

瞿秋白

年谱长编

姚守中 马光仁 耿易 编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瞿秋白同志一九五五年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工作时，曾向中央文献出版社领导同志提出，希望中央文献出版社能出版他的年谱长编。他生前曾向中央文献出版社领导同志提出，希望中央文献出版社能出版他的年谱长编。他生前曾向中央文献出版社领导同志提出，希望中央文献出版社能出版他的年谱长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领导同志对秋白同志的遗愿，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并决定出版他的年谱长编。这是中央文献出版社继《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之后，又出版的一部重要文献。

中央文献出版社领导同志对秋白同志的遗愿，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并决定出版他的年谱长编。这是中央文献出版社继《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之后，又出版的一部重要文献。

一九五五年
十二月一日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235038

瞿秋白 年谱长编

姚守中 马光仁 耿易 编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235038

(苏)新登字第 001 号

书 名 翟秋白年谱长编
编 著 者 姚守中 耿易 马光仁
责任编辑 杨杰 马洪才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地址:南京中央路 166 号
经 销 者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常州武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625 插页 3
印 数 1—1000 册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199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025—9/K·124
定 价 7.5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1985年6月18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杨尚昆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的讲话中指出：“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这是党中央对秋白的高度评价和历史结论。

秋白的一生，是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他在长汀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正当风华正茂之时，就不幸中途捐躯了。但他为寻求中国革命的真理，开创中国的革命大业，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作出了多方面的卓越贡献。秋白为共产主义事业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万古长青的。

秋白的一生，又是历经磨难、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特别是他在党内屡遭打击，但他对党和革命事业始终坚贞不渝，直至悲壮献身。他那优秀的共产主义品格，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令人敬仰、缅怀，也令人惋惜、深思。

秋白出生于“颠危簸荡”的旧中国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从小深受“士大夫意识”的薰染，“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论经籍”，涉猎老庄宋儒和佛学，同学间“以性灵相尚”，因而“思想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随之，母亲惨死，“家庭消灭”，“一家星散”，使少年秋白的思想更一度陷于“颓唐”“厌世”的绝境。

1917年，秋白孑然一身随堂兄瞿纯白来到北京，考入俄文专修馆。1918年，他开始接触新思想，“思想上似乎有相当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终于打破了秋白“孤寂的生活”，“卷入”了革命风暴的“旋涡”。他“‘热烈’的参与

学生运动”，任俄专学生的代表，带领大家上街游行示威，因而曾两度被捕。出狱后，他与密友郑振铎、耿济之等创办《新社会》旬刊和《人道》月刊，主张“改革社会”，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这是秋白思想上第一次质的飞跃。

1920年起，秋白“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并加入了李大钊等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了“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秋白不顾亲友的反对，毅然“决定到俄国去走一走”。他受聘担任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亲赴苏俄采访，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十月革命后不久的苏俄，经济上正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秋白不顾肺病缠身，在生活极其艰难的“饿乡”——苏俄，进行了频繁的采访活动，在留苏的两年时间内，写下了大量的通信，还不顾几度病危，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和《俄罗斯革命论》等四本书，满腔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歌颂列宁、俄国共产党和苏俄人民，成为向中国人民系统报道苏俄情况的先驱。在此期间，他还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世界观发生了第二次质的飞跃，完成了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成为“新时代的活泼稚儿”。1922年春，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1月，因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应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邀请，秋白回国从事党的领导、理论和教育工作。他出席了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大会起草党纲草案，并在大会上作党纲草案问题的报告。会后他还担任孙中山总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和“改组宣言”的翻译修改工作。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与毛泽东一起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积极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从党的“四大”到“五大”，秋白连续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局成员以及中央宣传部部长等

重要领导职务。1925年，上海暴发“五卅”惨案，他和陈独秀等发动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反帝运动，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大革命运动新高潮。1927年，他参与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他连夜起草了《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提交中央特委讨论。三次武装起义的成功，表明了这个意见书是正确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力主东征讨蒋。七月大革命失败后，秋白临危受命，毅然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他参与发动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接着，他主持召开“八七”紧急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从而开辟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秋白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突出的业绩是他所作的理论贡献。可以说这是秋白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先后编辑《向导》，创办并主编《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以及我党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他在这些党报党刊上，及时翻译和发表了许多马列的重要论著和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生平，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特别是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他提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的原则，指出“革命的理论 and 革命的实践相密切联结起来，否则理论便变成空谈。”他提出并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取得革命领导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强调无产阶级“要在共产党领导下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他还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便不得成功”，强调“中国革命的中枢是农民革命”。在对待武装斗争问题上，早在1923年，他就提出，中国问题的解决既需要“武装革命”，又需要“群众运动”，“同时并进相互为用”，并指出“各地直接组织武装势力，推翻军阀政府，才能使

民族解放运动胜利”。1926年，他发表《中国革命中的武装斗争问题》一文中，更明确指出：“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

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与党的根本利益，秋白坚决与党内以陈独秀和彭述之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以及党外各种各样的敌对思想如国民党右派戴季陶主义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应该承认，秋白在我党早期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还不可能形成系统完整缜密的理论体系，其中有些观点还存在某些偏颇与不成熟之处。但它确实是我党早期探索革命理论与革命道路中最优秀的成果。

“八七”会议后，秋白担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主持中央工作，但由于没有能正确认清当时革命已处于低谷的复杂形势，错误地提出了“不断革命”和“革命不断高涨”论，以及“合流直达社会主义”的“一次革命”论等观点，并在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据此制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从而“左”倾盲动主义的急性病在一段时间内在全党取得了支配地位，致使党和革命继续遭到不应有的损失。秋白的这些错误观点，究其来源，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明纳兹，但他宣传了，执行了，当然是难辞其咎的。尽管秋白在这时期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他对武装起义的指导方针，基本上还是正确的。没有武装起义的发动，就不可能有后来工农红军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秋白主动承担了错误的责任，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仍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党的“六大”以后，秋白留苏，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成员。就在这一年夏天，莫斯科中山大学发生风潮，王明宗派小集团在中山大学校长米夫支持下，捏造“江浙同乡会”反党小组织的

罪名，迫害反对他们的留苏学生。以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经过联合调查，否定了有“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因此，米夫及其王明宗派小集团，视秋白为实现他们政治野心的主要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自此开始，王明等屡对秋白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29年秋，他们利用联共（布）发动清党运动机会，对秋白公开点名批判斗争，诬蔑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秋白三弟瞿景白因此“失踪”。

1930年8月，秋白和周恩来同志一道回国，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党的整个工作逐步转到正确轨道上来，而王明等却无理指责秋白是“调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是“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1931年1月，在来到中国的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米夫、王明一伙进一步对秋白进行诬陷、打击，把秋白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并长期不予分配工作。1933年9月，王明等控制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又作出《中央关于秋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决定》，以莫须有的罪名指责秋白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号召全党对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

当时，上海正处在国民党文化“围剿”最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秋白在屡遭迫害和打击的逆境中，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主动挑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的重担。他与鲁迅等结成深厚的革命友谊，并肩作战，在近三年的时间内，以无比的热忱和惊人的毅力，翻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和高尔基等苏俄文学作品；创导了普洛（无产阶级）大众文艺理论，并从事大众文艺作品的创作实践；发表了许多探讨中国革命文化发展道路的文章；团结革命文艺工作者进行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对三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说这是秋白继政治理论之后在现代文学领域中又一个辉煌时期。秋白无愧于

“革命文学事业奠基人”这个崇高的称号。

1934年1月，秋白奉命去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并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秋白虽身患严重肺病，很想参加长征，却遭博古拒绝，留在苏区。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蒋介石加紧派兵“围剿”。在形势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中央分局决定送秋白去上海养病。1935年2月，秋白在突围时，不幸被捕。初关押在上杭监狱。身份暴露后，移押长汀国民党军卅六师师部。秋白在狱中，始终坚持革命立场，蒋介石曾多次派要员亲临劝降，均遭秋白严词拒绝。在狱中，秋白写了《多余的话》，他抱着必死的念头，严格解剖自己，并向同志作最后的告别。6月18日，秋白高唱国际歌，徐步走向刑场，在长汀罗汉岭前从容就义，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

建国后的十七年中，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缚，对秋白的研究，仅局限于文学领域的论述，至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给予一定的评价。至于秋白是我党早期的著名领导人之一，特别是他为探索中国革命理论与革命道路方面的卓越贡献，则极少涉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对已牺牲三十年的秋白也未能幸免，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连墓穴也被平毁。但历史是公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不仅恢复了秋白的名誉，并作出了新的评价。

在新的历史面前，对秋白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一个还秋白本来面目的阶段。学者们从党史、革命史、政治思想史、社会运动史、文化史等不同角度，探求秋白的精神世界和贡献。近几年来，各界多次举行隆重的纪念集会和学术研讨会，成立了瞿秋白研究会，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出版了极有价值的传记、年谱、专著和论文集，特别是出版了《瞿秋白文集》十四卷和《瞿秋白选集》一卷。在资料的发掘和考证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就。这一切都表明了研究秋白的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已经来临。

但是，随着对研究秋白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基础资料不足的矛

盾也明显地突出起来。其表现主要有：一是文献资料不足。特别是秋白的某些重要历史阶段和活动领域，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秋白在武汉时期的活动，1928年秋白第二次去苏及在苏期间的活动；1934年秋白在中央苏区期间的活动，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有关的第一手资料也不多，或虽有涉及但语焉不详，因此，在已出版的传记、年谱或专著中，往往略而不述，因而影响了研究的展开和深入。二是有关秋白的回忆录虽已发表不少，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史料，但由于时代久远，回忆者当时所处地位的局限及自身的情感因素的渗入，往往使有些事实或细节带有不确定性，甚至在同一历史事件的回忆中各执一词，出入很大，互相抵触。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回忆材料时，需要慎重地反复考证，力求去伪存真，使其符合历史的真实。三是过去流传较广，习以为真的某些被扭曲了的历史“事实”，没有给予必要的澄清，还在继续流传着。如过去说秋白是国民党“一大”代表，但我们遍查国民党“一大”代表名册，查对“一大”会议记录，均无秋白记载，可见秋白是国民党“一大”代表之说是没有根据的。又说秋白在党的“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经人查对考证，证明秋白在“三大”未被选为中央委员。再如有人发现一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京分盟于1932年6月出版的署名瞿秋白的《中国到那里去？》的小册子，未经查证就以为是新史料而予运用。我们发现在1929年2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四期上载有一篇署名问友（系潘文育）写的《中国到那里去？》文章，经查对此文与署名秋白的小册子不仅题目一致，内容与标题亦雷同，故可否定该文系秋白所著。等等。

正是基于上述的考虑，更出于我们对秋白伟大一生的崇敬、缅怀，萌发了我们编写一部《瞿秋白年谱长编》的动机。我们用数年时间，尽我们力之所及，将能搜集到的有关史料，一一予以查对考证，按编年的方式，编出一部以较为翔实的史料为依据、记录秋白一生历史的年谱来，为后人深入研究秋白做一点铺路的工作，并聊尽我

们一分对秋白的敬爱之情。

为此,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我们即着手进行史料的搜集、采访和考证工作,并在这基础上,按年谱的要求分工编写条目。凡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及过去曾讹传或有争议的史实,除在条目中如实概述清楚外,尽可能附以经过考证的第一手资料,以资佐证,这样既避免了年谱枯燥乏味的弊病,增添了可读性,又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and 研究的方便。经过十多个寒暑,我们终于获得了初步的成果,并和读者见面了。我们深深知道这一成果的取得,首先应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它,我们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其次,应归功于从事秋白研究的学者与专家,因为在我们的编写过程中吸取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劳动与对史料的发掘,也不可能有我们的这部著作。

《瞿秋白年谱长编》虽然出版了,但我们也深深认识到这部著作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它既有我们无法克服的困难,也有我们自身水平的限制。例如,不能说我们已穷尽了所有有关秋白的资料,特别是有些重要的文献资料,我们虽经努力仍无法看到。这样对历史事实的介绍,就难免会有疏漏不详的地方。其次,在条目的概述和资料的选择上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甚至错误的地方。本书的出版,只能说是研究秋白工作中的一个路标。瞿秋白研究的继续深入、发展,还须集体的奋斗和努力。正是这一点,促使我们鼓起勇气将几年积累的成果公布于众,让它在众人的培育下,进一步完善。我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期待着。

编者



瞿秋白同志死於二十五年一月。在
他生前，許多人不瞭解他，或者
反對他，但他在人民工作的勇氣
並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
的年月裏，站了英畧的~~第一~~
地位，領導了劇十年的風口火
舌，不顧屈服。他的這種為人，上
你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
意志和他在工作中的任何不
懈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
去。瞿秋白同志是有用的人，他
創始的，他是有思想的人。他的
遺集出版，將有益於青
年們，有益於人民的事業，
特別是在文化事業方面。

毛澤東

一九五〇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目 录

前言

1899年	1岁	1
1900年	2岁	4
1901年	3岁	4
1902年	4岁	5
1903年	5岁	6
1904年	6岁	7
1905年	7岁	8
1906年	8岁	10
1907年	9岁	11
1908年	10岁	12
1909年	11岁	13
1910年	12岁	14
1911年	13岁	17
1912年	14岁	19
1913年	15岁	21
1914年	16岁	25
1915年	17岁	26

1916年	18岁	28
1917年	19岁	34
1918年	20岁	41
1919年	21岁	43
1920年	22岁	55
1921年	23岁	73
1922年	24岁	100
1923年	25岁	111
1924年	26岁	133
1925年	27岁	155
1926年	28岁	179
1927年	29岁	192
1928年	30岁	243
1929年	31岁	268
1930年	32岁	279
1931年	33岁	293
1932年	34岁	330
1933年	35岁	358
1934年	36岁	386
1935年	37岁	408
附录一: 瞿秋白《多余的话》			455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479
后记			485

一八九九年 1 岁

一 月

29 日 申时,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① 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一个世代“士宦之家”。

谱名榭森,乳名阿双,学名瞿双。入中学后,自号雄魄、熊伯;自署别号涤梅、铁梅、梅影山人、瓠舟。中学后期,自改名为爽、觥、霜,字秋白^②。自此开始,即以秋白字行。

祖籍湖北黄梅。明初,迁至晋陵(今常州)。瞿氏世代为官,据《瞿氏宗谱》称:“瞿氏晋陵望族,明季巨富,号‘瞿半城’”。瞿氏“祖孙、父子、兄弟、叔侄,世代科名”,“无瞿不开榜”,“相继为士大夫者十余世矣,诗书之泽如此绵远,亦人家所难能而不可必得者也”。但到秋白出生前后,瞿氏家族已日趋衰败,走向破产。他在《饿乡纪程》中曾这样描述道:

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

① 清代自雍正至民国初,常州府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匱、宜兴、荆溪、江阴、靖江八县。民国初,阳湖并入武进县。1949年4月解放后,武进城区划入常州市。八桂堂在今常州市青果巷86号。

② 《1912年江苏常州中学一年级二班同学录》载:“瞿双(姓名)、雄魄(号),十五(年龄)”。1915年,秋白在《李长吉歌诗》上,题有:“乙卯季夏吴子凌虚持赠”,下署“秋白”两字。1917年、1920年12月,在《常州中学校友会会员录》的姓名栏内,均载有:“瞿爽,原名双,字秋白”。有自铸“秋白”印章一方。

级”之一家族里。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的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

又在《多余的话》中写道：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

父亲瞿世玮(1875—1932)，字稚彬(稚宾)。自幼生在武昌。因侍奉疯瘫的寡母庄氏，赋闲在家，不事生计。平日郁郁寡欢，沉默少言。“善绘画，工山水，颇得时誉”。还爱读医书，粗懂医道。信奉道教，对黄道学颇有兴趣。清光绪中叶，叔瞿庚甫(字廷韶)先后升任湖北按察使后，在武进营建八桂堂。瞿庚甫因举家均在湖北官邸，乃让世玮回武进照管八桂堂，并侍奉疯瘫的母亲。1903年，瞿庚甫病故后，失去依靠及经济来源，被迫迁出八桂堂，家境日趋贫困，妻金衡玉因之自尽后，一家星散，瞿世玮流寓济南，以教书、卖画为生。1932年6月19日病故，终年57岁。

母金璇(1875—1916)，字衡玉，江苏江阴县西乡大岸村人。自幼聪慧，爱好文艺，擅长诗词，旧学颇有根底。金璇23岁时与瞿世玮结婚，婚后深得婆母欢心，每谓“使儿能若是，则视科甲如拾芥耳”。金衡玉对秋白早年的成长有很深影响，她特别注意培养秋白对文学的热爱。金衡玉心地善良，性情温和，正直贤淑，勤快能干，尤乐意帮助穷人，就是在家境困窘后，也还常常竭尽绵薄之力，周济穷困邻居。因此，秋白十分敬爱他的母亲。

金衡玉生六子二女：

秋白、秩群(女)、昀白、榭红(女，早夭)、景白、垚白、榭兴(早夭)、坚白。

羊牧之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秋白父亲同堂排行第七，好技击，习黄老术，画学王石谷。母亲金衡玉是常州北门外大岸村广东盐运使金心芑次女，自幼延师教读，颇有旧学根底，心芑视为掌上珠。故结婚时，稚彬（秋白父名）就乡成礼，满月后才迁往八桂堂之天香楼。时我母在金家侍奉衡玉，情谊较深，故随之来常。翌年，即公元1899年1月29日，秋白诞生于天香楼（现天香楼尚在），生时发际有两旋涡，俗称双顶，故名阿双。入学后改霜或爽，又改秋白，秋白即霜之意。

一九〇〇年 2岁

十月

月初 妹轶群出生。

同年

叔祖瞿赓甫升授湖北布政使。

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

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赓甫，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的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

一九〇一年 3岁

(缺)

一九〇二年 4 岁

七 月

11 日 大弟云白出生。

云白,幼名阿云,又名昀白,谱名榭焱,过继给六伯父瞿世琨。曾留学苏联。解放后,在北京某中学任俄语教师。1964 年病故。

一九〇三年 5岁

七月

27日 叔祖瞿赓甫病故。

十二月

全家被迫迁出八桂堂，暂寓乌衣巷。

瞿赓甫在湖北病故后，其家属于12月5日，将棺柩运回常州安葬。赓甫一支各房也随之迁来八桂堂居住。这样，非属瞿赓甫直系的“七房”瞿世玮一家，就成为八桂堂多余的人了。瞿世玮和金衡玉不耐他们的“冷嘲热讽”，被迫迁出了八桂堂，暂寄寓河对面的乌衣巷。

一九〇四年 6岁

因乌衣巷寓所房屋太小,不能久居,又迁至城西织机坊(今西大街)祖母家庄氏星聚堂之九皋楼下居住。

同年秋入星聚堂的庄氏书馆读书。

一九〇五年 7岁

入常州冠英两级小学堂读书。在校读书用功，成绩优良，是一个聪明诚实、深受师长和同学称赞的好学生。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秋白在星聚堂时，始入塾读书。塾师为庄怡亭老先生。……后入觅渡桥冠英两等小学堂（后改名觅渡桥小学），堂长为庄苔甫老举人。他具有维新思想，主张废科举，办学堂。教师都为秀才，尚聘有一日本人教博物。记得一次放学回来说：“教师作了解剖小狗的实验。”他兴致特高，在纸上向我讲心的位置，并低声说：“我母亲平常总对我说，为人心要放在当中。其实没有一个人心在当中的，可见古人不了解心的位置。”

秋白在小学时，各门功课都好，他升高级时，我才考取初等一年级，秋白从不以“少爷”自居。回家后即到西面房里做作业。金太夫人来查看时，常留红枣、花生糖等以示鼓励。有一次做算术时，秋白好奇地问：“为什么三乘四是十二，四乘三也是十二？”我说：“老师教的。”他摇着头说：“老师教的，我们也要问个为什么？”可见他学习用心之深。

假日，秋白上午在家做作业，下午则喜欢同我到东门外天宁寺林园游玩。他特别欢喜捕捉各种昆虫，采捕各类树叶做标本。犹记一次傍晚，园林深处，归鸟正在休息，突然远方飞来一只苍鹰，削入林际，攫一小鸟，展翅高飞，顿时园林寂静。秋白颇有所感的对我说：“好光景就是给这种强盗们破坏掉了。要是天地间没有这种强

盗多好啊！”这话虽属天真，但出自幼小的秋白，寓意确是深远的。

……

秋白少年时上街，每每碰着乞丐喊着“少爷”，伸手要钱，他总是和蔼地看着对方年龄大的说：“老人家！你不要喊我‘少爷’，我不是‘少爷’，随即把金太夫人给他的零用钱，把铜元一枚放在他手里。有一次，他随着母亲到北门外贤庄去，秋白出去玩了后，母亲见他身上穿的褂子没有了，几经追问，他才说：“看到村上一个小朋友光着背在风里发抖，脱下给他了。”母亲听后无丝毫其他的想法，淡淡的一笑说：“这种事好是好，就是我们也不多啊！”秋白听了把头一扭说：“不多，不多，我们总比他们多些。”此事十年后，我们在上海与杨之华闲谈时，提起此事，秋白犹遗憾地说：“我一生就这那一次回过母亲的嘴。”……

羊牧之 《霜痕小集》：

一九〇六年，秋白八岁，……他在小学时，各种功课都好。他听老师讲太平天国故事，常州是被李鸿章雇佣外国洋枪队攻破的。他还晓得常州十八家的由来，说蒙古人攻打常州时，烧杀抢掠，房屋全被焚毁，只存城外（彼时城小故是城外）十八家，所以叫十八家村。

一九〇六年 8岁

三 月

19日 二弟景白出生。

景白,幼名阿森,谱名榭森。1902年随姊轶群到杭州四伯父瞿世琥家,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为人正直、刚强。他很快受秋白的影响倾向革命,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知心》等诗作。1925年春,被秋白带到上海大学深造,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景白随秋白抵汉口,参加党的工作。1928年去苏联,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时,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正在莫斯科。1929年9月,景白在苏共“清党”运动中,受迫害失踪。

一九〇七 9 岁

升入初等三年级班。

一九〇八年 10岁

开始萌发对封建制度和封建专制的强烈不满。

父亲瞿世玮，一生寄人篱下，无官无财，但他仰仗祖宗世宦的遗泽，以及亲叔瞿赓甫在湖北做大官的余荫，自己还有个“候补盐大使”的虚衔，在乡里仍能置身于“绅士”的行列，勾通衙门，欺压百姓，以维护其“绅士的体面”。为此，引起了少年秋白的强烈反感。他在后期写给鲁迅的一封《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的长信中，曾叙述了这段他“小时候最强烈的印象和记忆”：在他十岁那年，有一天，他正在看《三国演义》，忽然听到父亲为一件事对一个人大发雷霆，“接着就是父亲的骂声：‘混帐东西，办他！拿我的片子，送他到衙门去！’后来，我打听着，那被‘送去’的人是打了二十下屁股。为着什么事情我记不得了。但是随便拿一张大红名片可以打人家的屁股，这使得我非常奇怪。而且衙门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也是那时候打听清楚的。因此，张飞大打督邮那一回书，我觉得特别有滋味；而尤其有意思的是张角他们的造反。我想：‘你们要打人家的屁股，人家自然要造反，为什么又要叫人家是黄巾贼呢？’”

这件事，直到他被俘在狱中，都没有忘掉。1935年5月，他在长汀狱中准备写篇文学札记和自传性作品，曾拟订了一个《未成稿目录》，其中自传部分《家乡》中，就列有“大红名片”一节，显然是准备写这件往事的。

一九〇九年 11 岁

一 月

毕业于冠英小学初等班,在家自修半年。

六 月

25 日 三弟榭垚出生。

同年秋以高小毕业同等程度考入常州府中学堂预科。

一九一〇年 12岁

七月

升入常州府中学堂本科一年级。在中学期间已显示了好学、多艺的才能。

羊牧之 《霜痕小集》：

〔秋白〕在中学时除钻研正课外，已开始读《太平天国野史》、《通鉴记事本末》、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群学肄言》、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中国近世秘史》，及《庄子集释》、《老子道德经》，还有陈曼生印谱、百将百美图印谱，吴友如画宝等。书桌上、枕头边经常乱堆着《杜诗镜铨》、《词综》等。他的台上喜用红木盒的大端砚、白磁水盂、刻字的铜尺、大笔筒等。

……

他读书很多，有一次到我家来，吃饭时对我说：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文学如孔子与五经，与东周的词赋，与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上古、中古、近古，特别是近代史以及私人著述的野史笔记；哲学如先秦的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我说：做一个中国人这样不容易么？他说：这是起码条件。同时还对我说：他们要我读书，不好书我不读。

1910.7

记得升中学后，他看到阶前菊花盛开，他做了一首白菊花诗，诗是五言绝句：“今岁花开盛，栽宜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金太夫人看了称赞是好的。父亲稚彬看了，不以为然地说：怎么秋色淡，怎么霜痕无处觅？把秋白的秋字，瞿霜的霜字都写进去了，而且是淡淡，而且是无处觅，充满了不吉利的话，恐怕是儿不得善终。盖稚彬信星相之说，故有此看法。

……

秋白对文学的爱好，自小受金太夫人的启蒙，外祖父金心芑公的熏陶和督促，后来又经老师的教育，同学的琢磨，于是由爱好到精进，下笔成章了。词则更与同学任氏两兄弟乃纳、乃间，互相推敲研究，逐渐深入，先由二窗（梦窗吴文英、草窗周密）入手，继学各大家，于是渐能谱叶调，感情奔放。

羊牧之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秋白在中学时，由于思想上对社会的不满，有一次在作文簿上就题发挥大发议论，国文教师是一个研究《文选》的老秀才，看到了，惊异之下深表不满，于是在文后写了一大段斥责之词。秋白看到之后竟在批语后再加上批语。教师看到后大为愤慨，拿到学监处，后经研究，作了记过处分。秋白在读书时就此次记了一个过。

李子宽 《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

秋白……独于课外读物，尤其是思想性读物，研读甚勤，如《庄子》、《仁学》、老子《道德经》、《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等。在民初中学生中能注意此类读物者并不多见，尤其是江苏五中。我班同学受秋白影响的亦偶而借阅《饮冰室文集》及《仁学》等，此两书内容秋白在校时常引为谈助。惟《庄子》除秋白外，他人皆不易无师自通，亦惟秋白能独立思考。

暑期 每逢暑期，常到江阴县贤庄大姑母金家作客，与表妹金

君怡两小无猜，情投意合。

贤庄座常州西约 20 里，村子四周有清溪环绕，故又名环溪，村外则是一片绿油油的田野。大姑夫金家干（翰如），家资富足，又是十乡总董，是贤庄有权势的人物。秋白在这里渡假作客，常和农家子弟结伴上山放牛割草，或下溪钓鱼捉虾，过得十分欢乐。最使他留恋难忘的，是与表妹纤纤的一段初恋生活。纤纤是大姑母的幼女，名金君怡，小秋白一岁。她常和秋白在一起玩，秋白特别钟爱她。俩人随着年岁的增长，渐渐产生了互相爱慕之情。后来，秋白离家远行时，还特意为她画画写字，并赠折扇等物留念。后来，在《饿乡纪程》中提到：“有耳鬓厮磨啾啾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指的就是在贤庄渡假与表妹金君怡的这段两小无猜的初恋生活。

秋白赴俄以后，金君怡奉父母之命，另适他人。但她至死仍眷念着秋白。

一九一一年 13岁

七月

因病未参加期末考试,在本科一年级留学一年。

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烈士》:

当我于一九一〇年^①初从冠英小学毕业,考入常州府中学堂预科时,瞿秋白已经先我入学,为正科一年级生。后因病降级,故与我同班。初见面时,瞿秋白给我的印象是:面色白皙,头发深黄,体质孱弱,不大喜欢活动;休息时间只偶而跑跑浪木,打打乒乓球,平时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争执。

同月 与张太雷相识,成为挚友。

张太雷(1898—1927),原名复,又名雷让,字泰来、长铗,江苏武进人。是月,张太雷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因堂兄张揆让(字哲观)与秋白系同班同学,故与秋白相识,两人很快成为挚友,时相过从。

十月

10日 爆发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毅然剪去辫子,以示对辛亥

^① 李子宽以第三届毕业生离开冠英小学时,据《冠英十周年纪念》册记载,应是1911年1月。

革命的热烈支持。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秋白在星聚堂时，小学未毕业，就考取常州府中学堂预科（预科只办一期），校长为屠元博，他在日本时，加入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常在学生中进行民族革命教育，时秋白与张太雷同学，在屠的影响下，对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十分关注。一次，指着自已头上的辫子对张太雷说：“尾巴似的东西，我们非把它剪掉不行。”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当清皇朝被推翻的消息传来时，他独自在西面的房子里，自己把辫子剪下，高兴地提着，连跑带跳地喊母亲说：“皇帝倒了，辫子剪了。”他对辛亥革命愉快如是。迄今回忆，犹难忘怀。

同月 常州光复后，常州府中学堂成为临时驻军所，学堂暂时停课。

一九一二年 14岁

常州中学堂复课后,在一年级二班就读。是年,常州府中学堂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

十月

10日 双十国庆节,在门口悬挂写着“国丧”二字的白灯笼,以发泄对政局的不满。

瞿逸群《怀念哥哥秋白》:

他〔秋白〕中学读书时,为辛亥革命前后时代所激荡,已经忧国忧民,深深思索国家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了。他在周围的人中,最早剪掉了那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我现在还记得他高擎着自己的辫子,在天井里欢呼雀跃的样子。在当时他幼小的心里,以为国家已经有救了。但到了第二年,他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那年的双十节,即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许多人家都挂上红灯笼,表示庆祝,有的还在红灯笼上写上“国庆”。哥哥却与众不同,弄了个白灯笼,写上“国丧”二字,挂在侧门上。我那时已经懂事,怕惹出祸来,赶忙摘下,他又挂上,我再去摘下,他还是去挂上,还追来追去地要打我。我终于拗不过他,只好听凭这盏“国丧”白灯笼悬挂门外,直到天明。事后,我听他对人说,这时孙中山已经退位,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并且抓着兵权,还有什么可“庆”呢!这个“民国”就要名存实亡了。这一年哥哥也只不过十二岁,却怀着这样深沉的忧国

之心,这样明晰的政治见识,我现在想来真令人惊讶。

一九一三年 15岁

因对辛亥革命后的“政治恶象”失望而陷于迷惘，一度产生“避世”思想，与同学组织诗社，醉心于诗词、绘画、篆刻和昆曲的研究。

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证明中国旧社会的破产。可惜，因中国五十年的殖民地化使中国资产阶级抑压他的内力，游民的无产阶级大显其功能，成就了那革命后中国社会畸形的变态。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與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人所厌闻，——一激而成灰世的人生观；或是有托而逃，寻较远于政治科学的安顿心灵所在，或是竟顺流亡反，成绮语淫活的烂小说生涯。

所以当我受“欧化”的中学教育的时候，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的机会。所谓“欧化”——死的科学教育——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炳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研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友谊的结合无形之中得一种旁面的训育。然而当时是和社会相隔的。

节假日，还常偕知友游红梅阁。后曾赋诗一首，记述旧时游红梅阁与老道交往的情景。诗云：“出其东门外，相将访红梅。春意枝头闹，雪花满树开。道人煨骨出，烟显舞徘徊。此中有至境，一一入寒杯。坐久不觉晚，瘦鹤竹边回。”这首诗反映了少年秋白因辛亥革

命失败而产生的“避世”情绪。

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

省五中，上午上课四小时，下午上课两小时；下午三时后，学生课较差者补课一小时，如国文、英文等。其他学生则于此时间上游艺课一小时，游艺内容有书法、篆刻、军乐、雅歌等，由学生自由选择分组练习。秋白曾一度选雅歌（昆曲）学“拾金”一出，既而弃去。以后彼于著作中曾批评唱曲行腔咬字尽符自然，其认识即基于此。后一年改习篆刻（治印），我亦与俱，其时发现秋白于小学（说文）有相当知识，于各种印谱早有研究，较诸我辈初作尝试者迥然不同（按：秋白六伯父世琨能篆能刻，秋白自幼学习。中学国文教师史蜚夫善治印，看到秋白喜爱此道，就精心教他）。秋白于治印之皖浙派，于浙派较为爱好，所治印章在校为多，……秋白于音乐能吹洞箫，偶于月下一吹，音调婉转而凄楚，似惟此器适合于其性情。于国画能作山水，但亦不常作，在校时写过两三幅，后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时曾画过两三幅，我乞得一幅。^①

自1913至1914年之间，秋白课余时间付诸吟咏者不少。最初，我班同学年龄较幼者四人即江都任乃闾、宜兴吴南如与秋白和我，相约学作诗词，从咏物开始。我未得其门径，不久即退出。秋白与任、吴乐此不彼，各存二三百首，抄录成帙，秋白与任君进步尤速，惜稿早失。三人中惟秋白间亦作词。

秋 因祖母移居杭州四伯父处后，经济来源断绝，全家生活更陷入困境，被迫迁入瞿氏宗祠。

^① 秋白的画保存下来的有三幅：题赠李子宽、表妹金君怡和表兄秦恩寿。

王铁仙^①《瞿秋白论稿》：

瞿秋白一家，没有一分土地，也无自己的一间房子，父亲从未正式就业。经济上，曾靠两个方面支撑。一是由于父亲世玮侍奉祖母，因此世琥每月约有大洋五十元寄来，它也就成为秋白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二是贤庄的大姑母家，是地主，逢年过节也有些柴米运来，接济一下。后来，母亲认为父亲正值壮年，应该出去做事，好有个固定收入。因而在征得世琥同意之后，于一九一三年秋天，把祖母送到世琥家里，然后父亲到黄陂二姑母周家管帐，月薪约三十元。（有的文章说世玮在去山东前未外出过，是不确的。）但是，不久，世琥被罢了官，自己经济拮据，又兼祖母与他同住，就不再往秋白家寄钱了。这样，秋白一家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二姑母那里又因分了家，不再主持家政，也绝少来接济了。自此秋白一家每况愈下，渐渐只能以典当衣物和借债度日，借据积了厚厚一迭。母亲曾伤心地说：“要等我到七十岁，才能还清这些债啊！”而当时她才四十来岁。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秋白家因两处经济来源断绝，难以维持，不得不将星聚堂每月租金七元的房屋退赁，迁往城西瞿氏宗祠。在当时，住祠堂是极不体面的事，但亦无可奈何，实逼如是。瞿氏宗祠是秋白在常州最后的一个住处，此时我母亦因年老体弱，携余回家。记得走时，秋白犹执手嘱我：“好好读书。”……

瞿氏宗祠在城西觅渡桥北堍，面对河流（今河已填没），西面四席，为祠的正屋，东西一进，由小门出入，头席为灶，二席空着，三席为稚彬夫妇卧室及用膳之处，四席为弟弟住处，后翻轩为秋白卧室及读书之所。轩东墙下置小床一，正中窗下置方桌一，煤油灯一盏，

^① 王铁仙系秋白妹轶群长子。

壁上悬地图一，玉屏箫一，假日中同学来时，恒叙谈于是。张太雷亦常来之一个。……时秋白十五岁。

搬进祠堂后，因四伯父及大姑母两处经济来源断绝，生活全靠借债度日，后来有时连去了信，回信也没有。一次我奉母命提一篮芋头送去，午饭时分，秋白留我吃饭，实际是早上剩下的白粥，他边吃边问我学习及家庭生活情况，最后很有感慨地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孙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说：“我还有点粥吃，乡下还不知多少人家连粥都吃不上哩！”

又一次，中秋前夕，我去时刚好看到秋白在整理一包衣服，说是要送孙府弄当店典质。他告诉我：“这是母亲暂时不穿的一件绸棉袄和几件陪嫁时的旧衣服。”我问：“天一冷太夫人怎好没棉袄？”他苦笑着说：“天下冻饿人何止我母亲，到那时再说吧！”

……

在典当度日的情况下，面对着社会上的一些现实，秋白思想十分愤慨，十分苦闷。有一次我们在闲谈《水浒》中的英雄好汉时，他竟愤然地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酒保。”我笑着说：“做个酒保有什么出息。”他笑着说：“做个那样的酒保也是有意思的。”如今看来，这虽属笑话，但亦可见秋白当时的心境。

一九一四年 16 岁

六 月

10 日 随省五中全校学生乘船赴上海参观展览会。

省五中游艺部在这次展览会上有 80 余件展品在巴拿马万国展览会上展出曾获优等奖。据瞿軼群回忆,其中有秋白的作品。

十 月

升入四年级二班。

一九一五年 17岁

二月

入四年级最后一学年。

夏 因支付不起学费,于四年级最后一学期只差几个月被迫辍学。

失学的痛苦,给青年秋白以沉重的打击,他在《饿乡纪程》猛烈地抨击形将没落的封建家制道:

我幼时的环境完全在破产的大家族制度的反映里。大家族制最近的状态,先则震颤动摇,后则渐就模糊渐灭。我单就见闻所及以至亲自参与的中国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种社会现象而论,只看见这种过程,一天一天走得紧起来。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排诅咒毒害,无所不至。“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

羊牧之《霜痕小集》:

时生计日艰,无法解决。秋白以无钱交费,竟至辍学。昀白以入嗣六伯父随嗣母费氏住。秩群则时往舅家。阿森、阿垓无钱入学,

只得在家，就太夫人读。时阿壺尚小，略教识字，阿森则在后翻轩八角窗下一方桌上，授以鲁论唐诗，详为讲解，教以讽颂，有时不能复讲，辄加夏楚。

张晓萃《瞿秋白少年时代侧记》：

她（秋白母金衡玉）很爱秋白，深知他在子女中的秉赋最高而且有抱负，一心想培养他成材。但由于丈夫无能而又嗜烟，家境破败，遂使秋白中途辍学，这使她精神上很感痛苦，曾经多次给无锡的秦耐铭^①写信，提到瞿秋白前途问题，信上说：“阿双（秋白的乳名），年龄大起来了，他的父亲不管一切，最好跟他姐夫（指秦）在一起，可以研究些学问。”……言语中隐含着无限的辛酸。

① 秋白的姨表姐夫。

一九一六年 18岁

二 月

月初 奉母命去无锡秦耐铭家,商谈就小学教员事。

7日 母亲金衡玉为债务所逼,吞红头火柴自尽。

王铁仙《瞿秋白论稿》:

这个家庭,可以说是清末民初典型的破落封建士大夫阶级的家庭。金璇则是这个破落的封建家庭中的第一个受害者。她一方面为不断应付咄咄逼人的债主而痛苦不堪,为思量维持生计而愁肠百结;另一方面,当年为要使丈夫外出谋事而送走婆婆一事,还给她带来不贤不孝的“罪名”。当时,祖母因不愿离开故土而骂过她,而祖母于一九一五年阴历九月初二,即到杭州不到两年就亡故了,因而更有人数说她“把丈夫逼走了,把婆婆逼死了,……”金璇为此百感交集,曾对着祖母的遗像整整哭了一夜。

一九一六年初(旧历民国乙卯年底),金璇的外甥女婿(金璇姐姐的女婿)为秋白在无锡乡下谋到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业。这时,金璇已准备自尽,有意要支开较为懂事的秋白,就叫秋白到无锡去面谈一次,并嘱他就在无锡过年,不必急于赶回。另外,又要轶群去舅舅金声侣(金璇的哥哥)家探望表姊病体。轶群不几日就回家。一天见云白买回一包东西,说母亲不让告诉人,也就没有细看。其实,这是一封红头火柴。约腊月二十四日,世玮两手空空地从湖北回

来,意气消沉,金璇见了,唯有叹息而已。除夕之夜,她做了一些较好的菜肴,说了一些吉祥如意的话。晚饭后,孩子们睡了,她还为轶群改制了一条棉裤,为阿谷的狗头帽缝上了福、禄、寿、喜四个银字。新年过后,丙辰年正月初五(一九一六年二月七日)子夜左右,轶群醒来,见母亲房里还有灯光,朦胧中见她在灯下疾书,隔壁房里父亲则已酣睡。后来还依稀看到母亲过来给最小的阿谷掖紧被子,在另几个孩子床头转了一会,又到自己床前俯视。轶群当时也与弟妹们一样,年幼无知,又兼瞌睡,根本没有觉得有异样。凌晨,父亲才发现她已经服毒多时,正在极端痛苦之中。她是剥下红火柴头,用桃花纸包成小丸,用虎骨酒吞服下去的。地上还散落着不少火柴头。年节里医院停诊,到别处请来一个外科郎中,当然毫不济事。当日(初六)下午六点左右(酉时),金璇停止了呼吸,终年四十一岁。她平时爱读的书藉,同着各种借据、当票,都整整齐齐地放置在案头。而昨夜所写,是几封给亲友的书信,信中恳切请求他们照看、扶助自己的子女。秋白于次日(初七日)上午从无锡赶来,恸哭在地。正如他后来所说,母亲留下的“唯一遗产”,只是对于子女的万般慈爱。

9日 接到父亲打来的电报,与秦耐铭夫妇一起急忙从无锡赶回杭州奔丧。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秋白得电赶回,已初七日上午,看到火柴盒,桌上遗书,但呼母不应,哭母不闻,遂卧床前地下大哭,亦无济于事。

王铁仙《瞿秋白论稿》:

丧事是世玮主持的。世玮向一个亲戚(秋白一个表姐的公公)借了一百元钱,买了棺木等物,用以入殓。……当时,除了借款一百元外,秋白还将两只榉木衣柜典给当铺,还清了米钱,另有裁缝费

用等则拖欠了下来。自然，一大迭借据当票(放在一朱红漆的摆盒内)，更无法清还。……

金璇的丧事十分草率。祠堂第二进厅上，安放灵柩，挂起白幔、遗像、牌位上书“金宜人之位”。来吊丧的人，只有秋白的舅舅金家、表舅母陆家、表姐夫秦家(即秦耐铭家)。金声侣送了一幅挽联，内容是：“我妹非人妹，傲骨珊珊男子相；伊女即我女，……”。“伊女”指轶群，因她曾居住舅家，但下联后半句她已不能记忆。世玮也有挽联，轶群只记得其中半联原是“受尽讥谗全大局”，后因怕得罪亲友，改成“受尽饥寒全大局”。其原句颇能说明金璇生前的处境，透露了破落封建家族里的关系。……

入殓后，灵柩放在祠堂东侧屋内达十多年，一直无钱买地安葬^①。

13日 家事安顿好后，即随秦耐铭匆匆去无锡南门外江溪桥杨氏小学任教。自此，“一家星散”。

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我因母亲去世，家庭消灭，跳出去社会里营生，更发见了无量无数的“？”。和我的好友都分散了。来一穷乡僻壤，无锡乡村里，当国民学校校长，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所以当时虽然正是袁世凯做皇帝梦的时候，政治思想绝对不动我的心怀。思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

又写道：

我母亲已经为“穷”所驱逐出宇宙之外，我父亲也只是这“穷”

^① 秋白母灵柩，后来于1942年前后，因私立群英中学借瞿氏宗祠开学，葬于东郊乱葬坟中。1962年，才在常州市人民政府主持下，由杨之华从《瞿秋白文集》稿费中拿出三百元经费，将瞿母遗骨迁葬于西郊公墓，墓碑上刻：“瞿秋白烈士母亲金太夫人之墓”，下署：“媳杨之华、女瞿轶群敬立”。“文革”中被毁。

的遗物。我的心性，在这几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lumpen proletariat)的社会地位中，融陶铸炼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不能知道。只是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几度的回光返照的时候，影射在我心里，影响于我生活，成一不可灭的影象，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积一深沉的声浪，在这蜃楼海市的社会里；不久且穿透了万重疑网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来。

秦耐铭回忆：

住在常州四天，等待秋白父亲摒挡一切完竣之后，于正月十一日，遂又匆匆和秋白一同返锡。那时离开学日期很近(旧例各校开学规定过元宵节后)，我托邑人华仲远介绍到江溪桥杨氏小学，担任校长兼教课。

杨晓萃《瞿秋白少年时代生活侧记》：

瞿秋白丧母后，十分悲痛。为了谋生，母亲“头七”刚过，他就随着秦耐铭到无锡扬名乡江溪桥一所民办小学当老师，教算术、唱歌、图画，月薪十元。这是一所乡村小学，不同年龄不同班级的学生都聚在一个教室里，所以教师也就成了所有学生的共同老师。据秦耐铭回忆，瞿秋白在这里教了两学期。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母亲逝世后，他(秋白)妹妹轶群同弟弟阿谷往舅舅金声倡家。阿谷即坚白(……)时方五岁，后又随舅迁回贤庄，至九岁轶群又同阿谷、阿森即景白(……)往杭州四伯父家。稚彬同阿垚至武昌二姑母处，二姑丈周复生是个大地主，不愿视穷亲戚还同一个小孩来，心颇厌恶。稚彬不能耐，意态消极，遂携阿垚往山东一道院，从此一家星散。这事对秋白内心受到深刻的刺激。

四 月

5日 清明，由无锡回到常州瞿氏宗祠，祭奠母亲灵柩，并写《哭母》诗一首，以示悼念：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旧新痕；
饥寒此日无人管，落在灵前爱子心。

1925年，秋白在上海与羊牧之相聚，曾赠他四首五言诗，其中一首写道：

君年二十三，我年三岁长。
君母去年亡，我母早去养。
亡迟早已埋，死早犹未葬。
茫茫宇宙间，何处觅幽圻。
荒祠湿冷烟，举头不堪望。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是年清明节，秋白从无锡放假回常视母柩。时瞿氏宗祠尚有一许氏阿妈在，代为照顾母柩。我去看他，秋白详谈小学教育和学校四周地方恶势力任意欺侮农民的情况，在留午饭吃菜粥时，他又出示了《哭母》七绝一首：“……”。他悲伤地读完后告诉我：母亲自杀后，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父天主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改革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

秋 赠金君怡山水画一幅。

十一月

辞去杨氏小学教职，回到常州，住在舅舅金声侣家。

秋白在杨氏小学，孤寂一人，目睹学校四周地方恶势力任意欺压农民的情景，又牵挂着星散各地的家人，加上学校设备破败不堪，且有几个难驯的调皮学生使他不快。曾写信给在武汉的堂兄瞿纯白，准备走出家乡，在外地获得重新学习的机会。在接到堂兄的复信后，即于农历十月间辞去了杨氏小学的教职，回到常州，暂住在北门外通江桥小皮尖村舅舅金声侣家。

十二月

怀着渴求知识，寻找光明和希望的心情，告别家乡“只身由吴而鄂”。

到车站送行的有胞妹轶群、表姐金君芝和“借给我车资”的陆家表舅母。

一九一七年 19岁

春 到武昌后，在堂兄瞿纯白的帮助下，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因学校设备和教学条件都很差，加上学费昂贵，“饭碗问题”无法解决而中途退学。后到黄陂二姑母家寄住。在表兄周均量的指引下，醉心于诗词和佛学的研究。在此期间，经医生证实，患有肺病。

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唯心的厌世梦是做不长的。经济生活的要求使我寻扬子江而西。旧游的瓜洲，恶化的秦淮，长河的落日，皖赣的江树，和着茫无涯涘的波光，沉着浑噩的波声，渗洗我的心性，舒畅我的郁积，到武昌寻着了纯哥，饥渴似的智识欲又有一线可以充足的希望。

——饭碗问题间接的解决法。同时却又到黄陂会见表兄周均量，诗词研究更深层一层，他能辅导我的，不但在此，政治问题也渐渐由他而入我们的谈资。然而他一方面引起我旧时研究佛学的兴趣，又把那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那一点萌芽折了。

王学其《“天涯涕泪一身遥”——少年瞿秋白在黄陂》：

1919年冬天，在黄陂城关正街周家大屋门前，来了一位中等身材、俊秀文静、悒郁瘦弱的少年。他提着简单的行李，戴着一幅近视眼镜。这位少年便是瞿秋白。

……

瞿秋白到姑母家那天，姑侄相见，感伤至极。姑母把秋白揽在怀里，亲了又亲。秋白触景生情地想起了那惨死的慈母，于是倒在

姑母怀里，恸哭起来。那年秋白才十七岁。

当时他姑母家的后花园中，有房屋三间，两间藏书，一间是私塾，表弟周均适和先他而来的弟弟阿垚就在这里读书，塾师就是他的表兄周均量。秋白自己则经常在藏书室的书橱前，选择爱读的书，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阅读着。他最爱读的是《资治通鉴》、“四史”等书，不爱读四书五经。当时他和均适同榻，均适睡眠时间较早，往往一觉醒来，已是夜阑更深，只见秋白仍在暗淡的煤油灯下苦读着。……秋白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来黄陂后，又不注意休息和调养，所以这时的身体更虚弱了。姑母和堂妹发现他经常咳咳呛呛的，怀疑他有肺病，请中医诊断，医生说确实患有肺病，并叮嘱他一定要坚持服药，尤其要注意休息，姑母也再三劝他多休息，少看书。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初期肺病没有什么大不了，你放心好了！”此后他为了避开姑母的眼目，总是等人家入睡了，再悄悄起来，潜心攻读。

……

秋白酷爱诗词，对绘画、雕刻也颇有兴致，因此有时还作山水画，操刀琢印。有时也看佛书。对托尔斯泰的僧侣主义，也曾一度发生兴趣。均适有一次和秋白开玩笑说：“你对佛学这么感兴趣，莫非是看破了红尘，要出家了吗？”秋白即严肃地答道：“‘老庄’是哲学，佛经里也有哲学，研究学问，知识不妨广泛些，真理是在不断的探讨中积累和总结起来的。”

……

秋白在黄陂的交游不多。那时常来周家串门，与均量切磋学问的好友李笠，是一位文学和绘画的爱好者。秋白便和李笠结成了学友。他们三人后来常在一起品诗评画，论文析疑。他们自己的诗词也常常互相品评阅读，不少是写风物、时令、人情的得意之作。其间秋白还向他们出示过自己当时随身携带的《哭母》七绝几首。……秋白对于古典诗词爱好的全盛时期，也就是在这段黄陂做客的日

子里。

……

秋白在黄陂游历过的胜境中,给他印象最深的要算是陂邑的著名十景之一——铁锁龙潭了。……在郁郁不快中,秋白曾多次情不自禁地到那个“影闭空潭探月冷,春深九地抱龙眠”之处,或沉吟湖畔,或放歌桥头,或看书休息。……秋白善吹洞箫,他常以吹箫排遣郁闷,抒发情怀。……

1917年元宵节之夜,秋白也是在龙潭渡过的。那是一个风清月朗,夜空如洗的晚上。……均量、均适等邀秋白到闹市区游玩,对铁锁龙潭一往情深的秋白,却力主到铁锁龙潭赏月去。为了对客人表示尊重,均量、均适等欣然同往。秋白自己是很高兴,赶忙走到前面带路,把大家引到一个他认为最便于观赏清波皓月的处所。在那里,大家面对寒空月色和清澈的潭水,诗兴大发,浮想联翩。秋白首先吟诵起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接着又朗诵起杜甫的诗句:“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海内风云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等诗句,秋白的声调先是洪亮铿锵,随后却越来越低沉微弱了。敏锐的均适,知道秋白准又是在“每逢佳节倍思亲”中黯然神伤,于是便借题冲淡和岔开他的思绪,指着潭水问道:“表兄,这潭里果真是锁过一条龙吗?”秋白微笑着说:“这不过是神话罢了,怎能当真呢?”接着他便把《史记》中记载孔子见老子后,对门人说的一段话,念给大家听,“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这次夜游龙潭,给秋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17年春天,秋白的心,有如经过了一冬的酝酿、沉默,终于苏醒过来了的春天一样,意识到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所以在黄陂客居了三四个月之后,便又由湖北而燕地北上,到北京另寻生路,从此踏上了新的生活里程。

暮春 抱着上大学的目的,从黄陂回到武昌,随堂兄瞿纯白北

上,来到北京,寄居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羊肉胡同堂兄家里。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这三四个月的旅行,经济生活的要求虽丝毫没有满足,而心灵上却渐渐得一安顿的“境界”。从此别了均量又到北京,抱着入大学研究的目的。

孙九录《瞿秋白在常州府中学堂和北京的一些情况》:

一九一六年冬,我在我的姑丈百魁处,遇见秋白的同祖父堂兄瞿纯白(刘瞿两家是至亲),他告诉我秋白已到北京来,就住在他家里。瞿纯白当时是北洋政府外交部护照科科长。……我到瞿家去看望秋白,他对我说,中学出来后,因急于要找事做,以解决家庭生活问题,故曾当过小学教员;年初(指一九一六年阴历正月)母亲去世,觉得在乡间当小学教员孤陋寡闻,无甚意义,想寻找一合乎意愿而比较有所作为的事,遂来京就商于纯伯堂兄。他的情绪并不因穷而颓唐,反比中学时开朗。我并没有问他离中学后的详细情形,因他在中学时经常写些小品文学,就建议他写些作品向京沪各报副刊投稿。

瞿重华《回忆秋白叔父在北京的情形》:

当时,秋白大叔还不到二十岁,高高的个子,清瘦的面庞,看上去面清目秀,文质彬彬,完全是一个读书人的模样。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他(秋白)和两个弟弟住在北京叔伯哥哥瞿纯白家里,还有一弟一妹住在杭州他的伯父家里。纯白先生我见到好几次。他是一位好好先生,那时在外交部做一个科员,收入微薄,但负担很重。秋白兄弟三人住在他家里,很得到他的照料。我记得秋白独自住一个屋子,屋子里有书桌,书架,收拾得干干净净。

四 月

应文官考试，未被录取。

同月 去天津会晤常州五中老同学任乃讷、任乃闾、张太雷、李子宽、吴文炳等，并合影留念。

七 月

闲置半年，因张勋复辟，为避兵祸，受瞿纯白委托，护送家眷三人离京去黄陂周家。复辟事件平息后，回到北京，曾到北大文学院旁听胡适等人的课。

九 月

考进北洋政府外交部部立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并自修英文、法文，继续研究文学和哲学。

同月 随瞿纯白迁至东城根东观音寺草厂胡同南口路西居住。不久，云白、垚白也来京一起生活。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虽是大言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

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当时一切社会生活都在我的心灵之外。学俄文是为吃饭的，然而当时吃的饭是我堂阿哥的，不是我的。这寄生生涯，已经时时重新触动我社会问题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

后来又在《多余的话》中写道：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教员度过这一世。甚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也希望他能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年夏），当时我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沈颖《关于秋白的一点回忆》：

秋白是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九月考入北京外交部俄文专修馆第二届甲级（俄文专修馆座落东总布胡同十号，民国元年起由东省铁路学堂改称外交部部立俄文专修馆，经常保持甲、乙、丙、丁、戊五班）。秋白是在原有之第一届甲级毕业后考入者，故在第二届甲级肄业三年，于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冬因赴苏离校。在校时住东城东观音寺胡同内草厂胡同南口内路西他的堂兄纯白家内。那时候，纯白在平汉铁路局任差，秋白与其弟云白均依其兄纯白资助。秋白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彼时俄文专修馆每星期日上午有文课，全校学生一律参加，秋白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作文课

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至名遍校内,无人不知!秋白同志除上课外定有自修表,据记忆所及,大概为俄文、英文、法文、社会科学及哲学等。每日不论多忙,必定要照表把应做的工作作完,所以往往到深夜两三点钟才睡。喜吸纸烟,烟卷常不离口。平日甚少谈话,然每作谈论,辞如泉涌,滔滔不绝,而且关于每一问题都作有系统的陈述。对于报章所发表的大事件虽事隔多日,而谈及时总是源源本本的说出来。记得有一次,胡政之为聘请大公报副刊编辑,邀秋白、济之等吃便饭(大约民国九年秋天,彼时胡政之刚由法国回来,不久为了适应新文化潮流,欲改组天津大公报副刊),席间五六人只听到秋白与主人胡政之的谈话,由时事而及文艺而及法国出版的李白诗选译文,使我大为惊异佩服他的渊博。未几我又与他同赴天津,采访俄人柏烈伟,他以三年的俄文程度,平日在校很少练习俄文会话的机会,竟然说得相当流畅。……

瞿重华:《回忆秋白叔父在北京的情况》:

也许正是贫困的家境,更加激励了秋白大叔发奋图强,刻苦钻研的坚强意志。在学校里,秋白大叔的学业成绩总是在前几名,而“俄专”的课程远远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那时候我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养家,曾在一个法语补习班兼课,自己编写了一套法文教材。大叔又利用这个机会,在学习俄文的同时,自学起法文来。想不到几个月之后,他的法文水平,竟然远远超过了补习班的其他正式学员。

十一月

7日 俄国在列宁领导下爆发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一九一八年 20岁

开始接触新思想,新的人生观开始形成;并积极参加校内外的社会活动,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

到北京后的初期,秋白在思想上仍陷于苦闷、徬徨和探索之中。1917年底或1918年初,曾写了一首七绝: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这首诗,正反映了他当时从“避世”到“厌世”的消极情绪。

1932年12月,重录此诗,并书赠鲁迅时,在诗后写了如下“跋语”:

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

但到了1918年,秋白受国内外形势激荡的影响,终于走上新的人生道路。他在《多余的话》中这样写道: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

瞿重华《回忆秋白叔父在北京的情况》:

大叔除了勤奋学习外,还积极参加了当时进步学生的各种社会活动,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经常有和大叔年纪不相上下的人到我家里来聚集在他的屋子里,热烈地谈论

着,常常到深夜。我印象最深的是郑振铎^①(当时他在北平铁路管理学校读书),他瘦高个子,穿一件半旧的长衫,几乎是天天都来,有时一天要来两趟。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秋白在我们几个朋友里面,是有“少年老成”之称的。许地山^②、耿济之^③、瞿世英^④和我的年龄都比他大。地山在入大学之前,还曾“饱经世故”,到过南洋,做过教师。但比起秋白来,似乎阅历都没有秋白深。秋白在我们几个人当中,够得上是“老大哥”。他说的话,出的主意,都成熟、深入、有打算、有远见。他的中国书念得很多,并大量刻苦的读着哲学书。对于“老”、“庄”特殊有研究。我那时只读些刘知几《史通》、章实斋《文史通义》之类的书,见解很幼稚,对于他的博学和思想的深刻是十二分的佩服的。有许多事,都要去请教他。

①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史学家。

② 许地山(1893—1941),笔名落华生,台湾人。现代小说家、散文家。

③ 耿济之(1900—1947),名匡,上海人。翻译家。

④ 瞿世英(1900—1976),是秋白的远房叔父。字起杰、号品涛。作家、教育家。

一九一九年 21岁

四 月

6日 清明，赠李子宽山水画一幅。画面上高山临水，老松数株，山水阁一座，内有一人横琴抚弦。画上题词：

松风自度曲，我琴不须弹，胸中具此潇洒，腕下自有出尘之概，何必苦索解人耶。

己未春清明为子宽五兄雅属。秋白瞿爽，盖“爽”印章。

五 月

4日 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满怀爱国热忱，积极组织和率领俄专同学参加天安门的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斗争，被俄专同学公推为总代表之一。是日，因疲劳过度，肺病发作，口吐鲜血。

5日 积极响应全市专科以上学校总罢课的号召，领导俄专学生参加罢课斗争。

王士菁《瞿秋白传》：

五月四日那天，他[秋白]带领俄文专修馆的学生，参加了游行示威队伍和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斗争。因为疲劳过度，他回校以后，当天即肺病发作，口吐鲜血，但他仍奋不顾身，第

二天又积极响应全市专科以上学校总罢课的号召,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会的负责人,积极领导俄专学生进行罢课斗争。

6日 代表俄专学生出席各校代表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大纲,宣布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成立。会上,被选为“学联”评议部议员,和各校代表一起,积极领导北京广大青年的爱国反帝斗争。

学联成立后,立即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接着,又投入了挽留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斗争。

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秋白所代表的俄专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所代表的汇文大学和铁路管理学校等单位便联合一起,进行爱国活动。秋白因有领导才干和组织能力以及出众的辩才,就成为主要的“谋主”和领袖人物。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我们几个代表都是小单位,而且在那些单位里,做工作十分困难,群众意见多,领导不起来,特别是我几乎成了“单干”。我们这一群代表着“俄专”“汇文”“铁路管理”的便在一起,成了一个小单位,主要的原因是平常见面多,比较熟悉,因之,在开会、活动时也就常在一起了。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自己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

24日 北京政府徐世昌下令将北京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学生的爱国斗争处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和战友们一起采取更加灵活更加巧妙的隐蔽斗争。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越到后来,我们的活动越困难,北大、高师都无法开会了,只好到东城根的“汇文”去开。开会的时候老在夜间。悄悄的个别的溜

进来开会。散了会之后，也一个个悄悄的溜出去。军阀的走狗们变得更狡猾了。说不定就埋伏在附近，叫一声你的名字，如果回头一答应，就会被他们捉去。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已经捉了好几个人。秋白是很机警的，曾经被一个走狗跟踪了半天，跟上了电车，又跟上了人力车，但他转弯抹角的兜圈子走，终于甩掉了那个狗子。自此之后，秋白的行动显得更小心了。有时，总是我们三两个人一同走，以便彼此有照应。

六 月

3日 率领俄专学生上街演讲，遭反动军警逮捕入狱。

北京政府加紧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诬蔑学生爱国行动是“越轨”、“祸国”，并下令“即日上课”，否则将予逮捕法办。是日上午，北京学生两千多人不顾北京政府的禁令，上街演讲。秋白和俄专同学也一起到达预定地点，进行演讲活动。演讲学生遭到了军警镇压。当天被捕的达一百七十八人，秋白也在其内。由于捕人过多，警察厅无法容纳，只得把北河沿的北京大学法科校舍改为临时拘留所。6月4日，有更多学生上街演讲，又被捕去七百多人。反动当局又把马神庙北大理科校舍改为临时监狱。秋白和被捕学生在狱中坚持斗争，抗议军警非法捕人，要求立即释放。

8日 在全国声援下，反动当局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是日，出狱。

6月3日，因北京学生遭逮捕，而触发的全国响应、声援运动，特别是上海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罢”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政府感到恐慌。7日，徐世昌派人向被捕学生道歉，表示政府“处置失宜”，劝诸生“回校休养”。直到8日，被捕学生为准备参加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效申包胥七日之哭，不杀卖国贼，誓不返校”的大请愿，才离开了临时监狱。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使秋白第一次感受到群众的伟力，更加明白了“社会”的意义和前途，成为他迈向新的人生道路的起点。

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道路。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最初北京社会服务会的同志：我叔叔瞿菊农，温州郑振铎、上海耿济之、湖州张照德（后两位是俄文专修馆同学），都和我一样，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怎么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暂且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克鲁朴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

杨之华《忆秋白》：

六月三日，他和一些同学一起被捕，被关在北京大学。这时北京大学等院校已经被反动派当作临时监狱，囚禁了近千同学。敌人不给床铺，同学们把课堂里的桌椅拼起来睡；敌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完全靠外边的同学和教员的支援，才得到一些东西勉强充饥，有不少的同学饿病了。秋白和一些同学一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抗议非法拘捕，要求立即释放。秋白还鼓励去探查他们的同学们说：“你们要继续奋斗，坚持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由于他们坚强不屈，由于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声援，敌人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秋白也恢复了自由。在这次斗争中，秋白因劳累过度和受到反动派的虐待，吐了血。

瞿重华《回忆秋白叔父在北京的情形》：

1919年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秋白大叔是积极参加者。记得“五四”运动好多天，大叔都没有回来。父亲天天到处打听他的消

息，母亲愁得吃不下饭。大约过了十多天，大叔回来了，满脸胡茬子，显得更瘦了，原来他被军阀抓起来了。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北京的大学生全部卷入这个大运动中了。它象一声大霹雳似的，震撼了整个北京、整个中国的青年学生，以至工人和中年的知识分子。山洪暴发了。由于一九一七年俄国大革命的影响，中国走上新的革命道路了。这个开始，这个以反帝反封建运动开始的学生运动，在实际上已经是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的序曲。而且，实际上领导者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们，秋白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七 月

17日 在《晨报》第六版上发表《不签字后之办法》一文，署名“瞿秋白投稿”。

这是秋白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文。

在全国人民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怒涛冲击下，北京政府被迫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但秋白深感中国仍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他在文章中揭露和抨击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要求政府“亟宜”与日本“先行开始交涉”，取消“军事协定”，指出该协定“实为二十一条要求中第五号之变相，有碍中国主权者也。”并警告北京政府“更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约。”

文章提醒全国人民：“今日政府万勿可靠”，“亟宜联络各省、各界联合会、团体，一致宣言并派代表入京要求政府实行”上述“要求”，“及随时明白宣布一切外交情形及各项文电，如不得要领，即可表示国民对于政府最后之决心，一面敦促解决南北问题亦为要图。”

文章还提出：“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派代表赴〔巴黎〕和会”，“请愿并监视专使”，“向和会声明全国国民之意”，“一切秘约及二十一条中国国民誓不承认，必须废除，不然是协约国绝中国太甚，中国国民唯有与日人拼命，而决不能负破坏东亚和平之责。”

文章主张要加强舆论宣传，“以示中国国民民意之真相”，“激起国外之舆论”与“各国之同情”。文章要求“各地学生联合会多出书报，切实研究外交、政治，以为一般社会之指导。”

八 月

23日 因“马良祸鲁”事件，参加北京、天津、山东等地要求徐世昌取消山东戒严令的斗争，与请愿代表一起被捕入狱。

“五四”运动爆发后，济南各报均对学生爱国运动表示声援和支持。唯独安福系的喉舌《昌言报》对运动加以攻击，辱骂学生是“狂热”，并主张以武力镇压学潮。7月21日，济南学商工农各界千余人召开各界联合大会。会后，群众冲入《昌言报》馆，将该报主编、经理等捆绑游街示众，然后送交省公署审判厅请求依法处理。25日，北京政府应山东督军张树元要求，宣布济南戒严，并委任段祺瑞心腹大将马良为济南戒严司令。8月3日，马良派兵镇压，捕去请愿者十六人。不久，又捣毁山东外交后援会，并将会长马云亭及爱国积极分子朱春祥、朱春涛等三人逮捕杀害。

马良祸鲁殃民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共愤。北京、天津、山东、唐山、山海关等地代表聚集于北京进行联合请愿斗争，要求徐世昌取消山东戒严令，严惩马良。秋白也参加了请愿斗争。是日下午3时，秋白与全体代表三十余人到新华门请愿，徐世昌拒绝接见，派警察处长和督察长敷衍代表，被代表们问得理屈词穷。4时许，京师警察厅竟逮捕秋白等全体代表，拘入警察厅。

30日 北京政府在全国爱国运动压力下，被迫释放拘捕的代

表。出狱后,因劳碌过度,加上监狱条件恶劣,竟至吐血,病了几个月,从此,肺病一直未愈。

病中,表姐夫秦耐铭写信慰问秋白,他复信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

九 月

15日 在《新中国》第1卷第5号上发表译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署名瞿秋白。

这是秋白发表的第一篇译文。

杨之华《忆秋白》:

最初,秋白翻译俄罗斯著名作家的作品。他发表的第一篇译作,就现在所知,是一九一九年九月发表在北京《新中国》杂志上的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秋白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和介绍,影响了当时和他关系密切的其他学校读书的朋友郑振铎等,也影响了耿匡(济之)等俄专的同学。秋白同这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团结在一起,进行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工作。这是中国直接从俄文原著翻译俄国文学的开始。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共同的趣味就是搞文学。我们特别对俄罗斯文学有了很深的喜爱。秋白、济之是在俄文专修馆读书的。在那个学校里,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柯夫等人的作品。

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

我们译的东西,起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

来由一个什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正在编《共学社丛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

十一月

1日 与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许地山等创办并主编《新社会》旬刊。

这期间，秋白终于从最初的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开始转向于憧憬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同他的战友郑振铎等都渴望能有一个发表自己主张的园地。

这年夏秋，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组织“社会实进会”想编一本供青年阅读的刊物，邀请秋白、郑振铎、瞿世英、许地山等人做编辑。秋白等商量了好几天，便欣然应聘编辑《新社会》旬刊。

当时的“社会实进会”，是以联合北京学界，从事社会服务，实行改良风俗为宗旨的，但它不免带有基督教慈善救济事业的某些色彩。但是，《新社会》旬刊在秋白、郑振铎等人的主持下，突破了实进会原来的宗旨，成为“五四”时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鼓吹社会改造、家庭革命的进步刊物。

《新社会》创刊号的《发刊词》说：“我们是向着德谟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我们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

这篇《发刊词》是由郑振铎执笔写的，但无疑也反映了包括秋白在内的当时对“社会改造”的共同主张。它表明了此时的秋白的

世界观，还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那时青年会想出一本给青年阅读的杂志，约了我们几个人做编辑。我们商量了几天，决定出一旬刊，是八开的十六页，定名《新社会》。孔君负责做经理，我负责集稿和校对。我跑印刷所，也经常跑到秋白、济之、地山、世英（菊农）那里去取稿。每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时，济之也同去。我们到秋白家里时，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的咳嗽着，脸色很苍白。我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忧。但一谈起话，他便兴奋起来。带着深厚常州口音的国语清晰而有条理的分析着事理。他的稿件总写得很干净，不大涂改，而且是结实，有内容。我一进屋子，他便指着书桌上放着的几张红格稿纸，说道：“已经写好了，昨晚写得很晚。你看看，好用吗？”他在那个时候，已经习惯在深夜写作了。他的国文根底好，——在学校里他的国文得过一百零五分——写的白话文，“文言”气息很重，有时，用的古典，我还不大懂得。可惜《新社会》如今是一本也找不到了。我想不起来，当时写的都是些什么题目的文章。但我们所写的开头还谈些青年修养，介绍些科学常识，到了后来，却完全鼓吹起社会改造，家庭革命，向当时的统治者直接进攻了。《新社会》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队伍里的一支勇敢的尖兵队。远到四川、两广、东北等地，都有我们的读者。秋白的尖利异常的正面攻击，或明讽暗刺的文章是《新社会》里最有份量的。

同日 在《新社会》旬刊创刊号上，发表《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一文，署名瞿秋白。

文章一扫过去的悲观厌世情绪，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应赶快觉悟，加强社会改造，以适应世界潮流。他写道：

中国人尤其应该觉悟得快一点。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塞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要

有历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赶快想法子去疏导,不等他横决。

中国人如其有这种历史的眼光,对于大战后世界的现势彻底觉悟;真能有精确的辨别力,实在的责任心,真能有坚毅的志向,明敏的智能;真能有爱惜光阴的心,慎重办事的心,那么,中国新社会的基础就建筑在这上面。

11日 在《新社会》第2号上,发表《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一文,署名瞿秋白。

文章通过对一个绅士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侧面的描述,分析了绅士阶级知识阶层的腐朽没落的生活,揭露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禁锢和摧残;并对他们散布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谬论给予有力驳斥;文章还对封建的家庭制度、婚姻制度以及旧礼教、旧道德进行猛力抨击。指出:“我主张攻击旧道德并不是现在的急务,创造新道德、新信仰,应当格外注意一点。”

21日 在《新社会》第3号上发表《革新的时机到了!》一文,署名瞿秋白。

文章指出:

欧战以后,全世界政治上、经济上、社会组织上的变动,一天紧似一天,中国人现在这种状况,如其听其自然,赶得上人家吗?所以我要大声疾呼地提来说:“革新的时机到了!”中国人若是多能够乘着这个时机,极力奋斗一下,非但中国自身有无穷的希望,就是对于世界也是有极大的贡献。

文章清醒地看到“不平等观念”,对社会造成的恶果,而这种观念在中国就是“君子与小人”。因此,文章认为只有以普遍的平等来代替某一阶级或某一地域的平等,才是补救社会的万全之策。

同月 《新社会》编辑部成员到《新青年》社访问陈独秀。

《新社会》创刊后不久,为办好这个刊物编辑部成员到北京箭杆胡同《新青年》社访问陈独秀。

陈独秀接见了他们,并提出:希望《新社会》办成给劳动界灌输知识的通俗报纸,社会改造运动要做切实的工作,不要说空话。

十二月

1日 在《新社会》第4号上发表《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一文,署名瞿秋白。

文章指出:劳动界的不平,完全是资本家专横压迫出来的,中国劳动人民不仅受本国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而且还受帝国主义的压榨。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商业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们的眼光更全然注意到远东方面,中国有了如此之多的原料和人口众多的市场,所以对中国必然行他们的经济侵略主义。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外货的输入和国内原料的输出,就把中国劳动界的生活弄成不可思议的情况。因此,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不仅仅是“劳动界本身的问题,是中华民国全民族的问题”。必须进行大力地认真研究,寻找出解决中国劳动问题的办法来。

文章还特别注意到农民问题。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可以不注意么?”

3日 在《晨报》“论坛”栏内发表《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一文,署名“瞿秋白投稿”。

林德扬是北京大学本科三年级的学生,他曾经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一贯热心于国事。但这位参加“五四”运动的爱国青年,因对现实的不满而于11月16日上午投水自杀,致引起社会舆论强烈反响,一些重要报刊都纷纷发表了议论。秋白也写了这篇评论,就林德扬自杀一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并驳斥了当时种种错误的看法。文章认为当时有些青年学生自杀的原因,是他们发现了社会的种种罪恶,觉悟了要去改造它,但遭受到几次挫折、失败,就自杀了。文章既同情他们的不幸的自杀,又指出这种行为是不对

的。文章说：

我们既然觉悟了，就应当预备着受种种痛苦，经种种困难。若是没有痛苦，没有困难，就可以达到我们改造运动的目的，那是社会本来没有缺陷，用不着改造，我们从前所做的本来没有谬误，用不着觉悟。我们既然预备着受种种痛苦，经种种困难，又为什么要自杀呢？

11日 在《新社会》第5号上的“随感录”内发表《自杀》、《唉！还不如……》两篇短文，署名秋白。

21日 在《新社会》第6号上发表《知识是脏物》一文，署名瞿秋白。

秋白在文章中援引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观点，分析了旧社会中统治阶级凭借特权，掠夺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认为，占有知识和占有财产一样，是一种盗贼抢劫的脏物。所以，“知识就是脏物，财产私有制下所生出来的罪恶。废止知识私有制，就是废止财产私有制的第一步”。

文章还进一步阐明了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应当享有这些财富的权利。

一九二〇年 22岁

一月

1日 参加《新社会》编辑部在西石槽召开的编辑会议。

会议确定《新社会》从第七期起，由原四开版的小型报纸改为十六开小册子。刊物的容量增大，并对材料如何增加，内容如何改进，作出具体规定。

同日 在《新社会》第7期上发表《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一文，署名瞿秋白。

秋白在文章中对吃人的封建制度压迫下的妇女表示深切的同情。

文章指出旧社会替妇女造成了一座坚固的精神牢狱。纲常、礼教、家庭制度、社会组织、男女不平等观念象手铐脚镣把妇女禁锢起来，使她们的聪明才智不能得到“有用之处”。文章要求社会各个方面给妇女解放以支持。其中包括艺术作品要为妇女解放而呐喊。指出：“现在文学家应当大大注意这一点，……这是现在文学家的责任呵！”

11日 在《新社会》第8号上，发表《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一文，署名瞿秋白。

文章就社会改造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的结论指出：

凡是一种群众运动之后，必定要有继续他的社会运动才能显

出他的效用。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社会运动。不带着群众运动之性质的，所以这种真正的社会运动牺牲者，在现在的中国是非常之需要的。

21日 在《新社会》第9期上，发表《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署名瞿秋白。

李大钊在1920年出版的《星期评论》新年号上，发表了《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对美国的新村运动作了分析和介绍。秋白读了该文后，“就引起好多感想”，于是写了这篇文章。他根据李大钊提供的材料分析了美国宗教新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所奉行的理想是“非社会主义”的，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农村改革的活动是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新村运动”“不是正确的试验”。他说：“我们只好换一个方法来试验”。他明确提出：“我以为历史派的——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不可少的。……我想这或者是较普遍的较易的进步的办法。不至于象办新村办不好，仅仅是新式理想的‘桃源’”。

在这篇文章里，秋白第一次明确地表示赞成马克思主义。它表明了秋白的思想已开始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并考虑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去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同月 参与“文学研究会”的创建工作。

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

我们组织了一个研究文学的团体，名为“文学研究会”，我们五人（另三个为耿济之、瞿世英和许地山）都是发起人。

胡愈之《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模范》：

就秋白和我的个人关系来说，我们才不过见过两三次面，大概是在上海宝山路郑振铎家中，主要是商谈文学研究会的事情。

耿洁之《耿济之的青少年时代》：

秋白与耿济之等组织了“文学研究会”，常与郑振铎、许地山、

瞿世英、王统照等到他家开会。

二 月

4日 翻译果戈里的短剧《仆御室》，发表在同月14日出版的《曙光》第1卷第4号上，署名“瞿秋白译”，并附有“后记”。

秋白在“后记”中称颂果戈里的作品“于谈中含有很深的意境，还常常能与读者以一种道德上的感动”。他指出果戈里创作的社会意义就在于真实地描写刻划“社会的恶”，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有助于改变“社会恶”。他提出，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这一种文学。

12日 撰写《托尔斯泰的妇女观》一文，发表在10月1日在苏州出版的《妇女评论》第2卷第2期上，署名瞿秋白。

14日 在《曙光》第1卷第4号上发表译文《马德志尼论“不死”书》，署名“瞿秋白译”。

三 月

1日 在《新社会》第13号上，发表《社会与罪恶》一文，署名瞿秋白。

文章探讨了社会问题功与罪的标准问题。文章认为：“所谓功德，所谓罪恶，都是以时以地而不同的，时代不同，所谓功德与罪也不同；地域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

同日 在《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5号上，发表译述托尔斯泰《告妇女文》、《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等两文。署名“瞿秋白译”。

6日 撰写《文化运动——新社会》一文，发表在本月21日出版的《新社会》第15号上，署名瞿秋白。

文章论述了文化运动与改造社会的关系,批评了有些人只注重文化运动而忽视改造社会的其他手段的想法。

15日 晚12时,为沈颖译作《驿站监察吏》作序,载《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1920年7月《新中国》杂志出版社出版。

该序对普希金及其小说给予高度评价。

同日 在《新中国》第2卷第3号上发表译作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祈祷》,署名“瞿秋白译”。

16日 为《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作序,署名“瞿秋白序”。

序对伟大的十月革命给予热情的歌颂,并分析了十月革命对世界及中国的影响。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确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

序还论述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指出:“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

杨之华《忆秋白》:

《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是由耿匡(济之)、沈颖等翻译,1920年7月,由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秋白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连同他为沈颖所译《驿站监察吏》作的序,这是秋白在当时写的两篇最重要的文学评论。

20日 撰写《将来的社会与现在的逆势》一文,发表在4月1

日出版的《新社会》第16号上,署名瞿秋白。

文章对当时的世界形势作了分析。指出,现在的“逆势”是非常严重的,必须引起革命者的重视。

21日 在《新社会》第15号上发表散文《心的声音——绪言》一文,署名瞿秋白。

同月 参加李大钊等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是月,在李大钊的组织 and 指导下,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张崧年等人发起,秘密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秋白也参加了这个研究会。

他在《多余的话》中写道: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

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〇年初,学生运动正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我就多读了一些书。

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

杨之华《忆秋白》:

在一九二〇年春,秋白参加了李大钊同志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和李大钊同志有了来往,研究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秋白说:“社会主义之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这使秋白的思想更明显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因而对《新社会》旬刊起了积极的影响。

四 月

11日 在《新社会》第17号“劳动号”(一)专辑上发表《谁的

利器? La greve, le Sabotage, 谁知道呢?》一文,署名瞿秋白。

文章启发中国的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如何反抗压迫者、剥削者。

同日 在同期《新社会》上发表译作都德的短篇小说《付过工钱之后》,在译文前加了“按语”,署名瞿秋白。

13日 译德国倍倍尔著《社会之社会化》,发表在《改造》第3卷第4号至第7号上,署名瞿秋白。

秋白在译文前写了一段说明,对作者及其作品作了简要介绍。

21日 在《新社会》第18号“劳动号”(二)专辑上,发表:《劳动底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心的声音》三篇文章,署名瞿秋白。

同月在《改造》第3卷第1号上,刊登北京共学社出版的新书预告中,有瞿秋白翻译的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的广告。

后因秋白忙于动身去苏联的准备工作而没有完成这一计划。后交由耿济之翻译。

五 月

1日 在《新社会》第19号“劳动号”(三)专辑上,发表:《世界底劳动节,中国底新劳动节》、《心的声音》两文,署名瞿秋白。

15日 在《新中国》第2卷第5号上发表《社会与罪恶》一文,署名瞿秋白。

同月 《新社会》旬刊在第19号后,被北京政府警察厅查封。

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这也是一种奇异现象,社会思想的

变态：一方面走得极前；一方面落得极后。

六 月

15日 在《新中国》第2卷第6号上发表译作托尔斯泰的《论教育书》，署名瞿秋白。

八 月

5日 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创办《人道》月刊，出版创刊号。

《人道》月刊仍以“北京社会实进社”名义出版发行。负责编辑的还是《新社会》旬刊的编辑班子，编辑负责人是郑振铎。《人道》创刊号上登有“启事”说：“本刊是由《新社会》旬刊改组的，凡以前订阅《新社会》没有满期的人，都继续以本刊补足。”

创刊号上发表了由郑振铎执笔写的《本刊同人宣言》，以及在《人道》上发表的文章的思想倾向，都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秋白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此后北京青年思想，渐渐的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也象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于是我们组织一个月刊《人道》(Humanité)。《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大不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郑振铎的倾向最明了，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

杨之华《忆秋白》：

秋白和郑振铎等对反动派封禁《新社会》都很愤慨，主张再接再厉，另行出版一个月刊，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这个月刊终于在

一九二〇年八月五日诞生了,这就是《人道》月刊。但它只出版了第一期,就被迫停刊了。

在出版《人道》月刊的时候,秋白他们的团体就叫“人道社”。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不过,当我们编辑《新社会》旬刊和《人道》月刊时,在编辑过程中,也不是没有争论的,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其余的人,则往往孤立的看问题,有浓厚的唯心论倾向。有的还觉得他的理论“过激”。我则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的信仰,而看的书却以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为多,因此,就受了他们的影响,而主张什么“人道主义”。《新社会》旬刊被禁止出版后,讨论要出版一个“月刊”时,我就主张定名为《人道》月刊。秋白当时表示不赞成这个名称。他的见解是正确的,鲜明的。但他并没有提出别的名称出来,大家也都赞成我的意见,当即定名为《人道》。

同日 在《人道》创刊号上,发表新诗《心的声音》,署名瞿秋白。

这首诗是秋白发表的第一首白话诗。诗中充满着对反动统治阶级强烈的憎恨,对劳动人民深切的同情。

16日 参加人道社与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等五团体在陶然亭召开的座谈会。

18日 由李大钊、周恩来等为首组织的五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通讯图书馆召开联络筹备会。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通过《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布“本联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并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

杨之华《忆秋白》:

秋白当时是热烈主张“到民间去”的,而且想的比较深刻。他同

朋友们议论这个问题时,提出了“到那个民间去?站在什么立场上到民间去?”等问题,说明革命活动不能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不能把在大街上撒撒传单、讲讲话就算是“到民间去”,应该深入到工人和农民的“民间”去,而应该向工农学习,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宣传革命思想。他还向朋友们介绍了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情况,指出了民粹派的错误。由于他不久就去了苏俄,因而没有能够把这种深入工农群众的志愿付诸实践;但他对此始终萦回在心。

同月 《人道》月刊已编好第2期,因经费无着,被迫停刊。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期的二三事》:

《人道》月刊只出版了第一期。第二期已经编好,而且“目录”预告也刊出了,但青年会方面却有了种种的推托,借个题目主要是说经费没有了,干脆停刊。

同月 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此后,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九 月

俄专未毕业,应北京《晨报》社和《时事新报》社招聘,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准备动身赴俄考察。

1920年秋,北京《晨报》社和《时事新报》社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等国。为此,两报社发出《共同启事》,内称:“吾国报纸向无特派专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一大缺点也。吾两报有鉴于此,用特合筹经费遴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

当时，秋白在俄专尚未毕业，由于他个人的才华和朋友的推荐，应《晨报》社的聘请，以特派员身份，准备赴莫斯科考察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研究共产主义，研究共产党，研究俄罗斯文化，“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

秋白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我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将来”里的生命，“生命”里的将来，使我不得不忍耐“现在”的隐痛，含泪暂别我的旧社会。所以我决到俄国去走一走。

当时，革命刚胜利后的俄国，在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以及连年的国内战争，正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当时留俄学生肖劲光回忆：

“苏俄战争的创伤历历在目。工厂、矿山遭到严重破坏停产了，农村遭受兵祸，被洗劫一空，天灾人祸，粮食欠收，人民贫穷不堪，各种物资极其缺乏。到处都是弹痕累累，道路桥梁被破坏得不象样子，全俄处于普遍饥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旁。”

正是在这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秋白毅然决然决定到苏俄去。他写道：

我和诸同志当时也是飘流震荡于这种惊涛骇浪之中。

我呢？以整顿思想方法入手真诚的去“人我见”以至于“法我见”，当时已经略略领会得唯实的人生观及宇宙观。我成就了我世间的“唯物主义”。决然想探一探险，求实际的结论，在某一范围内的真实智识——这不是为我的——智识和思想不是私有权所能限制的。况且我幼时社会生活的环境，使我不期然而然成一“斯笃矣派”(Stoiciste)，日常生活刻苦惯的，饮食起居一切都只求简单节欲。这虽或是我个人畸形的发展，却成就了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

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

没有穿，……饥，寒……暂时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我已经决定走的了。

但是，秋白去苏俄的决定，曾遭到亲友的反对，就是支持他的堂兄纯白也竭力反对他去苏俄。秋白回忆说：

在北京整整的住了四年，虽纯哥按“家族的旧道德”培植扶助我，我又被“新时代的自由神”移易了心性，不能纯然坐在“旧”的监狱里，或者有和他反背的意见，——纯哥当初竭力反对我到俄国去，以为自趋绝地，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论点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从，——到现在一切都已决定，纯哥亦就不说什么，勉励我到俄国后专门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辍。

秋白决定赴苏俄后，就忙着做出国准备工作，并向亲友们辞行。

十 月

初旬 去山东济南，拜别父亲瞿世玮；整理行装，辞别亲友。

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我父亲只能一人住在山东知己朋友家里，教书糊口。在中国这样社会之中既没有阔亲戚，又没有钻营的本领，况且中国畸形的社会生活使人失去一切的可能，年纪已近半百，忧煎病迫，社会还要责备他尽什么他所尽的责任呢？……我因此到济南辞别我亲爱不忍舍的父亲。

在回京的途中，秋白又去天津探望了二表姐丈。回京后，又去少年时的恋人表妹纤纤处告别。表姐、表妹家的凄凉境况，使他的心情格外感到沉重和痛楚。

15日 晚，到北京饭店面见苏俄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Urin)，办理出国护照。

同日 晚,约十一二点钟,又匆忙赶到耿济之家,与正在那里等待的郑振铎、瞿世英、郭绍虞、郭梦良、郭叔奇等话别。

16日 晨,与李宗武、俞仲华三人在北京东车站登上北上列车,并与到站送行的瞿纯白、瞿世英、郑振铎、耿济之及亲戚兄弟一一握手分别。

同日 车过天津,到二表姐处告别,并拜别旧时同学张太雷、张昭德、吴炳文等,晚间抵足长谈。

在送别时,郑振铎、耿济之、郭绍虞等各有诗赠秋白三人赴俄之行。

18日 晨,对郑振铎等的赠诗复信并附以答诗《去国答〈人道〉》一首。

当晚十一二点钟,秋白告别了天津的亲友,登上了京奉车。“结伴同行”的有北京政府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等。

19日 火车由山海关,抵达奉天(今沈阳市)。

当火车驶近山海关时,面对祖国的大好山河,秋白赞叹道:

遥望一角海岸,白沙青浪映着朝日,云烟缭绕,好似拥出一片亚洲大陆的朝气。

同日 傍晚时到奉天,换乘南满铁路列车,继续北上。

此时,车上的职员全是日本人,甚至车站上看不见一个“中国脚夫”。秋白感慨地写道:

我现在已入满洲,出中国,仿佛记得中学地理教科书上写着,这满洲三省还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一出山海关到了奉天站,——他那繁华壮丽的气象,与北京天津不相上下,——却已经另一世界似的,好象自己已经到了日本国境以内呢?也许奉天现在已经割给日本了!然而原住奉天的许多中国劳动人民,想必一时还没有来得及死尽,怎么奉天站连中国脚夫都很少很少呢?原来日本铁道车站上的中国苦力,他们劳作也受日本节制的。帝国主义的况味,原来是这样!

20日 晨,火车到达长春后,即换车,当晚8、9点钟到达哈尔滨。

到达哈尔滨后,由于苏俄国内战争的原因,滞留在哈五十多天,住在一家“糟不可言”的福顺客栈内。秋白这样描绘道:“黯黯的一盏电灯,密不通风的大窗子,一张桌子两张凳,四张板铺——我和宗武、颂华各占一张,一张放行李,满屋子,桌子上凳子床上,堆着报纸杂志笔墨纸砚,脸盆,牙刷,高高低低象乱山似的——这就是我们哈尔滨寓所的一幅景象。”

22日 撰写通讯《哈尔滨之见闻》,署名瞿秋白。

滞留哈尔滨期间,秋白非常烦闷心焦,每日出去访俄国朋友,调查俄国的工人组织,并且搜集些俄文书报,以为研究劳农政府材料。同时为《晨报》写通讯,报道到哈尔滨途中的所见所闻。通讯全篇充满了作者憎恨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

28日 撰写通讯《哈埠见闻之珲春事件——日本设总领事与张使直接交涉》一文,署名瞿秋白。

通讯揭露北洋军阀政府驻东三省特使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共同出兵珲春,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

十一月

1日 在苏州《妇女评论》第2卷第3期上,发表译述果戈里的《妇女》一文,署名瞿秋白。

3日 在北京《晨报》上,发表通讯《谢军大败后之东俄情形》一文,署名瞿秋白。

通讯描述俄国白军谢苗诺夫被歼灭的情景。

同日 写《饿乡纪程》的“绪言”。

秋白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写道:

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我现在

挣扎起来了，我往俄乡去了！

6、7日 晚6时，撰写通讯《俄国远东之统一问题》，发表在本月13、14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7日 应邀参加哈尔滨工党联合会庆祝苏俄十月革命三周年盛会。

这是秋白第一次参加庆祝十月革命的纪念会，第一次听到声调雄壮的《国际歌》。

13日 撰写通讯《赤塔统一会议与右党》一文，发表在本月20、21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秋白。

通讯介绍了苏俄远东临时政府的政权建设及同右翼势力斗争的情况。

19日 撰写通讯《远东统一之将来》一文，发表在本月24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秋白。

20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通讯《哈尔滨之劳工大会》一文，署名秋白。

通讯概略报道了哈尔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庆祝会及“劳工大会”的情况。

22日 在北京《晨报》上发表通讯《欧俄最近实况谈》一文，署名仲武、秋白。

通讯报道了秋白等三人访问来自莫斯科的旅客，并借旅客之口，介绍了苏俄最近的实况。

23日 撰写通讯《访问俄国工党联合会会长访问记》一文，发表在本月30日、12月1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澹、秋白。

通讯报道了秋白等经苏俄孟什维克党员优亭介绍，和友人廖连雅同去访问中东路俄国工党联合会会长国耳恰阔夫斯克。访问中，与该会会长就联合会组织、中东路交还中国、中俄关系、日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两天诚挚的交谈。访问结束后，写了这篇通讯。

29日 撰写《远东统一与日俄商务》一文，发表在12月4日

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秋白。

通讯评述了日本对俄国政策的变化。

十二月

1日 写《无涯》新体诗一首，附于《饿乡纪程》一书的开首。

月初 得到确实消息，谢苗诺夫白军已败退，乃定于本月7日离哈西行。

秋白在滞哈的五十多天中，所见所闻，思绪万千，感触极多，更坚定了他去“饿乡”的意志。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哈尔滨旅馆生活一瞬已有一月多了，天气一天一天冷起来，街上的积雪，树梢的寒意，和着冷酷陈死的中国社会空气，令人烦闷。北地严寒，渐渐的显他威武。可是我心苗里却含着蓬蓬勃勃的春意；冒险好奇的旅行允许我满足不可遏抑的智识欲，可爱的将来暗示我无穷的希望。……

……我冒险而旅俄，并非是什么“意志坚强”，也不是计较利害有所为——为社会——而行；仅只是本于为我的好奇心而起适应生活，适应实际精神生活的冲动。生活不安的程度愈高，反应冲动的力量亦愈大。既无益于抽象的中国社会文化，又无味于具体的枯燥生活。当然，除出那一部分薄弱的意识作用；有无利益于社会，而心理上突然呈一种猛进的状态。宁死亦当一行。

所以，当得到可以通行的“确实消息”后，秋白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写道：

启程了，启程了！向着红光里去！苏维埃俄国，是二十世纪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究竟如何情形，虽有许多传说，许多宣传，又听见他们国内经四年欧战三年内乱，总不知详细，只是向着自由门去，不免起种种想象。此去且要先经新

造的民主主义的远东共和国，——为苏维埃共和国之缓冲地，行民主主义制度而执政党是共产党——布尔塞维克；亦是研究的兴趣盎然。快走了！快走了！快到目的地了！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独裁机关，——共产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可以有研究的机会了！

5日 撰写通讯《哈尔滨俄侨之舆论》一文，发表在本月10日、11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秋白、澹。

7日 在北京《晨报》上，发表通讯《俄工党会长对中国之陈情》一文，未署名。

通讯报道了秋白等三人访问工党联合会会长国耳恰阔夫斯克。会长谈了俄国的对外政策，特别对中国的政策。

8、9日 在北京《晨报》上，发表通讯《哈埠工会联合会会长访问记》一文，署名澹、秋白。

通讯着重介绍了工联会的宗旨和组织情况，现时工人的生活状况，以及俄侨对哈尔滨市政的意见，对于统一的意见。

10日 经过一番周折，终于乘车离开哈尔滨，向满洲里进发。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十二月十日开车，又离开哈尔滨北去了，同车一共六个人，我们同伴三个，莫斯科领事馆三个。在车上没有事就随便谈话。这次旅俄“和领事同行”有很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因此略知中俄外交以前的经过，中国在俄的外交界向来的态度，在俄京外交团里的地位，在俄国华侨里的口碑。别一方面，截然两个世界两个社会的人聚在一块，精神上的接触，发生种种的痛感，绝不投机的谈话，费了无限的宝贵光阴，双方各自隐匿了真面目，委蛇周旋也夺去我不少精力。

13日晚，火车抵达国境满洲里，访问了刚自苏俄归来的中国军事代表张斯摩和华工总会会长刘绍周。

同日 撰写通讯《欧俄归客谈》一文，发表在本月19、21日出

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秋白。

14日 在北京《晨报》上，发表通讯《北大三青年赴俄之旅况》一文，署名秋白。

北京大学的三个学生由北京到达哈尔滨后，由于战事无法前进，只得在哈暂住，正巧与秋白等同住一个客栈，彼此相识。三学生赴俄心切，就转走伯力、海参崴一线。临别，秋白与他们相约，请他们随时将途中见闻告知。此篇通讯就是根据三个学生的来信写成的。信中详细介绍了他们三人在途中所见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伯力、海参崴的侵略行径，使他们的行程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16日 离开满洲里，穿越中俄边境线，进入西伯利亚。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十二月十六日得到确实消息，方才前进，经中俄边境，出满洲里，到俄属的西伯利亚了。那天晚上又是大风雪，沿途战争中所毁铁道，都只暂时在冰上架了临时铁轨。因此车行非常之慢，车身簸荡，厉声作响，好像替冤死于“白祸”的俄国劳动人民，哀诉于东亚初临的贵客。……

17日 到达沃洛文站。

18日 车抵达苏俄远东共和国的都城赤塔后，又因故不能前进。在赤塔停留期间，作社会调查，研究远东共和国的政体及共产主义；阅读赤塔共产党委员会赠送的书刊，了解俄国共产党的理论。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到赤塔后，又是迟滞不进。领事往北京、莫斯科两方面所发电报，等来等去也不得复音。时时听欧俄危苦的传言。车子一时没有前进的希望。于是我们三人中又发生改变计划的问题。在哈尔滨时亦因迟迟不行，想留哈研究俄文和共产主义，开春再定计划。到此听说赤塔亦可找一私家(Pension)寄住，于是又发生这一计划。想在赤塔住下，研究远东共和国的政体及共产主义，俄文俄语也可以有练习的机会，这是我和宗武两

人的办法。至于颂华呢,他不习俄文,就想回国。此行沿途都有阻滞,也真焦闷。幸而后来机会好,不然,目的地恐怕就此走不到了。

在赤塔等待期间,秋白一行除作社会生活调查之外,还曾访问了苏俄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都夫、粮食部总长葛洛史孟等人,交谈了中东路问题、新政府的粮食政策及中俄通商问题。通过社会调查、新闻采访,以及阅读赤塔共产党委员会送来的书籍报刊,既练习了俄文,又研究了远东共和国的政体及共产党的理论,使秋白对苏俄及共产党的了解又前进了一大步。

23日 撰写《东俄之近状与华侨》一文,发表在1921年1月16、18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秋白。

· 通讯主要报道了秋白到赤塔后所了解的情况。

同月 在《改造》第3卷第7号上发表译作《共产主义与文化》一文,署名“瞿秋白译”。

一九二一年 23 岁

一 月

1 日 撰写《旅俄华侨问题》一文,发表在本月 14 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秋白。

通讯主要介绍了俄国华侨的情况,对于希望回国的华侨,要求政府尽快给予解决。

2 日 晚,与俞颂华等到苏俄远东共和国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克腊斯诺史赤夸夫的寓所进行采访。

上旬 撰写《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渴望》一文,署名“秋白(广州)”。

此文似是秋白在赤塔逗留期间,为向苏俄人民介绍“中国真实的状况”而写的一封信。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1921. 2. 17)上发表。

信上提到:不久以前,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党,虽然成员人数不多,但这个党的组成毕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

“社会主义青年党”,指的是 1920 年 8 月在上海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4 日 离开赤塔,继续西行,当晚,到达上乌金斯克。

秋白在《饿乡纪程》中写道:新年过了,一月四日,启程的诸事停妥,又开车西进。一切停滞的计划都打消,安心向目的地进行罢。哈尔滨得空气,满洲里得事实,赤塔得理论,再往前

去,感受其实际生活。

此时,秋白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他写道:

身离赤塔,不日入“赤国”,我实行责任之期已近,自然当立此原则。从此于理论之研究,事实之探访外,当切实领略社会心理反映的空气,感受社会组织显现的现实生活,应我心理之内的要求,更将于后者多求出世间的营养。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寒风猎猎,万里积雪,臭肉干糠,猪狗饲料,饥寒苦痛是我努力的代价。现在已到门庭,请举步入室登堂罢。

5日 深夜,到达远东及苏维埃俄国交界之地的色楞河边。

6日 清晨,到达美索瓦(梅佐夫)站。

火车在这里换车头,停车四、五个钟点。有三个中国人上车找领事,“说他们许多苦状”,秋白等与这三人顺便谈了话。

7日 经贝加尔湖,于下午3时,到达伊尔库茨克。

在这里“遭到了麻烦”。站长命令把中国专车摘下来,“扣留检验”。火车停留期间,对当地作了采访,他们到了外交委员的家里,受到了留伊的副领事姓薛的中国人的热情招待。秋白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现在已经进了饿乡了。饿乡的滋味却还没尝着。……我们在薛君处第一次吃着“苏维埃的黑面包”,其苦其酸,泥草臭味,中国没有一人尝过的,也没有一人能想象的。可是那天席间还有些鸡鱼。据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来了之后,商业一概禁止,这是乡下有熟人偷卖上来的。我们因问起工人职员(官吏)的生活,据说口粮分好几等,从每月十五斤(俄斤抵中国一斤之四分之三)到每月四十五斤黑面包。薪水最多的不过八千卢布,依那时卢布的行市只抵到中国人的八角钱……

9日 上午8时,一切都已接洽妥贴,车离开伊尔库茨克。

16日 车到沃木斯克(鄂木斯克)又要办交涉,因此,在这里再停顿。

去市场上进行了采访。他写道:

车站上行人很多。我们上站走了一走,离站不远一荒场上挤着许多人,似乎是市场,我买了一盒俄国烟,价值倒要一千七百五十卢布。市场上的俄国人都穿得褴褛不堪,看见中国人都围着兜卖。遇见一中国工人,谈起来,说是:一九二〇年春天那地方还可以做小卖买,后来全充公了,强逼做工,一天一斤半黑面包,现在商业禁止,这市场上的小卖买还可以做,……

在伊尔库次克时外交委员会打电到沃木斯克可以领些食物,到此交涉好久才出官价二千多卢布买了面包、牛肉、鸡子等。可是当天(十六日)晚上,车停在车站尽头,我们货车上的锁被人扭断,偷去面十铺德,陈广平咆哮大怒,噪了半天,也就无法可想了。

18日 离沃木斯克西行。

21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通讯《访远东交通总长及粮食总长记》一文,署名秋白。

25日 晚11时,历经三个月的艰辛旅程,终于抵达莫斯科耶洛斯拉夫站。

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那时是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晚十一时光景,太阴历的庚申年十二月十七。寒风当空,嘈杂的人声中,知道已到“饿乡”了。

……“赤都”第一夕的心影,留一深切的印象,东方稚儿渐渐自觉他的内力,于人类文化交流之中求一灯塔的动机已开,饿乡之“饿”如其不轧窒他的机括,前途大约就可见平风静浪的海镜,只待于百忙之中,将就先镇定了原人时代海运的帆篷舵索,稳稳的去探奇险。

到苏以后，秋白给自己取了 Виктор·Страхов 的俄文姓名。他取 Страхов(斯特拉霍夫)为姓，是有着战胜恐惧、克服困难的意思。

26日 拜会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司长杨松(Yan Son)，安排了食宿和工作。随后，又拜会了《真理报》主笔，就此开始工作。

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到莫斯科的第三天就得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发给的“膳票”，并且派一人同往外交委员会的公共食堂。饭菜恶劣，比较起来，在现时的俄国还算是上上等的，有些牛油、白糖。同吃饭的大半都是外交委员会的职员。我看他们吃完之后各自包着面包油糖回去，因问一问同行的人。他说俄国现在什么都集中在国家手里，每人除办事而得口粮外，没处找东西吃用，所以如此。……过不到几天(2月2日)外交委员会就派汽车送我们到一公寓。这公寓亦是旧时的旅馆“Knyaji Dvor”(即“贵族官”)。我们三人占了两间屋子。桌椅床铺电灯都很完全。草草收拾整理停妥，房间汽炉烧得暖暖的，吃饭在公寓里有饭堂。……这种物质生活的条件，虽然饮食营养太坏，亦满可以安心工作了。

……

我们的工作条件是不很困难的。杨松介绍我们许多地方，可以搜集材料，访问要人。第一就见着俄罗斯共产党机关报《正道》(pravda)^①的主笔美史赤略夸夫(Mechtcheryakoff)，他指示我们参观的手续，一切种种，从他开始。同时东方司还派一翻译郭质生，他懂中国话，生长在中国，所以有中国名字，虽然他不能译得很好，我们也另有英文翻译，亦是外交委员会派来的，自己又可以说几句俄文，本来用不着他，然而后来我

^① 即《真理报》。

同郭质生竟成了终生的知己，他还告诉我们许多革命中的奇闻逸事，实际生活中的革命过程。因此我们正式的考察调查从那天见美史赤略夸夫起，“非正式的”考察调查也从那天见郭质生起。

秋白激动地写道：

俄多！俄多！你还是磨炼我的心志，还是亏蚀我的精力呢？工作开始了，看看罢。

下旬 参观特列嘉柯夫美术馆。

秋白先从研究俄罗斯文化入手，来了解俄国和俄国人民。他写道：

俄罗斯文化的伟大、丰富，国民性的醇厚，孕育破天荒的奇才，诞生裂地轴的奇变，——俄罗斯革命的价值不是偶然的呵！社会之文化是社会精灵的结晶，社会之进化是社会心理的波动。感觉中的实际生活教训，几几乎与吾人以研究社会哲学的新方法。进赤俄的东方稚儿预备着领受新旧俄罗文化的甘露了。理智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性灵的营养，敢说陶融于神秘的“俄罗斯”。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

二 月

6日 与俞颂华、李宗武三人署名在《消息报》上，发表《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

《呼吁书》中指出：中国人民按其心理状态来说是酷爱和平的，他时刻准备和那些愿为共同利益而改善国际局势的人民友好相处，而同那些怀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意图的人们进行斗争。我们愿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人民也将能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中国人民几乎完全不了解你

们新的社会建设的进程。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研究这一建设并把它广泛地介绍给我国人民。

上旬 参加全俄华工大会。

12、13日 到克鲁泡特金灵前参观，并参加送殡。

14日 会见苏俄著名诗人马耶可夫斯基，“他殷勤问及中国文学”，并赠诗集《人》一册。

15日 到莫斯科大剧院观看歌剧。

27日 由克鲁泡特金学生纪务立介绍，会见来莫斯科的克鲁泡特金夫人，并“送他一袋白面”。

同月 为俞颂华（澹庐）所写的《俄国旅程琐记》写第一、二部分：《自赤塔至莫斯科的见闻记》。

全文共七部分，刊载于本年9月14、15日北京《晨报》上。澹庐在本文末，说明一、二两部分是“秋白所记入俄情况”，“是今年正月里的事情”。

三 月

2日 到克里姆林宫，访问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谈最近教育上的设施和苏俄与东方文化的关系。

8—16日 以记者身份参加莫斯科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采访工作。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伟大转变的开始，它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列宁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就政治工作，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党的统一、工会问题等作了报告。

秋白敏锐地看到了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他根据会议的文件

及其他材料,集中全部精力连续写了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全文约三万多字,从6月16日至9月23日间,先后分27次连载在北京《晨报》上,热情地忠实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11日 在北京《晨报》上,发表通讯《劳农政府治下之教育》一文,署名秋白。

通讯介绍了秋白等在3月7日采访劳农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谈关于俄国之教育状况。

12日 写《秋意——题画赠林德女士(Lind)》诗一首。

上中旬 患病。

在《赤都心史》中写道:

莫斯科生活开始,我们求学考察还正兴致勃勃,然而因物质生活的困苦,竟奄奄有些小恙。病中无聊,同寓一日本人新白介绍几个女友来谈谈,勉强解闷。……病中无事,因与俄国友人闲谈,略略得知莫斯科城市生活,并及全俄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草创的设施。

15日 在《改造》第3卷第7号上发表译凯仁赤夫(W·Ker-gentseff)著《共产主义与文化》一文,署名瞿秋白译。

19日 撰写《革命之反动》一文,载《赤都心史》〔六〕。

文中记述了喀琅施塔得社会党人煽动的武装叛乱。

31日 撰写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民族问题》一文,发表在6月22日、25日、28日、29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根据民族委员斯大林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较详细地介绍了俄国民族的情况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问题总原则和具体政策。

秋白在通讯的最后指出:

共产主义是“理想”,实行共产主义的是“人”,是“人间

的”。他们所以不免有流弊,也是自然不可免的现象,如单就“提携小民族,使越过资本主义的过程而并达于共产主义”的大政方针,及他们首领的深自警惕,抱定宗旨,不折不扣去实行,这种态度看起来,虽不能断定他们最后的成功,然而必是见他们实行自己的理想而并且能深切研究实际生活中之状况及对付他们的相当办法——这是中国人应当注意的。

四 月

月初 参加无产阶级文化部举办的“音乐或诗文晚会”,受到会员们的“极端欢迎”。

月初 经俄友纪务立介绍托尔斯泰孙女苏菲亚来谈,并去她家——托尔斯泰陈列馆叙谈,受到她母亲“很亲热的接待”,并赠送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为《老子》的俄文节译本。

3日 撰写《社会生活》一文,载《赤都心史》〔七〕。

4日 撰写《共产主义之人间化——外交问题》一文,发表在7月7日、10日、12日、13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着重分析了当时苏俄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政策的原因和做法及联络东方弱国的外交政策。

5日 译莱蒙托夫诗《烦闷……》一首,载《赤都心史》〔八〕。

7日 撰写《共产主义之人间化——共产党组织问题》一文,发表在7月21日、22日、23日、24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首先介绍了加强共产党建设的重要性;在新时期对党的组织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强调要发挥每个共产党员的工作积极性的问题。写道:

共产党的运用政权,全仗着党内组织的精密,办事的敏捷,……共产党之精神是在于使最有觉悟最有知识最有才能

的人运用政权,指导群众。……照议决案原文说,“要使党员中没有一个不是积极的自动的党员”。所以实行民主主义乃是一种增进党员知识觉悟程度的方法。

10日 写古体诗《皓月》一首,题画赠苏菲亚·托尔斯泰。诗云:

皓月落沧海,碎影摇万里。
生理亦如斯,浩波欲无际。

11日 写《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一文,载《赤都心史》〔十〕,署名瞿秋白。

文章记述了德国经济调查员兼外交代表史德勒“来访”,谈及德国社会情况不同,假使共产主义革命实现,它的过程一定不与俄国相同。文中还记述了与苏俄通商人民委员长列若乏(A·M·Лежава)的谈话。列若乏说,“没有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况且决不能在隔离状态中实行新村式的共产主义”,“并且必须和暂时没倒的外国资本家相利用——发展工业培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本”。

12日 撰写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三国际》一文,发表在9月2日、7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根据共产国际会长祗诺维叶夫(今译季诺维也夫)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介绍第三国际的宗旨、发展历史、组织状况,加入条件等情况。

15日 撰写《共产主义之人间化——小结》一文,发表在9月9日、23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对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道分:职工联合会、课税、民族、外交、党务、第三国际等六个问题作了小结。该文指出:共产主义从此不能仍旧是社会主义丛书里一个目录了。世界及社会实际状况的研究之洽切适用与否及“民间去运动”之成熟与否,是社会改造过程第一步所必当注意的,这一层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

心,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

22日 撰写通讯《俄罗斯之工人及协作问题》一文,在7月26日至28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报道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继公布课税法改善农民生活以后,又着手改善工人生活、劳动工资待遇等情况。苏俄当时成立了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工人报酬及消费协社三个法令。通讯评述了这些措施。

23日 俄友郭质生邀请去参观莫斯科大教堂举行希腊教的复活节大礼拜仪式。归来后撰写《宗教的俄罗斯》一文,载《赤都心史》〔十一〕。

29日 撰写通讯《莫斯科之中俄外交》一文,发表在7月19日、20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报道了当时中俄外交中的华侨问题和派代表问题。通讯还抨击了中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不负责任,因此,中俄外交“冷淡到极点”。“莫斯科中国领事馆,就成了清萧萧冷静静地光景”。

五 月

1日 适逢“五一”劳动节与复活节两个“佳节”在同一天。有感,写《劳工复活》一文,载《赤都心史》〔十二〕。

4日 撰写通讯《莫斯科之耶稣复活节及五一节》一文,发表在8月24日、25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秋白在文末深有感触地写道:

他们共产党的精神非常之好。可惜比之全国国民,人数太少,人才太缺,所以每每办事有些不周到的地方。以“五一节”和“耶稣复活节”相比而观,使人领略到俄国国民性及共产党之“五一”运动的意义,不免发生一种奇异的感想呵!

12日 撰写通讯《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合作社、货币制度、工钱制度、自由商业》一文，发表在9月24日、25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19日 撰写通讯《俄都记闻》一文，发表在8月31日、9月1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在通讯开首，阐明了撰写此文的目的说：

记者到此，以前所写通信，均为较有系统的，原是因为交通不便，通信到京太迟，所以系多日搜集材料，稍加编辑后，才寄回国内，使国内人看了容易明白有头绪些。然而因为一人精力有限，工作太多的时候，所见材料往往疏忽遗忘，所以如今另辟《俄都记闻》一栏，随得随记，一则做记者自己随后研究编辑时的底稿，二则仍先寄回国，做国人参考的资料。

同日 撰写通讯《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苏维埃政府之国家的资本主义”——财政改良问题之讨论》一文，发表在9月27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通讯评述了苏俄政府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形式。署名瞿秋白。

下旬 给俞颂华信，信中谈到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四种形式。

秋白在信中写道：

列宁最近指出四种苏维埃制度中之国家资本主义(Governmental Capitalism)(一)租借地^① (二)合作社，(三)商人，(四)企业家(私家小工厂)。现第四次全俄职工联合大会及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已在讨论之中，此种过渡法甚有味。

同月 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布〕党组织。

张太雷是在1921年3月，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委托，来俄国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东方局任中国科的书记，从事共产国际与

^① 今译租借制。

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工作,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并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身份从事共产国际组织局委派的工作。是年5月,秋白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布〕为预备党员,9月转为正式党员。

六 月

7日 撰写通讯《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三大会之经济政策决议案》一文,发表在10月26日、27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介绍了全俄国民经济苏维埃大会、全俄职工联合大会和全俄共产党会议三个大会讨论的有关经济政策决议案。

上旬 写《“死人之家”的归客》一文,记述两位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老革命家。载《赤都心史》〔十四〕。

8日 译莱蒙托夫《安琪儿》诗一首,载《赤都心史》〔十五〕。

13日 写《贵族之巢》一文,记述了苏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自由市场开放的情景。载《赤都心史》〔十六〕。

同日 撰写通讯《俄罗斯之经济问题——国民经济苏维埃、职工联合会两大会议中之两大问题》一文,发表在10月28日、29日、30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介绍了俄国经济中两个“最要紧”的问题:“国民经济苏维埃全俄第四次大会中之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改组问题及职工联合会全俄第四次大会中之工资率问题。”

15日 撰写通讯《俄罗斯之经济问题——劳农政府之农民政策——新经济政策与人民之舆论》一文,发表在11月1日、2日、3日、4日、5日、6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这是一篇介绍和论述农民在十月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及劳农政府“农民政策”的报道。

通讯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在于经济改造。俄罗斯之经济改造，其要点就在于农业经济，为全体经济命脉之所在。劳农政府待农民的政策是农业经济改造的步骤。所以我们必得考察劳农政府之农民政策，然后能明白现时的新经济政策，然后能明白“社会主义俄罗斯”之经济问题，然后能明白“俄罗斯的社会革命之意义”。

17日 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典礼。

22日至7月12日 以记者身份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23日 撰写《莫斯科的赤潮》一文，以激动的心情描述了红场的阅兵及大会的盛况。载《赤都心史》〔十七〕。

同月 为出席6、7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撰写《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署名瞿秋白、李宗武。

文章介绍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概况，文章指出：“大约在二十年以前，……西方的社会主义便传到中国。但是，只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中国学生才认真着手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文章指出：

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是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从那时起，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出现了许多这样的小组。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以前，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许多地方，共产党员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工作。但是，在这些共同组织中，共产党员有自己的同志来监督和领导他们，并把这些组织变成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然而后来中国共产党相信，要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分子共同工作毕竟是不可能的。

为了阐明共产党的宗旨、原则和策略，为了把无政府主义

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共产党员们认为有必要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召开各组织的代表会议，以这次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共产党人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会议还制定了临时纲领：

迄今为止，共产党人所做的还是准备性质的工作。他们的宣传部向中国报刊提供关于苏维埃俄国和工人运动的消息，以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阐明美国的“民主主义”的实质的一般材料。组织部在许多大城市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了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这个部还在各工业部门建立了许多工会，并把它所建立的上海五金工会的代表派往各城市去建立当地的五金工会。组织部还竭力打入到同业公会和行会组织中去瓦解他们，并由这些组织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建立象印刷工会那样的纯粹的工会。几乎所有的罢工都是由共产党员组织或领导的。

出版部为工人群众出版了一系列周刊和报纸。这个部还为工人印行了许多小册子和传单，如《一个士兵的故事》、《工友对话》、《工会》、《共产党员是什么样人》等。中国共产党把下列各书译成了中文：布哈林的《当代苏俄》、《共产党纲领》和一套《社会主义者袖珍丛书》。其中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此外，他们还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杂志，还着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中文。

七 月

6日 撰写《列宁与托洛斯基》一文，记述了采访托洛斯基和第一次晤见列宁的情景。载《赤都心史》〔十八〕。

文中描述了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演说的风姿和第一次晤见列宁的情景：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谈几句，他指给我几篇东方问题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

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着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觉，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大会决定政治生活的莫斯科这次才第一次与我以深切的感想呵。

上旬 以记者身份参加莫斯科市苏维埃为各国代表的钱行宴会。

后来，秋白在《赤俄之归途》（1923.1.25）一文中，生动地记述了参加这次宴会的情景道：

我以新闻记者的资格列席，席间遇着一莫斯科苏维埃的议员，某工厂的工人。他对我说：“呵，你原来是中国新闻记者，你们报上列宁死过了几回了！哈哈。”我说，中国造谣机关的机器还太简陋，自己还不配制造此种世界新闻的谣言，大概中国市场外货充盈，“舶来货的谣言”自然不少，不过我的报还算是有些左的，大约决不让此等谣言随便乱载。他道：“不错不错，你既来此地，自然不至于此。我听说中国青年曾经抵制日货。你们贵报大约更进一步抵制这类的英美货了。”说着大家哄然大笑。大家看见我这一个稍有常识的中国人——是俄国境内稀世之珍，——又能说几句俄国话，谈得来，都拥着来问长问短，弄得我头昏眼眩。……忽然有一位似曾相识的女郎跑来，才为我解围。……我们携着手走着谈话，走过一张桌子，忽

然听见大家嚷起来，“呵中国人来了，把他举起来。”女郎夹住我不让他们抢去，说：“刚吃酒，不要让他们颠簸。”始终夺不过，我竟被他们举起，几乎抛上天！我对女郎说：“你们这种欧洲式的欢迎礼，我实在不赞成。”他道：“还不是热闹热闹，谁象你们中国人拘拘谨谨，一点生气都没有。你看今天热闹不热闹！从前这所屋里，那里容得“我们”来热闹；——不容说象今天这样的盛会(Banquet)，就是平平常常的音乐会也不能来听，——票子卖得那样贵，还要穿什么晚礼服！人家才有说行新经济政策就已经没有社会主义了。我总不要听。这些宴会不宴会，还是小事，只看苏维埃里议事，对于商人及企业家加税减税，整顿实业交通，都是随着工人代表的意。政权总在我们工人阶级手里。……”

23日至8月2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

八 月

月初 经医生诊断，左肺有病，劝其回国。

4日 吐血。

5日 写《南国——“魂兮归来江南(庾信)”》一文，载《赤都心史》〔十九〕。文中写道：

我回寓来觉着更不舒服，前几天医生说我左肺有病，回国为是。昨天不是又吐血么？七月间卧病了一个月，奄奄的生气垂尽，一切一切都渐渐在我心神里磨灭……还我的个性，还我为社会服务的精力来！唉！北地风寒积雪的气候，里面烂肉的营养，究竟不是一片“热诚”所支持得住的。

……

梦吃模糊，焦热烦闷，恍恍惚惚仅有南国的梦影，灿黄的

菜花,清澄的池水……桃花……

唉!心神不定,梦归无聊。病深了!病深么?

12日 撰写《官僚问题》一文,载《赤都心史》〔二十〕。文中写道:

俄国社会问题是从十九世纪以来,除九十年时代勃兴起的劳工问题外,向来在社会思想中占极重要而不得解决的还有三个问题:知识阶级问题、农民问题、官僚问题。封建遗毒,东方式的专制政体,使官僚问题种得很深的根底。……共产党报纸上努力的攻击官僚主义呢。

15日 撰写《新资产阶级》一文,载《赤都心史》〔二十一〕。

苏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允许私人经营商业。文中写道:

新资产阶级发生起来,应着“资本最初积累律。”社会生活的现象中也就随之发见种种“新式”。戏院(私人的),咖啡馆,饭馆,照相馆,市场经济越发扩张了,技师就私人企业家聘请的每月动辄百余万了。

苏俄政府采取什么对策呢?文中写道:

国家工厂企业也完全改成“每一企业为一法人”的原则,竭力增加生产力,设许多国家托拉斯,种种专利制,——以与私人经济竞争。不但如此,政权把得稳稳才好。

29日 撰写《饥》一文,载《赤都心史》〔二十二〕。

文中概述了东俄盛产粮食的“黑壤区”发生了“非常之盛”的旱灾,造成了严重的饥荒。秋白以深切同情的心情写道:

值此劳农政府努力提高农工生产力之时,又受一大大的打击。革命战祸连年以来饥寒交迫,今年又是如此,真可见俄国无产阶级创业的艰辛。

九 月

10日 撰写《心灵之感受》一文,载《赤都心史》〔二十三〕。

13日 撰写《民族性》一文,载《赤都心史》〔二十四〕。文中写道:

旱灾非常之可惊,要征取新资产阶级的慈善捐,不如使他们自掷“缠头”,“孤注”,国家跑马厅又开跑马赛会,抽头赈济灾民。

我因病懒懒的不能去看,宗武去参观归来,告诉我许多很有趣味的事。

跑马厅中赌注下得很大,竟有百余万^①一次的输赢,——新资产阶级的生长竟如此之敏捷,豪举胜事,固不必说,只要真有益于饥民。

15日 在《改造》第4卷第1号上发表翻译凯仁赤夫著《校外教育及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一文,署名瞿秋白。

16日 中秋节,写《“东方月”》新诗一首,载《赤都心史》〔二十五〕。

“人离别,长相忆”。“原万族共‘婵娟’,但愿‘婵娟’年千亿”。

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思乡怀亲之情,也表达了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理想。

25日 由于患病的缘故,写信在德国的俞颂华,表示准备回国,写了《归欤》一文,以志其事。但没有走成。

在《归欤》中写道:

中国的一个中秋节也能在莫斯科过,意兴萧条中,未始不是一件乐事。后来谈到我的病,嘉德琳女士竭力劝我回

① 那时一万苏维埃卢布约值中国二角钱。——作者原注

国，——我亦知道，夜夜虚汗咳嗽吐血，难怪心绪不能好。可是回去罢，又怎么办呢？……

夜深散宴归来，又过质生处一谈，在莫斯科物质生活太困苦，还“不如归去”，或者有“可为”。……病体支离，要做的，应当做的，也都不能做。况且心理的病态，情感易动，感慨低徊，抛一滴无意的热泪；家园，故乡，人生的意趣，将来的责任都拼在泪花里，映着灯光，陆离万象，化作一宇宙外的“宇宙”了。

今天我写信与俞仲华，归计暂决，我们三人同来，未及一年，都已四散，——颂华五月就上柏林去了，我现在决计要归国，宗武还留此地，——三人此行的成绩，千辛万苦，报酬又何如呢？致颂华信中有几句话，聊且记下：

……我一个病人，为精力所限，为才力所限，为学识所限，在这八个月内的成绩如此而已！……是成是败？以我这样学识浅薄，精神疲敝的人来做开天辟地研究俄罗斯文化（在我以前俄国留学生有一篇好的文章出来没有）的事业，勉强有这一些成绩，能否算得最高限度？……

总上三种原因：（一）求学问题，（二）通信问题，（三）经费问题，再加我现时的病状，不能不决定回去了。现在我已着手进行，可是旅途困难，行李笨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走得成功呢。……

九月二十五日（中秋后九日）。

可是，结果还是没有走成，在《知识劳动》（10月12日）一文中写道：

西伯利亚旅行现时非常困难，而我带的书籍太多，又不能走了，——总要等一“便”的机会才好。

病亦似乎轻了好些，最好能进医院，……肺病是要“养”的。可是我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不能不工作，要工作。

工作?我现在的工作纯粹是非体力劳动,片面的智力劳动更使健康受损,性情怪僻,再加之智力劳动所必须的“精神娱乐”,我也看得非常之淡,自然没有生趣了。

同月 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者大学(以下简称“东方大学”)中国班、陆军大学汉文系任教授,上俄文课,并任理论课翻译。

在俄共〔布〕党和列宁的关怀下,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办了中国班。这个班的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王一飞、彭述之、柯庆施等 40 多人。秋白应聘为这个班和陆军大学汉文系的教授。

萧三《秋风秋雨话秋白》:秋白担任助教和翻译,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他经常来我们中间询问工作、学习情况,对我们十分关怀。此后不久,秋白同志奉调回国,……

温济泽《瞿秋白同志战斗的一生》:当时东方大学有四十几个中国学生,编了一个中国班,其中多数是从国内派去学习的革命干部,瞿秋白同志给中国班的学生上俄文课,担任理论课的翻译。他教课非常认真、热情。他有病,有时累得脸色发白,仍旧滔滔不绝地讲。当时中国学生都不懂俄文,俄国教师除去一人而外,都不懂中文。瞿秋白同志象是他们中间的一道桥梁,帮助他们完成了教和学的任务。

同月 翻译兹腊托夫拉斯基的《痴子》,发表在《小说月报》增刊“俄国文学研究”专辑上,署名瞿秋白译。

同月 翻译阿里鲍甫著《可怕的字》,发表在《小说月报》增刊“俄国文学研究”专辑上,署名瞿秋白译。

十月

10日 应德尔纳斯嘉女士邀请,参加她举办的家庭音乐晚会。

12日 应邀去中国工人林扬清家吃饭。写《智识劳动》一文,载《赤都心史》(二十七)。

15日 应苏菲亚·托尔斯泰女士的多次邀请,偕李宗武随莫斯科教育厅第一试验模范学校学生前往清田村参观托尔斯泰邸宅。

18日 撰写《清田村游记》一文,载《赤都心史》(二十八)。

文章具体记述了这次参观的情景,并写下了自己的感触:

清田村一游,令人畅心满意,托尔斯泰——世界的伟大文学家,遗迹芳馨。旧时代的俄国——贵族遗风还喘息于草间,依稀萦绕残梦。智识阶级的唯心派,新村式的运动,也有稀微印象。俄罗斯的农家生活,浑朴的风俗气息,而经济上还深陷于小资产阶级。平民农夫与智识阶级之间的情感深种社会问题的根蒂,依然显露。智识阶级问题、农民问题,经怒潮汹涌的十月革命,冲动了根底,正在自然倾向于解决。——新教育与旧教育的过渡时期。

此游感想如此,其他乡间秋色,怡人情性,农家乐事,更饶诗意,生活的了解似乎不在远处……

31日 撰写通讯《劳农政府内政外交之新局面》一文,发表在1922年5月24日、25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就苏俄政府设立国家银行,承认帝国国债等问题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关系且已及于外交。……现在一切都入和平时代,非但实行租借地政策,要利用国外资金来开发俄国的富源,以立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而且今年又值旱灾,非得仰求西欧资

本主义国家的帮助不可。既要借新债,旧债不能不承认,而维持信用。……

同月 写完《饿乡纪程》跋。

在“跋”中明确地记述了自己到苏俄后,寻到了正确的道路。他写道:

我寻求自己的“阴影”,只因暗谷中光影相灭,二十年来盲求摸索不知所措,凭空舞乱我的长袖,愈增眩晕。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何况孑然飘零,远去故乡,来此绝国,交通阻隔,粗粝噎喉,饿乡之“饿”,锤炼我这绕指柔钢,再加以父母兄弟姊妹,一切一切,人间的关系都隔离在此饿乡之“乡”以外。如此孤独寂寞,虽或离人生“实际”太远,和我的原则相背,然而别有一饿乡的“实际”在我这一叶扁舟的舷下,——罗针指定,总有一日环行宇宙心海而返,返于真实的“故乡”。

十一月

6日 晚,去华侨吕某家取昀白托带的信,未遇,与吕某同居的王某及亲友聊天。16日,写《中国人》一文,记述其事,载《赤都心史》(三十一)。

7日 参加第三电力劳工工厂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纪念的晚会,又一次见到了参加晚会的列宁。在8日写的《赤色十月》一文中写道:

集会的人,看来人人都异常兴致勃发。无意之中,忽然见列宁登演坛。全会场都拥挤簇动。几分钟间,好象是奇愕不胜,寂然一晌,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

工人群众的眼光,万箭一心,都注射在列宁身上。大家用心尽力听着演说,一字不肯放过。列宁说时,用极明显的比喻,

证明苏维埃政府之为劳动者自己的政府，在劳工群众之心中，这层意义一天比一天增胜，一天比一天明了：“拿着武器的人”，向来是劳动群众心目中一可怕的东西；现在不但不觉他——赤军——可怕，而且还是自己的保护者。

列宁末后几句话，葬在热烈的掌声中。

23日 写《饿乡纪程》“跋”后的“志”。

在“志”中，记述了写《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的意愿和经过：这篇《游记》（按：指《饿乡纪程》）着手于一九二〇年，其时著者还在哈尔滨。这篇中所写，原为著者思想之经过；具体而论，是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因工作条件的困难，所以到一九二一年十月方才脱稿。此中凡路程中的见闻经过，具体事实，以及心程中的变迁起伏，思想理论，都总叙总束于此（以体裁而论为随感录）。至于到俄之后，这两部分，当即分开。第一部分：一切调查，考察，制度，政事，拟著一部《现代的俄罗斯》，用政治史，社会思想史的体裁。第二部分：著者的思想情感以及琐闻逸事，拟记一本《赤都心史》，用日记、笔记的体裁。只要物质生活有保证，则所集材料，已经有极当即日公诸国人的，当然要尽力着手编纂，在我精力范围之内，将所能贡献于中国文化的尽量发表。成否唯在于我个人精力能否支持，——可是我现在已病体支离了。

“志”末署：瞿秋白志于莫斯科 Knyaji Dvor 病榻。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26日 前几天接哟白来信，信中提及“家里好”，引起无限感慨，写《家书》一文，载《赤都心史》〔三十二〕。文中写道：

前几天我得着北京来信，——是哟弟的手笔，还是今年三月间发的，音问梗塞直到现在方来，他写着中国家庭里都还“好”。唉！我读这封信，又有何等感想！一家骨肉，同过一生活，共患难艰辛，然而不得不离别，离别之情反使他的友谊深爱更沉入心渊，感切肺腑。况且我已经有六个月不得故乡只

字。于今也和“久待的期望一旦满足”相似，令人感动涕泣，热泪沾襟了。

……

我的母亲为穷所驱，出此宇宙。只有他的慈爱，永永留在我的心灵中，——是他给我的唯一遗产。父亲一生经过万千痛苦，而今因“不合时宜”，在外省当一小学教员，亦不能和自己的子女团聚。兄弟姊妹呢，有的在南，有的在北，劳燕分飞，寄人篱下，——我又只身来此“饿乡”，这就是我的家庭。这就是所谓“家里还好”！

……

总有那一天，所有的“士”无产阶级化了，那时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总有那一天呵……

十二月

3日 撰写《我》一文，载《赤都心史》(三十三)。

在文中自叙来苏俄后，经过一年的实地考察、学习和思考后，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和变化。写道：秋白的“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不能为现代“文明”所恶化；固然西欧文化的影响，如潮水一般，冲破中国的“万里长城”而侵入中国生活，……然而这一青年的生活自幼混洽世界史上几种文化的色彩，他已经不能确切的证明自己纯粹的“中国性”，而“自我”的修养当有明确的罗针。况且谁也不保存自己个性抽象的真纯，——环境（亦许就是所谓“社会”）没有不生影响的。

……

如此，则我的职任很明了。“我将成什么？”盼望“我”成一人类新文化的胚胎。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补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现时两种

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状，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我”不是旧时代的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固然不错，我自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无足轻重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

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

10日 写《生存》一文，载《赤都心史》〔三十四〕。

15日 因肺病严重，不得已进莫斯科郊外的高山疗养院治疗。

秋白痛苦地写道：

病魔，病魔！自七月以来，物质生活渐渐的减少，——优待食粮因新政而改付值办法；智力工作更加无限制的增加。于是，我更起居无时——不是游息的“无时”，而是劳作的“无时”，饮食不节——不是太多的“不节”，而是太少的“不节”。疾病的根底一天一天埋得深了。“我难道记忆力，论断力都失了么？……让我想一想看。”病卧几天，移我入此高山疗养院。

在医院，医生说他的—叶肺已经烂了，至多再支持三年。但他置之度外，毫不悲观，仍然学习、工作不辍。

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秋白，那是一九二二年吧，我们在莫斯科，你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医生说你的—叶肺已经烂了，说你顶多不过支持三两年。但你总不肯休息。讲课时，有时累得面色苍白，连气都接不上来了，但你还是海人不倦地讲着。后来真不能支持了，就在莫斯科近郊高山疗养院疗养，我几乎每星期日都去看你，你从来都是兴奋的忘了病，忘了一切，口若悬河地谈论着。你说苏联是一座琳琅满目的革命宝山，你要拼着你病弱的生命，把革命

的宝贝更多地运到祖国来。

你那时躺在床上，床头没有台灯，你就把吊灯拉到床头，拴到床架上，俯到枕上写文章。你说，病是要养的，可是书更要读，工作更要作，不能不作。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报纸大肆造谣，说什么“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即将崩溃”，正在这时候，你却扶病写了《共产主义的人间化》、《莫斯科的赤潮》等著名通讯，把苏联的实况，介绍给追求光明的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者，给他扫除了资产阶级报纸对苏联所散布的迷雾，使他们知道了苏维埃社会的真实情况。对全世界说来，这些热情洋溢的真实报道，正是拨开云雾而见青天呵！

19日 病中，写《中国之“多余的人”》一文，载《赤都心史》（三十五）。

秋白在疗养中，因受肺病的困扰，疗养院的孤独单调的生活，也常常使他在情绪上发生波动，引起他“忏悔、悲叹、伤感”和“怀旧”之情，发出过“心神不定，旧梦无聊”的叹息。他在病中写的杂感《中国之“多余的人”》一文，真切地写了他那忧郁、矛盾而又复杂的心境。写道：

四五天来——我是十二月十五日进院的，精神才渐渐的清晰，回忆复活，低徊感慨缠绵悱恻之情，故乡之思隐约能现。……噢！

噢！我生来就是浪漫派，时时想超越范围，突然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情性的动，无限量，无限量。然而我自幼倾向于现实派的内力，亦坚固得很，“总应当”脚踏实地，好好的去实练明察，必须看着现实的生活，做一件事是一件。理智的力，强行制裁。我很知道，个性的生活在社会中，好比鱼在水里，时时要求相适应。这我早就知道！……

噫！心智不调。无谓的浪漫，抽象的现实，陷我于深渊；当寻流动的浪漫，现实的现实。不要存心智相异的“不正见”，我本来不但如今病；六七年来，不过现实的生活了，心灵的病久

已深入，现实精神的休养中，似乎觉得：流动者都现实，现实者都流动。疗养院静沉的深夜，一切一切过去渐渐由此回复我心灵的旧怀里；江南环溪的风月，北京南湾子头的丝柳。……

24日 撰写《自然》一文，载《赤都心史》〔三十六〕。

同年 受苏俄在扫盲中用拉丁字母创制少数民族文字取得巨大成就的影响，开始注意研究中国文字怎样用拉丁字母拼写的问题，成为中国文字改革的先驱者。

一九二二年 24岁

一月

1日 在高山疗养院庆祝新年，引起无限感慨。写《离别》一文，载《赤都心史》〔三十七〕。文中写道：

“温情乐意的人生，在亲亲切切的生活里，中国社会中少见如此，——必定只在家庭。”然而欧洲有现实的社会，社会就和家庭（中国）有同样的价值。赤俄革命后的社会生活，更进一层，混以前相异的社会为一，女役——在中国不过“老妈子”罢了！——和医学博士携手同歌呢。那里想得到中国家庭外的社会生活，只是麻将牌的桌子，烧酒壶的壶底呢？——家庭内的亲切高尚优美的生活，娱乐，也就少见得很。

然而我不得不回想父母膝前的旧梦，——我曾有温情乐意陶养我的心性。现在离别六年了，今年更到万里外莫斯科的病院里！离别，离别！

9日 译丘采夫(F·I·Tutcheff)诗《一瞬》一首，载《赤都心史》〔三十八〕

12日 译丘采夫诗《Silentiun(寂)》一首，载《赤都心史》〔三十九〕。

21日至2月2日 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中国代表团作翻译。

是日，远东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开幕式，列宁出席了大会，季诺

维也夫作了报告。这次大会是为了推动和促进远东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抵制和对抗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华盛顿会议而召开的。中国代表团由相当广泛的成员组成，中共代表是张国焘、国民党代表是张秋白。高君宇、王烬美、邓恩铭、瞿秋白、林育南、任弼时、罗亦农、俞秀松、柯庆施、肖劲光、邓培、贺衷寒、卜士奇、王象干等也分别以各地区，各团体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大会。张太雷以大会筹备者的身份参加了大会。

远东大会开会时，秋白仍在高山疗养院治病。他出于责任感，满怀激情，抱病参加了大会，并任中国代表团的翻译。

会议期间，秋白因积极、热情而负责的工作态度，受到列宁的重视。

29日 生日。以激动的心情写了《晓霞》一文，载《赤都心史》〔四十〕。文中写道：

“高山疗养院的生活恬静规约，——有时也有精神的疲乏。况且和外界绝对隔离，几回封锁，天天看着灰色的天，白茫茫的雪，怎得不盼望清风朗日，一畅胸襟呢？莫斯科忽然移近东亚——远东大会召集，用得着我这东方稚儿”，于是出高山——陡然呼吸一舒，好一似长夏清早，登高山而望晓霞。

二 月

2日 抱病赶到彼得格勒参加远东大会举行的闭幕式。

7日 因气候不适，“血痰又现”，在病危中，再被送回莫斯科的高山疗养院治疗。

在《彼得之城》中写道：

…我到此地，——其实出疗养院不久，忽然不得已而步行二里，呀，气压的重，寒气浸浸，彼得城的街市于我几等于水晶宫。幸而遇着一女友扶我徐行，——冷冷清清，满街差不多不

见人影，……

勉强行至国际旅馆，血痰又现。如此睡在屋中四五天，……

二月七日，模糊梦寐中，有人把我运到莫斯科。

9日 撰写《彼得之城》一文，载《赤都心史》〔四十一〕。

在文中满怀激情地写道：

今日的彼得城苏维埃议场内，那困厄无赖的“奴隶”——韩国人，游牧愚昧的“野蛮民族”——蒙古人，盗匪统治下的“不安分青年”——中国人，帝国主义工厂机器下的碎骨，“不爱国者”——日本人，个个都站到昔日提议东清铁路权利的议坛上去。在彼得城工人女工劳动者欢呼鼓掌之中，发惊人的洪声，遥震万里外的四千余年的古国的“万里长城”，隐隐的似闻回响。

13日 写新诗《俄雪》一首，载《赤都心史》〔四十二〕。在诗后附记中写道：

俄罗斯的寒，令南国过来的旅客，对他这冷淡的主人翁，常起奇异的感想。虽则“寒主人”十二分的殷勤，周旋揖让，反是冷气直喷，令人欲绝。况且严酷的雪影，惨淡的雪色，凄凄黯黯，白茫茫，浑漠漠，一年一百五十天不见天日。我——江南花柳明媚中的产儿，怎不觉得，他——“俄雪”，是“我”与自然之间的屏障。

17日 撰写《美人之声》一文，载《赤都心史》〔四十三〕。

文中记述美国舞蹈家邓肯女士向“苏维埃政府的呼声”。

26日 译高尔基诗《阿弥陀佛》一首，载《赤都心史》〔四十四〕。

此诗为高尔基所作《市侩颂》的译作，秋白后来又重新译过，收入《瞿秋白文集》第6卷中。

同月 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

在入党宣誓时，表示要忘我地为中国人民服务，要把十月革命的光辉带给中国人民。

三 月

1日 撰写《新村》一文，载《赤都心史》〔四十五〕。

文章着重谈苏俄的农民问题和农业新政策。指出：

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同时农民却是小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的。

10日 写新诗《海》一首，载《赤都心史》〔四十六〕

18日 撰写《尧子河》一文，载《赤都心史》〔四十七〕

24日 撰写《新的现实》一文，载《赤都心史》〔四十八〕。

文章评述了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后，指出：

唯实的，历史的唯物论有现实的宇宙。无产阶级为自己利益，亦即对人类文化担负的历史的使命。凡在现实世界中，为现实所要求以达这“新”使命的，则社会意识的表示者都不推辞：代表此一阶级的利益，保持发展人类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已经破产。……亟起直追！现实世界中“奋斗之乐”，就是他的报酬。于现实生活，社会之动流中，须得实际的论证方法，那才走得人类文化史的一步。中国当代的青年！注意为是。……先知道中国“是什么？”然后说“怎么样？”……至于“我们”“要什么？”且放在最后再说。

20日 撰写《生活》一文，载《赤都心史》〔四十九〕。

文章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分析了生活中动与静的辩证关系。他认为：

生活是“动”，求静的动，然而永不及静的。正负两号在代数中是相消的，在生活中是相集的。……永不及静，是以永久的生活。

这篇文章是《赤都心史》最末的一篇文章。

四 月

19日 撰写通讯《赤俄之第四年》一文，发表在8月16日、17日、18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这是秋白病愈后写的第一篇通讯。他在文中作了简短的说明：

记者从去年十一月末起，病益加重，入医院后，调养虽好，然而昏卧床榻也有两三月之久，因此通讯中途停止至今未能动笔，算来已有四个月了。现在，从一九二二年起，重行继续。且略总结一九二一年的俄国时势，以为一九二二年通讯的序言，庶几有一端绪。

通讯概括了苏俄在1921年的形势说：

赤俄之第四年——一九二一年，是十月革命过程中一段落——自战争至和平之过渡，经济上从军事的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政治上从国内战争到反动暗潮，此期是劳农政府最发展的时期，——由政治舞台及铁血战场上得了胜利有转向经济的战线之可能；而亦是劳农政府最吃紧的时期，——外交、政治、经济、财政离军事状态而入平时，都在刚刚下手整理的时候，反革命派正想乘机破坏。革命的过程，使俄国现时的执政党不得不步步在奋斗之中，显示他们代表“阶级利益”的标志，而取相当应付的政策。

通讯最后写道：

此后当继以一九二一年末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的结果，今年——一九二二年前三月的大概情形及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时的政局。然后继续再作长期的通信，——如其记者旧恙不再发，万里之外，知读者渴望，特致款忱。

21日 撰写《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一文，发表在8月9

日、20日、21日、22日、23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22日 撰写《一九二二年之西欧与苏维埃俄罗斯——俄国经济改造之新气象》一文，发表在8月26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同日 撰写《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社会革命史之第二编》一文，发表在8月29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27日至4月2日 莫斯科召开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大会对执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年的工作作了总结。列宁在会上指出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场“谁战胜谁”的殊死战斗，同时宣布，现在退却时期已经结束，必须重新酌量向资本主义成分进行坚决进攻。秋白因病没有直接参加这次大会的采访。他根据收集到的报刊资料写了这篇通讯，报道了苏俄执行新经济政策后的情况。

五 月

12日 撰写通讯《莫斯科传来日诺亚会议情形》一文，发表在7月21日、22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日诺亚(今译热内亚)会议，于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在意大利热内亚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苏俄、英、法、意、比、日、德和其他21个国家的代表。会上，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利用苏俄的经济困难，强迫它接受条件苛刻的协定，包括要求偿还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借的外债，要求把收归国有的企业归还给外国企业主，苏俄代表拒绝了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

通讯报道了苏俄代表的态度，英法在对苏问题上的矛盾。

19日 撰写通讯《日诺亚会议情形》一文，发表在7月25日、26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在介绍苏俄与西方各国谈判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中，揭

露了帝国主义的狡诈和阴谋,特别对美国和日本揭露得更是深刻。

六 月

8日 撰写通讯《日诺亚后之中俄外交》一文,发表在8月15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介绍了当时中俄外交情况,批评了北京政府对俄外交政策。

同日 撰写通讯《苏维埃俄罗斯之立法》一文,发表在8月17日出版的上海《时事新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详细介绍了苏维埃刑法典之意义、性质及其形成过程。

15日 撰写《世界劳工之统一战线与莫斯科》一文,发表在8月18日出版的上海《时事新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介绍了欧战结束后,“欧洲劳工阶级处于革命潮流,势利于进取”。但由于工人阶级政党中的革命派——第三国际,与改良派——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之间,“因理论策略的不同,争辩无已,坐失良机”的情况。

26日 撰写通讯《反对社会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一文,发表在8月24日、25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着重介绍了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同他们作斗争的情况。

27日 撰写通讯《智识阶级与劳农国家》(之一)一文,发表在9月10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首先就什么是“知识阶级”作了说明,接着对俄国的知识阶级作了分析。

秋白在通讯中还写了如下一段话:

中国莫斯科的通信记者,可怜只有区区一个,全副功夫,永久只注意于“政治”、“外交”、“经济”,“会议又会议”,也未免

厌烦,何况名震全球的“文学的俄国”、“社会思想的俄国”,半世纪来,凡掌握世界的精神文明,何独于光荣的十月革命之后,而反可以使他落寞呢?”

七 月

3日 撰写通讯《知识阶级与劳农国家》(之二)一文,发表在9月20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继上文剖析俄国知识阶级各派对革命的态度。

10日 撰写通讯《海牙会议与俄罗斯》一文,发表在9月9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17日 撰写通讯《欧俄新订之劳工保险法》一文,发表在11月18日、19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24日 撰写通讯《欧俄国内商业之新发展——下新城市集复活》一文,发表在9月22日、23日、25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这是一篇介绍俄国集市贸易复活的长篇通讯。对下新城市集的历史、现状、规模作了详细描述,充分证明了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的活力。

31日 撰写通讯《海牙会议后欧俄经济之前途》一文,发表在10月7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八 月

8日 撰写通讯《苏俄一九二二年之丰收》一文,发表在10月7日、8日出版的上海《时事新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以十分喜悦的心情在详细报道俄国的丰收情况后,指出:虽然如此,只要劳农政府商业政策得手,单这一万万五千万辅

德的余粮,已经大足以舒展俄国的经济生活,利用之振兴实业,创建电站,购取国外的机器等,来年的经济状况大可乐观。俄国报界现在称此丰年为“国内之海牙”,“假使在海牙向外国资本家借钱没有借到,幸而国内年成大好,可以回头向农民阶级借面包”,虽则数量甚微,然在七八年内继续战祸灾祸之后未始不因此而如释重负呵。

通讯的“附”中,报道了:

劳动政府赴中国代表岳飞(今译越飞)^①已启程,闻并带有与日本开始撤兵问题之谈判的责任云。远东方面,消息较近,祈读者注意……

13日 撰写通讯《新经济政策之因旧政治思想之果——无产阶级敌党之反动》一文,发表在10月13日、17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介绍了俄国阶级斗争的情况后,指出:新经济政策之初,少数派,社会革命党,大家预定,共产党要因此而分裂,这是共产党之“负荆请罪”。他们高呼,共产党不久便要有政治的让步。等到后来看看形势不对,后悔起来,又要说是“历史的大误会”。其实一年以来,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即使不绝对解体,也就经过不少分化,内部大起分裂现象。一年半载以前,共产党中刚刚提及新经济政策的策略,他们就已经说,共产党中必因此而起紊乱,现在此种预言却无大影响。固然一年不算长久,共产党也还不敢说大话,——然而俄罗斯共产党中一年以内未起紊乱,而资产阶级政党之中,却应了他们自己的预言。

^① 越飞(1883—1927),苏俄外交官。1922年3月,以全权代表身份来华,与北京政府谈判外交承认及其他问题,未果。1923年1月,转赴上海,与孙中山会晤,并发表联合宣言。不久奉召回国。

20日 撰写通讯《新经济政策之因旧政治思想之果——无产阶级敌党之反动与共产党之职任》一文，发表在10月21日、23日、24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署名瞿秋白。

通讯仍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报告，介绍了8个问题：（一）资产阶级之新策略；（二）老招牌与新货物；（三）资产阶级的舆论；（四）知识阶级之分化；（五）共产协作社之小资产阶级性；（六）综观；（七）共产党之职任；（八）季诺维也夫之镇压观。

十一月

5日至12月5日 参加共产国际先后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翻译。

中国共产党派出由陈独秀、刘仁静等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广泛的团结群众的统一战线方针，专门讨论了东方问题，着重讨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会议通过的《东方问题提纲》，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蓬勃高涨，强调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会议还制定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决议》，其基本思想就是要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为陈独秀作口头翻译；同时，把列宁在大会上的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译成中文，迅速寄回国内，及时地指导中国革命。

十二月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与罗亦农两人介绍彭泽民加入中国共产党。

21日 因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随陈独秀等人登程回国。

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道：

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来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

秋白还在通讯《赤俄之归途》一文中写道：

临走前一星期，我还不能决定，——回国的川资已经来了，此后若要继续留学，经费或者不愁，——不必一定要国内接济；可是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的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客中中国书籍没有，不用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于是决定回国一次。匆匆走别几处大学教授，东方语言学馆同事，还要买些零碎东西。……

我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上车。……

秋白回国的真正目的，在通讯上当然是不能明说的。但是他在即将离别曾生活和工作两年多的俄罗斯大地，还是怀着依依难舍的深情。写道：我离俄国，真正有些低徊不舍的感慨，——那一种纯朴自然，新生的内力，活泼泼地向上的气象是有叫人留恋之处，虽然也有不少糊涂颠顶的蠢气，却不害其为世界第一新国，——劳农国家。

一九二三年 25岁

一月

元旦 与陈独秀等人在旅途渡过。

月初 为减少被张作霖部队发现的危险，没有与陈独秀同车到达满洲里，在临近满洲里的一个小站下车。

8日左右到达哈尔滨，由于受到军警的不断盘问，又被迫在哈尔滨停留三天。

在《赤俄之归途》一文中写道：

一进中国境，最触目的就是到处只见穿着“号衣”的军警，……哈尔滨下车后，我就因在车上时这最触目的东西时时盘问，只得缓一缓，在哈住了三天。直到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三日方才到北京。

13日 抵北京。当火车进入北京，远远望着天坛、城楼，中国式的建筑，不禁“怦然心动”。

在京住东城大羊宜宾胡同堂兄瞿纯白家中。

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在北京，秋白任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并协助编辑《向导》。

15日 出席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纪念德国共产主义者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殉难四周年召开的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

《晨报》(1月16日)报道：

昨日为德国马克思共产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特与卢森堡

女士殉难之第四周年紀念，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特在高師大禮堂舉行紀念會。昨日下午二時，各界人士先後到會，首由主席報告開會，次由瞿秋白唱國際歌，次由主席報告李卜克內西特與盧森堡歷史，次瞿秋白、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相繼演說。三時余，始散會。又開會之時，分發若干紀念品云。

17日 在北京現實狀況的異常刺激下，寫了雜感《最低問題——狗彘食人之中國》一文，發表在1月23日出版的《晨報》副刊上，署名瞿秋白。

秋白在文章的序言中寫道：

秋白離中國兩年，回來本急急想把在俄研究所得以及俄國現狀，與國人一談，不料到京三天，所接觸的中國現實狀況，令我受異常激刺，不得不先對中國說幾句“逆耳之言”。

根據“中國的現實”，秋白在文章中提出了黨的民主革命綱領：

“中國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義，假如不推倒世界列強的壓迫，永無實現之日。”軍閥政府乃“是‘率獸食人’的政府，諂媚歐美帝國主義，以屠殺中國平民勞動者為己任”的政府。

25日 寫通訊《赤俄之歸途》一文，發表在1月30日《晨報》副刊上，署名瞿秋白。

27日 撰寫回國后的第一篇重要論文《政治運動與知識階級》一文，發表在1月31日的《向導》18期上。

文章的杰出意義在於，首次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的資產階級，並將資產階級劃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買辦式的“商業資本”與官僚式的“財政資本”，這部分的資本主義是中國“軍閥制度的政治及帝國主義經濟之副產品”，“他們的安富尊榮全賴平民的汗血和外國人的剩肴殘羹”，因而是“賣國派”、“專制派”。另一部分的“商人階級”，是“受歐美技術文明的促進”而形成，他們不但受着外國資本的“擠軋”，而且受着軍閥的“勒索壓迫”。因而是“愛國派、民治派”。

文章认为中国的旧知识阶级，“是专制派的鏢师”；而新的智识阶级，“是民治派的健将”。智识阶级“立于代表社会文化的地位”，“是社会的喉舌”，但“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

同月 写《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纲领问题》，发表于6月出刊的《新青年》季刊第1期，署名瞿秋白。

同月 堂兄瞿纯白希望他能留在北京供职。李大钊曾介绍他到北京大学俄国文学系教授《俄国文学史》，因学校反动的教务长顾某迟迟不发聘书而未成。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黄郛也发来聘书，邀请秋白到外交部任职，月薪二百元。秋白对此却恼火说：“这是谁同意的？为什么给聘书？”又说：“上海有我的工作。”这事颇使堂兄不解。

春 将1922年春脱稿的《俄罗斯革命论》交商务印书馆。这是一部从理论上探讨俄国革命的著作，但未能出版。

杨之华《回忆秋白》：“这本书稿交给了商务印书馆，但遭到反动统治者的禁止，未能出版。我党中央曾要求赎回，商务印书馆老板不肯。后来书稿和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一起在“一二·八”淞沪战火中被烧毁了。”

二 月

7日 军阀吴佩孚对长辛店与郑州沿京汉铁路一线的工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制造了历史上的“二七”惨案。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而战。

22日 军阀政府加紧对革命势力的镇压，并下令通缉陈独秀等。陈于是日离开北京至上海，中央机关也随之迁回上海。留京的秋白，在此时亦深居简出，极少活动。

瞿重华《大叔秋白生平琐记》：

这段时间，秋白大叔不大出门，白天夜晚都在撰写文章。闲暇时，也不出去，在家里带我们小孩们玩玩，教我们唱唱歌子。

三 月

月底 离开北京南下。

到达上海后，即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负责筹办《新青年》季刊，并参加《向导》编辑工作。

春夏之交，秋白作《赤潮曲》，译《国际歌》歌词，发表于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一期。《赤潮曲》署名秋萁，《国际歌》未署名。

秋白是第一位将《国际歌》的曲谱与译词配合译出的人，由于秋白的翻译，才使《国际歌》开始在中国传唱开来。

秋白在《国际歌》词前附言中指出：

诗曲不必直译，也不宜直译，所以中文译本亦是意译，要紧在有声节韵调能高唱。可惜译者不是音乐家，或有许多错误，然而也正不必拘泥于书本上的四声阴阳。但愿内行的新音乐家，矫正译者的误点，——令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

《国际歌》译词，是萧三多次修正而成，与秋白译文已有很大变化。但其中对“国际”一词，保留了秋白采用译音的手法。

瞿重华《大叔秋白生平琐记》：

我还记得当年学唱《国际歌》的情形。那次，《国际歌》的歌页，也是大叔亲手复写的。和往常不同，歌页上的词曲排列成三行，第一行，是秋白大叔根据五线谱译成的简谱。第二行，是秋白大叔据法文原文歌词译成的中文。时隔60年，歌词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的歌词是文言文，歌词中的“安特那雄奈尔”一词未做意译，而用法文直译入乐。第三行，是法文歌词原文。

四 月

25日 在《向导》22期上发表《北京政府之财政破产与军阀之阴谋》一文，署名巨缘。

同月 经李大钊推荐，出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道：

“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三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程永言《回忆上海大学》：于、邵两氏为商量‘上大’的校务，在福州路（前四马路）同兴楼京津菜馆内邀约李大钊、张继两先生中午便餐，程嘉咏也在座招待，共计五人。专商谈‘上大’校务，及请他们予以协助。“李先生即介绍邓中夏先生（安石）出任总务长，瞿秋白先生任社会学系主任。”

王秋心《我在上海大学的生活片断》：

于右任来校后，曾邀李大钊、陈独秀来任校董，他们此时都负有革命重担在身，当然不可能来。李大钊介绍邓中夏同志给予右任到校担任教务长……后来，瞿秋白、陈望道、张太雷、傅东华、恽代英等革命前辈来教过书，不少学生在这个学校里参加了SY、CP组织，走上革命的道路。上海大学实际上已成为我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党团员的一所学校。我同弟弟环心就是在1924年由瞿秋白、邓中夏二位同志介绍入党的。

五 月

2日 在《向导》第23期上发表《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一文，署名秋白；同时发表的还有：《乐志华案是一幅中国的缩

影》，署名巨缘。

23日 在《向导》第26期上发表《文明的列强野蛮的中国》，署名巨缘。

六 月

6日 在《向导》第28期上发表《一致团结的反对军阀罢！》、《中国还没有亡吗？》两文，署名巨缘。

12日至20日 以苏俄归国代表身份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三大”上，秋白负责主持起草党纲草案，并就党纲草案向大会作报告；参与了党章的修正工作与向大会作共产国际“四大”情况的报告；积极主张同国民党合作，在促成党在策略路线上实现历史性的转变方面作出了贡献。对此，李立三曾评论说：“第三次大会秋白回来了，他在领导上起了主要的作用，当然他在有些地方也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不过他对于国际路线是坚决的。”

秋白起草的党纲在发表时曾被陈独秀修改过，其中重要之点：（一）“此革命之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二）“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改为“也很难成功”。（三）“督促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为“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秋白在检讨自己起草党纲草案中的错误时认为：“党纲草案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切实的、勇敢的解决农民问题”，“只有减租，而没有土地问题”。

“三大”的主要议题是国共合作和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讨论中曾有过尖锐争论。蔡和森对“三大”上发生的争论曾作概括：“（1）联合战线问题；马林、仲甫、秋白、太雷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国焘、和森、仁静

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为阶级性使然，所以我们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即是与国民党联合，因为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2)党的地位与独立工作(亦分两派)：一、马林、仲甫、秋白、太雷以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作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那时共产党自然有〔会〕出现了。二、国焘、和森、仁静以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

党内虽有过于激烈的争论，但经过讨论，最后还是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有关国共合作的决议。

大会后之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分配工作并选举5人组织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5人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

在“三大”上，秋白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

秋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介绍“三大”选举结果：“独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泽东(34)，朱少连[△](34)，平山(30)，项英[△](27)，章龙(25)。候补：邓培[△]，张连光(潜逃)，梅坤[△]，李汉俊，邓中夏(载《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76页)。”这名单与1957年苏共移交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历史档案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载一致：“中共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谭平山、毛泽东、王荷波(京浦铁路工人)、项德隆(京汉铁路工人，系项英——编者)，朱少连(萍乡煤矿工人)”。 “候补委员李汉俊、徐梅坤、邓中夏、邓培(京奉铁路工人)，张良工(译音，京汉铁路工人)”。

徐梅坤《九旬回忆》：“瞿秋白以及马林等都参加了党章起草工作。张太雷、瞿秋白还将马林起草的文件材料译成中文发下。

会议通过决议后,与会代表到黄花岗烈士墓举行悼念活动,由秋白指挥,大家高唱会议期间刚学会的《国际歌》,“三大”就在《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13日 《向导》第29期上发表《冯玉祥与吴佩孚》一文,署名巨缘。

15日 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出版。

《新青年》季刊筹备期间,编辑部几乎是秋白一个人搞起来的,他不仅组稿写稿,而且亲自担任设计、校对等工作,还要经常下厂。经过他的艰苦努力,《新青年》季刊于是日出版了。魏体刊头系秋白所写,封面图案亦系秋白亲自设计。

创刊号定名为“共产国际号”,共载15篇论文与译文。

创刊号中由秋白执笔的:《国际歌》译词,《赤潮曲》,署名秋白。《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以上署名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署名屈维它。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是继李大钊之后,对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主张复古倒退的东方文化派思想进行的又一次批判。

此外,秋白还写了“《新青年》之新宣言”,明确提出了《新青年》季刊的方针、任务,要使《新青年》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南针。

21日 致季诺维也夫信。

下旬 至杭州,住岳王村四伯父世琥家,与妹妹轶群、弟弟景白、坚白等团聚。秋白在给胡适信中写道:

自从回国之后,东奔西走,‘家里’捉不住我,直到最近回到‘故乡’,就不了了之。一“家”伯叔姑婶兄弟姊妹都引颈而望,好象巢中雏燕似的,殊不知衔泥结草来去飞翔的辛苦。“大家”看着这种‘外国回来的人’,不知道当做些什么一宗法社会的旧观念和大家

庭真叫我苦死。

瞿轶群《回忆哥哥瞿秋白》：秋白在杭时，“规矩周到，很讲礼节，不露革命者锋芒，他常用常州话和他们谈谈家常，描述在苏联的见闻如剧院里的演出和马戏团的滑稽表演之类，四伯父、四伯母听得兴致勃勃”。

七 月

1日 主编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创刊号出版。发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署名屈维它。发表《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署名瞿秋白。在“寸铁”栏以“鞘声”为题发表一组短文：《上海申报馆里的农业国》、《无用的人与东方文化》、《二十世纪的绝妙好辞》，署名巨缘。

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的政治特殊性：“宗主国不止一个，‘一国三公，无所适从’。因此，帝国主义所引起的政治上的纷乱，尤甚于完全的殖民地。”

《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写于6月2日，着重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根源：由于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侵略下产生的，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无独立的可能，更决无充分之可能”，故“中国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从而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得最宜于组织、最易团结的无产阶级之猛进，当能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而行向民族革命”，表达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9日 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委员的分工，秋白被指定为党的教育宣传员，并编入第一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央通知，召开上海党员全体大会，会上由上海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忘其名）报告第三

次全会通过的各项重要决议。其中有一条是成立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除负责上海市而外,兼管江苏、浙江两省的发展党员、成立党小组及工人运动等事务。会上选出执行委员五人,徐梅坤、沈雁冰、邓中夏、甄南山、王振一。候补委员三人,张特立(国焘)、顾作之、郭景仁。决定邓中夏为委员长,徐梅坤为秘书兼会计,王振一、甄南山为劳动运动委员,我为国民委员。全上海党员划分四个小组,第一小组为上海大学党员,共十一人,瞿秋白在其中。会议还指定教育宣传员若干人,轮流到各组或大会讲演,第一期讲演人及讲演题是理论与党纲,由瞿秋白、邓中夏二人负责。此外,还设立劳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除工人运动外,还办了劳动夜校,夜校课程有英文、共产主义常识、劳动运动常识,分别由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王振一担任。

10日左右 在杭州烟霞洞拜访于4月至杭疗养的胡适。在交谈中,胡适提出介绍秋白去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建议。

20日 结束在杭与家人团聚返回上海,在上海出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教授《社会学概论》、《社会哲学》。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一九二三年春,邓中夏到上海大学任总务长(总务长职权是管理全校行政事务),决定设立社会学系”。“随后瞿秋白也来了,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一次教务会议上,我遇见瞿秋白。这是我第一次会见瞿秋白。虽属初见,却对他早就有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读了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原名《饿乡纪程》)及《赤都心史》的原稿,感到他的文章极有风趣,善于描写”。这两部书的原稿,是瞿秋白尚未回国时由莫斯科寄来的。当时我觉得这两部书的书名是一副对联,可以想见作者的风流潇洒。

28日 寄《新青年》、《前锋》给胡适。

30日 给胡适信。对胡适介绍去商务印书馆工作事,以收入“远不济近”,“未必够‘家’里的用”等理由推辞了。

八 月

1日 在《向导》第34期上发表《摄政内阁卖国卖民之点将录》、《国会选举制宪统一的噩梦》，署名巨缘。

2日 在《向导》第35期上发表《大家都是良民那里来的匪》，署名巨缘。

2日、3日 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续发表《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署名瞿秋白。

秋白那时住在闸北。他的公开身份是记者。他除了担任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外，集注全力于整顿改革上海大学的学务。《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正是他对上海大学发展规划的蓝图。

“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系统——这两件事便是当有‘上海大学’之职任，亦就是‘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

上海大学设立“社会科学学院”和“文艺院”。社会科学学院设6个系：1、社会学系；2、经济学系；3、政治学系；4、法律学系；5、哲学系；6、史学系。文艺院设2大系：1、文学系（中国文学系、英文系、俄文系、法文系、德文系）；2、艺术系（绘画系、音乐系、雕刻系）。

对上海大学的教学规划，办学方针、学校体制，对各系的必修课程等都作了规定，还详尽说明课程设置的必要性。

秋白主讲《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他讲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把理论与当前的斗争实际相结合。学生都非常爱听他的课，其他系科的学生以及校外学生也常来旁听，把人教室挤得满满的。

为办好上海大学，秋白还四出奔走，聘请任课教师。

周建人《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同志》：那是一九二三年夏天，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同事沈雁冰（那时他还没有用“茅盾”这个笔

名),带了一个陌生人来看我。我一看那人,约摸二十四五岁年纪,穿着西装,衣履整洁。他长得神采奕奕,风度翩翩,英俊挺拔,举止潇洒。

我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他也在打量我。

沈雁冰给我介绍说:“这位是瞿秋白”。接着,又把我介绍给他。

秋白没有一句客套,象当时人们初次见面说些“久仰久仰”之类的话。不,他一点没有寒暄,还没有等我开口,他两手一摊说:“哎啊!你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呀!”说着,和我热烈的握手。

这样别开生面的初相识,倒是很少有的,现在回想起来,他的神态声音,好象还在目前。

他为什么要来找我呢?原来他从苏联回来,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在物色教师,要我去讲达尔文的进化论。

……

在平时的接触中,秋白谈笑风生,旁征博引,听了引人入胜。他古今中外,天上地下,无不涉猎,知识丰富,学问渊博。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得很多,有相当深的理解。这引起了学习马列的兴趣。他对我说,要写文章一定要看辩证法唯物论。我觉得秋白虽然比我年轻十岁,但在学习马列方面,他实在是我的老师。

杨之华:《忆秋白》秋白是社会学系主任,担任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第一次听他讲课的时候,使我惊奇的是学生突然加多了。别的同学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的课。除了社会学系本班的学生,还有中、英文系学生,其他大学中的党团员或先进的积极分子,甚至我们的好教师恽代英、肖楚女,上大附属中学部主任侯绍裘等同志都愿来听听。……

当课堂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看到秋白从人丛中走进课堂,走上了讲台。他穿着一件西装上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而平,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与他的脸庞相称。他

和藹亲切地微笑着,打开皮包,拿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态安逸而从容,声音虽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和空谈。同学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他为了使大家明白,引证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浅出的分析问题,把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斗争相结合。同学们都很郑重地记下笔记,万一有人因为参加社会活动而缺了课,非要借别人的笔记抄下来,才能安心睡觉。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可是,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讲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讲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科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中的形形色色。……

同日 为郑振铎译俄国作家路卜洵中篇小说《灰色马》一书作序。最初发表于11月《小说月报》第14卷第11号,题为《〈灰色马〉与俄国社会运动》。后载入1924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灰色马》翻译本卷首。

文章指出:“文学是民族精神及其社会生活之映影;而那所谓‘艺术的真实’正是俄国文学的特长,正足以尽此文学所当负的重任。文学家的心灵,若是真能融洽于社会生活或其所处环境,若是真能陶铸锻炼出此生活里的‘美’而真实的诚意的无所偏袒的尽量描画出来——他必能代表‘时代精神’,客观的就已经尽他警省促进社会的责任”。

3日 写《劳农俄国的新文学家》一文,发表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上。该文原题为《劳农俄国的新作家》,是为郑振铎著

的《俄国文学史略》而作。1924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俄国文学史略》一书时，将秋白文列入第14章，并注明：“本章为瞿秋白作”。1927年，秋白将此文收入《文艺杂著》，并将题改为《劳农俄国的新文学家》。

7日 写《国法学与劳农政府》一文，发表在9月25日《东方杂志》第20卷第18期，署名瞿秋白。

8日 上海大学成立评议会，被推选为评议员。

《民国日报》(8月9日)报道：

昨日上午，上海大学全体教职员假‘一江春’聚宴，由校长于右任先生主席。席间讨论各项改进方法，并照章推定评议员十人。评议会为该校最高会议，不设议长，开会时由校长主席，由评议员中互选书记一人，均以一年为期。除校长为主席评议员外，当即推定叶楚伦、陈德征、邓安石(中夏)、瞿秋白、洪野、陈望道、周颂西、冯子恭、邵力子九人为评议员，并决定陈德征担任评议员书记。

9日 写《滹漫的狱中日记》一文，发表在20日的《时事新报·文学》84期上，署名瞿秋白。

这是一篇以文艺笔法，隐晦曲折的形式，揭露北洋军阀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的罪行。

12日 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7次会议，通过党小组改组名单，将全体党员分成4个小组，秋白仍在第一小组，组长许德良。

同日 下午，上海大学评议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13日 写《新的宇宙》一文，发表在27日的《时事新报·文学》第85期上，署名瞿秋白。

文章介绍德国近代革命家罗若·卢森堡女士(即罗莎·卢森堡)。

15日 在《向导》36期上发表杂感三篇：《中国之所谓‘五族共和’》、《美国主张不干涉的好意!》、《世界革命中之德国》。署名巨

缘。

20日 出席在南京东南大学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着重讨论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会议于25日结束。

会议期间，经施存统等人的介绍，认识了丁玲与王剑虹，鼓励她俩去上海就读上海大学。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他们（指柯庆施、施存统）带了一个新朋友来，这个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的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的飘过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同志。

不久，他们又来过一次，瞿秋白讲苏联故事给我们听，这非常对我们的胃口。……他对我们这一年来的东流西荡的生活，对我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抱着极大的兴趣听着、赞赏着。他鼓励我们随他们去上海，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他保证我们到那里可以自由听课，自由选择。施存统也帮助劝说，最后我们决定了。他们走后不几天，我们就到上海去了。

九 月

2日 当选为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由于邓中夏等人调动工作，“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党员大会进行改选，王荷波、徐白民、沈雁冰、徐梅坤、顾作之为正式委员，瞿秋白、向警予、林蒸为候补委员”。

4日 新的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委员分工：王荷波任委员长，沈雁冰负责秘书兼会计，徐白民、顾作之负责国民运动，王荷波（兼）、徐梅坤负责劳工运动（徐梅坤病假期

间由瞿秋白代)。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这一届执委会还调整了各小组。执委会又指定了小组讲演员，有蔡和森、瞿秋白、施存统、恽代英、向警予、邓中夏等6人，每人每月讲一次。

12日 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12次会议。会议经过详细调查，将长期留沪的33名党员划分成4个小组。秋白仍留在第一组，组长施存统。

20日 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14次会议。决定“国民运动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由徐白民兼任“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改派瞿秋白、杨贤江、邓中夏、张秋人等8人为委员。

27日 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15次会议。根据中央关于国民运动应包括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商人及农民运动等一切运动的意见，改组“国民运动委员会”。改派王荷波、瞿秋白等18人为委员。

会议还将31名党员分成四个组，秋白仍在第一组，组长王一知。

月末 鲍罗廷到上海与陈独秀及其他中共党员会面，后即乘小船南下去广州。

同月 加入国民党。秋白在《记忆中的日期》中写道：9月加入国民党。

同月 在《东方杂志》第20卷第18期上发表《国法学与劳农政府》一文，署名瞿秋白。

十 月

月初 自上海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任孙中山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

4日 写《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一文，发表在1924年6

月《小说月报》第15卷第6号,署名瞿秋白。

文章认为俄罗斯革命不但开世界政治史的新时代,而且辟出人类文化的新道路。

9日 鲍罗廷于6日到达广州后,于是日与秋白、谭平山、阮啸仙等人谈话,研究改组国民党计划。

〔苏〕A·H·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10月9日,政治总顾问M·M·鲍罗廷会见了中共中央广州代表谭平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负责人阮啸仙及民权社社长、孙中山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瞿秋白。苏联顾问格尔曼和B·波里克也参加了会见。

同日 完成对高尔基《劳动的汗》的翻译及《欧文的新社会》的写作。

11日 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第17次会议,批准瞿秋白辞去“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15日 《时事新报·文学》第92期,刊《铁花》诗一首。

18日 孙中山签署任命鲍罗廷为改组国民党的顾问和指导的委任状,协助起草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纲、党章等。秋白具体帮助鲍罗廷开展工作。

25日 孙中山召集50多位著名国民党员举行会议,讨论国民党的改组;改组计划与纲要;国民党的纲领和章程及国民党的“一大”;选举改组委员会。会上,鲍罗廷就国民党的改组以及章程草案等作了报告。

同日 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第19次会议,批准顾作之辞去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委员的职务,提秋白为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正式委员。

28日 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成立,开始对国民党员进行登记,并在共产党帮助下着手建立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决定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里建立执行部。

同日 写《弟弟的信》，发表在11月19日《时事新报·文学》第97期。

同月 写《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一文，发表在12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2期，署名陶畏巨。

十一月

7日 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十月革命与经济改造》一文，署名瞿秋白。

8日 写《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一文，发表在1924年1月10日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期上，署名瞿秋白。

15日 节译高尔基《意大利故事》第5章。发表于11月24日《中国青年》第1集第6期。发表时题名《那个城》，并附“记者按”：这是象征性小说，那个城即是俄国大革命、大破坏后的光景，那个小孩即指中国。

同日 写《艺术与人生》一文，原题为《最近俄国的文学问题——艺术与人生》。最初编入1924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研究会会刊《星海》（上册）。

同日 写《猪八戒——东西文化与梁漱溟及吴稚晖》一文，发表在11月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集第5期。

16日 孙中山邀鲍罗廷去大本营。孙谈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中的右派要孙中山放弃法令，理由是法令将给侨居海外的国民党员的工作造成极困难的条件，会使国民党“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孙中山本人表示依然同意实行劳工法与关于改善小资产阶级状况的社会法令。至于土地法，孙建议与农民进行联系，弄清他们的需要。

同日 写《一封公开信》，致1922年夏曾一起在莫斯科郊外探讨唯物史观的秦涤青，揭露他的反苏言论。刊于11月20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署名瞿秋白。

18日 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广州的国民党改组工作，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加紧工作，坚决同右翼反对派斗争的决议。

19日 陈炯明叛军攻广州被击败，叛军开始败退。

晚，孙中山在大本营主持中央执委会。鲍罗廷按孙中山指示，建议在党纲草案中明确说明国民党新旧三民主义的继承性。会议还要求廖仲恺、鲍罗廷尽快实现去上海的决议，以筹备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与在上海出版国民党日报的工作。

24日 针对思想界在4月间掀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写《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的论文，发表在12月20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2期，署名瞿秋白。

这年2月，张君勱在清华学校作《人生观》讲演，说“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只能由直觉的、主观的、自由意志的“玄学”（即唯心主义）来解决。4月，丁文江发表《科学与玄学》的驳斥，但他的“科学”理论不承认科学法则的客观规律性，仍是主观唯心论。所以“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只是唯心论营垒里的分歧。

秋白认为：“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关键在于是否承认社会现象有否存在因果规律以及“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秋白正是抓住争论的核心展开正面的论述，故其题目亦为《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

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现象中的因果关系、自由与必然、个性与社会等问题。并对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思想”之间的关系，也作了科学论述。秋白后来在《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指出：

“有几篇文章关涉到较深的纯理论的问题，然而大致与中国现时社会思想的阶级斗争是有关系的，如东西文化、科学玄学的争辩等”。“思想的战线上，我们不能不对于当代‘伟人’梁启超、章行严、梁漱溟、张君勱、戴季陶、胡适之、《独立青年》派，以及帝国主义御

用的曾、左、李(并非满清贵族御用的曾、左、李,乃是《醒狮》的国家主义派)下无情的攻击。这不但是中国无产阶级之最高命令,不能不服从;而且是中国民族—国民革命之利益所要求。”^①

26日 鲍罗廷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次会议。

27日 在《向导》第47期上发表《好个江苏省民—驳〈时事新报〉张君勍之论新宪法》一文,署名巨缘。

十二月

1日 在《前锋》第2期上刊《太平洋问题与美国钱袋里的中国》一文,署名瞿秋白;在《寸铁》栏里,有《鞘声》第4—7节;《世界的结局》、《康有为与许斯、梁启超与芳泽》、《德漠克拉西的法兰西》、《好容易》。署名巨缘。

19日 在《向导》49期上发表《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署名巨缘。

20日 在《新青年》季刊第2期上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署名屈维它。同时刊出的有《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荒漠里—1923年之中国文学》及诗三首:《飞来峰与冷泉亭》,署名瞿秋白;《过去》,署名巨缘;《天语》,署名双莫。

《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第一次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德国之革命与反革命》和列宁的《两个策略》、《怎么办》等基本思想,并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并取得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亦作了有益的探索。在中国,“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方能胜利”,而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决不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建立“平民之革命独裁制”,

^① 《〈瞿秋白论文集〉自序》载《瞿秋白选集》第315至316页。

而这，又“是中国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诗言志，《飞来峰与冷泉亭》虽是在杭时所作，但“飞来峰下坐听瀑泉，一我恨不能再乘风飞去。且来此冷泉石上，做个中流的砥柱”。表达了秋白昂扬的革命斗志。

21日 《大公报》第二版：《快信摘要》报道了“廖仲恺为国民党改组来沪”的消息。

23日 参加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开的全体党员大会。

《大公报》(12.30)报道：“会议由汪精卫主持，胡汉民报告国民党改组之理由，廖仲恺作《关于广州改组国民党工作情况》的报告，然后选举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出席会议的国民党员约3千余人。”

秋白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谈了会后的观感：

大会之前，局势是非常复杂的，参加会议的人员是各式各样的。但会上依然感到热情洋溢。简直不能设想，在国民党20年的全部历史中竟从未开过一次全体大会。大家都情绪高昂地怀着过节的心情来开会。有很多海员、手工业者、工人、铁路员工，我们上海大学的学生尤其多。中学教师不多。商人更少。到处都是佩带着国民党徽章的管理员。……他们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学生运动的代表。

25日 上海大学改评议会为行政委员会，于右任、邓中夏、瞿秋白、邵力子、韩觉民、洪禹仇、曾伯兴、何世楨为委员，于右任为委员长。

29日 在《向导》第49期上发表《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署名巨缘。

文章认为：

“联合起来的第一步，应当赶紧组织国民党，集中我们的政治势力。……现在的国民党，便是我们集中势力，运用势力的中心。”

“现在这次的国民党改组，恰好有重要的三点：

一、从此平民的政治运动与军事的革命行动并进。

二、从此组织群众的民主式的真正政党，肃清腐败分子。

三、从此实行严格的纪律，作全国有组织有系统的运动，处处时时代表平民而反对军阀和列强。”

同月 从广州在写给王剑虹的信中附诗一首：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一九二四年 26岁

一月

1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会议。

会议讨论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对内与对外政策草案。参加讨论的有廖仲恺、瞿秋白、汪精卫、胡汉民等。草案修改后由瞿秋白译成俄文，交鲍罗廷。

同日 上海大学安剑平等发起成立《中国孤星社》，宗旨是“研究学术，讨论问题，彻底了解人生，根本改造社会”。聘校长于右成为名誉社长，邵力子、邓中夏、瞿秋白等人为顾问。

月初 出席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的联席会议。同时出席的还有鲍罗廷、陈独秀等人。会议的主题是关于改组国民党问题。会议听取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共产党中央和青年团中央联合委员会的报告。鲍罗廷向与会者发表了演说。详细叙述了自己作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工作情况。

同月 在沪工作期间，还挤出时间去上海大学讲课。

同月 与王剑虹结婚。迁至慕尔鸣路彬兴里306号。

自丁玲与王剑虹进入上海大学后，秋白几乎每天讲课后都要到她俩住所，有时还一同散步。此时，秋白与剑虹虽都默默地爱上对方，但谁都没有表白，是丁玲促成他俩的结合。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在王剑虹的塾

被底下,发现一张布纹信纸,纸上密密的写了一行行长短诗句。自然,从笔迹、从行文,我一下就可以认出来是剑虹写的诗。她平日写诗都给我看,都放在抽屉里的,为什么这首诗却藏在垫被底下呢?我急急的拿来看,一行行一节节啊!我懂了,我全懂了,她是变了,她对我有隐瞒,她在热烈地爱着秋白。她是个深刻的人,她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她可以把爱情关在心里,窒息她,她不会显露出来让人议论或讪笑的。我懂得她,我不生她的气了,我只为她难受。我把这诗揣在怀里……。

秋白的住地离学校不远,……我无声地、轻轻地把剑虹的诗慎重地交给了他。他退到一边去读诗,读了许久,才又走过来,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是剑虹写的?”我答道:“自然是剑虹。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她在那里。我将留在你这里,过两个钟头再回去。”……他握了一下我的手,说道:“我谢谢你”。

等我回到宿舍的时候,一切都如我想象的,气氛非常温柔和谐,满桌子散乱着他们写的字,看来他们是用笔谈话的。他要走了,我从桌子前的墙上取下剑虹的一张全身像,交给了秋白,他把像揣在怀里,望了我们俩人一眼,就迈出我们的小门,下楼走了。”

4日 廖仲恺坐船离沪。鲍罗廷亦于上旬返广州。

同日 给王剑虹信,信中写道:

我向来不信宗教,然而我知道有宗教的人的心境。我现在每每“祷告”——这是一种奇绝的境界,我有个高高在上的明镜是澈映我的心灵。我昨晚想了一夜:我看这就是所谓“幸福”罢?

5日 至广州。秋白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期间,时刻想念远在上海的王剑虹,几乎每天都要寄回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信中还常夹带有诗。

同日 李大钊离北京南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途经上海时,参加了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参加国民

党一大应持的态度。陈独秀提议：由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与瞿秋白等组成一个指导小组，指挥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

10日 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举行会议，讨论了瞿秋白因已赴广州，来信提出辞职的问题，同意瞿秋白辞职。

13日 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举行会议，改选了地方执行委员会，并重新划分小组，秋白仍划在第一小组。

中旬 参加国民党“四人委员会”，对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对外和对内政策的政纲草案的再一次讨论。

15日 在鲍罗廷的力争下，委员会在外交政策部分，采用了如下论述：“国民党将民族革命运动置于本国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基础之上，并同时认为，同其他被压迫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以及与我党有着共同目的——为争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而斗争的世界革命运动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势力的统一战线是必不可少的”。改变了原先含糊不清的“国家和民族”一类提法。

16日 应广东共产主义青年团之邀，作《中国革命史之新篇》的演讲。报告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特刊上，署名瞿秋白。

报告高度评价了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这是中国革命史之新篇，对三民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作了介绍，重点解释了大会宣言与新三民主义的要点。指出三民主义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只有完全实现三民主义，才能说革命成功，不然只有继续革命。

20日至30日 出席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形成。

大会选举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为候补执行委员。

31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会。并被推举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

全会通过执行委员会各部组织人选,并决定在广州、北京、上海、汉口、四川、哈尔滨等地设执行部。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统辖江、浙、皖、赣、沪四省一市的党务,由胡汉民、汪精卫、叶楚傖、于右成、张人杰、毛泽东、邵元冲、沈定一、茅祖权、瞿秋白等人组成。

同月 在《小说月报》第15卷第1期上发表契诃夫短篇小说《好人》的翻译稿。

二 月

1日 国民党中央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继续举行,会议通过了《对外问题决议案》。

同日 在《前锋》第三期上发表《现在的满洲经济》,署名屈维它;《俄国经济政策之剖析》,署名瞿秋白。在《寸铁》栏中,继续发表《鞘声》8至12节的杂文:《中国的花车和美国的公使》、《近东的土耳其就能如此,远东的中国呢?》、《这也是“国学”》、《社会主义行好事假客气》、《小小一个罪恶》。署名巨缘。

7日 由广州返回上海,会见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维尔德,并向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一大’的情况。

10日 上海大学召开行政委员会会议,教务长邓中夏报告上半年经济情况。会议决定组织上海大学丛书审查委员会,由邵力子、陈望道、瞿秋白、何世桢、邓中夏任委员。

12日 致信鲍罗廷。

20日 在《向导》第55期上发表《国民党与下等社会》一文,文章对国民党的组织成分及其性质作了分析。署名屈维它。

21日 在《向导》第56期上发表《中国承认苏俄与东交民巷》

一文,署名巨缘。

25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胡汉民、于右任、叶楚傖、瞿秋白、茅祖权、何世桢、邵力子、谢持、孙镜。胡汉民任会议主席。会议推选胡汉民、汪精卫、叶楚傖为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会议还选胡汉民任组织部长,毛泽东为秘书;汪精卫为宣传部长,恽代英为秘书;于右任为工人农民部长,邵力子为秘书;叶楚傖为青年妇女部长,何世桢为秘书;茅祖权为调查部长,孙镜为秘书。会议还推选胡汉民、吴稚晖、戴季陶、汪精卫、邵力子、瞿秋白等任上海《民国日报》编辑。

同日 上海大学第三次行政委员会会议上决定:下学期添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商业学系、教育学系等五个学系,推定瞿秋白为经济学系筹备员。

同月 秋白返沪后,在紧张工作的同时,与王剑虹过着美好的家庭生活。

同月 《社会哲学概论》与《现代社会学》由上海书店出版发行。这是以上海社会科学会名义编写的《社会科学讲义》中的两本书。

1923年,秋白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期间,曾主编《社会科学讲义》四集,包括《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经济学》、《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和《现代社会科学》六个部分。其中《社会哲学概论》与《现代社会学》由秋白撰写主讲。

《社会哲学概论》一书,概括地介绍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阐述了唯心、唯物及二元论或折衷派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对十七、十八世纪以来英、法和德国的哲学发展及唯心与唯物派的斗争作了重点的说明。更值得注意的是对辩证法的介绍。

《现代社会学》一书,是秋白将布哈林所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进行消化、吸收、批判、扬弃后,经过选择、鉴别写成的。故《现代社会学》是秋白的再创作,具有他自己的特色。

《社会哲学概论》与《现代社会学》的出版,表明瞿秋白是继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后,第一次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中国介绍的前驱者。

胡允恭《我所知道的上海大学》:秋白讲授社会哲学史时,他对欧洲各种哲学流派了如指掌,尤其对黑格尔的哲学,以及由黑格尔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都讲解得十分透彻。他讲课时经常了解同学的原有程度和接受能力,决不满堂灌。他常引用许多古今中外的故事,深入浅出地把一个个问题讲得极为通俗易懂。秋白十分注意结合当时革命斗争的实际,反复分析、解释,尽力讲清每一个概念。这样,既宣传了革命道理,又把现代政治讲活了,同学们很喜爱听他的课。所以每当秋白讲课时,再大的教室也总是挤得满满的。

三 月

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讨论通过委派上海《民国日报》编辑委员会委员与委员长人选:叶楚伦为委员长。胡汉民、汪兆铭、瞿秋白、邵力子为委员。

6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大力开展平民教育,会议还要求全体同志都参加此项工作。出席会议的还有毛泽东、于右任、胡汉民、叶楚伦等人。

9日 参加上海各界联合举行的追悼列宁大会,并在会上作列宁革命活动的报告。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及所属分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学生总会、上海印刷工会等30余团体300余人在小西门少年宣讲团内联合举行追悼列宁大会。会上,秋白报告列宁的革命活动,邵力子等发表演说。并印发《上海追悼列宁大会特刊》,发表秋白、恽代英等人文章。

同日 在《民国日报·追悼列宁特刊》上,发表《历史的工具——列宁》一文,署名瞿秋白。

文章阐述了革命领袖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列宁不是英雄,不是伟人,而只是二十世纪世界无产阶级的工具。

12日 出席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开第四次会议。决定添设俄文班一班;中国文学系、社会学系每周再添教授英文四小时及编辑《上海大学一览》与开办平民学校,审查本学期预算等。

13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三次执行委员会议。会上,汪精卫报告赴粤向国民党中央接洽事宜,决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沪负责招考黄埔军校学员,并由毛泽东负责招考学生在沪复试事宜。出席会议的还有毛泽东、汪精卫、叶楚傖、茅祖权、胡汉民等。

19日 在《向导》第57期上发表《〈时事新报〉之理藩政策》一文,署名巨缘。

20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四次执行委员会议。会上通过上海大学设立“现代政治班”案。

同日 写《苏联宪法与共产主义——驳心史之〈俄国宪法上共产主义之变化〉》一文,发表在3月26日出版的《向导》第59期上,署名秋白。

25日 写《列宁与社会主义》一文,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1卷第6期上,署名瞿秋白。

31日 出席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查《上海大学一览》;决定校刊宗旨,以学术研究为主,本校新闻为副,每星期三后出版。

四 月

1日 在上海《民国日报》为纪念国民党改组出版的特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的第二篇》一文。同时发表的还有陈独秀与汪精卫、

戴季陶、胡汉民等人的文章。

3日 写《太戈尔的国家观与东方》一文,发表在4月16日出版的《向导》61期,署名瞿秋白。

同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7次执行委员会会议。

5日 致信鲍罗廷,报告了上海执行部和《民国日报》的工作情况。

7日 写《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与外国人的上海政府》一文,发表在4月16日出版的《向导》第61期上,署名巨缘。

14日 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组织委员会编辑列宁全集,国民党中央准备采用秋白提议。但在广州的戴季陶却提出以先编辑苏俄法制全集,然后再编辑列宁全集,至于编辑全集的委员会及经费,应由上海执行部决定的修正案。最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戴的修正案,并将决议通知上海执行部。

17日 写《谁是帝国主义者?》一文,发表在4月23日出版的《向导》第62期上,署名巨缘。

18日 在《中国青年》第27期上发表《过去的人——泰戈尔》一文,署名瞿秋白。

春 上海大学成立共产党支部,秋白任支部书记,由中共上海地委直接领导。

五 月

1日 在《民国日报》“纪念五·一”特刊上发表《五一节之四十年》一文,介绍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和世界各国纪念五·一的历史发展概况。署名瞿秋白。

4日 在《上海大学周刊》第1期上,发表《自民族主义至国际主义——五七——五四——五一》一文,署名瞿秋白。

同日 参加在复旦中学部举行的“五四”纪念会,并在会上发

表演说,会上成立了上海学生联合会。有30多所学校团体到会,邵力子、胡汉民等也在会上讲了话,全国学联在会上散发了“五四”纪念宣言。

5日 在上海大学举行的马克思诞生106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并与任弼时在大会上高唱《国际歌》。汪精卫也在会上发表演说,声称国民党同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

6日 致信鲍罗廷。信中写道:“维经斯基同志来了,在他的参加下,我党中央不断地开会。不久要召开党中央全会,我们期待你的到来。全会上将讨论我党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信中还提到正在撰写的反帝国主义的文章。

9日 参加在天后宫举行的“五九”国耻纪念会,并发表演说。到会的有两千余人,沈玄庐、叶楚傖、邵力子等也出席了会议。

10日 胡汉民、汪精卫、叶楚傖等三人以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会名义,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置图书室及编辑丛书办法,以为党的理论及方略之研究宣传之所。

10日至15日 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等人,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根据国共合作5个多月来的实践,提出了党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方针:“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还认为应争取国民党内的批评自由,利用各种机会批评右派与帝国主义妥协的错误,削弱右派势力。同时,用种种办法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扩大左派。在工会运动问题上,强调工人组织的阶级性、独立性,不应与国民党的工作混合。

22日 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中国解放运动之公敌》一文,署名秋白。

六 月

中旬 陪同鲍罗廷了解上海的情况。鲍罗廷应加拉罕之约,于3月8日自广州启程去北京。6月15日又自上海乘船返回广州。在上海期间,鲍曾了解上海的情况,包括妇女运动的情况。

杨之华《回忆秋白》:

有一天,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大学支部转告我上级的通知,说孙中山先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他的夫人要了解一些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因为向警予同志有事离开了上海,就指定我去谈谈。

在鲍罗廷家中,出乎意外地,我看到了秋白,原来他是专为我们做翻译来的。一见到他,我觉得有了依靠,心情就平静下来了。秋白用俄语同鲍罗廷夫妇交谈着,把他们提出的问题翻译给我听,并且指点我说:你先把这些问题记下来,想一想再慢慢说。由于受秋白的鼓励,而且要我谈的情况我也比较熟悉,当时谈话的气氛又十分亲切友好,我的拘束就逐渐消失了,愈说愈起劲。秋白满意地微笑着,仔细听我说话,然后翻译给鲍罗廷夫妇听。最后,秋白又把鲍罗廷夫人介绍的苏联妇女的生活情况,翻译给我听,唯恐我理解不了,还给我详细的解释。

杨之华还从秋白热情认真做翻译的“小事”,提到秋白曾给上海大学一位学生的信:我现在时时觉着为自己做事总不如为大家做事好过。十九世纪的俄国青年往往说要‘为平民服务’,我现在觉得——真正的良心的觉得,不仅是理论上的推想,这是真正的‘生命’。

18日 完成计划在上海夏令营的讲课稿《社会科学概论》。该讲稿在同年10月由上海书店出版单行本。

《社会科学概论》是瞿秋白阐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重

要的理论著作。讲稿首次分析了上层建筑各因素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系统考察了上层建筑各因素的历史发展及其社会意义；对阶级社会中上层建筑各因素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亦作了科学的阐述。

18日 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发动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的弹劾案。在国民党内掀起了一股逆流。

20日 致信鲍罗廷：“您临行前同叶（楚沧 编者）谈过，他告诉您，在国民党员内部没有任何分歧。不过正如您所知道的，这纯属“中国式的客套”。事实上，右派早已开始准备公开反共反俄。”

26日 致鲍罗廷信。

29日 致鲍罗廷信。信中表示出对国民党内右派反共活动的关注：如国民党中央会议上张继和廖仲恺的争论；由国民党右派组成的“国家意识宣传组”的出现；戴季陶的突然返回上海等。信中还提出计划在国民党内形成左翼派别。^①

同月 完成计划在1924年上海夏令营讲课《新经济政策之意义》的讲稿撰写。该稿曾在7月14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原题为《新经济政策》，署名瞿秋白。在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改成现在的题目。

夏 介绍刚从苏俄回国的蒋光慈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教俄文。

上半年 与向警予一起介绍杨之华入党。

杨之华《回忆秋白》：

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向学校党支部和向警予同志提出了入党要求。不久，秋白对我说，你要求入党的申请书，支部和我都看过了。因为我最近很忙，组织上要向警予同志与你面谈，但我也想找

^① 原信未注明时间，从信中所述“罢工于昨天结束了”的语句，对照《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记载“28日，工人复工”。据此推断是29日。

时间同你谈谈。我说,我对马列主义的理论不大懂,你讲的课我有时候还听不懂,实际工作的经验也很少,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党员的条件。秋白诚恳地说:“你是 C. Y., 已经是靠近党的积极分子,只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把学习理论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更快地进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才能领会,你读书听课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问我和其他同志。向警予同志很关心你,她跟我谈过你的情况。”最后,秋白约我在一个星期日到向警予同志家里去,谈我的入党问题。……

我叙述了个人的经历和生活上的遭遇,谈到党和团对我的培养教育,以及我对党的认识和为党牺牲的决心。秋白听完我的叙述,严肃地说:“你从封建家庭里跑出来是有勇气的,但是革命是长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你一定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经得起种种考验。”接着,他分析了我的思想认识,阐明了党的性质和组织原则。最后,他满怀热情地说:“是的,你要求加入共产党是完全正确的,我愿意介绍你入党”。

几天以后,有秋白、警予、施存统等同志参加的上海大学党支部大会上,通过了接收我入党的决定。

25日 国民党监察委员谢持、张继等以所谓“共产党的非法活动”为由与鲍罗廷交谈,受到鲍的驳斥。

七 月

6日至8月31日 在上海夏令营讲学会上先后主讲《社会科学概论》、《新经济政策》。上海夏令营是上海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宗旨是利用暑期休假研究各种学术。讲学共分8周,由7月6日至8月31日。瞿秋白所讲之《社会科学概论》和《新经济政策》安排在第一周。

姚天羽《培养革命干部的洪炉——上海大学》:夏季,通过上

海学联,由上海发起,联合上海各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等开办了一个“暑期讲学会”。讲学项目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大部分。讲师都是请的各大学著名教授担任,上海大学教授担任讲师的较多。邓中夏、瞿秋白同志除给讲学会以全力支持外,秋白同志还担任了讲师,他担任的是《社会科学概论》的讲学,分章讲完。参加听讲的各校同学很多,盛况空前。“暑期讲学会”不单是各校利用暑期来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借此团结许多革命青年,为中国革命事业增加生力军。

14日 致信鲍罗廷。信中除提到去广州的时间外,谈了国民党内右派反共活动情况:右派在加强准备,蠢蠢欲动,以国民党党员个人名义或联名写信给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声明反对共产党的信件颇为不少,我们不得不在各个方面予以反击。

1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孙中山、汪兆铭、邵元冲、胡汉民、伍朝枢、鲍罗廷,批准谭平山辞去政治委员会委员,决议由瞿秋白递补。

同月 妻王剑虹因肺病医治无效,去世。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是年暑假,丁玲返回湖南家乡探母)一天,我收剑虹的来信,说她病了。……秋白却在她的信后附写了如下的话,大意是这样:“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我好象预感到什么不幸。我们祝愿你一切成功,一切幸福。”

……

又过了半个月的样子,忽然收到剑虹堂妹从上海来电:“虹姊病危,盼速来沪!”……

我到上海以后,时间虽只相隔一月多,慕尔鸣路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人去楼空。我既看不到剑虹——她的棺木已经停放在四川会馆,也见不到秋白,他去广州参加什么会去了。……

秋白用了一块白绸布包着剑虹的一张照片,就是他们定情之

后,我从墙上取下来送给秋白的那张。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这是因为我平常叫剑虹常常只叫“虹”,秋白曾笑说应该是“魂”,而秋白叫剑虹总是叫“梦可”。“梦可”是法文“我的心”的译音。诗的意思是说我送给了他我的“魂儿”,而他的心现在却死去了,他难过,他对不起剑虹,对不起他的心,也对不起我。……

我看了这张照片和这首诗,心情复杂极了,我有一种近乎小孩的简单感情。……我象一个受了伤的人,同剑虹的堂妹们一同坐海船到北京去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给秋白,尽管他留了一个通信地址,还说希望我写信给他。

杨之华《忆秋白》:

那时,秋白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这项工作已经够他忙了,又加上上海大学这一副不轻的担子。在生活上,他偏又碰到了不幸,他的妻子王剑虹病重了。他们夫妇俩感情是很好的,王剑虹在病重的时候,希望秋白在她的身边,陪伴着她,……从王剑虹病重到去世,我们只看出他似乎有些心事重重与平时不同,但他从没有漏过会或者缺过课,并且仍然讲得那么丰富、生动。这时,我们对秋白也更加了解了。

月末 办完王剑虹的丧事后,匆匆去广州。

八 月

1日 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署名瞿秋白。这是秋白在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后,又一篇重要的论文。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系统而全面地分析批判了胡适鼓吹的实验主义。秋白认为实验主义在政治上是改良派:“现状是可以改造的,却不必根本更动现存的制度,只要琐琐屑屑,逐段应付好了。所以实验主义

是多元论，是改良派”；在哲学上，实验主义是唯心派。“人的知识，究竟符合于客观世界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却在于这种知识能否促进我们的某种行动。因此，一切学说的价值，‘只要看他对于我们是否有益’”。在真理观上，实验主义是主观的。由于实验主义的根本观念在于利益，而各人的利益又不尽相同，真理的标准就只能依不同人的主观利益为转移，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无客观标准可依。最后，秋白一针见血指出：实验主义是一种“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他决不是革命的哲学”。

同日 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辩证法与逻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几个规律》两篇哲学论文。

6日 第一次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广州举行的第四次会议。出席者为孙中山及胡汉民、邵元冲、瞿秋白、伍朝枢、鲍罗廷等6人。决议设立统一训练处。将陆军军官学校、滇军干部学校、陆军部讲武堂、西江陆海军讲武堂、警卫军讲武堂、警卫军学兵营及航空局，归其训练管理。

13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决设立联络部，以解决国共合作纠纷问题。

15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开幕。

19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始讨论“国民党内共产派问题”。出席会议的中央执行委员有邹鲁、覃振、李烈钧、廖仲恺、王法勤、胡汉民、柏文蔚、谭延闿、于树德、谭平山、丁惟汾、恩克巴图等十二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韩麟符、于方舟、张莘村、沈定一、瞿秋白、白云梯、傅汝霖等七人。廖仲恺任大会主席。

首先发言的是国民党监察委员张继，接着发言的有王法勤、恩克巴图、覃振，其中以张继发言为关键，公然主张“分立”。

针对张继等反对国共合作的言论，瞿秋白作长篇发言予以驳斥。秋白先从主义性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否有合作之可能，国民党在组织上是否有容纳共产派合作之必要，继对监察

委员会弹劾案作如下有力答辩：

实际问题上则所谓党团作用(一致行动)之嫌疑,实在惹起此次纠纷之端。实则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否则只有取决跨党之决议。若此次会议议决分立,大可谓之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

20日 继续开会讨论,会议由胡汉民主席。发言者有张继、谢持、瞿秋白、沈定一、傅汝霖、丁惟汾、覃振等7人,未获结果。

同日 出席政治委员会第6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鲍罗廷等6人。会议讨论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草案,并以政治委员会意见,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提出。

21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继续开会讨论,由胡汉民任主席。

会上,汪精卫除了对政治委员会所拟草案进行说明外,又介绍了李石曾委员来函要点:“弟非国际共产党,亦非参与两党合作之人,但两党既已合作如前,万不宜分裂于后。”胡汉民发言认为,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法,比较的照政治委员会草案甚为适当。瞿秋白在发言中又指出:监察委员职权只问案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

在多数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支持下,会议通过了政治委员会提出的两个草案,国共两党的合作得以继续,轰动一时的国民党右派所兴起的监察委员弹劾案得以克服。秋白在这次斗争中的作用不可没。

23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闭幕。会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重申国民党“一大”之精神，论述国共合作之必要。

九 月

2日 夏令讲学会结束。“听讲员二百余人均陆续返里”。

3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7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孙中山及瞿秋白、伍朝枢、鲍罗廷四人，会议决定：（一）发表北伐宣言及大本营移驻韶关宣言。（二）韶关大本营特设政治训练团。（三）本月七日国民运动大会应宣传之宗旨，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反对北方军阀”，军官学校均加入运动。

同日 广州开始反帝国主义运动周。

10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8次会议，讨论北伐问题。

20日 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国民党》一文，署名瞿秋白。

23日 在广州为《向导》写了《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的通讯。署名巨缘。文章指出广州商团在扣械问题上制造纠纷的幕后是英国帝国主义。并着重分析了国民党左中右三派在这一事件中的政治态度及其本质。主张对商团严加镇压：“武装平民，以卫广州，预备作战，实行减捐民选”。

下旬 返沪后作形势报告。

杨之华《忆秋白》：

一九二四年九月间，秋白从广州回到上海后，给我们做了几次报告，详细分析了革命斗争的形势，指出革命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揭露国民党右派加紧进行着反对共产党，反对孙

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等等反革命活动,并阐明了当前党的方针和政策。

十 月

2日 写通讯《广州印刷工人罢工之经过》一文,发表在10月15日出版的《向导》第87期上,署名巨缘。

8日 致鲍罗廷信。信中提及在对待国民党问题上中共领导人与鲍罗廷之间的分歧。信中写道:“寄上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革命策略的决议及关于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从中可以看出,在这些问题上您同中共中央之间有某种程度上的原则分歧。因此中央决定:‘召请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如果鲍罗廷同志认为这是必需的而且他做得到的话。’中央嘱我将上述决定通知您,请您尽快答复。”

10日 上海30余团体发起庆祝辛亥革命十三周年的国民大会上,由于租界当局勾结国民党右派,收买地痞流氓,殴打高呼与拥护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一切军阀的上大学生,其中郭寿华与黄仁两人竟被打手从七尺高的主席台上推至台下,又继续殴打。在同学抢拥下,被送宝隆医院。秋白亲去探视,并研究对策。

杨之华《回忆秋白》:

入夜,我执行党支部的指示,到宝隆医院去看望黄仁同志。医生告诉我他的生命已无法挽救了。我怀着满腔悲愤,默默地坐在他床边,决定留下来看护他。午夜,秋白突然来到了。他急切地轻声问我黄仁同志的情况,我把医生的话告诉了他。他俯下身去,摸摸黄仁同志的额角,小心地揭开被子,察看受伤的身体,轻轻地呼唤着黄仁同志的名字。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对我沉重地说:“不要气,只要记!”随后,他告诉我,他还要去开会研究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对策,安排黄仁同志的后事,就离开了病房。

同日 写《国民革命之土耳其》，署名瞿秋白。刊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四期。

11日 上海大学学生会发表《上海大学学生横被帝国主义与军阀走狗摧残的通电》，揭露事情的真相。

12日 黄仁因伤势过重去世。

杨之华《回忆秋白》：党决定由秋白组织行动委员会，领导群众展开斗争，声讨和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反动罪行。

21日 致鲍罗廷信。信中汇报了黄仁事件的经过，及在上海大学内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上海大学国民党区分部召开会议，作出决议：一、请上海执行部将童理璋和喻育之开除出党；二、责令上海大学讲师何世桢——上海右派首领之一，在打手打人时他未采取任何行动帮助左派作出书面说明，解释他为什么不援救被打人；三、抚恤死者家属。叶（指叶楚伦——编者）只接受第三点要求，前两项要求是上海执行部开会时接受的。但通过决定后，叶突然声明，他认为有必要把开除童和喻的决定的公布时间推迟一天。但是与会者一致反对，认为他们的叛卖行径证据充分，应该开除出党。于是叶便回家‘睡觉’去了，同时却给《民国日报》编辑部送去一个纸条，说他已向广州国民党中央打电报要求辞职。这样我们便掌握了《民国日报》，让邵（即邵力子——编者）工作到现在。上海大学那个姓何的讲师纠集了他的几个学生反对我，反对一切左派，在我的名字上冠以“上海共产党首领”的称号。校长于右任这次很同情我们，在执行部他坚决主张开除童、喻二人。所以，在大学里，尽管何世桢及其同伙几个英文教员罢教，于右任宣布：如果何和那几个教员（教英语的）继续罢教，他就另请别人来教。

27日 出席上海大学举行的黄仁烈士追悼大会。据《民国日报》翌日报道，追悼会秩序井然，挽联悼词不下三四百幅。陈望道主席，沈玄庐、刘舍初、瞿秋白、恽代英诸君及烈士同乡同学暨各公团代表演说，演说极悲壮激昂之至，闻者色动焉。

十一月

1日 写《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一文，发表在11月7日出版的《向导》第90期上，署名瞿秋白。

月初 陪杨之华到肖山衙前与沈剑龙谈判杨沈离婚事。

杨之英《纪念我的姐姐杨之华》：我第一次见到秋白是1924年11月，姐姐同他一起到肖山家中来的时候。当时姐姐已决定与沈剑龙离婚，她和秋白来家就是为商议这件事的。秋白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十分有礼貌。他们到家后，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临别时，我看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猜想姐姐与沈剑龙离婚和秋白结婚的事已经达成协议。

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在浙江肖山三人谈判后，“瞿秋白又请沈剑龙和杨之华共去他常州老家。”

18日 与杨之华在上海结婚。^①婚后，经组织安排，秋白迁居到闸北区宝通路顺泰里12号，隔壁11号为沈雁冰的家。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定的喜日是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参加仪式的人有沈剑龙、杨之华的父母，及其他亲朋好友，我与德沚也去了，大家吃了一顿饭。这件事在当时新派人中间和共产党人中间也是很新奇的，传为美谈。

27日 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三则启事。

启事一：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启事二：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

^① 茅盾回忆日期与秋白《记忆中日期》一致，都采用11月7日。但在11月27日《民国日报》启事上说是11月18日起。这里用报刊启事日期。

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启事三：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上述启事于 28、29 日《民国日报》上继续刊登。

17 日 孙中山北上时，乘轮船抵上海。上海大学师生前往欢迎，上大师生在邵力子带领下列队到江边欢迎，并暗中加以警卫。上大迎接队伍归来经过法租界嵩山路时，巡捕就将上大校旗夺走，后经交涉，才由法巡捕房送回。

30 在《评论之评论》第 37 期上发表《国民会议与商人》一文，署名瞿秋白。

同月 上书孙中山，以上海《民国日报》的“言论诧异”，要求改组《民国日报》。

在同年 9 月 8 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于树德对国民党报刊杂志中拒绝反帝宣传的行为提出《重申本党纪律案》，着重对上海《民国日报》进行了批评。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树德提案决议由宣传部训令各关系人了事。由于未能认真严肃处理，故秋白直接上书孙中山。孙中山将瞿上书批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是“暂搁”。

十二月

3 日 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上海大学主张国民会议宣言》。

该宣言是 11 月 28 日由代理校长邵力子召开教职员及学生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主要响应孙中山提出召集九团体之预备会议产生国民会议之建议。宣言表示：“一致赞成中山先生之意见，并发表宣言号召国人一致拥护，以促成国民会议并解决中国问题。”

月初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记载：“最近几个月

来,中国布尔什维克之活动有显著之复活,颇堪注意。这些过激分子的总机关设在西摩路 132 号上海大学内,彼等在该处出版排外之报纸——《向导》,贮藏社会主义之书籍以供出售,如《中国青年》、《前锋》。该大学之大部分教授均系公开的共产党人,彼等正逐渐引导学生走向该政治信仰。教授中计有:邵仲辉,又名邵力子,《民国日报》编辑,彼系共产党人已几年了;社会学系教授瞿秋白,瞿系中国布尔什维克领袖之密切友人;施存统,于 1921 年因共产党活动在日本被驱逐出境。其地位较低之教授而为《向导》写稿的则有:蒋光赤、张太雷、刘含初”。

9 日 帝国主义首次搜查上海大学和秋白住所。

19 日 遭租界当局通缉,从此,转入地下活动。

杨之华《回忆秋白》:

秋白从此转入地下活动。他秘密居住在先施公司职员孙瑞贤同志的家里,地点在北四川路底兴业里一号。秋白住在三层楼的阁楼上,继续领导行动委员会及其他工作。……那天,我走进阁楼时,他正伏在桌上起草文件。我把他的住所和上海大学被搜查,他的书籍被焚的事告诉了他。他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在窄小的阁楼里踱了一会儿,然后停下来,象是对我,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书可以被烧掉,但是,革命的理想是烧不掉的!”

20 日 在《新青年》季刊第 4 期上发表《黎明期的台湾》的“记者附注”,署名记者。

一九二五年 27岁

一月

11日至22日 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大会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对代表们提出的政治决议案中若干问题，在会上作了理论性的阐述，得到代表们的拥护。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四大”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党的四大虽然提出了以前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没有正式提出过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指明方向。但秋白在后来发表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中认为：由于受到彭述之的影响，在论述无产阶级领导权时，有“天然领导权”思想。

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道：

“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于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所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一九二五年一月,我在上海参加党的‘四大’。记得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王荷波、邓中夏、彭述之、朱锦堂、~~翰~~殷、尹宽、陈潭秋、张太雷、李启汉、何今亮(汪寿华)、李立三等以及国际代表吴廷康(魏金斯基)。吴廷康和党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分别向大会作了报告。‘四大’通过的《民族革命运动议决案》是由吴廷康起草,瞿秋白译成中文的。它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我参加了《民族革命运动议决案》草案的审查小组,组长是瞿秋白。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原稿上提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由于考虑到国共合作的关系,议决案上没有明确写上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字句,但以肯定的语句指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在政治上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而‘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四大’对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这个分析是很可贵的。”

李维汉《怀念秋白》:

我同秋白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党的四大期间。这次大会,是在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大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前夜召开的。秋白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的领导,并担任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我在这个小组同他一道工作。这次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释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命题,最初就是在这个决议案中提出来的。决议还

批评了党内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右的和‘左’的倾向。决议案中的这些观点和命题,对于党如何领导正在开展的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指针。在审议过程中,秋白对这些要点都作了理论性的阐释。在他以后的著作中,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郑超麟《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一九二五年一月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我是大会记录),秋白在大会上很有地位,作了长篇发言,回答代表们对于大会路线的异议。记得,一次张崧年夫妇列席会议,张崧年发言反对国共合作。瞿秋白回答他说:在上海要刻一个“共产党”的图章,没有人敢刻,在广州就可以刻了。……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是主席团的一个成员。(当时以常住上海的五个中央委员为“主席团”,其实是“常务委员会”,不过不用“常委会”名称。五人是: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

21日 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驻中央局5人成员、兼中央宣传委员。

《中共中央通告第一号——四次大会选出的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及分工》: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照章选举同志仲甫(陈独秀)、守常、和森、特立(张国焘)、德隆(项英)、秋白、述之、平山(谭平山)、罗迈(李维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志邓培、荷波、章龙、太雷、锦堂5人为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月21日)决定分配工作如下:仲甫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特立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和森、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驻中央局;守常驻北京,平山驻广东,德隆驻汉口,罗迈驻长沙,邓培驻唐山,锦堂驻安源,章龙、荷波任铁路总工会工作,太雷任S·Y中央工作。

二 月

2日 写《1923年之“二七”与1925年之“二七”》一文，发表于2月7日《向导》第101期上。署名秋白。

文章总结了“二七”以来的工人运动，认为“二七”不但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一个关键，而且是民族革命运动史上的关键。并认为：“一九二五年的二七，应当是全国职工运动复兴的关键，亦便是民族革命运动取得巩固的基础的一关键！”

8日 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国际主义者列宁之民族主义》一文。

11日 写《上海小沙渡日本纱厂之大罢工》一文，刊2月14日《向导》第102期上。署名双林。

由于日商内外棉八厂的日本领班毒打女童工，开除男工，工人发动罢工。9日，沪西工友俱乐部在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派出之李立三、邓中夏等人的领导下，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动员所有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即日，内外棉五厂、七厂、八厂、十二厂的工人约一万人罢工，并成立内外棉纱厂工会和工厂纠察队。12日，内外棉所属11家纱厂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四万之多。这次罢工是“五卅”运动的前奏。

罢工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曾派出李立三、邓中夏等领导这次罢工。秋白也重视这次工人斗争，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评述。在《上海小沙渡日本纱厂之大罢工》一文中指出：工人们“应该一致起来力争：一、严定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工厂的限制；二、严定最少工资及最多工作时间的限度；三、特别规定使用女工童工的法律；四、改良工人待遇，供给工人住宅医药等；五、工人伤疾病等，由工厂负担保险费等；六、废除租界，取消工部局等类的外国政府，一切工人都应有选举权，参政权。只有这样，中

国才能逐步消灭外国人剥削中国劳动、占领中国市场的现象，中国人才能跳出牛马奴隶的地位。

18日 写《民族的劳资斗争》一文，发表在2月21日《向导》103期上。署名双林。

文章指出：为中国争独立，为中国民族争解放，便是现在上海日本纱厂里中国工人罢工的意义。文章还认为：“中国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这是很明显的劳资斗争，然而也是很明显的民族斗争；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民权主义者，若不赞助工人阶级这种阶级斗争，永世也不能得到民族的解放和中国的独立。”

25日 上海总商会为日商纱厂大罢工出面调停劳资谈判，迫使日本资本家接受工人提出的“不准东洋人打人”等部分条件。26日达成协议，罢工于3月1日结束。

28日 在《向导》104期上发表《帝国主义的佣仆与中国平民》一文。署名双林。

文章指出：“中国平民不但当认清自己最大的仇敌是帝国主义，并且要知道，这些反对赤化，造谣生事，蒙蔽社会，使不敢奋起帮助纱厂罢工工人，不敢明显地要求取消帝国主义者在华之一切特权的‘中国人’，都是我们平民的仇敌，都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

同月 闻悉邓中夏与工人代表去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工人，被警察局逮捕的消息后，焦急不安，叫杨之华化装成家庭妇女，到外面探听消息。直到邓中夏获释，“才放下了心”。

同月 翻译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的一部分。发表在4月22日出版的《新青年》月刊第一号“列宁号”上。署名瞿秋白。

同月 写《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一号上，署名瞿秋白。文章着重指出了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区别。

同月 写《道威斯计划的世界帝国主义》一文，发表在6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月刊第二号上。署名瞿秋白。

同月 写《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号上。署名瞿秋白。文章论述了孙中山在政治上的成长过程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半个世纪以来，从模糊的富国强兵的口号，进化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从会党式的军事暴动，进化到劳工农民之联盟；从联日政策，进化到与世界无产阶级携手——这一条困苦的道路，正反映孙中山生平和事业里啊！

同月 为工人读者写通俗宣传小册子《世界职工运动状况》。

三 月

1日 写《日本对华贸易之经济侵略》一文，发表在3月7日出版的《向导》第105期上。署名双林。

12日 写《胡适之与善后会议》一文，发表在3月14日出版的《向导》第106期上。署名双林。

21日 由于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向导》107期上辟“孙中山特刊”以示悼念。秋白在该刊上发表《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之第二功绩——镇压买办阶级商团之反革命》与《孙中山之死与孙中山之敌》。署名双林。

《孙中山之死与孙中山之敌》一文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孙中山虽死，中国平民这种革命的意志是不会死的。中国平民中觉悟的分子，在孙中山死后，必定格外团结，集中到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努力奋斗，以推翻国外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政策，消灭国内的军阀以及一切卖国卖民的民贼。”

25日 写《淞沪特别市和淞沪的民权》一文，发表在3月28日出版的《向导》108期上。署名双林。

春 △ 再次到杭州探望弟妹，并携景白弟至上海就读于上海大学。

瞿轶群《怀念哥哥秋白》：

“一九二五年春天，哥哥曾来杭州一次。……景白则尚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还未毕业。他早在哥哥的影响下产生了革命思想，哥哥这一次返沪时，就把他带往上海大学学习。景白到上大以后，很快成为坚强、勇敢的革命者。‘五卅’惨案时，他被英国巡捕房拘留很久，但他毫不畏惧，在监禁时面斥敌人。景白后来在一九二八年随哥哥去莫斯科，不几年在那里去世。那一次，哥哥也打算将我带往上海，并说我文化程度不高，可做相当的具体事情，如送信联系之类。但是四伯母不同意，于是就作罢。”

春 陪同杨之华去萧山衙前沈家，计划将女儿独伊抱回上海，但未成。

杨之华《忆秋白》：

“我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我与以前的丈夫有一个女儿，那便是独伊。我的离婚，受到当时人们封建思想的反对，他们把我的孩子当作私有物，不允许我看见我的女儿。我在上海时常想到女儿，……秋白很能理解这种母亲的心情，他同情我，安慰我，并且在一九二五年的春天，帮助我抽出一个空子，回乡下去看孩子”，“在我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夜里，秋白曾经不安地到火车站来接我，但是没有接到。又过了一天，我才回到了上海，他从我的神色中，已经知道这一次去，并不是很顺利的。秋白懂得母亲心灵上所感到的一切，他比谁都了解我，他想尽一切来安慰我”，“不久，又写了一首长诗给我，痛斥了黑暗的旧社会，并且表示：孩子有着光明的前途，我一定爱护她，一定会比她自己的生父更负责任的培养她，教育她，使她将来在社会上发挥她的力量”，“我们又抽了一个时间，两个人一起回到我的家乡。在我母亲家里，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派人把孩子偷出来，然后抱回上海，那天，秋白和我站在一座山上等着。等了好长时间，才看到孩子出来了，大姨太和照护孩子的人跟随在后边。我高兴地把孩子抱在怀里，孩子的两条小胳膊也紧紧地搂住我的

脖子,正在这时,突然来了两个大汉,一阵风似的把孩子抢走了”,“我和秋白冷冷清清地从河边走着,一路上默默无语,我第一次也只有这一次看到秋白流下了眼泪。”

四 月

1日 写《上海之外国政府与中国臣民——上海纳税外人会议及中国人民之自由权》一文,发表在4月5日出版的《向导》109期上。署名双林。

26日 在《向导》第112期上发表《五一纪念与国际劳动运动》一文。署名双林。

同月 写《北京政变后的政局与工人阶级》、《评职工运动中的反动派》二文,发表在4月出版的《中国工人》第4期上。分别署名瞿秋白与巨缘。

同月 写《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一文,发表在5月3日出版的《向导》第113期上。署名双林。

文章对“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五四运动实在是划分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当时的运动,第一,是积极的群众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在这运动里,我们切不可只看见学生,学生不过是运动的先锋;当时上海、天津等处的商人都以实力参加;这的确是辛亥之后,中国社会里各阶级努力以运动干预政治,而且带着群众性质的第一次。第二,五四运动时所发生的种种群众的组织,如检查日货,抵制日货等行动机关,往往真能直接以革命手段行使平民的政权,上海罢市的几天内,革命的学生商人竟自行行使警权;尤其是工人的罢工,也居然能以旧有的会党式的工人组织自行指挥。第三,这种巨大的民族革命的潮流,居然开始冲动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从此发现真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工会的组织。这种巨大的

运动,显而易见是辛亥革命以后第二次的民族革命。”

同月 写《五七国耻与日本帝国主义》一文,发表在5月10日出版的《向导》第114期上。署名双林。

同月 写《五一纪念与共产国际》一文,发表于5月出版的《中国工人》第5期上。署名秋白。

五 月

18日 写《日本对华之屠杀政策》一文,发表在5月24日出版的《向导》第116期上。署名双林。

30日 上海发生“五卅”惨案。

15日,上海的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数十人。16日,上海内外棉五、七、八、十二厂8000多工人愤起罢工。28日,青岛日本纱厂资本家勾结奉系军阀枪杀罢工工人,重伤十余人,逮捕七十余人。日本资本家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怒。中共中央与上海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发展为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

30日,上海三千多学生和部分工人组成的演讲队分头到租界各闹市区演讲与散发传单。租界巡捕在浙江路一带逮捕和殴打演讲学生。当愤怒的群众在南京路老闸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时,英国巡捕头目竟下令开枪射击,打死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等十三人,打伤几十人,逮捕瞿景白等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到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亦农、张国焘等。会议决定组成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并立即成立上海市总工会,发动全市实行罢市、罢工、罢课。行动委员会的人员,有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刘华和瞿秋白等。

此时,维经斯基也参与了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经常在维经斯基住所召开会议,讨论形势,确定政策。经常参加者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有时则召开中央委员会,除上述四人外,还有彭述之、青年团书记任弼时、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职工运动委员会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向警予等。

杨之华《我的回忆》:

我亲眼看到了这场屠杀,怀着满腔悲愤,马上回到宝山路顺泰里12号家里。李立三同志也来了,我和他激动地向秋白报告这场惨景。秋白抑制着愤怒说:“这是帝国主义直接进攻中国革命的罪恶挑衅,他们想用屠杀革命群众的手段来扑灭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必须扩大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帝国主义的进攻”。

茅盾《五卅运动与商务印书馆罢工》:

德沚是一个人回来的,之华被冲散以后,就不曾再见到,我们不放心的,就到隔壁秋白家里去探望,原来之华早回来了,而且秋白也在家里。瞿秋白这两天忙得很,是不容易见到他的面的。他见了我们很高兴,兴致勃勃地讲了这两天斗争的情形,他说中央讨论的决策是发动全上海的罢市、罢工、罢课运动,推动全国的反帝爱国斗争,……我主张动员大批工人和学生继续到南京路上去示威,看英国巡捕还敢不敢开枪,假如他们竟敢再开枪,把事态扩大,就会激起全国人民的爱国怒潮,全世界人民也将同情支援我们,那时形势将更有利于我们。停了一下他又说,我的意见没有通过,因为陈独秀不同意。

胡允恭《我所知道的上海大学》:1925年5月15日,顾正红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激怒了全上海人民,由此而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斗争。在这一斗争中,首先为国捐躯死于南京路的何秉彝,就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刘华,也是上大的学生。秋白同志的弟弟瞿景白,是上大的学生,时年仅20岁,

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得非常英勇,带头高呼口号,鼓励大家前进,后被英帝巡捕房逮捕。在法庭上,景白毫无惧色,作了义正辞严的答辩,使法庭审判官感到惊惧不已……据《上大五卅特刊》记载,仅在五卅惨案的当天,上大学生受伤的就有13人,被逮捕关押的达131人。

六 月

1日 上海总工会公开办公,发布总同盟罢工令,二十多万工人先后罢工;五十万学生举行罢课;大部分商人参加罢市;租界巡捕房华捕也有半数以上罢岗。

党中央召开会议,决定由上海总工会联合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共商筹备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以统一领导全市反帝运动。

4日 根据党中央决定,主编《热血日报》并于是日创刊。

“五卅”事件发生后,上海各报社迫于租界工部局的压力,不能据实报道事件的真相。而受帝国主义指使的报刊则制造谣言,歪曲事实,挑拨工商团结。鉴于这种情况,为正确反映上海及全国反帝斗争的情况,及时指导群众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创办《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主编,并抽调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人组成编委会。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热血日报》于6月4日正式出版。秋白亲自为前几期的报头题了字。《热血日报》是我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它从创刊到6月27日被查封,虽不到一个月,但以鲜明的阶级性、战斗性出现在人民面前,成为五卅运动的喉舌和党指导运动的重要阵地。《热血日报》的社论、短评、报道等大多出自瞿秋白的手笔。在现存的24期报纸中,由他写的就有25篇之多。他还用“热”、“血”、“沸”、“腾”、“了”的笔名写了许多“杂感”和“小言”。

创刊号发表了秋白撰写的《发刊词》:“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與

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可是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了顶点了！尤其是大马路上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已经把洋奴、冷血之耻辱洗涤得干干净净……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在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秋白还以维摩的署名，发表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高潮》一文。

杨之华《回忆秋白》：《热血日报》是党指导五卅运动的舆论工具，秋白用了很大的精力努力办好这份报纸。……报纸设在上海闸北华兴路56号一间客堂里，陈设很简单，中间放着一张白木长桌，四周摆着几条长凳。当时天气很热，他忙着写社论，审改文稿，还和同志们一起做编辑、校对等各项具体工作，忙得满头大汗，显得非常高兴。他极其重视和热爱这项工作，他对我说，这项工作比在大学讲台上讲课要有效得多。

郑超麟《我所知道的瞿秋白》：《热血日报》还是由梅伯格路（今名新昌路）明星印刷厂承印的。筹备的事是张伯简通过徐梅坤去办的。编辑部设在闸北香山路东端一条与之垂直的路（似是宝通路，总之在东方图书馆西边）的一条弄堂内的最后一幢房子，编辑室设在楼上。发行所在另一个地方，我未去过，也忘记了谁负责。秋白做总编辑，从中央宣传部抽出我，从《民国日报》编辑部抽出沈泽民和何味辛（后名何公超），一般分工是：秋白写社论，我写文章，沈何二人编新闻，二人有时也写文章。有些文章是外面投稿的。

许焕隆《瞿秋白》：

《热血日报》很快就取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出版十期，销数即达三万，投稿来信与亲来接洽者，日以百计。它使敌人害怕，汉奸胆寒，广学会中就有人写信给《热血日报》，请求不要把他的名字列入‘汉奸题名录’。买办资产阶级头子虞洽卿也因《热血日报》揭发

他受贿六十万元而坐立不安，亲自写信要求“辟谣”。《热血日报》也具有自己的独特的新闻特色，充满着战斗性、鼓动性。文章力求通俗化、大众化；文章体裁形式多样，版面编排生动活泼。”

同日 瞿秋白等遭英租界巡捕房通缉。

5日 在《热血日报》第2期上发表评论《上海新闻界之畏怯》、《舆论之批评》两文。

6日 在《热血日报》第3期上发表《上海市民要注意的事》、《外人大屠杀之目的——上海、汉口、青岛、大连》两文。署名维。

7日 在《热血日报》第4期上发表社论《中国人不要做外国人爪牙》，署名维；评论《当心外国人的离间阴谋》、《我们要认清风潮的性质》。

8日 在《热血日报》第5期上发表社论《工商联合会与上海市民》及《两个懦弱的心理》一文。

工商学联合会代表全上海的市民提出的三条“最低限度”的“要求条件”：一、惩凶、赔偿、谢罪；二、收回会审公堂，取消领事裁判权；三、租界上有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绝对自由。社论认为，三条“最低限度”的要求，“固然已经是一部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然而还不足以保证我们民众运动发展之可能，而且实际上只要我们真能齐心坚持，所能达到的目的决不止此。因此，依我们的意思，最低限度的要求应当添下列三条：一、撤退外国驻华的一切武装势力；二、中国市民有参与租界市政之权；三、中国职员工人有同盟罢工之权。”

9日 在《热血日报》第6期上发表社论《监督政府的外交》。

10日 在《热血日报》第7期上发表社论《五卅交涉的危机——注意亡国的外交政策》与《罢市五更调》按语。

11日 在《热血日报》第8期上发表社论《政府特派员是何居心？》

同日 参加了在西门召开的市民大会。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在

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市民大会。参加的有各工团、各商界联合会、各学校五百余团体，近十万人。会议通过了反帝宣言和决议，会后举行反帝示威游行。

杨之华《回忆秋白》：“秋白在五卅运动中，工作非常繁重紧张，要参加频繁的中央和地方的党的会议，起草中央文件，给党刊写文章，给党团员、积极分子作报告，有时还秘密地亲自参加群众大会，如六月十一日在上海西门召开的三十万人的市民大会。

12日 在《热血日报》第9期上发表社论《警告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同时发表《巡捕房的假证人》、《枪弹究竟应当从哪里进去？》、《上帝呢还是财产？》、《贼的伎俩》、《蔡廷幹的表示》等5篇杂感，署名分别为“热”、“血”、“沸”、“腾”、“了”。

13日 在《热血日报》第10期上发表《救国十二花名》与杂感：《也是一种爱国方法》、《江亢虎辟赤化谣》、《小吃齐心酒》三篇，分别署名“热”、“血”、“沸”。

《救国十二花名》是秋白采用民间小调形式宣传革命主张。

14日 在《热血日报》第11期上发表社论《上海总商会究竟要什么？》与《更可怕的十秒钟》、《可爱的梁启超》，分别署名“默”、“顾”。

社论针对上海总商会把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条件改为十三项，删弃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判权、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等重要条件，进行揭露与谴责。

15日 在《热血日报》第12期上发表社论《全中国人快要受外人屠杀了！——上海总商会却还要反对民众的团结》。同时发表的还有杂感：《大家都卖气力了》等。署名热。

16日 在《热血日报》第13期上发表社论《五卅交涉中之民众要求——谨防外交当局的狡谋》及杂感：《卖国不但政府》、《蔡督办打扑克》等，分别署名热、血。

17日 在《热血日报》第14期上发表社论《外交当局的欺人

政策——商阀报阀的勾结》。

同日 写《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国民革命》，发表在 22 日出版的《向导》第 119 期上。署名秋白。

文章在介绍“五卅”惨案的历史背景及其经过后，指出：“帝国主义屠杀政策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引起了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怒潮”。“五月卅日！这确是中国国民革命开始的一天！”。

18 日 在《热血日报》第 15 期上发表社论《无耻的美国帝国主义者！》，杂感五篇：《总商会的非合作主义》、《糊涂的民国日报》、《自由劳动》、《万恶的上海报界》、《虞洽卿六十万元》等。分别署名：热、血、沸、腾、了。还发表泗州调《大流血》。

19 日 在《热血日报》第 16 期上发表社论《官僚商阀之秘密外交！——人民起来打倒他们！》、《推翻媚外的军阀官僚！》。

20 日 在《热血日报》第 17 期上发表社论《交涉破裂后我们怎样办？——全国对外的大罢业》、《还希望军阀来救国吗？》、《我们要积极的反抗》。杂感三篇：《外国皇帝的勋章与中国同胞的血》、《一手给钱一手开枪张少帅》、《大老板们好财运》，分别署名热、血、沸。

21 日 在《热血日报》第 18 期上发表社论《死活只有两条路——全国对外大罢业还是做奴隶》，署名维一。同时发表的还有《外国人铁蹄下之中国》。

22 日 在《热血日报》第 19 期上发表社论《谁是敌，谁是友》。社论指出，我们应当认清：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列强帝国主义政府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全世界的平民群众大多数都表同情于我们，援助我们，当然是我们的朋友。在国内，军阀奸商，却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民众要靠我们自己，要靠我们真正的朋友，大家合力一致的奋斗，反对我们国外国内的一切敌人，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根本解放中国，不再受人屠杀！

23 日 在《热血日报》第 20 期上发表社论《全国罢工潮与上

海开市》揭露上海总商会“背叛民众和国家的利益”，“决定开市”，指出，“这是国民绝交运动要流产的预兆。”

24日 在《热血日报》第21期上发表社论《北京政府之修正不平等条约——日本外相之政策可以对照》。

25日 在《热血日报》第22期上发表社论《全国大示威的意义——应再有实际上的统一行动》。

26日 在《热血日报》第23期上发表社论《英帝国主义之阴谋——广州事件》。

27日 在《热血日报》第24期上发表社论“五卅案与废除不平等条约”，指出北京军阀政府提出所谓“修正”不平等条约，将“很快会变成一种永久的悬案”。

同日 《热血日报》被封禁。

《热血日报》1至28期，由杨之华收藏，秋白生前曾选了二十篇《热血日报》的社论，准备出版一个小集子，但因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出版。秋白在《热血日报》合订本封面上写着：“此中圈出之文，可以总题作‘热血日报社论’（后附小言一则作为补白可也）——每篇仍悉原题下以小号字注明年、月、日”。

郑超麟《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最后当局动手了，巡捕封闭了明星印刷所，拘押了老板，罚款释放，老板来编辑部交涉，张伯简同他接头，替他付了罚款。从此就停刊了（那时中央印刷厂已筹备就绪，似乎我们自己印了一二期）。

那时瞿秋白和陈独秀碰了头，他写的社论反映了中央的意见。彭述之在五卅运动前因病住在宝隆医院，蔡和森已去北京西山疗养，只有张国焘在上海。

30日 写《五卅屠杀后之奉系军阀》一文，发表于7月2日出版的《向导》第120期上。署名秋白。

八 月

13日 写《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一文，发表于8月18日出版的《向导》125期上。署名秋白。文章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教训，详细论述了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英勇斗争和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反帝联合战线的意义。呼吁全国工商学农各界的大联合，以人民的力量促成全国政治的统一和军事的统一，使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府，武力真正成为人民的武力；各阶级应当和工人阶级一样的决心牺牲和奋斗，那时我们最终的胜利才有希望。该文认为斗争不能胜利的原因：第一、资产阶级等只顾私利而破坏联合战线；二、没有统一的人民政府；三、没有真正的武力。

27日 写《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与广州国民政府》一文，发表在8月31日出版的《向导》127期上。署名秋白。

同月 写《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署名瞿秋白。《向导》周报社于9月以《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为书名出版小册子，书中刊载了此文。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新老右派开始结集成政治力量，戴季陶就是其中代表。五卅运动期间，戴季陶发表《中国独立运动的基点》，7月间，又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和《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公开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农运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叫喊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声言要把共产党人驱逐出国民党。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共活动的信号，是为蒋介石夺取革命领导权作舆论准备。在戴季陶的影响下，广州、上海等地先后成立了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从时局、革命形势、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于国共合作等十个方面分析和批判了戴季陶主义的反动本

质。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能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注重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二、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对于戴季陶、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于真正之民族的资产阶级，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在这两条路中挑选一条：或者革命，或者反动”。

杨之华《回忆秋白》：

“秋白当时在党中央分管宣传工作，时刻关注着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因此，当戴季陶主义刚一出笼，秋白就敏锐地洞察了它的反动性和阴谋，认为必须给以反击。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他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戴季陶主义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新右派反共反工农的旗帜。……”

在这次中央会议上发生了争论，陈独秀反对攻击戴季陶，认为他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民粹派，而不是国民党右派的代表。经过秋白和任弼时等同志的力争，会议决定反击戴季陶主义，并委托秋白写文章进行驳斥。

秋白接受这个任务后，立即找了一些同志了解群众和各方面对戴季陶主义的反映，收集右派反动活动的材料，仔细研究了戴季陶的小册子。我们当时住的是一间很小的房间，秋白就在这个小房间的一块空地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吸着烟，咬着笔端（他用的每枝笔端都是咬得粉碎的）。这是他考虑写文章时常有的神情。他全神贯注在工作中，周围的任何动静都不闻不问，思考成熟后，就动起笔来，衬着复写纸一口气写下去，一写就是两份，写得很整齐清楚，就象是重新抄过的一样。他那驳斥戴季陶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就在一天夜里写成了。此外，他还写了《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等文。秋白在这些著作中系统地、彻底地驳斥

了戴季陶的反动谬论。

九 月

3日 写《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发表于9月7日出版的《向导》128期上。署名秋白。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是“破产的农民迫于经济上的困苦，本能的发生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五卅运动，实在说起来，是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不过五卅运动的方法、组织、策略，完全与义和团不同了”。

8日 写《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发表在9月11日出版的《向导》第129期上，署名秋白。文章批判了大资产阶级对反帝斗争的叛卖。并从五卅运动的经验中指出：“不但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压迫剥削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而且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亦是不可少的，是事实上不可免的。这种斗争里如果无产阶级胜利，便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得着充分的发展；如果资产阶级得胜，那就中国民族的要求，民权的要求，都要被他们的妥协和私利手段所牺牲。”

14日 写《五卅运动后之九七屠杀》，发表在9月18日出版的《向导》130期上。署名秋白。

十 月

月初 出席在北京苏联大使馆召开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并在会上积极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

会议总结了自五卅运动以来的斗争经验，确定了今后的斗争方针。会议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已明显地表

现出领导力量,而资产阶级已表现出妥协的倾向。会议从五卅运动的教训中认识到,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最忠实的分子”,“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会议还第一次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的“耕地农有”主张,初步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土地纲领,并发表《告农民书》。在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上,规定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的斗争。

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第二章写道:“我直到五卅之后的北京十月的扩大会议,才首先坚决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这是因为我受着实际的革命时势及群众的教训了。”

月初 秋白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曾去看望丁玲。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是冬天了,一天傍晚,我走回学校,门房拦住我递给我一封信,说:‘这人等你半天,足有两个钟头,坐在我这里等你,说要去去看他,地址都写在信上了吧!’我打开信,啊,原来是秋白。他带来了一些欢喜和满腔的希望,这回他可以把剑虹的一切,死前的一切都告诉我了。我匆匆忙忙吃了晚饭,便坐车到前门的一家旅馆。可是他不在,只有他弟弟云白在屋里,在翻阅哥哥的一些杂物,在有趣地寻找什么,后来,他找到了,他高兴地拿给我看。原来是一张女人的照片。这个女人我认识,她是今年春天来到上海大学,同张琴秋同时入学的。剑虹早就认识她,是在我到上海之前,她们一同参加妇女活动中认识的。她长得很美,与张琴秋同来慕尔鸣路,在施存统家里,在我们楼下见到过的。这就是杨之华同志,就是一直爱护着秋白的,他的爱人,他的同志,他的战友,他的妻子。一见这张照片我便完全明白了,我没有兴趣打听剑虹的情况了,不等秋白回来,我就同云白告辞回学校了。……我的感情很激动,为了剑虹的爱情,为了剑虹的死,为了我失去了剑虹,为了我同剑虹的友谊,我对秋白不免有许多冤气。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忽然收到一封从上海发来的杨之华给秋

白的信，要我转交。……我一早仍去找到了夏之栩同志。夏之栩是党员，……她果然把我带到当时苏联大使馆的一幢宿舍里。我们走进去时，里边正有二十多人在开会，秋白一见我就走了出来，我把信交给他，他一言不发。他陪我到他的住处，我们一同吃了饭，他问我的同学，问我的朋友们，问我对北京的感受，就是一句也不谈到王剑虹，一句也不谈杨之华。他告诉我明早就返上海，云白正为他准备行装。我好象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静静地观察他。从此我们没有联系，但这一束信我一直保存着做为我研究一个人的材料。

……

是一束用五色布纹纸写的工工整整秀秀气气的书信，是一束非常有价值的材料。里边也许没有宏言谠论，但可以看出一个伟大人物性格上的、心理上的矛盾状态。”

同月 写《反奉战争与国民革命运动》，发表在 10 月 30 日出版的《向导》134 期上。署名秋白。

十一月

1 日 写《世界社会革命开始后之第八年》一文，发表在 11 月 7 日出版的《向导》134 期上。署名秋白。

27 日 写《沪案重查与五卅屠杀的结局》一文，发表在 12 月 3 日出版的《向导》137 期上。署名秋白。

同日 由于国民党右派林森、覃振、居正、邹鲁等于 23 日在北京西山召开反共的“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林伯渠、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芬、恩克巴图，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等致电各级党部、严驳“西山会议派”。

十二月

2日 西山会议派发出通电,非法宣布取消共产派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党籍。瞿秋白名列其中。

20日 在上海大学中山主义研究会创办的《中山主义周刊》第一期上,发表《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讲演稿。

10月19日,上海大学为对抗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了中山主义研究会,并出版《中山主义周刊》,《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是秋白的一次讲演记录稿,由上海大学学生马凌山记录,此文曾印成小册子散发。

文章指出国民革命中的国民党“有很鲜明的三个目标”：“一、要把全中国民众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二、要从横暴的军阀、官僚手里夺到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三、要使全国十分之八、九以上的农工群众得到生活改良。这三个目标,都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说得很明白,就是根据着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就是要站在阶级的地位上去实行阶级斗争的,三民主义就是阶级斗争三方面的表现”。“主张国民革命而却反对阶级斗争,这不但自己不是国民党员,而且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每个中山主义者,革命的国民党员,去实行阶级斗争而发展国民革命”。

年底 在上海由蒋光慈陪同访问了郭沫若。

△ 肺病加重,发烧、咯血。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

光慈陪着秋白的来访,是在我已经辞掉了学艺大学以后,但是,是在一九二五年的年底,还是翌年的年初,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在午后一点钟的光景,是颇阴晦的一天,我正坐在楼下的小堂屋里看书,他们突然进来了。光慈在先,秋白在后,秋白带着一副药片

眼镜，一进门便取了下来。

秋白的相片早是看见过的，光慈虽也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小堂屋里只有正面有一堵窗，正对着外边的铁栅门，在那窗下摆了一张长条的西式书桌，是达夫住在马霍路的泰东编辑所时用过的，我把它要了过来。（现在这张书桌我相信是在周全平家里。）我就在那书案前正对着窗口坐着，秋白从右侧的门口进来，便在门次傍桌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了。光慈也从正中的小圆桌旁拉了一张椅子来，一同凑紧地坐着。

秋白的脸孔很惨白，眼眶的周围有点浮肿。他有肺病，我是晓得的，看到他的脸色却不免使我吃惊。他说，他才吐了一阵血，出院才不久。

……

我就象坐在书斋里的浮士德一样，把秋白和光慈作为自己的听众，在那儿唱独白。

秋白是很寡默的，他只说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可以趁早把它写出来。

但关于土耳其方面的情形，我便有点隔膜。……

我希望秋白给我些关于土耳其方面的资料，他答应了，并说随后检出，由光慈交来。

秋白那时已把《新青年》杂志恢复，注重在文化方面的问题。做文章的似乎就只有他和光慈两人，他希望我们也做些文章去。但那复活的《新青年》似乎只出了两期，以后又停顿了。

零碎地又谈了些俄国文学，秋白劝我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那部小说的反波拿巴主义，在我们中国绝对的必要。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战争与和平》，并有点小儿病的地不高兴托尔斯泰，因为他是贵族，又还倡导无抵抗主义也。秋白的劝说，我在三年后是遵照了的，但可惜那书只译了三分之一便中断了。……

谈了有一个钟头的光景，秋白说他另外还有事，便又和着光慈

一道告辞走了。

不久便在报上看见秋白到了广州的消息。

又不久便有广州大学聘我的消息。后来陈豹隐对我说过，这事是出于秋白的推挽。但秋白自己却不曾对我说过。

一九二六年 28岁

一月

1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19日闭幕。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占很大优势,这次大会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共产党员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会委员与候补委员。瞿秋白未出席这次大会,亦未继续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12日 写《五卅案重查的结果与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一文,发表在1月14日出版的《向导》142期上。署名秋白。

17日 改译《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发表在1月21日出版的《向导》第143期上,署名秋白。文章概括介绍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中国革命的实践已证明列宁主义的正确。

22日 写《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一文,发表在3月25日出版的《新青年》月刊第3号上。署名瞿秋白。

文章在阐述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后,全面总结了“五卅”运动的历史经验,指明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提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互争革命领导权的严峻现实。文章还对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进行了批判。

28日 写《国民会议运动与联合战线》一文,发表在2月3日

出版的《向导》144期上。署名秋白。

29日 写《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一文，发表在3月25日出版的《新青年》月刊第3号上。署名屈维它。文章认为：五四到五卅，这六、七年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有重大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在中国革命前途问题上，文章指出：“中国革命是国民革命，然而国民革命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由资产阶级来指导，对于帝国主义和局部的抵御，利用所谓列强之间的冲突而苟延残喘，想镇压劳动民众的阶级斗争，处处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而希望以反对赤化取媚外人，求得些恩惠；一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对于帝国主义整个来推翻，利用帝国主义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冲突而进行革命斗争，发展国民革命中之阶级斗争成分，集中最大多数民众的革命力，以肃清国内一切买办、军阀、土豪等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劳动平民的压迫者。现时左右派斗争的具体问题是如此”。

同月 完成为上海大学讲课用的提纲《现代民族问题讲案》的写作，全部分四讲：一、绪论；二、帝国主义前的民族问题；三、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四、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族问题。

二 月

2日至16日 为《新青年》专栏“战壕断语”写：《战壕断语——中国革命者的杂记》，发表在《新青年》月刊第3号上，署名屈维它。

3日 以《向导》周报记者名义代陈独秀写《对于阶级斗争之一疑问——答明致先生》，发表在同日出版的《向导》第144期上，署名它。陈独秀写的《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一文，在《向导》134期上发表后，广东大学法科教授梁明致来信，对文中表述的阶级斗争观点提出疑问。秋白在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就阶级、

阶级关系、阶级斗争与联合战线等问题作了答复。

同日 在《向导》144期上发表《两副面孔一个公式》、《大家谢了大家》、《日本外交部搬家》、《好个交换条件》、《苏联真无诚意!》等五篇杂文。署名它。

5日 写《国民应为国民会议而战!——张吴联合攻国民军之政局与民众》一文,发表在2月10日出版的《向导》145期上。署名秋白。

6日 写《中国职工运动战士大追悼之意义》一文,发表在2月10日出版的《向导》145期。署名秋白。

10日 在《向导》145期上发表四篇杂文:《都是犯了圣讳》、《赤化共产真时髦》、《原来唯恐我们不快死不坐牢》、《法统说的原来在此》。署名它。

21日至24日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会议历时四天,出席代表十二人,其中中央委员七人,CY代表一人,北方区代表二人,粤区代表二人。陈独秀因病没有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党的“主要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为了准备北伐,必须加紧北伐所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的群众工作,特别是要发动与组织农民,因而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认为只有工农联盟,才能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关于中央地址问题,会议决定,如北方国民军地位稳定,则中央即移往北方;如北方政局反动,则移粤与否尚须讨论。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便加强党的军事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建立了军事部,会议还指定秋白起草《通告》,张国焘起草《宣传大纲》。

三 月

1日 出席北京学生总会在女师大礼堂举办的讲演会,听众一千余人。同时讲演的还有李大钊。据3月2日《京报》的报道,他

们的讲演，“均极受听众之欢迎”。

7日 《京报》报道：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北京妇女界定于8日下午在艺术专门学校开纪念大会，“已敦请徐季龙、陈启修、于右任、李守常、吴稚晖、谭平山、顾孟余、瞿秋白、李石曾、于永滋、安体诚诸先生讲演”。

17日 以《向导》周报记者名义，就“阶级斗争与阶级间联合战线”、“阶级分野的标准”、“阶级与国家”等问题，在《向导》146期上发表《对于阶级斗争的讨论——再答明致先生》一文。

18日 写《中国境内之华人参政问题——上海工部局总董教训总商会会长》一文，发表在3月27日出版的《向导》第147期上。署名秋白。

27日 以《向导》周报记者名义，代陈独秀答复陆耀文、江沛的公开信《怎样实现国民革命？》。又以同样名义代陈独秀答复汕头嘉应学艺中学刘此生的公开信：《苏俄与民族解放》。两封公开信分别发表在同日出版的《向导》148期与4月3日出版的《向导》149期上。

春 从北京返回上海后，因肺病严重，遵中央决定，住宝隆医院治疗。病中编译《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

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

杨之华《忆秋白》：“一九二六年春天，我接到中央同志的委托，要我强迫秋白同志进医院休息，因为他吐血，不顾自己的身体，带病坚持工作，已经继续两个多月了。当我把中央的命令告诉他的时候，他笑了，深切地感激同志们对他的关心。他对我说：‘很想有一个较安静的地方来实现我的心愿——针对当前中国革命中几个重要问题编译几本值得参考的丛书’。……”

“党为了他的安全，特请了一个可靠的医生，设法在宝隆医院

里找了一间单人病房。……在头两个星期中，他完全按照医生的嘱咐躺在床上不起来。但他很想了解社会思想现状，开了一张书单，要我到四马路上的书摊、书铺里到处寻找。我把他需要的书买来，他一个晚上就读完了。后来，我几乎隔一天上一回书铺或书摊，四马路的小书店成为我熟悉的场所了。”

“到了第三个星期，当我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仿佛在家里一样，弯着腰坐在椅子上，兴致勃勃地一页一页的写起来了。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病人，还把自己订好的工作计划给我看，对我说：‘中国共产党员连我在内，对列宁主义的著作读得太少了，要研究中国当前的革命问题，非读几本书不可。我想将俄国革命运动史分成四部分编译出来……这些都可作为中国革命之参考，非常重要的参考’。他抚摸着俄文原著，用坚决的口吻说：‘如果客观环境允许的话，我必定在最短期间完成这个心愿。’”

“……我劝他‘你的计划回到家里再说。你现在的任务是治疗你的病，同志们不允许你不关心自己的身体’。秋白凝视着窗外，双手撑在桌子上，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我和彭述之等对革命政策上有不同的观点，我想编译这部俄国革命运动史，对于党内干部会起些帮助作用。农民问题已摆在面前了，因此我先编译这一部分’。”……“他走到床边，揭开一块白布，从小提箱内拿出他在一个星期内写的很整齐的复写成两份的薄纸手稿，把其中的一份交给我带回家。这时，他又恢复了轻松愉快的心情，手指着复写稿笑着说：‘这是医治我和我们同志最上等的贵重药品呀！’”……“他写作的速度是使人难以想象的，虽然是带病工作，在两三个星期内已将俄国革命运动史的第一部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编译了三分之二”。

“秋白从医院回来，不出所料，更重要的工作打断了他的计划，只好把编译工作搁下了”。

四 月

7日 写《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一文,发表在5月23日出版的《新青年》月刊第4号上。署名瞿秋白。3月18日,北京群众十余万人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与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竟遭到段政府的武装镇压,形成“三·一八”惨案。文章指出:“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更明显的更深切的拥出工农联盟的国民革命主力军,并且更紧切的逼得民众不得不力求武装——军队和工农军——准备直接革命。

10日 写《最近中国之中央政府问题》一文,发表在5月15日出版的《向导》第153期上。署名秋白。

12日 写《中国革命斗争中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一文,发表在《新青年》月刊第4号上。署名瞿秋白。文章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已经造成武装革命的必要条件。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时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从‘五四’、‘二七’、‘五卅’、‘三·一八’和广州战争直至现在,革命的波澜旋起旋落地昂然前进,运用这种种斗争方式,已经到了武装直接决战的准备时期,已经到了将近决死战争的时机——中国平民和帝国主义短兵相接一决死生的时机”。文章认为,“在中国条件之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动——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从事革命的作战”,“对于革命战争的必要,应当尽力宣传,打破伪和平的幻想,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不可避免,应当因此而更加积极准备,以免政治上宣传上战略上的临时疏忽,弄得失败而延长中国革命的难产。”

13日 在《向导》149期上发表《北京屠杀后之中国民族的仁

爱性》一文。署名秋白。文章指出：“只有加紧的组织自己，武装自己，继续实行我们的革命斗争。只有民众自身的组织，自身的武装，并且从帝国主义方面夺回武装势力——中国破产农民所组成的军队，然后才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使一切屠杀民众的凶手来受革命的审判。”

20日 写《再论中国境内之华人参政问题》一文，发表在4月23日出版的《向导》150期上。署名秋白。

27日 写《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五七、五四、五卅、五一、五五》一文，发表在5月1日出版的《向导》151期上。署名秋白。

同月 在《中国工人》第四期上发表《北京政变后的政局与工人阶级》、《评职工运动中的反对派》。署名瞿秋白、巨缘。

同月 写《五一纪念与共产国际》，发表在五月出版的《中国工人》第五期上，署名秋白。

五 月

4日 写《英日吴张战胜后之中国资产阶级》一文，发表于5月8日出版的《向导》第152期上。署名秋白。

15日 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22日闭幕。谭延闿、蒋介石等九人联名在会上抛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整理党务案”。这个提案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的意见不一致。最后，张国焘按照他与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接受。从此，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换上了国民党右派分子掌权。蒋介石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后又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垄断了党政军大权。

李立三《党史报告》：

当蒋介石的哀的美顿书要答复了，鲍罗廷提出他坚决的意见，认为原则上不退出，但必须以退出相威吓。当时国焘、秋白赞成这一意见，可是中央派去的彭述之是始终说要研究研究，每次会议总是没有结论。直到最后，由许多干部负责签字来提出这一意见。

17日 写《五卅周年大示威中之上海问题》一文，发表在5月22日出版的《向导》154期上。署名秋白。

23日 写《五卅周年的中国政局》一文，发表在5月30日出版的《向导》155期上。署名秋白。

同月 编写《世界革命运动年表——战壕断语(三)》一文，发表在7月2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5号上。署名屈维它。

六 月

1日 写《北京的巨头会议和政治公开问题》，发表在6月9日出版的《向导》第157期上。署名秋白。

7日 写《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化斗争》，发表在7月2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5号上。署名瞿秋白。文章指出：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后，已“处于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中国革命不解决农民问题，是永世不能胜利的”。

8日 在宁波^① 写《颜内阁之大卖国计划》，发表在6月16日出版的《向导》158期。署名秋白。

9日 写《世界的农民政党及农民协会——赤色农民国际与国际农民运动的历史》一文，发表在7月2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5号上。署名秋白。

18日 写《日本对华屠杀后的中日亲善论》一文，发表在6月

^① 文末写“一九二六.六.八于宁波”。

23日出版的《向导》159期上。署名秋白。

23日 在《向导》159期上发表杂感：《有利于中国即为侵略》。署名它。

七 月

1日 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

7日 陈独秀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认为北伐时间尚未成熟，反对北伐。此态度不仅受到党内的批评，也遭到国民党人士的反对。

9日 国民革命军在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典礼。

12日至18日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四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彭述之、项英、李维汉、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等；此外，尚有团中央代表与地区的负责人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等。会议讨论了党在北伐中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虽在原则上仍然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坚持了要发动群众，但对蒋介石仍然采取让步政策。会议根据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提出的召开两党联席会议的意见，决定派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去广州，参加联席会议。

16日 在《向导》162期上发表《上海买办阶级的威权与商民》。

八 月

7日 在赴广州前夕，秋白将他在上海一次谈话中发表的对北伐战争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整理成《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

一文,交给《向导》周报,要求发表,因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反对,被搁置未用。

文章明确指出了北伐战争的意义,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对于北伐战争的态度,含蓄地批评了陈独秀反对北伐,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文章认为,广州政府的北伐,实在应当是北京屠杀后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革命战争,是五卅运动继续发展的中枢。文章提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积极的赞助并主动的参加革命战争。

郑超麟《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北伐问题,鲍罗廷是以既定政策提到中国共产党中央面前的。那时瞿秋白、张国焘两人从广州回来不久,中央‘主席团’开会讨论这个问题。陈独秀、彭述之两人反对北伐;张国焘、瞿秋白两人赞成北伐,双方辩论起来。结果陈独秀拍案大骂张国焘,张国焘不敢回骂,问题就这样决定了。瞿秋白态度是明白的,他赞成北伐,但他不像张国焘那样直接同陈独秀冲突,他调解于二人中间”。“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这篇文章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国民党政府主席张静江写信给《向导》,反对这篇文章。《向导周报》在‘读者来信’栏内发表此信,并给以回答。”“本世纪四十年代我保管《瞿秋白文集》的原稿,从中发现瞿秋白当时写的一篇拥护北伐的文章。他在文章后作了附注,说此文《向导周报》编者拒登。事实上的编者是我。我忘记了这件事,这里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我收到瞿秋白这篇稿子,不敢决定发表与否,便拿给陈独秀,陈独秀不许登;第二,秋白此稿是交到秘书处的,陈独秀当时扣下来,不交给我。”

8日 离开上海,去广州参加国共两党联席会议。

同月 秋白到广州后,国民党由于忙于北伐,经双方磋商决定联席会议暂不举行。秋白便利用这机会,在广州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对当时形势及各方面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同月 与毛泽东、彭湃及中共广东区委代表一起参加了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的扩大会议。

同月 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作题为《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重要讲演。此讲演由瞿景白记录,后发表于同年11月30日出版的中共党内刊物《我们的生活》第4期。这篇讲演明确指出:“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苦痛,缴卸帝国主义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具体的办法是:(一)解决农民经济的束缚,用政治势力切实解决之;明定‘耕地农有’的标语。(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他有自己的武装保护他自己的利益。(三)农民参加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的也要有农民代表;凡是行政,要有农民与一般人民代表会决定后才能实行。(四)严厉的无情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之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

杨之华《忆秋白》:“八月间,秋白到了广州,在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秋白在讲《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中,指出当时革命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秋白还在百忙之中,挤时间继续编译《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终于印成小册子出版了。其余几部分,因为一直忙于其他重要工作,而没有能够完成计划,这是秋白所遗憾的一件事情。”

29日 在劳动学院作题为《什么是共产主义?》的报告。

九 月

15日 返沪后,于是日向中共中央写了《秋白由粤回来报告》,对广东政府和国民党内的派别、工农运动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具体的分析。《报告》指出:“社会反蒋空气颇盛,蒋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党政府态度均不好”。在谈到北伐战争时,秋白指出:蒋介石知道“到湖北后离

其本乡太远，且情形复杂，自己力量不够，所以他决取江西福建，以巩固自己势力，“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

同月 为毛泽东编辑出版的农民运动丛书写了序言。《序言》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十二月

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在汉口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正在发展变化中的政治形势，制订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为此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苏联代表鲍罗廷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赞同这次特别会议。

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指出：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特别会议时，决定了一个杂凑的政策：一方面要造成左派，别方面又认为现时已有“非理想的左派（伍廷康），总之，没有决定我们挺身领导。并且认为政府右倾，群众左倾，所以主张同时拉住些群众使之略略右倾，又要推动些政府使之略略左倾。没有下攻打右派之决心。

后来，秋白又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中说：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汉口会议，则认为国民政府有右倾的危险，民众运动又过于左倾。没有提起土地革命，……没有准备与民族资产阶级破裂之决心，那时，便已经有隐约退却的阵势之开始。”

下旬 与陈独秀、彭述之、维经斯基一起，多次到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与刚从苏联来的三位驻华代表——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勃雷希脱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等根本问题。秋白和三位苏联同志一致主张，党的工作应主要放在支持北伐上。

同年 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召开，大会以秋白在莫斯科写的《中国拉丁化字母》为基础进行讨论，正式作出了中国新文字的新方案。

一九二七年 29岁

一月

1日 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发表《恭贺新年》一文，批评社会上对妇女的欺凌和侮辱，驳斥资产阶级对共产党实行共妻共夫的胡说。

月底 在中共中央委员会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时，与彭述之发生争论。

1926年12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根据斯大林所作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报告的精神，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决议》：明确提出中国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重点是土地革命，其纲领应当是“土地农有”；并指出“对于这个问题持坚决态度并给予彻底回答的那个阶级，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中共中央在讨论这一决议时，秋白与彭述之发生了争论。秋白认为应当完全接受国际路线，批评了中央过去在这方面的错误，并特别强调进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中央通过多次的争辩，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议，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但由于陈独秀支持彭述之的意见，在《解释》中采用回避的手法，只字未提土地革命。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这个决议大约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到达上海中央的。讨论决

议时，中央听取了彭述之的报告。报告的最后部分说：‘共产国际的指示同中央的政策，一般说来区别不大！’他的报告在当时引起了中央委员和瞿秋白同志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的活动根本不同。……把中央关于上海暴动的决议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加以对照，就足以使人相信彭述之的话‘小区别’与实际不符合到何等程度。共产国际教导我们在资产阶级和农民当中要选后者作为自己的同盟军，而中央和罗亦农同志却把□□□、钮永建、吴稚晖、□□□等人作为同盟者。共产国际说，我们应当实行土地革命，而这时候‘农村统一战线’的口号还在我们这里起作用！”

李立三《党史报告》：“到了一月底国际决议全文到了中国，在中央就引起一个严重的讨论，发生秋白同志和彭述之的争论。当时秋白同志的意见是比较正确，他完全接受国际的路线，批评中央过去的路线和国际不合，特别提出土地革命的重要。彭述之的意见，他并不说国际决议不对，但他解释得一塌糊涂。因为独秀赞成他的意见，结果成立了一个接受的决议。……这一争论秋白同志是失败了，他当时就感觉反机会主义的重要，就在病中花了一个礼拜功夫，写了一本小册子，反对彭述之主义。”

同月 译完戈列夫著《无产阶级哲学——唯物论》一书，同年由新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时还附有译者两篇论文：《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1930年，该书由明日书店再版，再版时书名改为《唯物史观的哲学》，两篇附录未收入。当时《出版月刊》曾介绍说：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好的入门书”，“译文中于难解之处，且加译者的注释”。

《向导》第一八六期“广告”：

《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哥勒夫著 瞿秋白译 定价贰角。

研究唯物史观,在中国苦少著本,此书乃俄国著名的唯物史观教授哥勒夫所著的浅显易解的书。译者瞿秋白先生又是国内对于唯物史观有深刻研究的人。译本中于难解之处且加注释,书后并附有译者自著的二篇论文。

二 月

17日 将自己从1923年1月至1926年12月初,在《向导》、《前锋》、《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重要政治论文及部分文艺杂著,汇编成《瞿秋白论文集》。全书分8类:“(一)、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二)、帝国主义与中国,(三)、买办阶级之统治,(四)、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五)、北京屠杀后国民革命之前途,(六)、世界社会革命的问题,(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八)赤化漫谈。

秋白还为《文集》写了《自序》,说明出版文集的目的与该书的基本内容,他写道:

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

……中国无产阶级所涌出的思想代表当然也不能自外于此。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一九二三年回国之后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我现在收集四年来的著述付印,目的是在于呈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上的成绩,并且理出一个相当的系统,使读者易于找着我的思想的线索。固然,无产阶级之革命思想的指导,当然是集体的工作,然而我确是这集体中的一个

体,整理我的思想,批判我的思想,亦许对于中国革命实践不为无益。况且集体的革命工作之意义,正在于自我批评的发展;而集体的革命思想之形成,亦正在于其各个个体之间的切磋。

《文集》编成后,曾交商务印书馆出版^①,但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未能出版。

18日 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的第2号《通告》,决定于19日举行全沪工人总同盟罢工,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在此前夕,秋白曾主动提出要求,担任党召开的各区活动分子代表会议的报告,但被拒绝。

秋白后来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写道:

一九二七年二月上海暴动,……当时我曾正式要求自己担任区代表大会之报告。但是中央秘书处(王若飞)覆信讥笑我自告奋勇,说道:你“病”,不准你去了。

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同年4月18日下午参加特委会议的发言中亦提到此事:“我们曾与中央开会,秋白同志对于蒋介石的观察非常明确,可惜区委大会没有要秋白同志去报告,使同志们明了蒋之地位,这是一个错误。我们曾两次催秋白报告,结果因独秀同志之认为危险而未实行。”

① 据《瞿秋白选集》注释(第319页)。但据郑超麟回忆说:

1927年2月,瞿秋白准备离开上海去武汉。行前,他准备汇集自己的文章,打算出版一个集子,书名定为《瞿秋白论文集》。……

编好后,在离开上海前几天,瞿秋白亲自送给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这件事是1940年以后汪孟邹亲口对我说的。……瞿秋白把稿子交给了汪孟邹,就动身去武汉了。同一个时候,汪孟邹之侄汪原放也编好了《独秀文存》第二集……。不久,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汪孟邹很高兴,把两部稿子一起送印刷厂排版。秋白的稿子大约排出校好了五分之一,……这时,发生了“四·一二”反动政变,汪孟邹就从印刷厂把这两部稿子抽了回来(郑超麟:《亚东图书馆保存瞿秋白文稿的经过》(未刊稿))。

李立三《党史报告》：

当时国际决议时，正当着二次暴动的前夜，秋白要求出席活动分子会，中央不要他去，派了彭述之去，彭述之的报告，更加助长了二次暴动中的机会主义。

19日 上海十余万工人罢工。至21日，罢工人数增至三十五万人。主张坚决扩大总罢工并组织暴动。

李立三《党史报告》：

在中央就有一个争论，因为工是罢下了，但暴动不可能。当时秋白同志主张坚决扩大总罢工组织暴动，但是彭述之说只有结束罢工，等待北伐军，充分发挥他的机会主义的理论……。

22日 罢工人数增至三十六万人。党中央才决定由罢工转为第二次武装起义。秋白参与领导。

郑超麟《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上海第二次暴动的时候，他还是积极工作的。他坐镇设在辣斐路（今复兴中路）的暴动指挥所（启迪中学），我也在那里。

23日晚，参加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由于起义的准备工作不足，估计起义不能成功，决定停止暴动与总罢工。发出“为准备进攻而停止暴动”的口号。会上，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成立军委和宣委。

秋白在会上就这次起义的教训与下次起义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

杨之华《回忆秋白》：

二十三日晚上，秋白和我去参加中央和江浙区委的联席会议，……会议是陈独秀主持的。亦农和世炎同志报告了这次起义的情

况和问题以后,大家进行了讨论。秋白对于这次起义的教训和下次的起义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他指出“这次罢工开始以后,领导人犹豫动摇,组织士兵、学生、市民和小资产阶级响应工人罢工的决心不够;起义也缺乏充分的准备,对组织人民政权,只作为一般的宣传口号,没有实际组织工人和各界人民选举‘市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而一味依赖大资产阶级,等待国民党右派钮惕生去接洽李宝章(孙传芳的走狗,上海防守司令)兵变,等待大商人的决策,仅仅在‘暗室’里同国民党上层分子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虞洽卿、王晓籁等谈判,以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脱离群众,把革命的领导权双手奉送给资产阶级。结果,工人罢工已经三天,兵变无望,大商人旁观,才在二十一日午夜仓猝决定了起义计划。

24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特委会议,并就周恩来军事报告作了补充发言。秋白认为,“恩来报告中,缺少怎样动摇敌军,怎样联络军队与保卫团二个问题”,“纠察队之组织应由工会与党一块工作,要宣传武装使群众心理安定,要有作战计划,有主力军之训练。”

25日 将在24日连夜完成的《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交中央讨论,遭到彭述之的反对。

《意见书》总结了第二次暴动中党在领导上的教训,指出,应公开承认“事前未及早准备”及“中央政策动摇不定与疏忽不周到”之错误;提出了暴动的新政策、策略等一系列具体工作计划。在策略上提出:(a)对大资产阶级保〔持〕相当的必需的联络(使他们加入市民代表紧急会议,而不是使他们来指挥市民会议),逼迫他们服从‘民意’,牵制他们妥协政策,尽量利用他们内部之冲突及其军事上的联络(如钮惕生之与李部下);(b)对于小资产阶级,应当组织其领袖(及国民党左派市党部),尽可能引导一般市民群众,使他们做我们反对大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斗争中的友军,现在客观上是我们‘征取小资产阶级革命群众’最可能最紧迫的时机;(c)对于反对

派及买办阶级，竭尽全力暴露其罪恶，不断地激烈地攻击其卖国卖民勾当，并攻击帝国主义军阀之一切压迫——这亦是与民族资产阶级在此次上海革命中争领袖权之另一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方面。

李立三《党史报告》：二次暴动的口号只有两个：一是欢迎北伐军，一是欢迎蒋介石，此外，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政纲，没有政权问题，所以秋白同志又提出一个对于上海暴动的提案，……他的提案在总的路线上是非常正确的，可是这个提案彭述之反对。

同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特委会议，讨论关于党务、军事、派工人代表团见白崇禧等问题。会上就宣传工作作了发言。

26日 晚8时，出席中共中央特委会，在会上发言。秋白同志说，兵工厂问题，不在于打倒李宝章，而是在于谁取兵工厂的问题。假使我们有力量，就取兵工厂；如无力，则着重代表大会。同时要预先找好地方，然后群众进去拥护。总工会则在代表大会后立即选出临时委员会。我意在政治上要注意群众组织，在军事上，要占据相当地盘。

27日 晚8时，出席特委会议。

28日 晚7时，在特委会上发言。他说，在目前情形看来，如果我们的代表选出，汉口方面必能承认我们的名单，不承认蒋介石所委任的。我们并可攻击他们所委任的，他们必难站立。

秋白在会上还提出：以后让〔王〕一飞参加本会。

同月 撰写《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雪维克主义》，全书七万六千多字，于4月在武汉出版。全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与统一战线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28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在再版此书时写了《序》，全文如下：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是瞿秋白同志在第五次大会之前(一九二七年二月)做的。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是第一次比较涉及各方面的尝试。虽然这书中对于土地问题仍旧没有充分明晰的观点,然而他大致的讨论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前途,中国革命的党纲策略战术等问题。这就可以表现中国共产党在第五次大会之前,党内对于革命根本问题之讨论。即使这书的论断(对于中国社会政治及阶级关系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其中关涉太复杂而详细的问题,还有许多未成熟的思想,不能认为定论——这些问题本来还要有更深的学理有事实材料之研究——那么,至少,他是一本很重要的历史文件,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前之策略等问题的争辩。因此,我们决定将他再版。

再此书已在莫斯科俄文译本出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①

三 月

1日 晚8时,出席中共中央特委会,讨论军事、工运、宣传等问题。

^① 据郑超麟回忆:瞿秋白的反彭述之的小册子,究竟写于何时何处?这问题有不同说法,……我有我的看法,我没有证据,但估计它的初稿是在一九二六年深秋在上海西门路寓所写的,带到武汉去,然后补充以新的材料修改而成定稿,于二月底或四月初在武汉自己的印刷厂出版。一本七八万字的小册子,而且牵涉的问题很广泛,很原则,决非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紧张的斗争中所能于一个星期内写成功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的第一次大争论,值得好好分析。1928年初,重印瞿秋白这本小册子,同时出版彭述之回答瞿秋白的小册子(在武汉排好但未印的),不是当时中央决定的,而是秋白和我二人审查了从武汉运回的几付版之后定的(访问郑超麟记录)。

2日 晚8时,出席中共中央特委会,讨论工会工作和军事问题。

中旬 为筹备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离沪去武汉。

由于陈独秀、彭述之尚留在上海,故由在武汉的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组成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秋白还兼管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中宣部设在英租界辅义里27号一幢2层楼房里,秋白亦居住在内。

杨之华《回忆秋白》:

秋白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中旬从上海到武汉后,主要工作是为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作准备。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大约在四月初,中央决定让我去编汉口《民国日报》,……那时候宣传部长彭述之还在上海,武汉是由瞿秋白兼管宣传工作,我就去找秋白。秋白住在汉口旧英租界辅义里的一栋二层楼房内,……。他听说我要编汉口《民国日报》就说,当前的报纸宣传要着重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他说《民国日报》过去办得不错,旗帜很鲜明,就照这样继续办下去。他对蒋介石的反动很忧虑,说此人十分阴险,嘴上讲的和实际做的完全两样,现在掌握了军权又有了京汉杭的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将来后患无穷。果然不出所料,没有过几天,蒋介石就在上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

李立三《党史报告》:

当时秋白同志感觉党中央机会主义太深,所以他要求到武汉。在湖北省委,他作了一个报告,极力批评党的机会主义,号召同志起来反对机会主义。当时武汉的同志的确在他的影响下,所以过去广东与中央的对立,现在转移到武汉和中央的争论。

10日至17日 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上,决定

举行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并要求共产党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与湖北省政府。国民党决定参加联席会议的成员是：汪精卫、顾孟余、邓演达、陈公博、孙科。事后，中共决定参加联席会议的成员为：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联席会议前后召开 20 多次，通过决议 260 个。

17 日 苏联驻华代表 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勃雷希脱，在上海写给苏共中央一封信，认为最近几个月事变表明：中共“目前的领导机关是不能实行坚定的共产主义政策的，……在党的领导机关中，有一个派别，它决心要将党推向右倾，走上取消的道路，同时这一派别及其政策又受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指维经斯基一引者）的支持”。“中央委员会本身，现在实际上由三个人组成的，彭述之代表右派，瞿秋白代表左派，‘老头子’（指陈独秀一引者）代表中派。”

21 日 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

杨之华《回忆秋白》：

我经常兴奋地写信给在武汉的秋白，告诉他胜利后上海的情形以及我的工作和我欢乐。秋白的回信，也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他说：“上海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独立地拿起武器来争取解放，是有利于发展并完成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新方式”。“革命前途光明，但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要我坚定地谨慎地进行工作。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消息传来，秋白异常激动地对我说：“我们应该感谢恩来、亦农、世炎等同志，我们更应该感谢上海的工人阶级。是他们在上海的上空，树起了红旗，为我党添了光辉。……不管国民政府同意与否，中宣部要尽一切努力，为上海的武装起义大造舆论，并严重警告那些北方、南方的新老军阀，如想镇压，则无产阶级必将以革命

的武力对反革命的武力加倍奉还”。

四 月

4日至20日 先后出席有国际代表、中央委员以及湖北区委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后决定：4月20日召开中央全会，4月25日召开五次大会。同时决定：驻汉口的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在十天内撤销，中央委员、湖北区委与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当即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会议还决定致电上海催陈独秀速来，并把中央迁到武汉；会议赞成罗易关于成立几个委员会为五次大会准备材料的建议，并通过了三个委员会的主持人名单：农民土地委员会——瞿秋白、毛泽东；职工运动委员会——李立三；组织委员会——张国焘。

11日 为出版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印本，赶写序言。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3月12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九一期上刊登了前半部分后，没有继续刊登，秋白对这篇《报告》十分重视。将全文交党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单印本，并写《序言》：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萧三《秋风秋雨话秋白》：我又想起二十年代末，当彭述之不肯在《向导》上继续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不正是

秋白同志将全文用小册子的形式在武汉出版,广为发行的么!而且秋白同志亲笔写序言,称“彭湃是广东农民之王,毛泽东是湖南农民之王”。时毛泽东正抱病住武昌,亲眼见到了这本小册子。毛主席对此十分感激。

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秋白认为中央“对蒋存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的严重打击。”

张国焘《我的回忆》:在“四·一二”后的几天(陈先生尚未到达),由于瞿秋白的主动,约集罗易、维金斯基和我四人有过一次重要的会谈。谈话时,瞿秋白的愤怒的语气,表示中共中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武汉的同志们积极反蒋,中央却对蒋存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的严重打击,广东的同志们早已主张土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这些都是丧失了中央领导威信的重大危机。但这种危机是被人(他指的是维金斯基)掩盖了,莫斯科因而无法知道详情,也压抑了党内的自我批评。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蒋介石在上海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秋白沉痛地在一次晚饭后对我说:“我们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我们对不起上海工人阶级,我们对不起牺牲的同志,血的教训太沉痛了。”我问当时为什么不点蒋介石的名,他隐痛地说:“独秀同志有独秀同志的想法,当时北洋军阀元气虽丧实力尚厚,而且平汉、津浦两线大军压境,怕点了蒋介石的名,公开决裂,今后没有挽回余地。现在看来,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害了党的事业”。

14日 在联席会议上,鲍罗廷与罗易在是否北伐的问题上发生激烈的冲突时,秋白支持罗易的观点。

蒋介石叛变革命,全国形势由原来的南北对峙演变成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的对立。在此形势下,党的策略方针应如何制订,党内发生分歧:鲍罗廷主张立即北伐;罗易主张暂缓北伐,先在两湖一带开展土地革命,巩固武汉,而后扩大;谭平山和张国焘主张

南伐取广东；秋白主张先东征讨蒋，然后北伐。秋白的意见与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硕夫等6人于4月16日在上海致电中央，提出在军事上“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相一致。

鲍罗廷在14日会上说，如果会议作出反对北伐的决定，他就要马上辞去他在国民党中担任的职务，因为他不能执行这个决定，……罗易立即反驳说，鲍罗廷的声明是等于提出最后通牒，是采取“炮舰政策”，如同举着手枪对准“我们的脑袋来强迫我们”接受他的主张。……秋白发言支持罗易，认为鲍罗廷的声明是最后通牒，不能令人满意。他要求迫使鲍罗廷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他表示不赞成推迟决定是否举行二次北伐的问题。

争论的结果，罗易的主张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

16日 中共中央通过由秋白起草的《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决议》主要根据罗易的意见写成。

决议指出：“在目前情况下，立即北伐去占领京津等地不仅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而且有害于革命。采取北上扩大领域的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将早已在国民党统治下或革命已经部分完成的那些地区的革命基地加以巩固。”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上年（1927年）四月中，我从莫斯科回到武汉，首先撞着一个问题便是第二期北伐问题。新国际代表罗易同志一到武汉即与鲍罗廷同志政见冲突。鲍主张立即实行第二期北伐，土地革命待打到北京后再实行。罗易反对此主张，以为现在革命应深入，应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得革命之根据地。于是有所谓深入广东之争。……

最初参加讨论的是平山、秋白、国焘。平山、国焘主张南伐取广东，但偏重于军事财政方面；秋白主张先打南京，经由陇海路北伐。……后来决议由秋白起草，罗易仍不满意。老鲍亦采用了折衷的主张，不日国民党即迁都南京（即东征），但公布之翌日，南京失败的消息到来，于是仍然回到老鲍原来的主张，立即由京汉路出发北

伐。……

16日或17日 陈独秀由上海到达武汉,并出席正在召开的联席会议。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后来陈独秀到了,再开正式会议讨论:独秀、述之、太雷是完全赞成老鲍的;平山、国焘主张南伐;秋白仍是经过南京北伐;和森提出四个条件的北伐政纲。

18日 中共中央委员会改变主意,撤销了《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转而支持国民党左派关于立即出师北伐的决定。

20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民众宣言》,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罢免蒋介石职务,开除其党籍的决定。

22日至26日 出席中共中央全会,讨论确定“五大”的议事日程,中央委员会向大会的政治报告以及大会各委员会、秘书处的名单。秋白当选为政治委员会与农民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政治委员会的秘书。

杨之华《回忆秋白》:在五大开幕前夕,中央召开的预备会上就发生了争论。在讨论党的工作的总结时,对中山舰事件、上海工人起义、“四·一二”事变等重大事件中党的路线和策略的看法,双方的观点都截然不同:一方指出,在这些事件中,暴露了党的领导对资产阶级一味退让妥协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方则拒不承认,反而把中山舰事件归咎于革命力量的不足,“中山舰跑得太快”,指责上海工人不应该起义,等等,来为他们的错误辩护。……会议没有结果。秋白回到家里,心情很沉重,他预感到问题不易解决,决心坚持同机会主义作斗争。正如他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本小册子中所表示的:“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我将服从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27日至5月9日 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的第二天，在会上散发了他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的小册子，点名批判彭述之的机会主义，但大会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陈独秀的错误，没有解决问题。会上，陈独秀仍被选为党的总书记，秋白被选为中央委员。

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中对“五大”作如下评述：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积极意义，固然是在大会上议决关于中国革命根本的原则问题，革命前途，领导权及土地革命的意义。固然这些原则问题到此时若再不能解决是一步也不能前进的。可是事实上连这些原则也不过是形式上的接受罢了。对于蒋介石叛变后的新形势，并无明显的具体的决定。……第五次大会的空气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合作到底的万岁。”这是在严重的斗争之前夜的清闲态度，这当然是说一般同志浮面的态度。第五次大会之时，其实各个同志心内都有“不安”的预觉，那表面的清闲态度，不过是“无办法”的自欺的安慰。秋白又指出：最高政策是谁在执行？一是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他是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政府里的党团之实际领导者；一是国际代表罗易；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独秀、和森、维汉、秋白、国焘、平山、兆征、立三、恩来、……）。三个领导之中，鲍罗廷是有一定的路线——退却的路线，和缓土地革命；罗易也有一定的路线——务必同着小资产阶级进攻；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实际上是没有一定的路线，因为他已经不能指挥群众，又因为他动摇于鲍罗之间，而不能一致，但是实际上是倾向更右于鲍罗廷的占优势。

杨之华《回忆秋白》：代表们被这本小册子的醒目的题目吸引

住了,很有兴趣地翻看着。会上的气氛活跃起来,出现了笑声和议论声。恽代英同志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我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又说:“秋白的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揭开了系统地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序幕。在以后的会上,秋白和蔡和森、任弼时等同志发了言,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陈独秀仍然否认错误,而且以家长式的统治不准代表充分讨论这本小册子和有关的发言,致使这次路线斗争没有能够充分展开。

同月 与郭沫若来往甚密。

秋白于1935年5月28日汀州狱中致郭沫若的信中还提到两人在武汉相会的一段情景:“还记得在武汉我们两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当年的豪兴,现在想来不免哑然失笑,留得做温暖的回忆罢”。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郭沫若当时也在武汉,常到中宣部来找秋白,……听得秋白曾说过,他们俩一次游黄鹤楼,面对大江东去,大家都诵了苏东坡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句。说我们在这种形势下,大家在未被淘汰去的时候,还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成败且不去计较。秋白对郭沫若同志,一面说他是虽有些浪漫主义色彩,一面却十分敬佩他。常对我们说起他对蒋介石也敢于面撞的四川人性格。

五 月

4日 写《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一文,发表在5月8日出版的《向导》195期上,署名秋白。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特别是两湖和江西的农民运动仍在迅猛的发展。秋白更深刻地认识到领导农民土地

革命成了挽救时局并继续推动革命发展的中心问题。他在文章中指出：

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中国没有土地革命，便决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和剥削的根基。

10日 在五大闭幕后的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国共两党在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关系》的决议。

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谭平山、毛泽东、周以栗、瞿秋白、蔡以忱、任旭、罗绮园、阮啸仙、陆沉等9人组成中央农委。谭平山任部长，任旭为秘书。

17日 夏斗寅叛变，进攻武汉，在如何对付这一事变的策略上，中共中央内部意见不一。秋白认为中心问题是与国民党“左派关系的问题”。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和森与立三提议叶挺及中央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兜剿夏斗寅，若唐生智全部叛变，则由粤汉路取湖南为根据地，再进攻湖北与广东；同时发动一切工农群众起来做殊死战；同时提议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当时罗易与秋白同志以为现在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左派关系的问题，只有与左派关系美好，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现在急务便在建立此中心。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十八日那一天，在叶挺的部队已开赴前线，又胜负未定之时，武汉人心惶惶，国民党左派人物，躲进租界者有之，化装潜伏者有之，国民党宣传部长顾孟余甚至买好了英国轮船的船票，准备形势不利时就溜走。那天晚上，“大家都在等候前线的消息，但陈公博是借酒消愁，而秋白则沉着肃穆。秋白坚信叶挺出阵必胜，但也考虑到，如果相持的日子多了，武汉不能无军队拱卫，也考虑是否从河南前线抽调第四军回来。一直到天亮，胜利

的消息终于来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20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鲍罗廷住宅举行的会议，总结粉碎夏斗寅叛乱的经验。

同日 写《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一文，后作为附录二，收入《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署名美夫。

文章认为“威胁中国革命的主要危险”有三：一、外部的危险——国际帝国主义；二、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有获得领导权的可能危险；三是无产阶级对于革命领导权作用没有准备的危险。

文章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谁获得小资产阶级谁就胜利”。如果我们抓不住他们，则革命的发展将延迟下去。……”；“我们对于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现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谓领导权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队是在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外的，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在党内，存在孟塞维克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最近几年来把自己总是看作‘在野党’的趋向，不求参加革命政府的趋向，与资产阶级的妥协的倾向，以致逐渐消失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并且迟钝了它的斗争，这都不是偶然的現象。否认这些错误是不赦的罪过。……我们必须用俄国战胜孟塞维克的思想——列宁主义的思想，注射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以预防孟塞维克的毒素”。

21日 国民党长沙驻军第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解散湖南省工会、农会革命团体，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鲍罗廷与罗易发生激烈争论，秋白在会上作了发言。

鲍罗廷说：现在国民党的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同志太幼稚；我们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合作是中心的问题，与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的失败；国民党中央还是好的，离开或推翻他们不是

决裂便是政变。罗易则认为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已经不是左派而是土劣、地主、军阀的代表。我们应当号召左派起来推翻他们；推翻他们不是根本决裂与政变；我们现在应一直到工农民主独裁制。在和森发言之后，秋白接着说：“和森同志的批评是很可笑的，在他看来，仿佛罗易与老鲍之间，一个懂得“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原则，一个不懂得“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原则似的。其实老鲍与罗易在根本原则上并无不同，只是对于国民政府内资产阶级的成分是否完全排除的估量上有点不同，在罗易以及莫斯科的同志们以为中国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业已成功，国民政府内已经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的成分，所以土地革命可以尽量实行。老鲍则认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还未成功，因国民政府内还保留许多资产阶级成分，所以土地革命不能彻底实行。我（秋白自谓）也觉五次大会决议关于这一点没有指明，太把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说完全了一点，仿佛此联盟完全成功了，没有资产阶级成分在内了，这是一个缺点。

25日 任党报委员会书记。

26日 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汉口举行的泛太平洋劳动会议的闭幕会上发表演说，介绍了中国的革命形势。

同日 晨5时，写《五卅二周年纪念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发表在5月30日出版的《向导》196期上，署名秋白。

26、27日 出席连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马日事变”后湖南的政治局势及党的军事工作，决定致电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质问解散工会、农会事，并决定派瞿秋白、张国焘赴湖南了解情况。

会上，还讨论了“退出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力主“退出”，秋白认为“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

次,我说:“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了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

同月 茅盾因汉口《民国日报》“编辑事务”请示秋白,秋白曾主张把《民国日报》交给国民党,另办一张党报,堂堂正正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但因“时局迅速逆转”而未成。

同月 应向警予之邀,到汉口市委办的干部训练班作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报告。认为:中国革命就是民权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才能推翻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的统治,中国革命才能胜利。

六 月

1日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召开第8次扩大全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共产国际曾给中国共产党发出指示:要实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国民党中央,改组国民党;动员两万名共产党员与五万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的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举行会议,讨论国际指示和北伐军攻克郑州后的军事问题,以及追认常委会讨论通过的《两湖决议案》。关于国际指示,包括鲍罗廷、维经斯基在内,一致认为无法执行,决定回电莫斯科:“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关于攻克郑州后的

军事与《两湖决议案》问题：陈独秀、鲍罗廷、瞿秋白、李立三主张东征蒋介石；罗易、谭平山主张南伐广东李济深；蔡和森主张先解决两湖问题。会议最后通过了《两湖决议案》及《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农运策略》。《通告》一面指出现在农运的主要任务是以农民为领导建立乡村自治的革命的农民政权；但又说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应等到乡村自治政权建立之后才能实行。

同日 写《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自序》，署名瞿秋白。该书在同年7月由新青年社出版。

《自序》指出：该书是计划编写的俄国革命运动史的一部分，所以注意农民问题是因：俄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不能解决农民问题，推翻封建势力，并且不能完成自己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与农民问题的解决，始终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这的确对于中国现时的革命，有很重要的教训。

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瞿秋白增补为常委。

4日 自是日始，中央常委由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四人轮流值日，持续到六月下旬。

5日 晨5时，写《长沙政变与郑州开封的克服——革命之胜利与危机》，发表在同月8日出版的《向导》197期上，署名秋白。

6日、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陈独秀在会上发表拒绝执行国际五月指示的言论。

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瞿秋白出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团会议，并决定李立三加入党团。

10日 汪精卫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预谋反共。会后，唐生智部回师武汉。

中旬 冯玉祥攻下郑州后，高唱宁汉合作，共同北伐，反共态度日趋明显。在此形势下，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攻下郑州后的问题。主张东征讨蒋。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郑州下，摇动不堪的逆迹显著的假左派首领都赴郑州开会。此时中央政治局开了三次重要会议。一次是讨论郑州下后的北伐问题；此时，冯玉祥反共态度已较明，独秀同志已悟前次北伐政策之错误，他现在所忧虑的是冯玉祥所唱的“共同北伐”（号召武汉南京共同北伐），他知道共同北伐成功之日，便是共同解决共产党之日，所以此时独秀同志及老鲍都认“东征”是唯一出路。在此次讨论中，独秀、立三、秋白是主张东征的；罗易、平山则仍主张南伐取广东；和森则主张解决两湖问题。

13日 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了党的宣传工作，决定催瞿秋白速出版党的日报，并指定金树成等筹备创办“国民通讯社”。但在7月5日又决定日报与通讯社停办。

同日 晨3时，写《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危机》，发表在同月15日出版的《向导》198期上，署名秋白。文章分析了宁汉对立以来的形势及其斗争的实质。

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有关与国民党谈判问题，决议今后常委会讨论两党关系及谈判问题，谭平山、李立三应参加；决议还增加了参加两党谈判之中共代表：瞿秋白、陈独秀、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张太雷等。

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由罗易提出，经鲍罗廷、陈独秀修正的《国民革命纲领草案》：要求立即收复广东，支持冯玉祥北伐，消灭湖南反革命，增强国民党作为国民革命领导者的权威等。

18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联合举行的欢迎北伐凯旋将领宴会。

19日 冯玉祥与蒋介石、李宗仁等举行徐州会议，决定冯蒋共同讨伐奉系军阀，并敦促武汉政府反共，要求蒋汪合作。

中下旬 在冯玉祥、朱培德已经明显反共，张发奎、唐生智部

队撤回武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因鲍罗廷不满,再次讨论由罗易起草的《关于武汉工人总罢工与反对朱培德、冯玉祥、许克祥的宣传大纲》。会上,罗易表示:“现在既然一些职工运动的主要同志都不赞成罢工反抗国民政府,自然可以容纳大家的意见,修改原案”。秋白说:“我们进攻是应有准备的,全无准备,贸然进攻是无益的。”李立三提议将反抗的示威罢工改为欢迎北伐军凯旋的罢工。罗易不得不表示撤销自己的意见。在鲍罗廷的影响下,陈独秀干脆放弃了一切“进攻”的努力,转而采取了全力维护国共关系的办法。

22日 鉴于政治形势紧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议:在武昌、汉口等地设秘密办公处。

25日 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机关,蔡和森将23日由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张国焘四人决议的“提高反帝运动的通告”与“致上海区委的信”给秋白看。

28日 晨,在汉口鲍罗廷住宅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讨论三十五军何键部即将反共的应变措施。决议为消除何键制造反共的借口,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

晚 在武昌新机关,陈独秀与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开会。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提出批评党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的决议,陈独秀大怒。瞿秋白书面提议:土地革命暂以减租减息为条件;“中心问题,仍在贯彻对国民党左派让步政策,陈对秋白的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案,提交中央扩大会。

30日 中央在武昌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关系问题,会议通过陈独秀重申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国共两党关系的“十一条决议案”,企图以妥协退让拉住武汉国民党的急剧右转。

同日 中共中央常委又回汉口鲍罗廷处开会,决定将中央机关迁回汉口,会议还讨论了两党联席会议,决定每两周的联席会议一次由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三人参加;另一次由瞿秋白、张国焘

参加，陈独秀缺席。

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中，对武昌会议作了如下评述：

随着何键反共准备的传言一天天盛起来，于是有所谓东征问题。东征问题的本身，其实不是什么问题，而是如何骗那些“革命军人”先反蒋再反共不迟呵。这也算是“缓兵之计”。……可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因内部意见纷乱不堪，独秀、秋白、国焘、和森四人各起草一篇宣言，都不能通过。……于是有名的武昌会（七月一日）便开了。这会议是要议定东征政纲的，其实，政纲已在实行了！六月二十七日（？）中央开会，决定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政纲；当晚，便自动执行解散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谭平山已请病假了，湖北省政府的“共党分子”也早已退出了，中央秘书厅也在这几天内慌慌张张逃过武昌去。不问当时主张“迁都”武昌的主观如何，客观上的形势是避嫌与逃命。……这十一条政纲是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最后尝试，最后的拉拢，一面逃与避，一面拉与拢。武汉会议开会决定了一个议决案，一个政纲。这两件东西是十分符合的。议决案上说：我们要领导左派，要批评左派，要单独进攻反动派，要准备着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始终离开时，我们能号召群众（以及国民党群众）与地方，反对现在的中央与政府（其中引用国际第八次执委决议之一节）。政纲上却说，革命的领袖地位是国民党的，群众不得批评，不得自由行动。中央的不一致，在这会上表现得很明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要求发表其土地革命的主张，而被禁止，他们对决议勉强可以接受，对政纲是反对的，结果，冲突而散会。这会一开始便亦是从冲突起的。代英同志说：“现在中央很奇怪，我听说秋白同志到处报告是‘进攻’、‘进攻’；中央又是决定要‘退让’、‘退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和森在武昌布置机关妥当后，翌日黄昏独秀、国焘过来，不久

秋白亦偕一驼背毛子来。是夜开会于武昌之新机关：(1)国焘提议整军经武，注意军事工作；(2)共青团中央来一决议，批评党的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独秀大发雷霆，碎之于地；(3)秋白有甚长之书面提议，大约系说明湖南农民问题所促进之阶级分化的革命危机，主张土地革命暂以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保护佃农等为条件，待有武力再实行没收土地，中心问题，仍在贯彻对国民党左派让步政策；(4)驼背毛子出一答复国际之电稿，内有“凡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中央之指导权”之语句。

国焘之提议未经注意讨论，独秀看完秋白书面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决议案，于七月一日召集一活动分子会，或中央扩大会。

翌日仍回汉口开会于鲍宅，是日才知道，这两日中因解散纠察队和中央秘书厅未迅速发迁移通告问题，同志间精神大形混乱，有几位同志激烈反对中央移于武昌，理由是：“我们是领导左派的，左派首领尚在汉口支持革命的局面向前进行，而我们反离开他们藏到武昌去，成甚么话……”。独秀也以为必须仍回汉口，才便与汪等接头，于是又决定中央机关仍回汉口，同时正式决定七月一日开中央扩大会议。

七 月

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反动到来时如何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毛泽东主张上山，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讨论湖南局势时，会议仍然坚持联唐（生智）反蒋的政策。

8日 在《向导》200期上发表《革命失败之责任问题》，署名秋白。文章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但仍认为“革命统一战线之巩固是万分必要的”。

12日 根据国际执委会于6月中下旬发出训令中共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调回鲍罗廷等指示精神,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为成员的中央政治局兼常委。会上,鲍罗廷建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与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后又函临时中央,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自此陈独秀即不视事”。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大约国际责斥机会主义、调回老鲍及改组中央之训令已来了许久,老鲍秘不发表。……老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为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才有人说出,原先我们莫明其妙。

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除了提到上述情况外,说到:“国内组织一个五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成员有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和我。在五人常委中为什么没有瞿秋白,我至今搞不清楚”。

13日 与鲍罗廷去江西庐山。进一步商讨有关中国共产党转变政策、发动农民暴动等一系列问题。

同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并宣布:“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15日 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分共”决定,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共产党遭到残酷镇压,被迫转入地下。不久,宁汉合流,大革命宣告失败。

中旬 在武汉国民党政府实行分共清党后,中共中央确定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订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同时决定以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为基本力量,联合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

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

中旬 中央常委会决定,在“东征讨蒋”口号下,集合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叶挺部与朱德原领导的军官教导团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指定以聂荣臻为书记的前敌军委,先去九江做准备。

20日 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谈话会,鉴于张发奎态度日见右倾,认为“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

20日 李立三、邓中夏赶赴庐山,当晚,在庐山举行会议。“由立三将九江会议、决定南昌暴动的事向秋白和鲍罗廷汇报”,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

邓鹤鸣^①回忆:

二十日左右,九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参加者有苏兆征、彭湃、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由邓鹤鸣负责筹备膳宿等,有同志说这次会议是秋白为了进一步听取在浔部分领导人意见而举行的。

21日 与鲍罗廷由庐山返回汉口,传达有关决议。

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当时秋白把南昌暴动的决定由浔带到汉口,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

张国焘《我的回忆》:

七月二十一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立即提出了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在汉口租界的那所寓所内,他告诉我鲍罗廷可以经过冯玉祥的西北区回到莫斯科去,共产国际派了一位新的代表罗明那兹,一两天内就要到达。……

^① 原江西省委书记。

接着瞿秋白又表示他这几天在庐山与鲍罗廷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斯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而出负担起这个责任,……

23日 共产国际派来接替鲍罗廷的代表罗明那兹和他的助手德国人纽曼来到武汉,当晚与秋白、张国焘进行工作会谈。

张国焘《我的回忆》:

七月二十三日,罗明那兹来到了汉口。当晚他和我及秋白晤谈,……罗明那兹首先表示他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奉命来纠正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种种错误,并指导中共工作。……宣称,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现在共产国际决定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不能再任书记,甚至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你们两人如摆脱机会主义,仍可参加领导工作。现在如不首先反对机会主义,别的事情是谈不上的。

我问他中共中央究竟犯了哪些错误,他大致是这样回答的:中共中央主要是放弃了在中国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这种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盘踞,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很久以来都是机会主义的加以曲解。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的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负中共的领导工作,并使他们在中共中央占多数。……

谈话结束后,瞿秋白也颇感失望。他曾向我表示,共产国际为什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人来当代表,只会反机会主义,提起南昌起义就没有主意了。……

罗明那兹与瞿秋白单独长谈之后，他似对中共情形有了一些了解。……第二天我们会晤，但态度已较客气了。他重提要绝对拥护共产国际，立即召集会议，改组中央，其口吻已不似昨天那种“宣读上谕”的神情。

24日 中共中央发出《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

26日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在汉口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瞿秋白、李维汉、张国焘、张太雷等。罗明那兹、加仑、范克也出席了会议。在讨论南昌暴动问题时，罗明那兹传达了国际指示：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可把队伍中的共产党员撤往农村，俄国顾问可不参加暴动。加仑发言表示：如张发奎同意回师广东，不强迫共产党人退出其部队，可不必举行暴动。会议讨论了国际指示，认为，“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经秋白和李维汉的推荐，常委会决定派张国焘当晚去南昌传达国际指示和中共中央决定，由秋白、太雷、李维汉同罗明那兹一起筹备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

罗明那兹是七月下旬到达武汉的。当时，五人常委开了一次会，罗明那兹在会上传达了国际的指示，作了批判陈独秀的报告。那时，五人常委代行中央职权。在五人常委掌权期间，主要决定了三件大事：

第一是同意举行南昌起义。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旋因军事形势变化，敌情紧急，李立三同志等一致向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征得当时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同志的同意。政治局常委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派周恩来同志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委员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遂于八月一日胜利

地举行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

第二是决定发动秋收起义。这是五人常委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至七月下旬这段时间里决定的。……

第三是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

27日 鲍罗廷离开武汉，经内蒙返莫斯科。

29日 中共中央发布《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

同月 所著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运动》一书，由汉口长江书店发行，但遭汪精卫、唐生智等封闭，未能传播。至十二月再版发行。《布尔什维克》第9期有介绍。

八 月

1日 凌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2万余名官兵，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秋白在《中国革命和共产党》一书中评述南昌起义道：

“叶贺南昌暴动，在历史上的意义是伟大的，因为他是代表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群众，共同反对陆续背叛国民革命宁汉中央之最后斗争，因为这是真正的奋斗”。

周恩来《批林整风会议上的讲话》（1972年6月10日）：在‘八一’起义以前，我曾和瞿秋白等酝酿起义的问题，瞿秋白、张太雷要我酝酿起义去做动员和组织工作。

3日 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时局和对策，以及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会上，张太雷、李维汉报告了与国际代表谈话的结果；会议确定发动农民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秋白在发言中指出：共产国际的决定是中国革命新的转机，我们应该接受并据以制定新的策略。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根本的错误是由于缺乏坚定的政策”。在听取张浩汇报南昌暴

动情况后,秋白说,对于农民运动,已有决定。湖南农民应夺取政权,再加上武装力量,一定能够成功。会议还讨论了改组中央问题。对于共产国际要陈独秀赴莫述职一事,会议决定,在等候共产国际对于陈独秀请假不赴莫的复电同时,还是劝他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赴莫。会议还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

同日 主持中共中央常委会,通过《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大纲》认为,党的政策应实行抗租抗税的“秋收暴动”,“湘粤有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可能前途”。在土地问题上,《大纲》提出:“对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之大地主一律抗租不交,对五十亩以下之地主实行减租”。《大纲》指出:“秋收暴动的战略应以农会为中心,团结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实行暴动,夺取乡村(可能时包括县)政权。实行抗税、抗捐、分配土地、策应南昌起义”。

4日 中共中央在复山西省委信中说明举行紧急会议的必要:

我党因为指导的错误,没有能依照国际指示,实行在两湖没收大地主土地,举行盛大之农民暴动,反而处处让步,迁就那时所谓左派汪、谭(系指汪精卫、谭延闿—编者注),于是一败涂地。现在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以前的错误,决定即日召开紧急会议,改正以前的错误,另定新的政策。

同日 在给广东省委信中告知紧急会议的议事日程:“一、接受国际的最近训令;二、通告同志书(批评过去的错误);三、农民决议;四、工运决议;五、组织决议;六、新的指导机关”。信中还决定“成立以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宜”。

5日 中共中央致湖南省委信中指出:南昌起义的主要目的就是发动土地革命,给与湘粤赣鄂四省的秋收暴动以有力援助,把南昌起义与秋收暴动汇合起来,以利于土地革命的进行。

上旬 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商量起草《告全党党员书》及

决议案。

7日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会议由秋白和李维汉主持。

会议第一项议程由罗明那兹报告，瞿秋白翻译。在讨论罗明那兹报告时，秋白对《告党员书》草案提出几点补充意见：“（1）在国民革命和阶级斗争中，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党只看到其上层领袖，而没有看见群众，以后仍然要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但不能采取过去的态度；（2）我们党团太无作用；（3）应明确我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并反对第三党的主张；（4）要造成工农民权独裁制，以真正国民党的旗帜为号召，等等。”

讨论总结后，代表们原则上一致通过了《告党员书》，并决定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组织委员会进行文字修改。

第二项议程是由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新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已与我们分裂了。我们不能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现已全国反动，现在主要的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报告认为：“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燃着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因此：（1）在此时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戴了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汪便是此派的代表。所以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敌人是汪。……这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策略；（2）我们要纠正过去的错误，要注意群众，要由下而上，谁赞成我们，就是左派；（3）现在的目的，并不是与政府绝缘，……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政府仍用国民党的名义，但我们要占多数，成为工农民权独裁政权，乡

村中要农会政权。

报告后,秋白一一宣读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党的组织议决案》,经逐一讨论,获会议一致通过。

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当选政治局委员9人: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8日 发出《中央给前委——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

信中要求“湘鄂粤赣四省的秋收起义应当立即进行,以响应南昌暴动,牵制破坏南昌之敌。”

9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

会议选出了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在政治局讨论分工时,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会议还讨论了主要地方的党组织人选,决定派王荷波、蔡和森去北方局;张太雷去广东,同时委派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湖南省委的新领导名单由毛泽东、彭公达负责与原湖南省委协商后报中央。

后来,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道: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年初就发表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然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

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适，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

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

为什么大家都推选瞿秋白同志负责？我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秋白在当时是比较适当的人选。建党初期秋白即在中央担任宣传和理论方面的负责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有贡献。在陈独秀推行投降主义时，他曾进行抵制。他在党的“五大”时，发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由于瞿秋白同志的理论水平比较高，无论是反对戴季陶主义，还是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他的旗帜都比较鲜明。所以陈独秀的总书记职被撤销以后，大家很自然地就推选了他。

10日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南方局，任命张国焘为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南方局成员和南方局军事委员会主任。

11日 发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的情况通报》，并在《中央通讯》第一期上刊载《告全党党员书》及《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的议决案》和《最近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有关文件。

《告全党同志书》批评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要求全党党员都来参加这种批评。《告全党同志书》指出，“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的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同日 发出《给山东省委及山西、满洲临时委员会的信》：

决定组织北方局，以王荷波为书记。管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以及内蒙各党部。

12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一号》，阐明“八七”会议的

重大意义,并要求组织党员讨论。

14日 中共中央致信河南省委,要求河南省委领导工农群众及广大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提出了15条斗争口号。

同日 为揭露蒋汪合流,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宁汉妥协告民众书》。

19日 发出《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号》;

《通告》强调“改正党的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和建立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从组织上保证八七会议决定的政治路线的实现。在以秋白为首的中央开始了恢复、整顿、重建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和工作机关;组织了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党中央决定暂留武汉,指导两湖秋收暴动。

此时,秋白夫妇住在汉口原英租界新造的一座三楼的公寓里。同住的还有郑超麟、潘家辰(潘系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又是中央与国际代表之间的交通员)。

21日 为了在妇女、学生战线贯彻八七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通过《中央通告第五号——最近妇女运动的议决案》与《中共中央通告第六号——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

22日 发出《中共中央致南方局转广东省委信》。信中要求南昌起义部队“迅速到达目的地占领东江”,“如能早拿下东江两个星期,则反客为主可以进击敌军,夺取广州”,并表示中央准备加紧督促两湖暴动的实现以声援之。

23日 中央复信湖南省委,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一、对集中力量在中央调二个团的军事力量配合下夺取长沙的主张认为是“军事冒险”,主张依靠农民的军事力量来解决,以长沙湘南为发动点。二、否定他们提出的“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应当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的主张,认为“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三、在土地问题上否定他们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认为这时的口号应

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

25日 发出《中央通告第八号——关于职工运动》。

同日 致安徽临委的信，批评临委报告中提出的农村政策，认为“以贫农和佃农自耕农为对象，同时团结中农、小商人、手工业者，结成农村革命同盟”以及“尽力鼓吹乡村自治，把农村整个的政权从土豪劣绅手中夺回”的提法，是“党的旧政策，是错误的”。而“应以雇农、佃农及失业农民为中心”，因为“富农小商人等，一到实行土地革命时必然动摇，甚至反水”。“至于自耕农也只能希望他们中立”，但又说“我们现在并不抛弃自耕农、中农、小商人，还要联络他们”。在土地问题上，虽主张“没收大地主土地”，而不提“没收小地主土地”，但又说：“目前我们在农村中普遍口号应为耕者有其田，即谁耕田即给予谁，不耕则没收其土地”。

同月 发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议决案》。

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农民来实行”。“中国革命的这种特性以及无产阶级独裁胜利之存在就是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之客观的保证”。在武装暴动问题上，从中国实际出发，认为“不能预定一个时期举行全国的暴动”，以推翻中央政府。而应“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为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之武装暴动”，其暴动日期亦“只能看当地情形及一般情形去决定”。《决议》还强调“创造新的革命军队”的必要，它“不要有雇佣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

但《决议》又认为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中国民主革命“直接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

同月 发出《给湖南省委信》，并附由毛泽东草拟经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的湖南工作计划。

同月 造访陈独秀，告知八七会议情况，并劝说陈去莫斯科，为其所拒。

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八七会议后，秋白和我到他（指陈独秀——编者）那里，把“八七”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国际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但他坚持不去，并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

同月 打算出版《向导》单张，因印刷机已拆运去上海，未成。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在上船离汉口前，仲翁（陈独秀）还布置了一件事：把长江印刷厂两部对开架印刷机拆运到上海。
.....

印刷机已经拆掉时，忽一日，接到瞿秋白同志给我一张条子，要我一去。我到时，他对我说：“《向导》已经出不成了，现在打算出一个单张。”我只好告诉他：“印刷机已经拆走，我的事已经交给泽民兄。印单张，我已经办不到了。……”后来他也离开武汉了，这件事，大概只有搁下了。

九 月

5日 给湖南省委信，要省委“立即坚决的遵照中央计划实行，把暴动的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

9日 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指示，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同日 《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指出：在土地问题上，“一开始即提出抗租的口号，由抗租而进到没收地主土地”。

12日 在《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指出：党在目前“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创成一种独立的暴动局面以发展暴动”。

13日 致信鄂特委，批评特委违背中央关于“秋收暴动是要农民群众来干，农民是主力，军事只是一种辅力，一种帮助秋收暴

动的力量”的指示精神。要鄂特委不失时机,严格执行两湖暴动计划。

15日 在给共产国际的政治报告中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高涨的,工农是要求暴动的”。认为实行两湖暴动计划,“集合湖南各地的农民力量合取长沙,拿得湖南的政权。这个计划并不是空想的”。此外,提到“党内知识分子,在目前整个革命潮流中或者完全消极,或者公开叛变”。为此,“我们只有坚决的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下决心重新造党”。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中概括了“八七”会议一个多月来的中央主要工作是暴动。对今后工作提出:一是暴动,主要是引导工农群众暴动;二是注意秘密工作;三、坚决的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下决心重新造党。四、除在中央负责的“革命职业家”外,都应有自己职业,不受党的供养。《报告》强调“严厉执行党的纪律,才能挽救党的危机”。

19日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对省委两次停止在长沙暴动以及毛泽东在秋收失利后改变计划提出批评。认为这种行动是“临阵脱逃”,坚持要省委“一面命令萍、浏、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暴动。”

同日 在《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提出,国民党的旗帜在群众中已成了“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因此决定取消原决议中关于在左派国民党旗帜下举行暴动的打算,认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

23日 写信给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批评他们制订的暴动后各县市工作计划:一、计划提出保留一部分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的政策是错误的,必须对小地主土地亦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二、对“小商人有选举权”,且规定县级革命政府选举的代表中,“小商

人要占百分之二十”是错误的“因为随着土地革命深入,他们必然走到反革命的方面”。三、对于“不没收工厂、作坊”,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对于反革命的工厂作坊一定要没收”。总之,“我们对于社会各阶级的态度,要以不妨碍革命的发展及工农的利益为原则,不可事先作法以自限”。

24日 就河南省委9月4日来信作答复。对河南省委提出:“在乡村中可保持贫苦农民与中农、富农、中小地主的联合战线”,在斗争中“须兼顾小地主的利益,而不十分妨害中地主,使他们在—个共同要求之下形成—条民主的反封建统治的联合战线”,“要联络正绅”等意见提出批评,认为现在地主无大小,绅士无正劣都是我们的敌人,乡村联合战线只是农民与小手工业者、革命知识分子(小学教员之类)的联合战线,必须排除小地主及绅士。

下旬 随中央机关乘船离开武汉到达上海。离开武汉前,与李维汉一起在罗亦农家中开会,讨论湖北秋收起义的问题。

郑超麟《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九月下旬,中央从汉口迁往上海,杨之华后走,我陪瞿秋白乘船,二人住在一间官舱,秋白出舱门,我则常常在门外警戒。船上大概另有警戒的人,因为我们住进孟渊旅馆之后不久,中央交通处王警东(即王凯,解放初期作国务院机要交通局局长),便来旅馆接秋白去了,我仍在旅馆。

上旬 和李维汉一起去拜访陈独秀,向他索回黄文容来做郑超麟编辑《布尔什维克》的助手,并再次劝陈“去共产国际,陈仍坚持不去”。

同月 《中共中央致南方局暨广东省委信》:主张在潮汕失败后仍应“极广泛的尽可能的发动农民暴动”,“在乡间成立农民协会政府”,“占领县城即成立工农贫民代表会议,无情的歼灭豪绅,没收土地,一直到均分田地,以耕者有其田为主要口号,绝对不交租”。“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即使叶贺完全败(如报载回闽消

息),也须积极执行。”

十 月

1日 决定成立长江局,代行中央职权,管辖湖北、湖南、河南、四川、江西、安徽、陕西七省。

2日 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告两广闽南工农兵书》。

10日 就辛亥革命纪念,发表《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

12日 发出《中央致广东省委函——关于叶贺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提出“广州暴动计划应即停止”,但强调“以农民为暴动主力,坚决的领导他们继续不断的暴动,夺取县政权,杀土豪劣绅、政府官吏,抗租抗税,分配土地,一直到推翻整个的反动统治,夺取全省政权”。

15日 给福建省委信。指出福建的工作方针:“直接由我们的党组织宣传工农暴动,没收土地,推翻反动统治,建设工农贫民的民权政权。而在闽西各县依目前主客观的条件,应即开始暴动起来。”“在暴动中应毫不顾惜的没收地主土地,杀土豪劣绅,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派”,“尽量施行红色恐怖”。

19日 中共中央给江苏省委一指示信。明确指出:党对小地主的政策已经改变,即同样实行没收土地政策。

同日 发出《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指出中央决定在11月12日于上海召集紧急会议。不久,又发出《中央关于召开紧急会议的更正》,决定将会议提前到11月8日举行。

20日 写《反对南京武汉的军阀斗争》一文,发表于同月24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一期上。

22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决议,决定出版综合性的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

飞、郑超麟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任主任。

《布尔什维克》为周刊，秋白每周来编辑部一次，代表中央常委主持召开党报编辑委员会，指导工作。在筹备时期，秋白还以编委主任的身份，邀请陈独秀写文章，使陈从第1期至第19期，以撒翁名义共写“寸铁”151则。

同日 发出《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一号》，具体规定了《布尔什维克》的性质与宣传任务、编辑方针及所设栏目等。

23日 发表《中国共产党反对军阀战争宣言》。致信南方局并广东省委，通知周恩来务于7日以前赶到上海出席中央会议。

24日 《布尔什维克》在上海创刊。

秋白在《布尔什维克发刊露布》中宣告：国民革命因为国民党领袖的背叛革命而受着非常严重的打击，国民党，中国最早的革命政党已经因此而灭亡了。……

此后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起领导的责任。革命思想方面，……只有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无产阶级坚决的向国内外资产阶级实行阶级斗争，勇猛的领导农民及一般贫民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封建的剥削，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群众的革命独裁，铲除一切反动分子，下层民众直接起来行使民权，实行苏维埃的政治制度。只有本着这种精神，……才能彻底的完成中国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亦就是真正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秋白在创刊号上，还发表了《反对南京武汉的军阀斗争》、《民众的革命战争反对所谓北伐》、《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道路》等三篇论文。署名秋白。

同日 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

26日 写《军阀混战中的中国与工人阶级》，发表在10月31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2期上。署名秋白。

28日 就北方局十月六日的暴动计划作复信,指出暴动口号应是“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暴动“应该用自己的红旗,国民党的名义应即取消”。暴动后的政权不是人民代表会议,在乡村是“一切政权交农会”,在城市“一切政权交工农兵和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

同日 致山东省委信,要山东省委应即在全省各地发动土地革命。

29日 写《青天白日白色恐怖的旗帜!》,发表在11月7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3期上。署名秋白。

同日 《中共中央致两湖信》,认为两湖秋收起义虽受挫,但农民革命情绪未低落,武装未完全消失,宁汉战争的爆发有可能发动工农群众进行第二次暴动并夺取政权的可能,要省委讨论实现这一可能。

30日 发出《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总结了南昌起义与两湖秋收暴动失败的总结。《报告》认为“从四月到十月,全中国差不多都在农民暴动的过程中”,党的政策是“以工农贫民兵士群众为主力,领导他们起来,武装暴动”。认为除此之外,依靠组织好的武力(包括正规武装),都是不信任群众的机会主义遗毒。亦是南昌起义、两湖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

同月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转移到上海,李维汉代表中央与他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并向秋白作了汇报。秋白听后,要贺龙回湘西去再干一番。在中央派人掩护下,贺龙回到桑植,又干起来了。其余辗转来上海的同志都得到了妥善安排。

十一月

1日 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秋白在会上发言,认为“中国革命潮流是

高涨的”，“党组织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定要坚决地提拔工人分子，党不但要换灵魂，而且要换躯壳，凡旧的同志稍微不好的即请他自己去找职业。”

会议决定由罗明那兹起草《中国现状与共产党任务决议案》，瞿秋白起草《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

2日 写《中国社会的大破裂》一文，发表在同月7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3期上，署名秋白。

6日 中央指示陕西省委“应马上注意到尽可能地发动农民暴动”。

7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3期上发表社论：《十月革命万岁》，未署名。

9日至10日 主持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以瞿秋白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支配地位。

会上，由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作政治报告。

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政治纪律决议案》、《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职工运动决议案》等。会议虽强调了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党内悲观情绪的批判；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坚持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主张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正确的主张。但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党内的“左”倾错误，形成了盲动主义。

一、强调了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不断革命），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又主张整个地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

二、否认革命形势已处低潮，认为现时革命“无疑的是在高

涨”，“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主张实行盲目的进攻，把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视作“机会主义”，并据此制订一系列“左”的政策。

三、在组织上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农化，并采取过份追究个人责任的惩办政策。如对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斥之谓实行“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全体人员以警告处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被说成“违背中央策略”，不仅给湖南省委全体人员以纪律处分，而且解除了毛泽东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会议增补了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

扩大会后，中央又与张太雷一起讨论了广州暴动问题，决定了广东总暴动计划。

14日 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而设局。会议还通过了举行两湖暴动的计划。

同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4期上发表《江南农民大暴动之开始》的社论，未署名。

15日 发出《致两湖省委信》。认为两湖“在极短的时期内有造成两湖工农大暴动夺取政权之可能”。命令他们“更积极的发动两湖的革命，创造部分的暴动，汇合成为总的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暴动。”在政策上又主张采用“红色恐怖”。

16日 写《最近资本家的进攻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中国的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两文，发表在本月21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5期上。署名秋白。

在《中国的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中说，中国革命性质“是无间断性的革命，要说中国革命已经是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固然不对，要说中国革命仅仅是民权主义的革命，…更是不对”。

17日 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命令广东省委坚决地发动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

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规定总暴动的中心和重点是夺取广州。会议还决议由张太雷、恽代英、张善鸣、黄平、陈郁、黄谦、周文雍组成中共广东省委常委。讨论北方工作时,决议取消。中共北方局,派蔡和森为北方五省特派员兼顺直省委书记。

×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提出全国军阀混战局面下的党的暴动政策,认为“农村之中比城市之中有更多些客观上的可能”。

18日 发出《中央通告第十六号》,提出“党的总政策是:(一)发动农民潜伏待发的暴动,组织农民自发的暴动,努力使农民自发的暴动有最大限度的组织性;(二)发动广大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店员之日常经济斗争,引导这种斗争使发展而成广大的城市劳动民众的革命高潮,一直到武装暴动;(三)联合工农暴动的力量,汇合各处自发的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

20日 中央派张太雷回广州,组织起义工作。

21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5期上发表社论《国贼党徒与工农民主——唐生智下野和汪蒋合作》。未署名。

28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6期“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刊”上,发表《布尔什维克主义万岁》的社论。

同月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提出全国军阀混战局面下的党的暴动政策,认为“农村之中比城市之中有更多些客观上的可能”。

30日 写《反对南京政府的工会条例》、《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策略》三文,发表在12月5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7期上。署名秋白。

同月 中央制订《中央工作计划》,提出“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主要任务为严格的执行最近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使扩大会议决议的精神深入于干部党员群众之中,坚决的改造各级党部,洗刷一切

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党的成份,使党的核心建筑在工农的身上,如此才能使党成为一个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的党。同时要特别注意恢复和发展各重要的工农运动,以及组织并发动各重要省份的农民暴动,创造新的军事工作的基础。”中央决定派人巡视两湖、江浙的工作,布署这几个省的工农暴动的局面。

同月 蒋光赤(后改名蒋光慈)的小说集《短裤党》,于本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印行。秋白与蒋光赤的交往较多,蒋在创作《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等小说时,都曾与秋白商讨,脱稿后,又请秋白为其审阅。秋白为蒋光赤所写反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小说,取名《短裤党》,并提供宝贵的素材。《短裤党》三字是从法国大革命史上“借用”来的,它的真正含义是共产党。《短裤党》描写了我党领导人与先进的工人阶级形象,小说中的杨直夫和秋华夫妇,就是秋白与杨之华。秋白曾说:“暴民专政正是短裤党那篇小说的理想。”

十二月

1日 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对各级党组织的机关在组织上和成份上的改造,作了具体规定。

2日 为《布尔什维克》读者志益于11月26日的来信作复。来信中对党内的民主问题提出批评,秋白对此作了阐述。来信与秋白的复信均刊在同月12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8期上。

3日 写《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一文,发表在12月12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8期上。署名秋白。

4日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浙江省委议决的《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时,已开始对“左”倾盲动主义有所觉察,故未予核准。在18日致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说:“你们上次的暴动计划因为太不切实,故中央未予核准”。认为浙江“各县农暴

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要浙江省委重视党和工会及农民间组织的迅速恢复或建立,只有先开展群众性的斗争,然后才能发展暴动。

5日 发出《中央致广东省委信》,同意省委转来的张太雷关于广州暴动的报告,指示要注意广州市郊工农群众的发动,要召开工代会,使它成为暴动的发动机关。

同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7期上,发表社论《广东工农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未署名。

6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在党团关系上出现的错误观念。如上海党部为了怕被共青团说成机会主义,而在军事上采取冒险行动。为纠正党团关系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中央关于党团关系通告第十九号》。

7日 就江苏省委提出的全省暴动定于明年元旦前后,江北江南一齐动的计划致信江苏省委,指出:“冒昧地定了一个全省或无锡等地暴动的日子,于发展农暴有碍”,“定期暴动的条件是应该在统治阶级趋向崩溃、群众斗争加紧时的必要根据上”。

9日 中共中央常委复陈独秀函,阐述了对革命形势的估计与暴动问题。陈独秀于11月11日、12日两次致信中央,反对“武装暴动的工农革命”,主张用“不缴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的“四不”口号代替“以暴动取得政权”。

复信认为:“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针”。“农民群众在现在的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的与政治的。所以以“四不”口号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接下去立刻就是政权问题”。“只准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同时认为:“现在可以说工农的任务是发动一切武装暴动,组织群众暴动,汇合联络各方面的暴动,其目的便在夺权”。

同日 写《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连续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11期、12期与14期上。署名秋白。

10日 中央发出《中央通告二十号》。提出改造党的具体办法。

11日 张太雷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在广州举行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广州公社。因寡不敌众,在起义的第三天失败。

12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8期上,发表社论《反革命的国民党政纲和混战》。未署名。

13日 举行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广东问题,至15日结束。会议决定派李立三去广州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事宜。

14日 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广东工农兵暴动建立苏维埃告民众书》,刊《布尔什维克》第9期。

同日 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广州暴动告工人书》。

同日 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广州暴动告农民书》。

同日 发出《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三号——广州暴动形势下党的任务》。《通告》认为,广州暴动是全国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一个信号。《通告》要求广州暴动迅速扩展胜利;要求两湖党团全体动员,实现总暴动;要全国各地党团员根据中央宣言,实行广东暴动的宣传周,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工农斗争。

同日 写社论《伟大的广州工农兵暴动!》发表在同月15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9期上。

同日 写《武装暴动问题》一文,发表在12月14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10期上,署名秋白。文章首先论述了“农民的游击战争之前途问题”,不仅指出农村暴动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游击战争的必要性,而且指出了进行游击战争的可能性。文章还论述

了城市工人暴动问题。强调“城市工人暴动”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城市自然要成为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

15日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致信。表扬了海陆丰，说他们“做了很好的成绩”，农民差不多全部动员了，苏维埃政权已经正式成立了；批评湖南省委没有趁军阀混战之机发动暴动。

16日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江西问题。

17日 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广州暴动再告全国民众书》。

18日 写社论《广州工农兵暴动的信号》发表于同月19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10期上。未署名。

同日 获知广州起义失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中央深信，只要我们党努力领导已经暴发的农民革命的高潮，领导他们不断的发动，全省的暴动局面是必然成就的”，“深信这次广州暴动是广东总暴动的开始，是全国各地工农暴动的信号”。

21日 致信朱德，指示25师今后的行动方针，要求朱德与附近的毛泽东率领的农民武装联络，创造暴动局面，建立苏维埃。

22日 发出《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四号——关于反对对俄绝交及国民党屠杀压迫的宣传示威》。

24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取消原定的唐生智在宁汉战争中败退时，湖北省立即举行暴动事。中央在听取双方意见后确认：在唐生智溃退时，由于革命的主观力量薄弱，武汉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罗亦农在政治指导上不存在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同日 发表《中国共产党反对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对俄绝交宣言》。

25日 写社论《苏维埃政权万岁！》刊于26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11期。

27日 从广东省委信中获悉朱德部队可能随范石生部到韶关，为此，发出《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全体同志的信》。要他们“坚决

脱离范石生,联络北江的农民军及广州暴动后退往北江的队伍,参加北江区域的农民暴动,扩大和深入北江的土地革命,做成北江农暴的主要副力”。并要他们“直接受广东省委和北江特委(大约在韶关)的指导”。

29日 写社论《只有工农兵政府能解放中国》,发表在1928年1月2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12期上。未署名。

29日、30日 中共中央致信硕夫(尹宽)和福建临委。信中指出:“凡是斗争就认为是暴动的观念要纠正过来”。“暴动这一个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形式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至若城市工人带有武装性的斗争,或是乡村农民非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都不得谓之暴动”。并强调“城市的暴动必须与乡村的暴动相衔接”。

31日 发出《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对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作了规定。

下旬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就陈独秀于12月13日致中央的关于广州起义的信作复。复信指出:广州起义“原定的计划是大规模的发动农民群众的暴动,解决其经济问题——尤其是土地问题”;提早在市内暴动是敌人逼出来的。

同月 秋白在1921至1922年旅俄时写的《俄国文学史》,作为他编著的《俄罗斯文学》一书的下卷,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于本月出版。蒋光慈在“书前”写着:“关于本书的下卷,我要深深感谢我的朋友屈维它(秋白的笔名——编者),因为这是他的原稿,得着他的同意,经我删改而成的”。

冬 在武汉时期,由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杨村人等议论成立党的文学组织,出版《太阳》文学刊物的活动,因“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而未实现。在党中央迁回上海后,光慈等着手实现武汉未完成的计划,成立太阳社。秋白曾参加太阳社的活动。阿英回忆:“秋白同意参加太阳社是光慈去动员的,据光慈说,征得了组

织允可。太阳社成立春野书店,出版《太阳月刊》是经秋白同意的。当时秋白是总书记,不便常出来,太阳社成立会和一般活动他都不来,光慈常有机会去找他,有时我也一同去,杨之华有时也捎来过秋白的意见”。当太阳社与创造社发生争论,以及两个组织攻击鲁迅先生时,秋白因即将赴苏而无暇直接处理,特派郑超麟以党报主编名义去帮助调解。

一九二八年 30 岁

一 月

1 日 与周恩来、罗亦农、王若飞、李富春、任弼时一起同陈独秀谈话，交换对中国革命的意见。

2 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 11 期发表《悼太雷同志》，署名秋白。同时发表的还有《只有工农兵政府能解放中国》。

同日 中共中央就河南省委《目前政治状况及工作方针决议》提出意见，认为应取消“没收大商店归店员管理”的口号，同意“没收一切土地分配给贫民和士兵耕种”的口号。

同日 中共中央在致陕西省委的指示信中提出兵暴时机成熟的条件，强调如果条件不成熟，宁可迟缓一点动作，竭力使这些条件中的主观成分达到成熟境地。

3 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秋白起草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议决案，发表在 1 月 9 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 12 期上。《决议案》认为广州暴动失败后的中国形势，“仍旧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到革命方面来”。认为广州的苏维埃政权虽只保持了三天，但它是第一次实现了列宁所说的殖民地国家内进行苏维埃革命的任务，高度赞扬了工人阶级在广州起义中的英勇精神。

会议还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认为长江局罗亦农反对马上暴动是对的，青年团湖北省委意见是

错误的。因为在估量暴动时，“不能单只看到统治者的崩溃，尤其要注意工农群众革命的高潮和主观的力量”。湖北应迅速发展游击战争到割据的局面。会议决议李维汉为中央巡视员至武汉巡视，停止原定的两湖年关总暴动。

5日 写《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一文的第三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发表在1月16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14期上，署名秋白。

6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对暴动的认识问题。周恩来主张在有能力领导的情况下，派贺龙回湖南。

8日 发出《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

9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浙江问题时，强调浙江应普遍地发动农民的斗争，不要在各地斗争尚未发动的情况下，就订出四县联合暴动计划，更不要每次都将暴动列为第一议事日程。在讨论两湖问题时，决定成立湘西北特委，以造成割据局面。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为委员。同日，中央给郭亮写信：“派贺云卿、周逸群等返湘工作”，“以造成割据局面”。

同日 在《布尔什维克》13期上刊登有关秋白的书讯两则：

新书出版——《俄国革命运动史》瞿秋白著 全书四册。

俄国革命运动史是革命经验之宝库，中国革命要有正确的理论策略，必须研究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瞿秋白同志为此目的，特著成此一部书。其第一册：《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运动》已经出版。当兹全国农民大暴动之际，这部书的第一册尤其是中国革命者先所欲先睹为快的。

出版预告——《无产阶级斗争的战术与策略》 斯徒夸夫著瞿秋白译。战术与策略正确与否，乃是决定斗争胜败的条件。中国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革命，但究竟那几种阶级能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同盟者，及此斗争的形式与方法又当如何？这一部书就是从理论上答复这些问题。

10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为组织局局长。

同日 写《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发表于1月16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14期的社论栏。未署名。

（编辑郑超麟在未经秋白审阅情况下，于该刊11期发表自己所写社论《苏维埃政权万岁！》认为中国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同苏联的苏维埃政权一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社论指出郑文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目的在于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而建立极广大的工农兵士贫民的政权，就是中国人民之中最大多数的政权——最广泛的民权主义的政权。“这种政府的性质将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权专政。这不是社会主义政府，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政府，因为他的任务不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政纲，他的任务乃是要彻底的完成民权革命”。

11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告湖北同志书》，指出：主张在武汉三镇马上暴动，这不仅是一个错误，且系玩弄暴动，工人群众的斗争和组织力量都很脆弱，推翻统治军阀夺取政权的决心还未成熟，假如硬要暴动起来必致成为徒然的牺牲。

12日 写《蒋介石上台与肃清共产党》，发表在1月16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14期上，署名秋白。

14日 发出《中共中央通告第三十一号》。

“通告”认为广州暴动后，工农贫民越来越信仰我党，因而党组织要利用形势大大发展，举行“广州暴动纪念征求期”。

16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批评广东省委犯了军事投机错误，并处分了许多起义领导人之事。决定起草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信中指出：“这次省委会的根本错误在于将省委会讨论和注意中心寄托在查办当事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这一问题上，太侧重主观上的责备而忘记客观的困难，表显一个极不正确的指

导和估量。指出广州暴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创城市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第一次实现！”

中旬 发出《中央关于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继续强调“革命潮流一般的普遍和高涨”，“在直接革命形势之中”。党的方针应是：“领导工农兵士群众暴动而夺取某一省或几省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扩大革命胜利于全国”。这是“绝对正确而又必要的政策”。并认为广州暴动失败后，“湖南与湖北、江西应成一革命的中心区域”。

18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

秋白在会上报告，提出在3、4月间召开六大，地址暂时考虑在澳门，（多数人主张在香港）。大会议程除十一月扩大会议规定外，又增加《党纲问题草案》。会议要求中央在两周内起草下述文件的讨论大纲：（一）C·Y问题，由C·Y起草；（二）党务组织由罗亦农起草；（三）工会问题由工委起草；（四）土地问题和政策问题由瞿秋白起草；（五）党纲草案由瞿秋白、罗亦农起草；（六）政策问题由瞿秋白起草。

同日 《中央致罗迈同志信》。《信》对湖北、湖南准备举行总暴动持否定态度。认为在湖北应“反对即刻举行总暴动”。在湖南，省委提出的湖南环境“已较好于十月革命前之俄国”，要“暴动起来恢复农民协会，实行农民协会专政”，“工人占据工厂自己管理”等口号，有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政治倾向。要李维汉加以纠正。

同日 《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的信——对〈广东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的指示信》。

《信》批评了省委决议案的错误，在于对广州暴动的积极意义没有应有的估计与肯定。并不适当的对广州起义的指导机关与领导同志予以纪律处分。

20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

言》刊于1月30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15期上。

21日 写《民权主义与苏维埃制度》，分别刊于1月30日、2月6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15、16期上，署名秋白。文章认为只有建立苏维埃制度，才能“实行最彻底最真实的民权主义，然后才能最彻底扫除帝国主义的统治，真正解放中国民族”，并且在民权主义革命完成之后，“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进于社会主义的建设”。

25日 《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中央不同意省委对广州暴动的结论》。《信》中反对将广州暴动失败说成是“由指导机关的错误所致”，不能将“偏重军事行动”，“未充分发动群众”等错误说成“军事投机”，“机会主义”，更不能将张太雷出身知识分子而说成“知识分子把持指导机关”。强调省委“必须服从中央的意见，停止省委决议案在各级党部的讨论”。

同日 致信李立三，要他即赴沪向中央面谈，解决中央与省委在广州起义失败教训上的分歧。在立三离开广东后，中央改派邓中夏为广东省委代理书记。

26日 写社论《最后的假面具》，发表于1月30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15期。未署名。

27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广东、浙江问题。发出给广东省委两封信。一封信指出“琼崖可以加紧造成一割据局面，坚决实行土地革命的一切任务，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另一封信批评广东省委与北江特委的暴动方针。

28日 中央给江西省委的信。《信》中认为计划在南浔路沿线举行暴动并造成割据局面的主张是不正确的，因为条件尚不成熟。

30日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夏明翰汇报湖南工作。决议夏明翰调湖北省委，王若飞为湖南省委书记。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强调各委员会与省委各科负责同志应在短期内做到二分之一以上是工人与贫

民。

月底 中央致信广东省委,就东江苏维埃政策问题作了指示。要他们不要乱杀人,“苏维埃政府是不好杀的,凡是杀的都是因为反革命派要危害革命及群众利益,不得已而杀的。”

二 月

1日 撰写社论《从吴佩孚到国民党的杀人政策——一九二八年的二七纪念》,发表于2月6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16期上。未署名。

2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周恩来建议:朱德部队既已到湖南边界,不宜回广东,在湖南发动暴动。

同日 中共中央给江西省委信。确认江西是“全省总暴动的局面”,要抓住时机实行外,还根据江西富农在中国最多的情况,提出“我们的胜利尚未有全国或几省的范围的时候,对于自耕农必须采取联络的政策,不能太有害于他们的利益”。

3日 中央接到李维汉于1月25日给中央信后,发出《中央致罗迈同志及两湖省委信》。《信》中提出凡举行全省暴动,在主观条件上必须要中心城市的群众工作做得很好,中心城市附近各县的农民普遍的发动起来,对于暴动均有相当的认识。各外县的农民必须要有许多县份造成割据的局面,全省都在暴动的恐怖与骚扰中,有确实把握比较大的兵士,兵变才能举行。表明中央在暴动问题的认识上有了变化。

5日 写《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一文,刊于2月13、20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17、18期上。署名秋白。

8日 在《致河南省委信》中提出了中心城市起义与农村暴动相结合的方针。《信》认为中心城市是“敌人政权的所在地”,如果其“四周的邻县不能有广大的暴动能抵制敌人的进攻”,则城市的“暴

动即令成功亦是要失败的”，因此，必须“切实造成各区农民割据的局面，威吓与包围”中心城市，中心城市暴动“不是在各地暴动之先，不是单一城市的暴动”，必须是全省“总暴动之汇合”，只有这样，才能有取得胜利的希望。

9日 写社论《国民党大出棺材》，刊于2月13日发行的《布尔什维克》第17期。

10日 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坚持“革命的潮流显然不是低落的”观点。《信》中虽提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如工人与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程度的不平衡，除广州市的工人能起来做农民领袖外，其他城市还缺乏这种现象；在地域上革命发展亦不平衡，认为广东、两湖存在暴动夺取一省政权的可能外，其他省份尚不存在。但中国革命始于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的可能是有的。

12日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举行政治谈话会，讨论对国内形势的估量问题。会上发生激烈的争论。出席会议的有秋白、恩来、亦农、项英、王若飞、陈乔年、刘峻山、刘伯坚、郑覆他等九人。秋白针对王若飞提出的“现在革命潮流是低落的”问题作了两次发言。秋白一面承认“我们的力量比敌人弱，需要休息一下”，“现在党的牺牲是很大的了”，但另一面又认为“整个的革命潮流是高涨的，农民自发的暴动是很多的。如果说是低落，工农一定是很灰心的”。

13日 中共临时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中共六大在苏联举行，并要求布哈林或斯大林出席。

15日 写社论《中国革命低落吗？》，发表于2月20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18期上。文章除了强调：“中国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还提出党的政治的总路线：“发动群众斗争，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士贫民苏维埃”。要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起真正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的党，不受任何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侵蚀和犹豫动摇”的影响，坚定实行在“革命高涨中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政策。”

16日 与恩来一起就国内形势估量同张国焘、罗章龙、刘少奇、汪泽楷谈话。刘少奇认为“依农村看来是高涨的，依城市的看来是低落趋势”。“农民的革命是向上涨，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秋白仍强调“中央常委认为革命潮流一直高涨。”

17日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江西问题，并通过了《顺直省委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决议案》要求顺直省委利用当地形势，“建立以玉田为中心的暴动割据中心，以影响全省的农民斗争”。农民运动的口号应当是“抗租、抗税、抗捐、抗债，没收地主的土地，杀屠土豪劣绅、大地主、保董、庄头，围缴保卫团武装，一切政权归农民代表会议”。

19日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广州起义和总政策问题。会上，秋白、恩来、罗亦农等继续强调革命潮流是高涨的，并决定由秋白起草一个通告（即《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

22日 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中国现在革命的发展，事实上形成特殊的方式：‘农民割据’”，同时“这种割据局面必须发展大城市的中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要在这上面表现坚强起来”。

24日 写社论《两个国内战争》，发表于2月27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19期上。未署名。

2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由斯大林、布哈林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忠发等联合提出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议决案》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不断革命”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对革命形势的分析，认为“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但是，有许多征兆表明，工农革命正在酝酿这种新高潮”。党在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千百万工农群众”，“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必须反对工人阶级某些阶层中的盲动主义”，在农村苏维埃地区主要“进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队伍，以期这些队伍今后逐渐汇合成为一支全国

性的红军”。但又指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在乡村和城市，在一系列相邻的省份组织统一步调的普遍行动，而且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因此，必须反对热中于零星分散、互不联系的游击战争”。

27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周恩来、罗亦农提议要老老实实开始党组织的改组工作，准备作长期的斗争。并开始党员登记工作。不怕少，只要质量好。会议决定由项英、王若飞、李富春、徐炳根、黄平组成江苏省委常委，李硕勋代理浙江省委书记。

三 月

5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土地问题。

6日 由秋白起草的《中央通告三十六号》于是日发出，并有“附文”。《通告》对政治形势与斗争策略作了认定；指出“革命正在高涨无疑”，怀疑革命高涨的意见是“机会主义的观点”。广州暴动的失败，“不但不是全国的失败，而且只是全国革命胜利的序幕”。“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策略不但仍是目前的问题，而且夺取一省或几省政权的问题更加紧迫”。当前的具体任务是“特别加紧工人运动和准备暴动工作，并扩大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认为中国目前有“两个革命中心区域，第一是广东，第二是湘鄂赣及豫南，后一区域的布置应暂以湖南为中心，而武汉的暴动应当是这一区域暴动的完成，并当使暴动的武汉变为全国的革命中心”。

9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两湖与湘鄂赣边界的割据。

10日 中共中央致信湘、鄂、赣三省委。信中指出：“湘东特委与赣西南特委必须经常发生密切关系，如将来在这些地方的割据将会合时，临委可以决定此两特委合并归湖南指挥。至毛泽东的军队之分配应看两特委之需要由两特委共商调遣，不必专于死板的决定其驻在某地”。在暴动问题上，改变了首先夺取中心城市的主

张,而要首先采取分区割据,包围中心城市的策略。但同时又强调城市工作,认为“三省在组织上的严重问题即是不要城市的倾向。”“单纯的农民暴动不单是可以影响到党的成份,而且在政治上可以动摇无产阶级领导土地革命的根本问题”。要求“加紧城市的工人运动及发展城市中党的支部。”

12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江苏问题。

30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三十九号》。《通告》认为“现在革命潮流自从广州暴动以来,显然日益高涨。”

月底 共产国际在接到中共临时中央要求在苏联举行六大的电报后,经讨论同意中共要求,并于3月底来电:“让六大代表去莫斯科开会”,共产国际还要求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去莫斯科,并要求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参加六大。

同月 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广州暴动的意义与教训》一文,署名M·君。

同月 著作《三民主义》由中山书局出版。该书由秋白已发表过的四篇文章组成:《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民权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并以《青天白日白色恐怖的旗帜》一文代序。

四 月

2日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六大在莫斯科举行的问题。会议先由任弼时传达共产国际3月底的来电,确定了六大的开会地点。根据国际来电,经会议讨论,决定瞿秋白、周恩来先行出国负责筹备六大有关事项,李维汉、任弼时留守,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2日 写成《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小册子,5月底,由中共中央出版社出版。署名瞿秋白。全书共八万多字,分三章:一、中国

革命领导权之争；二、中国共产党之过去与前途；三、中国当前的问题。对党领导的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运动作了全面总结，对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在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认为“主要的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而以彻底的土地革命为其社会的内容”，完成这一任务的根本条件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只有中国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实现这一任务的基本方式是组织工农的武装暴动。对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分析，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过去”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对“八七”会议，认为“开辟了共产党的新生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新纪元”。对中央所犯的盲动主义错误，也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

21日 罗亦农 15日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是日，在龙华遇难。罗亦农的被捕，暴露了党组织不适应地下工作环境的需要。为此，秋白、恩来等与留守同志作周密研究，制订了整顿发展组织和秘密工作的具体措施。这次讨论的决定于5月18日由中央以四十七号通告下发。

28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刚收到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经讨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并决定起草一通告。

30日 中共中央发出第四十四号通告。

《通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的中国问题议决案之后，接受这一议决案之一般方针”。《通告》要求“争取群众，建立城乡的群众组织，巩固并健全党的组织，以与白色恐怖斗争，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也是准备工农总暴动胜利的必须条件”。《通告》下发时，还附有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至此，“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秋白后来在《多余的话》中写道：

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行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确的。武汉分共之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秋收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一般的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的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然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的;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同日 化装登轮,前往莫斯科筹备“六大”事宜。

五 月

月初 船行两天,到达大连。从大连转乘南满铁路的火车,经中东路,从满洲里秘密出境。随秋白之后,杨之华携女儿独伊偕同

罗亦农夫人李文宜也离开中国去莫斯科。

中旬 抵达莫斯科,然后乘坐马车,到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一座号称“银色别墅”的地主庄园。中共六大就在这里举行。

20日 写《卖国和剥削的战争》,发表在5月30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20期上。署名秋白。

六 月

4日 中共中央根据秋白、恩来出国前所作的决策,给红四军发了指示信,肯定了中国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革命;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的盲动主义;红四军应在湘鄂边界以军事实力发动工农,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并指定以毛泽东为书记组成前委,以朱德为书记组成红四军军委。

7日 与苏兆征、周恩来召集已到莫斯科的近60名六大代表开谈话会。会议讨论了政治、组织、职工、农运等决议草案的起草问题,确定6月12日前后成立大会秘书处和各个委员会并开始工作。

9日 斯大林同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谈话。斯大林指出,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经处于高潮。革命高潮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创建红军。如果能够把参加农民运动的人们争取过来,并且集中部队打下几个城市,那末,这将对今后的局势有更大的意义。并强调说:在任何时期,农民都是不能领导工人和革命的。革命必须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

14日、15日 与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黄平、邓中夏、向忠发、王若飞、张国焘等21人出席由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会上,周恩来和王若飞报告了陈独秀拒绝来莫斯科出席六大的理由和意见。会议围绕对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过去的经验教

训和党在今后的任务方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6日 六大筹备处发出通告,通知在17日下午召开预备会议,要求从速组织各代表团并选出负责书记。各代表及到会同志均编定号码,大会发言及领取一切文件物品,均用号码,不用真实姓名。

17日 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讨论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以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名单和组成等问题。晚,由秋白主持召开大会预备会议。出席的有各省代表、中央委员、特约代表、C·Y中央代表和指定参加者共60人。会议讨论通过了大会议程,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和名单。

18日 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隆重开幕。出席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84人。大会通过主席团、秘书处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秋白为21人组成的主席团成员之一,周恩来为秘书长,苏兆征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秋白以五届中央委员会名义致开幕词,强调指出:六大一定能够纠正一切错误倾向,使党走到正确路线上来,完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任务。

当晚,秋白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大会主席团会议。

19日 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大会上作《世界革命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在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又提出反资产阶级,“否则就不能完成土地革命”,中国革命形势“处在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时期”,他批评“中共中央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联合战线的任务,缺乏正确的了解,在紧急关头,不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因而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他还严厉批评了盲动主义,要求大会予以纠正。

20日 瞿秋白代表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分五个部分:一、中国革命问题;二、过

去的教训；三、现在阶段盲动主义的危险；四、革命形势；五、党的任务。《报告》全文长约7万字。

秋白在政治报告中对盲动主义进行了无情的剖析。他指出：“新的机会主义倾向与盲动主义有关。盲动主义是机会主义的反过面来。马日事变，不准备暴动，固然是机会主义，但有的只几十人，亦要来暴动，说今天不能不暴动，主张暴动即社会主义，不暴动即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秋白痛感自己以及党的一些领导人既缺乏革命实践锻炼，又缺乏革命理论修养，对于革命造成损害，他说：“吾党缺少理论，革命的党要正确的理论的工作人员，就算几十人也是好的。无理论的党，必归破产”，“一个党，一个党员，一个革命者，只有用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才能在革命实践的实践中得到胜利和成功，而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革命理论将会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更好地指导革命运动的前进。”

对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秋白不赞成一个要求追究个人责任，而主张严于责己。他说：我们也可以批评国际，说对中国指导如何，如何不切实！又是其他什么指导人的原因等等，而发生机会主义；但是这并不能去掉自己的责任。他批评了张国焘在会中缺乏与人为善，热衷于指责别人，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行为。

但秋白在政治报告中仍然把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估计过高，认为革命有无间断的进展，革命显然是高涨的，因此党的总策略仍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对八七会以后，中共中央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仍认为是执行党的纪律，是必要的。

21日 在第三次主席团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各委员会的组成名单。除政治委员会四十八人由秋白召集外，还参加了组织委员会、职工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土地委员会与农民委员会。

22日 讨论通过了秋白起草的中共中央致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贺电。

24日 在第五次主席团会议上，决议成立湖北、湖南问题委

员会和南昌暴动委员会。秋白是湖南问题委员会和南昌暴动委员会的成员。

27日 在主席团第七次会议上,决定在政治委员会下组织广州暴动委员会,秋白是成员之一。

28日 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

秋白在结论中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深入剖析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进一步认识了“左”倾错误的危害。对于陈独秀的功过和责任问题,秋白在结论中作了说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中共中央应负责,而不能委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怪我们自己。中共中央本身,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的责任,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功过,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否责任由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这是法律的观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带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在武汉他有机会主义的政策,妨害了,甚至出卖了工人阶级,这是不错,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能说他个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在结论中,秋白还充分肯定这次大会充分发扬的党内民主。他认为各地代表在讨论过程中对中央进行批评是过去党的生活所没有过的新现象。“以前,所谓党即执委会,执委会即常委,常委即书记,可以决定一切!这次大会就不同,不仅受共产国际指示,并且受各地群众代表的指导”。

29日 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发言时宣布,我们(共产国际)作了一个讨论,认为不派代表比较派那些犯错误的代表还好。共产国际决定对中国的指导不是通过共产国际代表,而主要是依靠在莫斯科设立一个常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从而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机构——中共代表团的阶

段,结束了以往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七 月

1日 项英、罗章龙等29人提议,以六次代表大会的名义电中央政治局,着重指出:中央政治局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定,在国内切实停止盲动倾向,目前中心工作应是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参加反帝与城市、乡村群众运动的斗争。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反对这一提议,建议大会不进行讨论;王若飞、夏曦等人支持29人的提议,反对米夫的意见;张国焘、瞿秋白等反对29人的提议。经大会表决,大多数代表赞成提议给国内发出指示电,并决定把29人提议交政治委员会作为研究资料。

2日 大会讨论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秋白等人作了发言。

4日 晚上,召开六大主席团第11次会议。成立由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等7人组成的六届中央委员选举委员会,负责提出六届中央委员人选的初步名单。

9日 下午1时,修改通过《政治决议案》及通过六届中央委员选举法。《政治决议案》由秋白起草,米夫、布哈林修改,尔后秋白又进行了修改。大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时,先由秋白逐段宣读,大会边讨论边修改,全体一致通过后,全场掌声如雷,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

六大政治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实现革命任务,“必须用武装起义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

大会在通过《政治决议案》后,又由秋白宣读主席团通过的对

国内工作指示电稿,传达六大精神。

10日 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三人。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

11日 中共六大闭幕。

17日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1人(其中20人有表决权)。瞿秋白以斯特拉霍夫的俄文名出席大会。在开幕式上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委员,以后又被选为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并被指定为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运动的三位补充报告人之一。在共产国际“六大”上,秋白分别于7月27日、8月4日、8月15日、8月21日和8月23日作了发言。

19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秋白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根据布哈林提议,会议决定:瞿秋白、张国焘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任代表团团长,张国焘为副团长。代表团成员包括:邓中夏、余飞(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驻农民国际的代表)。稍后,陆定一为驻少共国际代表,也成为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

秋白后来在《多余的话》中写道: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旧干部中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只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

27日 在共产国际“六大”的第十二次会议上发言。

发言就布哈林在《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提出“第三时期”的理论,发表自己的意见。

布哈林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的最主要错误,在于对一九二八

年以后的世界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总崩溃的时期。不少代表反对“第三时期”理论,首先提出不同意见的是波兰代表团女代表科斯特鲁蔡娃,而秋白是第二个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秋白在发言中说:他不懂得这个问题,因之我们相信这第三阶段是不成立的,当他说到第二与第三阶段之间无分别的时候,旁听席中有人嚷着说:“很对”。秋白这次发言,受到布哈林的严厉批评。

秋白的第一次发言还同赤色职工国际的总书记罗佐夫斯基发生了分歧。秋白强调共产国际的政策要适合民族殖民地国家特点,适合农业国家的特点。他说:“我认为,如果认识到殖民地国家是世界的农村,那么所有关于民族革命的问题就都明朗化了。总的来说,所有的殖民地国家都是农业国家。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制定出一个关于殖民地农民问题的总政策。该政策应当符合共产国际的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制定出在东方进行革命运动的适应的策略”。但是,罗佐夫斯基站出来反对秋白的观点,认为强调农业国家的特点,就是否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八 月

4日 在共产国际“六大”的会议上,讨论战争危机问题发言。秋白认为:“在中国,由于日本干涉济南,战争实际已经开始”。并认为在当时国际条件下,“帝国主义者之间争夺势力范围和统治中国的斗争(部分地是通过军阀进行的斗争),就变得更加激烈,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太平洋战争,准确点说,还要导致印度洋战争”。“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号召中国工农和一切劳动者团结起来,把国民党军阀战争转变为国内阶级战争,转变为工农兵反对地主、资本家和军阀的战争”。

同日 在《国际出版通讯》第8卷上发表《关于战争危险问题

讨论续编》。

15日 在共产国际“六大”上,作《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报告》在总结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说:“与资产阶级同路时,与资产阶级联合时,我们千万不可忘记,资产阶级随时都可能从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变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应该记取,任何让步都换不到资产阶级的友谊或友好关系。只有基于开展群众工作、群众活动、群众斗争的独立的阶级路线,才能在一定条件下迫使民族资产阶级有时共同参加反帝斗争(这也只能做到一定的限度),才能在群众压力下迫使它表示让步而不是友好”。“在中国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力量的接近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接近必定是暂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无产阶级唯一的、很可靠的同盟者,无产阶级主要注意力应在同盟者农民身上。”

同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了《中共代表团致联共中央政治局信》,对苏联当局处理中山大学学生中的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错误意见,提出不同看法。

“江浙同乡会”是王明为制服反对他们宗派小集团的留苏学生而捏造的罪名。王明将反对他们的江苏、浙江籍的同学,称之为“江浙同乡会”;把工人出身的同学,称之为“工人反对派”;把年轻的与团员叫“先锋主义者”,然后将这三部人合起来,叫“第二条路线的联盟”,意思是与米夫、王明对立的联盟。王明认为三部分人中间江浙籍学生对他威胁最大,故先向他们开刀。王明等在米夫支持下,竟请苏联格伯乌(K·P·U)人员调查;要向忠发来校作报告。事后,决定开除12名中国学生的党籍、团籍、并逮捕其中四人。使事态发展更复杂、尖锐。事情反映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尚在苏联的周恩来处,经过周恩来、瞿秋白及中共代表团其他人员调查核实,并无此事。遂于8月15日给联共政治局写信,对联共监委作出的结论,提出不同意见。至是年秋,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中央

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此事，最后作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结论，并由周恩来在中大全体师生会上宣布。“江浙同乡会”的问题解决了，王明一伙却开始将矛头对准了秋白与中共代表团。

17日 在《国际出版通讯》第8卷上发表《第二国际与国民党》一文。

21日 在共产国际“六大”上，受中共代表团委托，以《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为题，针对共产国际候补书记、美共党员佩佩尔一概否定中共和中国革命的言论，发表声明。声明说：佩佩尔硬说中国党内过去是孙中山主义，现在是托洛茨基主义，这纯粹是诽谤。……我们损失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不过，我们在数量上的损失虽然很大，然而我们在质量上却锻炼了党，锻炼成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应当承认，武汉事变以后，中国党毕竟找到了新的道路。这不容否认。就是在武汉事变以前，我们党也是采取了同孙中山主义分庭抗礼，针锋相对的态度，在发动千百万群众（农会会员有一千万人，工会会员有二百八十万）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23日 以中共代表团身份，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印度共产党代表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及其他东方国家共产党代表团的代表，就瓦尔加^①和曼努意斯基^②的报告，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发表声明。

① 瓦尔加·耶诺(1906—1964)，匈党员，后加入俄共(布)，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1928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② 曼努意斯基·德米特里(1883—1959)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1928年被选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九 月

1日 共产国际“六大”闭幕,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然后,又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同日 写《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发表在12月1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2卷第2期上,署名秋白。

5日 和各国代表前往南俄各工业区参观,先后参观了巴统、第比利斯、巴库、罗斯托夫、乌法、哈尔科夫等地。杨之华也随往。因劳累过度病发,去巴库疗养。

14日 给尚在莫斯科正准备回国的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谈贯彻“六大”路线的意见。

秋白在信中写道:“两次大会^①所给我们的确是不少”。并说:“政治上的认识,我自觉‘自信力’增长很多。党的政治上之生长是异常的明显,两次大会之中,至少使一般参加的同志,得到了更深的了解。”

信中对如何贯彻“六大”决议,提出了多方面的具体意见,写道:“我在动身时曾经匆匆忙忙的和你谈过,现在仍想再写遍。”

对职工运动,秋白首先提出要“争取群众”,“现在应当竭力注意的是两种可能的坏倾向:(一)是空洞的否认国民党及黄色工会之影响——这是很危险的,……(二)是回复到纯粹的旧方法,就是不做群众的党团工作,而只做“制造领袖”的工作(如少奇同志以前的说法)——这亦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在群众之中始终不能有党的作用,始终不能真正有党的组织的基础。”

关于农民问题,信中写道:“问题是在工人阶级如何运用农民

^① 两次大会,指1928年6—9月间先后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的力量,来减轻自己斗争中的困难。工人阶级争取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这是总的目的。”信中明确指出:“苏维埃区域中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创造红军。领导一般农民的琐小斗争到推翻豪绅政权的斗争——游击战争。”同时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需要避大击小的红军的游击策略。红军的游击可以散布土地革命及工农独裁的宣传于广大的区域,而积累革命的军力。现时特别要注意盲动主义情绪的余波再生,特别要注意忽视农民革命作用,……”。信中特别强调要肃清一切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的流毒,反对盲动主义及复活的机会主义。信中最后写道:“我在俄做国际工作(政治)及理论的工作,本是党的需要,国内工作自然是你们多负责了。但我想不久就要回国的,我又要养病,又要想做许多工作,不知如何是好,要做的事太多了!”

杨之华《回忆秋白》:秋白在六大以后,虽然因过劳而发病,不得不到巴库疗养,但心情很愉快,对革命前途满怀信心,并且和过去一样,病再重也放不下工作,努力尽自己的责任。他的这种心情集中表现在一封信中。这就是秋白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四日从巴库写给当时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同志的一封长信。

同月 瞿秋白向库西宁^①提出撤换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职务的建议。此事被米夫知道后,进一步加深了对秋白的怨恨。

夏秋 △在“六大”后,把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改写为六万字的通俗读物,并在莫斯科出版。

△“六大”之后,应莫斯科步兵学校中国学生团支部的邀请,到该校为中国学生作报告。向学生们介绍了党的“六大”,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对盲动主义作了自我批评,使同学们深受教育。

^① 库西宁·奥托·威廉(1881—1964),共产国际“六大”的主席之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并任共产国际政治书记。

十 月

1日 写《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广州暴动周年纪念》一文,发表在12月1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2期上,署名秋白。

4日 于西绵伊斯写《战争暴动革命之时代——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的意义》一文,发表在1929年1月1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3期上,署名秋白。

13日 写《世界无产阶级独裁——共产国际党纲问题》一文,发表在1929年3月1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5期上,署名秋白。

同月 因《布尔什维克》编辑郑超麟提出辞职。李立三从国内写信到莫斯科征求秋白意见,秋白表示同意,并从苏联派吴季严回国接替《布尔什维克》的主编工作。

十一月

月初 应斯大林之约,与张国焘一起会谈中国革命的问题,共约3个小时。

秋白向斯大林报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最近讨论中国问题的要点,并说明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给以指示。斯大林说他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中共六大决议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首先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还问到宋庆龄和陈独秀。

同月 因病到南俄里海疗养地疗养了一段时间。

本年 和黄励等人出席了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反帝大同盟会议。

本年 秋白还致力于中国的文字改革问题。这是因为 1928 年正是苏联扫除文盲运动进入高潮的时期。在列宁的“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的思想指引下,苏联从 1921 年起就为国内少数民族制定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所以,1921 年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已有创制拉丁字母的中国拼音文字的思想行动。1928 年 9 月 26 日,南京政府大学院公布了“教人会”拟订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进一步激起他改革中国文字的热情。

秋白最早提出的拉丁化方案,曾与当时由于大革命失败来到苏联的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共同讨论,并且得到了苏联语言学者郭质生(В. С. КОЛОДЦОВ)等的帮助,在 1929 年 2 月拟出了《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先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本年 10 月,瞿秋白又把方案修改写定,名为《中国拉丁化的字母》。

杨之华《忆秋白》:

有一天,来了一位苏联同志,他是中文博士,是 1921 年秋白来苏联时的朋友。他给秋白送来两个抄本,说是秋白过去留在他家的研究拉丁文字母的笔记本。从此,秋白经常和林伯渠、吴玉章同志组成自愿集合的小组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并写成了叫《中国拉丁化字母》的小册子。

一九二九年 31岁

本年初 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附属中国问题研究所成立,后来创办了学术性的俄文季刊《中国问题》,由瓦尔加、威格爾、库秋莫夫、马札亚尔、米夫、斯特拉霍夫(瞿秋白的俄文化名)和沃林组成编辑委员会,沃林为研究所所长兼编委主任。瞿秋白在《中国问题》第2、3期上先后发表过论文《中国职工运动问题》、《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等。

二 月

△ 肺病加重,二、三月去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休养,同去的还有黄平等。休养期间还与人一起练习滑雪。

7日 给杨之华信。信中写道:我只觉得精力不够了。我只有丝毫的精力支持着自己的躯壳,不是最近是如此的。世界加在我身上的事务是如此的多。我只是慌乱,我想帮助你学习,可是我能做的是如此之少。我已经是一半废人了。我念念只想如何美好生活的秩序。念念的想成痴想了。

8日 起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中的观点,反映了以米夫为代表的共产国际东方部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的观点分歧。

14日 给独伊写信。信中写道:“你会写信了——我非常之高兴。你不病了,我欢喜了。我很念着你,我的病快要好;过三个星期我要回莫斯科,那时要来看你,一定来看你。我的小独伊。再见,再

见。好爸爸二月十四日”。

20日 苏兆征病逝，悲痛不已，写信给杨之华。信中说：“昨天接到你三封信，只草草写了几个字，一是因为邮差正要走了，二是因为兆征死的消息震撼的不堪，钱寄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三十元已收到）。一九二二年香港罢工（海员）的领袖，他是党里工人领袖中最直爽、最勇敢的，为何我党又有如此之大的损失呢？前月我们和斯大林谈话时，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此的切合于群众斗争的需要，他所教训我——尤其是“八七”之后是如何的深切。我党的老同志，凋谢的如此之早呵，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些丝毫呢！”。

杨之华《忆秋白》：

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起到兆征同志离开苏联前，秋白与兆征同志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兆征同志对待工作非常严肃，一丝不苟，每在斗争重要的关键，环境越恶劣，他的工作越坚强，同志间合作的越好。兆征同志在莫斯科患肚疼痛，秋白曾劝他割了盲肠以后休息一个月再回国，可是兆征同志鉴于国内革命正处在艰难的条件下，十分需要他回国工作，终于回到了上海，不久病发，来不及急救而死了……

此后，秋白常常带着责备自己的口气说：“我没有坚持说服他留在莫斯科，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

26日 给杨之华写信。信中写道：我最近几天觉得人的兴致好些，我要运动，要滑雪，要打乒乓。想着将来的工作计划，想着如何的同爱爱在莫斯科玩耍，如何的帮助你读俄文，教你练习汉文。我自己将来想做的工作，我想是越简单越好。

28日 给杨之华写信。信中写道：“因为极巨大的历史的机器……之中，我们只是琐小的机械，但是这些琐小的我们，如果都是互相融合着，忘记一切忧疑和利害，那时，这整个的巨大的机器是开足了马力的前进，前进，转动，转动——这个伟大的力量是无敌

的。”

三 月

13日 给杨之华写信。信中写道：“人的生死是如此的不定！这次养病比上次去南俄固然成绩好些，但是始终不觉着工作的愉快，我俩还是要经常的注意身体，方是有效的办法。”

15日 在疗养院写小诗一首，表达对独伊与千千万万孩子的爱与希望：

小小的蓓蕾，
含孕着几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
几乎不掩没光明。
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
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
谁道是无意中的赤化？
都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19日 给杨之华信。信中写道：“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常常想起罗马字母的发明是很重要的。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帮我做许多工作，这是很有趣味的事，将来许多人会跟着我们的发端，逐渐的改良，以致于可以适用于实际工作上去，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五十年、一百年，但发端是不能怕难的。我们每人必须找着一件有趣的要把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生活就更好更有趣了”。

同月 给独伊信两封。信中分别写道：“独伊：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要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

尚。”“独伊：你为什么要哭？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同月 译苏联著名的《三八妇女节之歌》，以此纪念国际妇女节。

五 月

1日 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在《真理报》上发表《中国革命万岁！》一文，署名屈维它。文章被放在报刊的显著位置上。

7日 参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信的起草工作。在对待富农问题上，与米夫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最后，不得不违心地同意米夫的观点。

随着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开展和对富农采取的严格政策，特别是随着反对布哈林的右倾与清党运动的开展，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党应加紧反对富农，因为布哈林的主要罪状是反对全盘集体化与反对消灭富农。国际东方部与驻国际中共代表团讨论上述信的起草时，发生了严重分歧。米夫认为中国应与苏联一样推行反对和消灭富农的政策。秋白反对，认为在中国土地革命中，不但不能反对富农，甚至有时还要推行联络富农的政策。如果强调反富农，将使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基础缩小，可能招致失败。两人反复辩论，相持不下。在张国焘的调和下，秋白勉强违心地同意米夫提出的信。信中批评中共“六大”决议中“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提法，指责“许多中国同志，直到现在还不明了这个问题。他们机械式地了解列宁关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工人阶级对农民态度问题的提法，而把中国的富农当作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可是列宁从来没有主张联合富农。联合富农，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是不允许的”。信中明确提出：不仅要反对“半地主的富农”，而且也要反对“自己经营的富农”，“甚至在这类富农参加抗税运动或反军阀运动的时候，也不应该向富农让步”。

有关富农的争辩虽结束了,但影响很大,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中山大学的米夫派更活跃起来,企图把右倾与“左倾”的帽子一起扣到秋白头上。

26日 为迎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扩大全会,在《真理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现状》一文,署名屈维它。文章概述了1925—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国内工农运动初步得到恢复,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方志敏领导的游击队活跃于湘、赣、闽等省,以及沪、津等地工人组织仍在开展斗争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同时,应该开展反对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斗争”,开展反对“已经露头的右倾思想的斗争,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文章指出:右倾的主要表现是不相信革命高潮必然到来,不相信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因此,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要同中国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在党内建立起极其严格的集中和纪律,“使国际工人运动经验得到充分利用,使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得到完全彻底的贯彻”。

夏 在暑期将到之际,中山大学举行了全校党员大会。王明等小宗派集团开始了反对瞿秋白的活动。王明宗派小集团反对瞿秋白是有深刻原因的。他们除了与瞿秋白在政治上有原则分歧外,在调查中大所谓“江浙同乡会”过程中,瞿秋白曾向库西宁提议撤换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的职务,使深受米夫赏识的王明怀恨在心。同时,在处理中山大学风潮的问题上,瞿秋白与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到中山大学发表演说,支持多数同学,批评支部。王明等人认为瞿秋白是他们的“幕后指使”。中山大学的全校党员大会是王明宗派集团实行“争取速胜”战略的组成部分。他们打着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辩论为幌子,向多数派学生摊牌。他们还邀请中大所在区的联共区委书记参加,企图利用他来压制多数同学;同时还提议中共代表团瞿秋白出席,目的是“把他们置于公开批判之下”。秋白婉言拒绝出席,让张国焘参加,小宗派企图把秋白置于当面受批判的目的

没有达到。

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

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作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

陆定一《〈忆秋白〉前言》：

“一九二八年党的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到一九三〇年中,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我是青年团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驻少共国际的团长,也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于一九二八年底到达莫斯科。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里,常相往来。……这个时期里,王明集团开始在莫斯科形成。这个集团自称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或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米夫组织了王明集团,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看来,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

张国焘《我的回忆》：“一九二九年夏季,中大举行学年总结大会时,又爆发了代表团与米夫之间的一次大斗争。这次学生大会,瞿秋白曾应邀参加发表演说,在多数学生反支部局领导的热烈气氛中,瞿秋白的演说,对支部局的领导也颇有批评。这次大会,僵持了三天,不能解决。

七 月

3日至19日 以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成员身份与蔡和森、陆定一等出席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会议对“第三时期”理论又作了进一步发展,认为第三时期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会议对布哈林“右派”开展了尖锐的批评、斗争。曼努意斯基和库西宁取代了布哈林,成为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会议还选举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由12人组成的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主席团。

6日 在国际执委会第十次会上作《共产国际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的发言。在发言过程中,遭到柏金斯基不断的粗暴地打断。

由于会议批准了联共(布)在4月关于撤销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决议,并决定免除他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会议还要求各国共产党反对右派,反对同情和庇护右派的调和派,并将他们从组织上清除出共产国际。在此压力下,秋白在发言中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在中国共产党内要反“左”倾冒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共产国际中右倾的危险,不仅从宗主国中表现出来,而且也从殖民地问题中表现出来”。并认为“机会主义者的殖民地弟弟,比其宗主国的哥哥走得更远”。

11日 中共中央写信给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定秋白、国焘、定一、若飞、蔡和森等组成党纲起草委员会,以秋白为书记,负责起草七大的党纲,“时间限三月完成,六月内运送中国。委员会的人得由代表团与东方部决定就地增加,俄国同志亦然”。但该信于12月才到达莫斯科,途中担搁了半年之久。

九 月

6日 当彭湃、杨殷等同志于8月24日被捕消息传到莫斯科，秋白于是日给中央写信：“得彭、杨被捕之电，究竟情形怎样？此事宜亟设法，究竟用武力劫狱，或贿买狱卒，或其他方法，救济，你们应能就地决定，如需特费，宜速来电声明。”

8日 写《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发表于《布尔什维克》第三卷第4、5期合刊上。

15日 又写信给中央，问及彭、杨被捕之事。“彭、杨如何，急死人了！！”

下旬 当彭、杨于8月30日遇害的噩耗传到莫斯科，秋白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在深夜写了《纪念彭湃》一文，发表在《真理报》上。后来，又在苏联编辑出版《纪念彭湃》一书，收录了彭湃的遗作《海陆丰运动》。在《真理报》上发表的《纪念彭湃》一文成为此书的前言，署名屈维它。

同月 与弟弟景白合编《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

秋 与黄平去德国，出席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呼吁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于德国返莫斯科后，为中东路事件应斯大林要求，要刘伯承、黄平去远东组织领导华工武装队伍。

7月10日，张学良所部不顾中苏关于中东路协议，解除中东路苏方局长和副局长职务，收回中东路电报电话权，中断全线通讯，封闭苏方的商务机构，制造中东路事件。8月至11月，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全面展开，东北军失败，12月22日中苏签订了《伯力协定》，结束了中东路冲突。

黄平《往事回忆》：九月间我回到莫斯科。瞿秋白对我说，张学良上了蒋介石的当，抢了中东路，把苏联局长驱逐出境。这就是一

九二九年的中东路事件。斯大林要我们组织一个苏联远东境内华工的武装队伍,以便必要时开入中国。瞿秋白指定我当党代表,刘伯承当司令。我按照指示就出发了。

十月

5日 写《论国民党改组派》一文,发表于《布尔什维克》第三卷第四、五期合刊上。

26日 共产国际发出《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信中提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已是“革命高涨底初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强调“现时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心理和倾向”。此信对中共在估量形势与应取政策上起着重大影响。

同月 王明小宗派集团利用苏联开展清党运动的形势,发起了对瞿秋白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的攻击与迫害。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和中国革命》:“〔我们〕着手收集他们‘幕后活动’的材料。我们同时仔细审查他们自中共六大以来的各种讲话,从中找出同中共中央和国际立场相抵触的地方。我记得有个周刊,是共产国际的刊物,内部发行,那上面载有他们的大部分言论,我们逐字逐句地仔细地把它翻阅了一遍,这可以说是我们为对瞿秋白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发动全面政治攻势,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我们决定在清党的第一阶段即一般讨论阶段,发起对瞿秋白和代表团其余成员的攻击,因为他们在清党的尔后阶段不会再来中山大学接受询问”。“中山大学的第一次清党大会,我想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举行的。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联共区委等来宾出席了大会。巴维尔·伊凡诺维奇·贝尔津将军被派来中山大学任清党委员会主席。……在他就清党程序作了简短讲话后,我走上讲

台作了我在莫斯科期间的第二个重要发言。我公开谴责瞿秋白及其同伙犯了机会主义的罪行。瞿秋白犯了左倾机会主义,我说,而张国焘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我谴责他们在中山大学培植‘反党第二路线联盟’。……发言只限五分钟,可贝尔津允许我讲了四十五分钟。……由于我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其他人随后的公开攻击,国际中共代表团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关系迅速恶化。瞿秋白及其同伙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

陈修良《回忆瞿秋白和杨之华》:我在莫斯科期间,王明这个野心家一心想夺权,把秋白看成阻碍他们掌权的最大敌人,千方百计地攻击、造谣、谩骂,无所不用其极。……当时,“中大”的墙报被王明派夺过去了,由他们的人任编辑,几乎每一期墙报都不负责任地攻击丑化秋白。

秋白的弟弟景白敢讲话,斗争性也很强,但后来失踪了。失踪前几天,他精神有些失常,有人就造他的谣言,说他掉进莫斯科河里自杀了。我们马上通知苏联保安机关去找,也没找到。秋白说,他肯定被捕了,被苏联保安机关枪毙了。这事对他刺激很大……

十一月

15日 中共中央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共产国际亦于1930年2月8日作出相应的决定。

此事在驻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中产生分歧,包括秋白在内的大多数代表团成员拥护中央决定,而王若飞主张先与陈独秀辩论,并向党内的群众进行解释。按理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但在共产国际反右倾的气氛下,是绝对不允许的。结果王若飞受到批评,并被停止了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农民国际的工作。作出决定的虽是共产国际,但作为代表团团长的秋白无疑也应负一定责任。

与此同时,秋白写了三万字左右的长文《中国的取消主义与机

会主义》，系统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

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致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信。

信中提出“与机会主义——反对派之取消主义的斗争”。要代表团同志对中央开除陈独秀、彭述之等事件，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并在留莫斯科全体同志中树立统一明确的认识。

信中虽提出要“反对盲动主义的残余”。但认为“这种左倾的危险，现在已不如右倾那样严重”。

十二月

15日 在接到中共中央要他起草党纲草案的来信后，不顾身处逆境，并于是日复信中央。信中写道：“我在此一年之中，大部的时间是花在这一问题上。陆续寄出的农民、职工、独秀等等的文章，都是准备工作。现在的问题，已经是要决定委员会的名单。我的提议是：莫洛托夫、库西宁、沙发洛夫、秋白、中夏、国焘七人。……此问题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是中国革命理论基础的打定的问题。需要的时间，必定较多，至少要五个月，尚且求国际方面准我三个月的假——即不管其他一切杂事。党纲必须在七次大会提出。而国内革命的发展亦渐有需要开七次大会。东方部已有此意，准备在明年七八月间仍在俄召集，尚未最后决定。此事，须等待你们的意见。

18日 不顾米夫与王明宗派集团对其政治迫害及病魔缠身，开始在列宁主义学院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由中山大学改称）中讲授《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讲到年底止。共十二讲，每月二、三次，原订课程排到1930年6月。

同年 拟订出《中国拉丁化的字母方案》。

一九三〇年 32岁

一月

16日 病倒,致信中央。信中写道:“我最近又因天气关系大病起来,简直差不多半个月晚上不能睡着了,因此,最近不能做什么工作。即日要去休养治病。真正烦闷死人。……去年12月至今,我又是到了‘冬蛰’的状态,简直不能做什么!!!国际如果不能给我长期疗养,并使静静的工作,则将来身体一天天的坏下去,严重的工作如党纲、党史之类,简直没有希望——(虽然,党史,我已开始讲演)。……听说恩来、向应都病,现在怎样了,不胜悬念之至!!”

同月 在《共产国际月刊》第一卷第1期上发表《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一文。文章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革命:“农民暴动胜利的地方,农民群众组织苏维埃的政权,没收地主的土地,扩大工农红军。”文章在逐一介绍国内工农苏维埃区域后说,它们对中国反动统治是极大的打击,以至于反动派到处叫嚷:“现在的世界真是反了,一切都是‘反常’的了——这都是因为‘共匪作案’。”但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工人农民则高呼:“中国的苏维埃万岁!”“毛泽东红军万岁!”

三月

15日 在《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2、3期合刊上发表《中国职

工运动的问题》、《军阀混战与汪精卫》两文，署名秋白。在《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结合的策略。指出党组织既要巩固与发展秘密的赤色工会，又要争取国民党黄色工会的群众，要巧妙的联结公开和秘密的工作方法，深入群众。既要领导正在兴起的经济斗争，又要引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到鲜明的政治斗争，并使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反帝斗争结合起来，推动中国革命。文章还批判了工人运动中的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在《军阀混战与汪精卫》一文中，强调应“努力巩固农民的游击队，努力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朱毛的部队”。认为“这个斗争的前途，不但是推翻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并且也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

30日 上海明日书店出版《唯物史观的哲学》一书，署名瞿秋白。

3—4月间 中山大学清党结束后，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受到共产国际的指责，并由此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

《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指责说：中共代表团须担负李剑如、余笃三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的活动。“共产国际执委委员会有见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的限制刷新代表团的成份，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份”。

张国焘《我的回忆》：在中国留学生中的清党工作，拖延了三个月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瞿秋白遭受着比我还要重得多的打击。在柏金斯基的办公室内（柏系共产国际秘书长——作者），首先由共产国际那位主持中大清党的监察委员，报告中大清党的经过，

根据他所搜集的材料,认为在中国学生中,长期存在着一个托洛茨基的秘密小组织。中共代表团方面,一直采取放任的态度。他指责瞿秋白曾让刘仁静这个托派领导人物,经由土耳其回国。刘在土耳其曾会见托洛茨基,请示机宜,回国从事托派活动,又指出其他若干托派分子,都是经由瞿秋白的提议,一一派遣回国。……

在柏金斯基办公室会议之后几天,米夫曾约我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四人,在他办公室举行会议。他以从前未曾有过的骄傲神态,板起面孔向我们宣读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决议。我和瞿秋白心中都很明白,这是上次在柏金斯基办公室内举行秘密会议,在我和瞿秋白等退席后,共产国际的少数巨头会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所作出的谴责决议。这个会议,当然无法改变这个决议的可能,争论是无益的。从此,中共代表团组织只有销声匿迹,丧失了它的发言地位。

五 月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解决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并处理中共代表团因解决中山大学派别斗争问题而与共产国际发生的分歧。但实践表明,共产国际对撤销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的决定,已无法变更。

六 月

11日 自周恩来赴苏后,成为中共中央工作实际主持者的李立三的“左”倾思想急速发展。是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表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19日 共产国际远东局看到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后,认为是错误的,提出周恩来、瞿秋白目前不在国内,中央政治局很弱,应停止发出这一决议。并希望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去纠正。

七 月

16日 与恩来等一起参加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

同日 中共中央以向忠发名义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报告“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时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保护与支援中国革命,并请国际“通知恩来、秋白诸同志速归”。

23日 与周恩来一起参加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讨论。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联合发出要李立三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

《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底新高潮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认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和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

《决议》没有点名,更没有说立三犯了路线错误,而是采用针对错误正面阐述的方法。《决议》成为秋白、恩来回国纠正立三错误路线的指导原则。

八 月

1日 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形势与国际来电。由于7月27

日,红三军团一度乘虚攻占湖南省会长沙,进一步助长了立三的冒险主义,不顾国际来电,进一步提出全国武装暴动的设想,要求尽快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与南方局、北方局。

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会议决定举行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调集力量分路向武汉推进,要求南方局在广州暴动。同时,要求共产国际“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要求苏联、蒙古出兵支持中国革命。

6日 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李立三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

共产国际收到上述的会议记录后,很快将立三的错误升级,不仅认为立三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路线”,而且在组织上“进行反国际的斗争”,“拒绝服从国际的指示”,并不尊重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的意见。因此,必须“给这种反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但正在返国途中的秋白、恩来,对此毫无所知,形成了事后在处理立三错误中所谓“调和主义”。

上旬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恩来先后动身经欧洲回国,以制止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的执行。行前,和恩来联名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在中共中央没有新的决定或改变以前,我们正式通知你们,张国焘同志是这一时间的中共中央负责代表。

秋白在莫斯科的两年时间里,曾校阅过列宁的重要著作的中文译本《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书,翻译过不少文件;他研究了中国苏维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他还写了《在中国苏维埃旗帜下》一文,分别刊登在《共产国际》第五十二期和1930年第二期《党的工作者》杂志上。还写了《中国工会问题》,刊登在1930年第二期《中国问题》杂志上,写《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发表在《中国问题》第三期。

19日 周恩来回到上海。

在是日举行的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 恩来提议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应加入总行委。会议决定扩大总行委和主席团, 周恩来、瞿秋白等加入总行委和主席团。

26日 与杨之华途经西欧抵达上海。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一九三〇年八月, 瞿秋白夫妇从莫斯科回到上海, 听说我已从日本回来了, 就用暗号写信给开明书店转我收, 约我去看他们。秋白改姓何, 之华改姓林, 还留了地址。我和德沚就按地址去拜访。他们夫妇住在一幢普通的楼房里, 楼上是卧室兼书房, 楼下是客厅兼饭堂。他们把我让到楼上的书房里。秋白问了我在日本的情形, 问了我母亲的身体(我告诉他, 母亲回乌镇了), 也谈了他自己在莫斯科的生活。他告诉我泽民、琴秋不久就要回国了, ……。他还向我概略介绍了当时的革命形势。

九 月

6日 总行委主席团会议。决定早日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补选中央委员, 选举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作传达共产国际决议和组织问题的报告, 秋白起草《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此时,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已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在周恩来和秋白的帮助下, 李立三进一步认识并承认了错误。

8日 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 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电, 并报告: “中央即开扩大会, 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 将立即恢复党、工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

9日 总行委主席团会议, 除讨论苏区军事问题外, 还决定召开苏区代表大会, 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先为临时中央政府。

16日 总行委主席团会议, 讨论六届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草

案。秋白就草案作报告：一、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是一致的；二、中央在策略上有相当的错误，主要对工农斗争力量的估量、红军力量的配合，犯有冒险主义的危险。

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宣读中央工作大纲，获会议通过。还讨论了职工运动决议草案，酝酿三中全会的补选问题，决定补毛泽东、顾顺章、李维汉、温裕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24日至28日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于上海召开。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接受共产国际“七月指示”。会议主要由向忠发作《工作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经过讨论，瞿秋白作《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李立三在会上作了检讨发言。会议通过了由秋白起草的《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

《决议》完全接受共产国际七月指示。指出李立三路线主要犯了“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的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所以冒险倾向的轻易暴动的布置，代替了切实创造武装暴动前提的斗争”。

秋白在《政治讨论的结论》中谈到两条路线斗争时，批评了那种认为“左”比右好，宁可“左”一点也不要右了的错误论调。他说：要知道“左”倾决不比右倾好，象某个地方党部总觉得左倾比右倾要好些，所以宁可“左”一点，不要右了，这是不对的。

三中全会切实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七月决议中存在着“左”的倾向，特别是1929年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着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这次会议未能加以清算和纠正，因而错误地认为目前“党内的

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

全会改选后的中央政治局由14人组成,其中正式委员7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候补委员7人:罗奕(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罗迈、顾顺章、毛泽东。

党的六届七中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无论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决议》指出:“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

聂荣臻《学习周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

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做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虚精神,令人钦佩。

30日 为《红旗日报》撰写社论《辛亥革命纪念和苏维埃政权——拥护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 月

17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确定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二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会议还决定成立苏区军委,由25人组成。

19日 写《大夏大学学生反对改组派》报道，发表在19日《红旗日报》上，署名阿林。

28日 《中央通告第九十二号——为发动全国的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运动，以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暴动》发出。通告针对国民党调集湘、鄂、赣三省近二十个师的兵力，实行对苏区的“围剿计划”，指出党在当前最中心的任务是，调动全国劳动群众和红军，打破敌人的进攻。

30日 在《实话》^①第一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的意义》一文。

同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十月来信”）。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立三错误、完全同意和接受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的通知后，很不满意，指责三中全会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十月来信”认为：“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如果抹煞这两条路线底原则上的区别，那就不仅是遗害无穷，而且一定会潜伏着将来又重复这些错误的极大危险。”“十月来信”认为李立三“所犯的错误，并不只是个别的错误，而是造成了整个错误观点的系统，定下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要李立三去莫斯科检查错误。

十一月

13日 王明从新近由苏联回国的人员处先于中央得知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后，立即打出“反立三路线”的旗号，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是日，与博古联名写信给中央，说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

^① 《实话》系《红旗日报》副刊，随同该报发行。

的,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王明等还以此拒绝本已接受去苏区参加工作的组织分配。

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国际“十月来信”。

17日 王明、博古再次写信给中央政治局,信中提出三点要求:一、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实质,教育全党;二、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我们的处罚;三、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对我们的污蔑与造谣。

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国际批评,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一种调和态度。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这个问题不宜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的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周恩来还针对王明一伙活动,提出:“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回国的),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上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22日 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国际“十月来信”。并在会上作报告,周恩来作重要发言。

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即三中全会补充决议。《决议》认为:“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但“没有把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彻底的揭发出来,亦还没有对于立三同志路线的影响占着优势的时期里面政治局的工作,给以正确的估量”。《决议》承认:“这种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对反立三路线的斗争问题,《决议》认为李立三和赞成过他的同志都作了自我批评,而党“现在又正处在困难时期,因此要求不要进行公开辩论”。

“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解释工作之中,仍旧是须要各同志的详细的讨论。”会议决定将国际十月来信和中央的决

议发给各级党部。

在讨论王明等人的信时，秋白批评他们在先于中央知道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以后，不向政治局报告，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中央提出立三路线问题和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的问题，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月底 王明按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精神，约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两条路线》小册子的写作（此书后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并抄成三份，在几十人中传阅。

小册子打着反对李立三的“右倾机会主义”旗帜，推行比立三“左”的观点更“左”的理论，是王明“左”倾错误的总纲领。同时又以反对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继续”的三中全会及其中央，集中攻击秋白。王明说：“这一切都证明，现时的领导同志维它（指秋白——作者）等，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他们不能执行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策略来解决当前的革命紧急任务”。又胡说秋白起草的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是在事实上更进一步的宣告自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危机，只是使一般同志对于现在政治局的领导同志维它等更表示绝望”。抢班夺权之心溢于言表。

此时，党内一些受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过的地方党组织成员也纷纷起来，攻击党已经临到“八七”会议前夜的情况，要求改组中央。其中，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最为活跃。罗章龙等还与王明等联名致书共产国际，要求召开“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他们攻击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地指向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特别是瞿秋白和周恩来，形成一股反中央的风潮，这对处在极端秘密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说来，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十二月

月初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审议和讨论东方部《关于中国

党三中全会和李立三错误的报告》。东方部的报告,主要是全面否定三中全会,把矛头指向瞿秋白。报告指名攻击瞿秋白,诬陷他故意搞“调和路线”、“小团体”活动。说瞿秋白“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领导者,不但不去执行国际指示,反而对立三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采取调和态度(政治决议案是他起草的),这是对于国际的指示,运用两面派的手段”。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审议和讨论东方部这个报告时,听取了李立三的发言,并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但主要是批判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集中攻击所谓中国党内的“派别观念”和“小团体”活动,把矛头指向瞿秋白,说他在中国党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时,就“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纠纷,这个小团体是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派合作的”;回国以后,又仍然搞“小团体”无原则的领导了三中全会。认为秋白“不是中国党的代表”“不过是一个小小团体的首领之一”。

会议在批判秋白的同时,却为王明等一小批人鸣冤叫屈,说王明等“起来说话防止党去做错误,却对他实行摧残”,他们回国后“不能够作到领导工作”,完全是“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吹捧王明等人是一些“知道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际”的,是“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很好同志”。

很明显,共产国际已决心把瞿秋白赶下台来改造中国党的领导,用他们一手扶植起来的“青年干部”王明等人来取代中国党的“老辈”,成为国际改造中共的既定方针。

4日 完成斯大林《中国革命之前途》一文的翻译。

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并发出《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九日的决议》与《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

14日 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华,并在是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召开四中全会来解决问题。

米夫到上海后,先分别会见王明、罗章龙、徐锡根、余飞、王克

全等人，批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与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决议，否决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召开四中全会，中心是反右倾。

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撤销李立三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中央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蔷、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

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米夫的压力下，会议通过了《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会议还决定改组江南省委，并根据米夫提议，由王明代理省委书记。

至此，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事实上已被迫陷于瘫痪，处于无法工作下去的境地。

下旬 王克全等人认为紧急通告仍是调和主义的，称现在中央不能信任，坚持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中央，要开除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贺昌的中央委员职务，并立即停止瞿秋白、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委员职权。为了避免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危及党的统一，瞿秋白、周恩来两人在主动承担调和主义错误的责任后，又提出一起退出政治局。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去留问题上，米夫采取了“留周拒瞿”的方针。对此，秋白对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

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道：“我回来之后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的纠正了立三的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错误路线，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和实际工作上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象立三那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到一九三〇年，我虽然在国际参加了

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什维克意识就完全暴露了。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么想不到,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一九三一年 33岁

一月

1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等人通过《全总党团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立即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并声言“对于在党的历次错误中负有严重错误主要责任的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同志（均是不堪教育与学习的）应执行铁的纪律，立即离开指导机关，照章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

7日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会上，被王明等指责犯了“调和路线”的严重错误，并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

1931年1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二二人外，还有王明宗派集团的主要成员、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团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以及白区党的基层组织代表，共三十七人。会上，米夫不断使用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王明等在米夫的支持下，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发言批判“李立三路线”，批判瞿秋白的“调和路线”。因为李立三已去苏联，会议集中火力批判了秋白。会上，秋白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所犯“错误”的责任。会议通过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指责：“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造成纯粹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路线的可能，以及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这里最主

要的责任,都应该是秋白同志负的。”米夫在总结发言中也指责说:“三中全会‘一方面向共产国际行鞠躬礼;另一方面向立三主义行鞠躬礼,这样行鞠躬礼的时候,将国际路线推到立三路线后面去了’。”“调和主义的中央政治局,不仅继续了立三路线,并且扩大了立三路线,给他一保障,涂改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秋白的文章,不仅没有揭破立三路线的根源,而且他一句不讲,比三中全会的决议还退后。在组织上三中全会是执行了斗争的,但不是反对立三同志,而是反对那些反对立三同志的同志,如陈绍禹(王明)、沈泽民,这些同志是立三同志反对的,三中全会政治局仍是继续立三这一意见来反对,他们是坚决的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这样错误,政治局也是应当负责的”。

会议在米夫的圈定下,原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李立三和李维汉三人落选,而原先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却一步登上了中央政治局的最高领导机构。同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又当上了代理总书记。自此,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达四年之久。

秋白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到打击后,有人曾问他,“为什么你对那些无中生有的诬蔑不置一词,不为自己辩解呢?”他回答说:“我个人的问题算不得什么,这些都是枝节的问题,我倒是担心革命的前途啊!”

秋白于六届四中全会后,因肺病日益严重,政治上又受到沉重打击,“请病假”休养治病。他在《多余的话》中写道:“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的委员。我呢,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钧万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治病——事实上从此脱

离了政治舞台。”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和米夫扶持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领导权的一次会议……。

向忠发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共讲了十个问题，……这个报告是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和王明等人一系列“左”倾言论的翻版。

向忠发报告后进行讨论，许多人发了言。王明在张金宝、韩连会简短发言之后，以“马列主义理论家”的姿态作了长篇发言，一开场就说他的《两条路线》的意见书没有带来，要大家去详细看，气焰十分嚣张。他一共讲了四个问题：首先说立三路线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其次，他完全抹杀三中全会的成绩，指责三中全会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下，继续立三路线。他点名批判瞿秋白与李立三的错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对立三路线采取公开调和态度。第三，他强调只撤换某几个中央负责人是不够的，必须发展全党的政治斗争，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特别要以所谓反三中全会反调和路线的“新干部”、“工人干部”来代替“旧干部”。第四，他尤其强调要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等等。王明的这个发言是他的“左”倾冒险主义总纲领的体现，也是为他们取得党的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

王明发言之后，有几个人继续发言，有的完全同意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接着何孟雄提议政治局的同志先发言，要听听他们是否改正了错误。何的提议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接着周恩来、关向应、瞿秋白、向忠发、我和顾作霖等发了言。瞿秋白的发言在这种形势下主要是进行自我批评。他主动地、诚恳地承担了三中全会及政治局所犯错误的最主要责任。说他参加了国际七月决议案的讨论，对情况是了解的，他认为立三的意见和政治局的路线是个别错误，而不是路线上和国际不同，因此十月来信后没有认识到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而是经十月来信所领导起来的党员群众的斗争和国际

代表的指导,才了解到这一点。秋白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以及和自己若干大致相同的观点,并提出党应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斗争的若干建议。

……

尔后,即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造政治局。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拟定了一个名单,让瞿秋白、李立三和我从三中全会的政治局中退出来,……在米夫的操纵下,远东局和政治局提出的名单获得多数通过。……这样,在米夫支持下便实现了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领导权的计划,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进入党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政治局。向忠发名义上虽然继续担任政治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由王明等人独揽中央领导大权。

27日 被迫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写《声明书》,公开承认自己所犯错误。

四中全会后,已经夺取党的领导权力后的王明等,对秋白进行了更为残酷的迫害。王明控制的中央,不顾秋白身心都已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且肺病加重,仍逼迫他公开发表声明,承认强加于他的所谓“调和主义错误”。秋白被迫在《声明书》中写道:

四中全会指出,这种调和主义错误(三中全会及其后)以及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态度的最主要的责任,是我应当负的,我对于这种指斥完完全全的接受,我对于决议案的全部,完完全全的拥护。

他在《声明书》中还违心地写道:

我在莫(斯科)当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领导者的时候,对于在俄中国同志之中的派别斗争问题,不但没有能够有正确的立场帮助联共党的领导去取消这种派别斗争,反而客观上卷入派别斗争的漩涡。……这种错误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是和我过去整个的非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联系着的,正因为政治立场的错误,所以对于这些派别观念,不去坚决的反对,不站在布

尔什维克的立场上从政治问题上去打碎派别成见，却想去调合这些派别，使之互相谅解——这是市侩式，“和事佬”的立场。

现在我公开的对国际执委和中国全党揭发和承认自己的错误懦夫的腐朽的机会主义。

28日 王明控制的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贺昌等同志问题的决议案》，并再次逼迫秋白公开表态，写出第二个《声明书》。

尽管秋白当时肺病已很重，“在病重中不能多写”，但王明等仍逼迫秋白必须“表明积极反右派与立三路线的政治态度”。秋白无奈写了第二个《声明书》，表示“反对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揭破并打碎立三主义者和右倾小组织的联合企图”，并再次表示：

“我完全抛弃我自己的一切错误和离开国际路线的政治立场——三中至四中间的调和主义的立场而站在共产国际之立场之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来为党为革命而斗争。”

“我的调和主义的错误，是和莫斯科代表团对于学生问题的错误相联系的，当时对于莫斯科学生中反对中央支部局的李剑如等同志，对于这个小组织我采取了保护的态度，以至不但不能反对派别斗争，反而自己陷于派别斗争的泥坑。……这种错误是我的非布尔什维克的整个立场之中的一部分，现在我公开揭发和承认我立场的全部错误和这个派别斗争的错误，而和他斗争。

秋白后来在《多余的话》中自我解剖说：

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又说：

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待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允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份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至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杨之华《忆秋白》：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秋白却受到王明的打击，被排斥出中央政治局，并且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初，不分配工作。

秋白遇到了新的考验，特殊的考验。……

当时，宗派主义者不但打击秋白，而且竟然把我的工作也给撤掉了。我当时的党性修养不够，一方面为秋白感到不平，同时对宗派主义者无理地对待秋白也感到委屈，要求给我工作做。但是，秋白却始终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情绪；不仅如此，当他觉察到我的委屈情绪和知道我要求做工作的心情之后，就经常耐心地教育和热情地鼓励我说：“你要求工作的热情是好的，共产党员当然要为党工作。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学会独立工作，自觉地、主动地去做”。他还常给我讲一些生动而含义深刻的故事来启发我：一个人要经得起任何考验，不光是在顺利的情况下要考验得起，特别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更要经得住考验。……

的确，秋白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在那三年里，他从来没有一点委屈情绪，也从来没有在同志、朋友和我面前诉说过受打击的事。……

秋白在同志们面前是这样，在家里也是这样。在艰险的漫长岁

月里,他总是那样专心致志地、安详地、乐观地工作着和学习着,他在生活中充满了乐趣,从来没有烦躁、忧郁、无聊的表现。有时我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随便向他嘟囔几句,也不会影响他的情绪。相反地,他总是给我除忧解闷,对我说上几句既风趣又有深意的话,使我解开了疙瘩,高兴起来了。……

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当时,经常送来警报,我们经常要搬家,而且总是很紧急,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一接到警报,就马上要走。秋白在这种情况下,镇静安详如常,就象平时出门访友一样,总忘不了要带上几本书,好利用时间学习和工作。

秋白身患肺病,身体很弱,但生活上是一点儿也不讲究的,无论怎么艰苦,总是满不在乎。拿吃饭来说吧,因为出去买菜不便,我们吃的是普通的包饭,一直没有什么好东西吃。他从来没有说过,看来也根本没有想过,要为他那患着严重肺病的身体增加一些营养。甚至连吃药也要我经常提醒他。有一次,我看他好久没吃一点好菜了,就托邻居买到了一只肥鸡,我高兴得不得了,尽心尽意地把它炖得稀烂,准备让他吃顿好饭。想不到晾衣服的时候,一不小心,晾衣服的竹杆子碰翻了鸡锅子。我心疼得不得了,就一边收拾一边埋怨他没有帮我晾衣服。他马上一声不响地帮我收拾,象哄孩子似地说:“算我已经吃了吧,应该高兴么。不要想它了,该读书和翻译了,把你昨天译好的拿来给我改。”说得我心宽了。

秋白在这个时期,一如往常,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工作上。他当时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总在十几小时以上,而且总是按部就班,有条有理。早晨起床后先看报,几份大报看得很仔细,看到有用的材料就剪下来或摘录。上午剩下的时间一般是写文章;下午睡一会午觉就起来翻译和写作;晚上是看书或写作。他习惯于晚上工作,很晚才睡。看书看报是他作为了解政治形势和文艺界动态的方法之一。他真是如饥似渴地阅览各种书刊,包括反动的,他都想办法买来看。他不能经常出去,就通过鲁迅和别的同志去买。住在谢

澹如先生家时,因为谢先生开着书店,也常托他代买。苏联的书刊,是萧三、曹靖华同志和鲁迅的帮助下得到的。为了免被敌人扣留,萧三、曹靖华同志从苏联寄书刊时往往寄两三份,有时还从西欧转寄,才能到鲁迅手里,再由鲁迅转给秋白。

秋白每天都这样勤奋地学习着、工作着、战斗着。作为他休息的唯一“文娱活动”,就是独自玩一会骨牌。在这一段时期中,秋白怎样勤奋地工作,仅仅从他写作的数目字来看,也就足以说明了。粗略地计算起来,仅收编在《瞿秋白文集》中的这一时期的文学著作,就约有一百五十来万字,每天平均写两千来字。这还不算他给党刊写的许多文章。为了写作,他还要花许多时间读大量书报杂志。比如他编《鲁迅杂感选集》,并写序言时,就研究了鲁迅的差不多全部著作和有关参考材料。

二 月

7日 给苏联汉学家郭质生(弗·谢优德罗)信,表示要继续进行中国文字拉丁化的探讨。信是用汉字写的。信中写道:

“许久不看见你了,时常想念你。我回来了之后,已经过了将近半年,因为病和忙,始终没有功夫写信给你。现在我病得更厉害了,因此已经开始休息,大概可以休息两三个月的功夫。

……

现在我寄上一本读本,《国语罗马字模范读本》——这是依照政府公布的拼音方式编的,比我们的方式繁难复杂得多。这是完全的北京方言——因为政府的新方式,把以前注音字母的拼法有些改变:就是么丨和丁丨混合只用丁丨(丁口亦是这样),把丨乙废去,只用口ㄝ等等。你可以用做参考的材料。我以为普通话仍旧要保存、发展,方言同时要制造拼音方法

——让他们“并存”，将来废除汉字之后，中国一定要有一个时期是“多种语言文字”的国家。至于四声的分别拼法，实在是非常之困难，这本书可以做一个例子。

我本想多寄几本，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能够。半个月后，可以有法想。我将要时常寄国语的文学的、小说、杂志给你。

我请求你的事，是要你寄我一切好的关于拉丁化问题的小册子，著作，杂志，以及言语学（Языковедение）的一般书籍，再则，新出的以及旧的文学、小说，以及杂论。这件事情，我千万的拜托，费神费神。如果你能够常常寄来，那真是不胜“感激之至”了！等候你的回信”。

20日 王明控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再次诬陷和谴责秋白。

《决议案》故意颠倒黑白，指责说：“中大李剑如余笃三派反支部局正确路线的派别斗争是影响到中国党内的。当着中共代表团还在国际的时候，秋白同志即曾以中山大学生中反支部的派别行动来影响过去的中央政治局，所以当时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对于陈绍禹等四同志所施的压迫制度，完全是站在代表团多数的派别观念上做成的错误。”并声称瞿秋白在三中全会犯调和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在莫斯科所犯错误的继续，是一贯不尊重国际等等。王明等还把这一《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1930年春通过的《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以及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这个报告的讨论记录等，同时登在《党的建设》第四期上，企图证明：瞿秋白的“一贯错误”，王明等的“一贯正确”。

28日 译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二十一期社论《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和机会主义的新活动》，发表于《布尔什维克》

第二期上,署名秋白。

三 月

12日 给郭质生信。信中写道:

“一个半月以前写了信给你,一直等待回信,但至今没有收到。也许是地址写错了?你生活得好么?我的妻子常常想念你们和你们的孩子。我这里的生活非常寂寞。尽管中国有过自己的“Renaississance”(“文艺复兴”),但几乎还没有自己的作家和艺术家。到处都是市侩习气,盛行的只是马路文学或用上海话来说“Semolae Wenhie”(四马路文学)。因此,再次三跪九叩首(原用汉语,黑线原有,译者)地请求你经常寄我一些俄文书籍,小说、短篇小说,新的或是旧文学作品都可以。还要各种文艺杂志(那怕是《小说报》等也好),以及有关阿拉伯文拉丁化的材料。再则,你能否马上就给我找一找:1、中国短篇小说(发表在《小说报》上的);2、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录;3、A·托尔斯泰的《三姐妹》^①和《一九一八》;4、几种新期刊。再三地拜托你。

你收到我们的邮件没有?一次——《国语罗马字读本》;另一次——《小说月报》四本。在这封信里,附上刊登在《申报》上的有关成立“中国语言文字学会”报道的摘录。倘若你有兴趣以你本人或某个团体的名义和这个学会联系,那么我就可以通过你提出我们主张的方案,用它来批判南京官方的草案。等候你的回信。紧握你的手。问候你的夫人,我的妻子问你好。

瞿秋白 1931年3月12日

再:有一封信,请你转寄给我的女儿,地址另开。

^① 应为《两姐妹》。原注。

请你马上寄两三本我著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草案》给我。又及

寄信寄书处——直接寄：上海四马路东华里（中华书局隔壁）申江书店转李文芳女士收启（前信所说办法取消）。^①

四 月

下旬 茅盾夫妇得悉秋白近况和住址后，前来看望，并要秋白审阅长篇小说《子夜》原稿及各章大纲。后因党的机关被破坏，至茅盾家中暂避。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泽民和琴秋要去鄂豫皖苏区了，他们来告别，谈到秋白在四中全会后心情不好，肺病又犯了，现在没有工作，并告诉了我秋白的新住址。于是第二天我和德沚就去看望他们。秋白和之华见了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有四五个月没有见面了。在叙家常之后，秋白问我在写什么？我答已写完《路》，现在正在写长篇小说，已草成四章，并把前数章的情节告诉他。他听了很感兴趣，又问全书的情节。我说那就话长了，过几天等我把写成的几章的原稿带来再详谈罢。过了两天，记得是一个星期日，我带了原稿和各章大纲和德沚又去，时在午后一时。秋白边看原稿，边说他对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见，直到六时。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农民暴

^① 全信用俄文写，瞿独伊译，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四期。

1937年2月7日和此信，均由郭质生保存。解放初期，国内征集革命先烈遗物，郭质生将这两封信并题书以及秋白的照片一并赠送给我国，并附以短筒说：“瞿秋白是我的知己朋友，是永远不会忘掉的亲人”，还称颂秋白“是中国卓越的共产党员”。

动的一章,也谈到后来的工人罢工。写农民暴动的第一章没有提到土地革命,写工人罢工,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起来也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秋白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当时红军及各苏区的发展情形,并解释党的政策,何者是成功的,何者是失败的,建议我据以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并据以写后来有关农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正谈得热闹,饭摆上来了,打算吃过晚饭再谈。不料晚饭刚吃完,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秋白夫妇必须马上转移的暗号。可是匆促间,他们往何处转移呢?我们便带了他俩到我家中去。当时我家在愚园路树德里,住的是三楼厢房。二房东是个商人。我曾对二房东说,我是教书的。现在带了秋白夫妇来,我对二房东说是我的亲戚,来上海治病,不久就要回去。我孩子睡在地板上,把床让给秋白夫妇睡。之华大概觉得我们太挤了,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转移到别处去了。秋白在我家住了一两个星期。那时天天谈《子夜》。秋白建议我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秋白看原稿极细心。我的原稿上写吴荪甫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上海那时通行福特。秋白认为象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他建议改为雪铁龙。又说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以上各点,我都照改了。

杨之华《忆秋白》:一九三一年初夏,我们住在上海大西路两宜里。一天下午,秋白和往常一样,正在专心地写着文章,我在看书,忽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房东太太嘟囔着去开门。我们听到客人在问:“何先生在家吗?”房东太太不耐烦地回答说:“这里没有姓何的!”这时,我已听出是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声音,就急忙放下书本,一边跑下楼,一边大声说:“有姓何的!”并对神色诧异的房东太太解释说:“我娘家姓何。他们是我的朋友。”房东太太扫了客人一

眼，回房去了。

孔德沚是和茅盾一起来的。我请他们夫妇上楼进房后，悄悄地告诉他们说：“秋白又改名换姓了，不再姓何，改叫林复了。”

这时正当秋白转到文化战线上工作不久，茅盾当即向秋白表示了关切之情，向他谈了他的创作情况和打算。秋白请茅盾介绍了文艺界的情况，听取了意见。他们谈到天快黑了还没有谈完。这时，王一知同志来了。我请他们一起吃晚饭。正吃着饭，邮差送来了一封信，我立即拆开来一看，上面写着：你们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快回去看看吧！”

这是党送来的警报，机关被敌人破坏，牵连到这个住所。我告诉大家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大家吃完了饭。为了不引人注目，秋白和我分开走。茅盾夫妇请秋白到他们家里去住，王一知带我到别的地方去。茅盾夫妇和秋白先走了。

……

茅盾夫妇住在静安寺路余庆里一号的三层楼上，房子很窄小。秋白住在那里，已经使他们的两个孩子让出床铺睡地板了。我这一去，更使他们受挤了。天气又闷热，秋白和我心里深感不安。但茅盾夫妇始终热情地接待着我们，使我们觉得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秋白在茅盾家里避难的那些日子里，他俩总是愉快地谈论着，谈形势，谈上海文艺界的情况，谈“左联”的工作，谈他们的作品和工作计划……，永远谈不完似的。秋白的心情很愉快，神态很安详，好象根本没有想到敌人的搜捕和避难的境遇。

五 月

月初 在茅盾家中会见“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对“左联”机关刊物《前哨》上刊载鲁迅写的追悼被杀作家的文章《中国无产阶

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连声赞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秋白住在我家中时，我们也谈到当时“左联”的活动情形。他问到鲁迅。原来他还没有和鲁迅见过面。我说：在方便的时候，我和你同去拜访鲁迅。五月初的一天，忽然冯雪峰来了。雪峰是送刚印出的《前哨》来的，原来他也没有见过秋白，我就给他们作了介绍。

冯雪峰《回忆鲁迅》：我记得是一九三一年五月初的一天，我把几份刚出版的左联机关杂志《前哨》第一期送给茅盾先生去，在茅盾先生家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秋白同志和杨之华同志。后来我知道，秋白同志那时是因为在上海的党中央某机关被破坏而避难在茅盾先生家里的。那天秋白同志谈些什么话，我大半都忘记了，但记得他很高兴地翻读着《前哨》，而对于其中鲁迅先生写的追悼当时被杀作家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还说过这样的话：“写得好，究竟是鲁迅！”

同月 化名林淇祥，迁移至南市紫霞路 68 号谢澹如家居住。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当时我想，我这个家条件太差了，闯来个生人，秋白连躲的地方都没有，这对他的安全不利。于是我就与冯雪峰商量。我说鲁迅的家是比较安全的，他住在北四川路底的一个高级公寓里，房子宽敞，住这公寓的大多数是欧洲人或日本人，一般的中国人都不去那里，但秋白与鲁迅从未见过面，贸然而去，是否妥当？雪峰说，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他倒有个可靠的去处，他有个朋友叫谢旦如，福建人，谢的父亲已故，是大商人，开过钱庄，家住南市，房子宽敞，秋白住到那里，是绝对安全的。不过先要征得谢旦如的同意。还要做些准备工作。我们与秋白商量，秋白也同意。我们又商定，如果谢旦如同意，就由他在《申报》上登一余房招租的广告，秋白、之华再去承租。又过了几天，之华来了，说他们的旧居，

没有被破坏,还是安全的,可以搬回去住。于是秋白决定搬回去。临走,我对他说,雪峰找的房子如联系好了,还是搬过去,总比这旧居安全。他也同意。不久,雪峰就帮他们搬到南市谢旦如家中去了。

冯雪峰《回忆鲁迅》:过了几天我再到茅盾先生家去,秋白同志夫妇还在那里,这一天,秋白同志问我有无商人之类的朋友或可靠的社会关系,因为他想找一个可以比较长时间居住的地方。并且说因身体不好,组织上要他休养,他很想借此休养的机会,翻译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这件事情使我很兴奋。我立即去和一个接近文学而同情革命的在钱庄里做事的朋友谢澹如商量了,因为他的家虽在上海南市,不是租界(那时候租界里各方面的情形都更繁杂,帝国主义统治者对户口等的管理也比较马虎,所以反而比较地有利于革命机关和革命者的秘密隐藏),但那是一所建筑不久的旧式的大楼房,他的亲戚和社会关系又都在商界,他的家属也很单纯,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可保证的住处。谢澹如当即答应了,他特意先在报上登了一个余屋招租的小广告,秋白同志夫妇就当作新从乡间来上海的人租住了他家的两间小楼房。谢澹如从此借辞谢绝了新文艺界的朋友到他家里去,而且除他本人外他的母亲和妻子等也绝不知道这对房客夫妇是什么人。那时就是在上海的党中央也并没有人直接到秋白的住处去,除之华同志有时出去和人取得联系外,经常就只经过我一个人去联系,而秋白同志自己是很少外出的,所以他们在这里住了近两年都没有出过问题。秋白同志的、后来由鲁迅先生收编为《海上述林》两大卷的译品以及许多重要的论文和杂文,大部分就都在这两年中完成的。只可惜谢家的这所房子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后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烧掉了,否则就很有纪念意义。

钱云锦《忆谢澹如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片断》:紫霞路68号我家在南市华界自置的一所楼房,占地七分多,三开间三进,环境相当僻静。当时我家人少,除了我们夫妇以外,还有澹如的老母、一

个孩子和几个佣工。一九三一年夏天，冯雪峰陪同瞿秋白夫妇来到我家隐居。从此，秋白夫妇就和我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

事先，澹如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他先取得我的同意，说是他的老朋友夫妻两人因养病需借住我家，然后再和我一起说服了他的老母亲（老太因家境富裕，一开始不同意出租余房）。与此同时，他在报上登了招租广告，在住房附近贴了几张租屋告示，以防万一。除了澹如，我和母亲都不知道这对夫妇的真实姓名和来历。当时，瞿秋白化名林复，我按上海人的习惯，称呼他为林先生，称呼杨之华为林家嫂嫂，两家亲密相处。

瞿秋白夫妇由冯雪峰陪同来我家时，秋白剪的平头，戴了副黑眼镜，穿了一件浅灰色的长衫，脚上是布鞋，完全是个教师先生的模样。他们夫妇两人只带了一个小皮包，别无他物。后来有人又送来了两口大皮箱。当天下午，杨之华就和我一起去蓬莱市场，购置面盆、口杯等日用品。

秋白夫妇住在二楼东厢房，家具都是现成的。对面厢房就是我家的书房。他们夫妇都喜欢我家的藏书。杨之华对我说过：进了书房，她就得花一天时间。一日三餐，我们两家都是一起吃的。饭后茶余，秋白喜欢和澹如谈天，也喜欢听收音机。有一次，他听评弹《三笑》，听出了味道，边听边议论，谈笑风生。有时，他还给我的大孩子讲故事。那一段时间，秋白足不出户，来看望他的，除了冯雪峰好象没有别人了。澹如也谢绝了文艺界进步朋友到我们家来，以免发生意外。秋白通过雪峰和澹如，了解了当时“左联”和文化界的动向。

杨之华《忆秋白》：紫霞路在上海南市，六十八号是一幢三开间三进的旧式大楼房。……

在我们搬进去之前，为了迷惑敌人，由谢澹如先生出面，在报纸上登了一则“余屋出租”的广告。我们就拿了这张报纸，用林淇祥这个假名，装作刚从乡间到上海的，去看房子。双方表示满意。我

们就搬进去住了。

为了掩护秋白，谢旦如先生从此借辞谢绝一些朋友到他家里去，并且不让他的母亲和妻子知道我们的真实姓名和来历。

我们住在边楼上，房间比较狭小，家具都是借用谢家的。在这里，我们很少和外界来往，过着严格的秘密生活。秋白一天到晚伏在桌子上看书，写文章和翻译，只是偶而在一张旧沙发上坐坐，或者独自玩骨牌“过五关”，或者是在房间里踱步，活动一下身体。我们在这里前后共住了一年半时间。

同月 翻译列宁名著《卡尔·马克思》一书中的《马克思底学说》、《哲学的唯物论》两部分。1939年，被收录在《社会科学概论》一书中，由上海霞社校印。

同月 开始主动领导“左联”工作，从事革命文学运动。

后来，茅盾有诗记其事，诗中有句云：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这样，秋白同志就开始和左联发生关系，并且比较直接地领导我们工作了，因为我大概三四天到他那里去一次，至少一个星期去一次，主要是去和他谈左联与革命文学运动的情况，讨论问题，和拿他写的稿子。住进谢家后，他最初写的是《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等论文。……

从这时到他离开上海时（一九三四年一月）为止的两年半之间，秋白同志的工作与领导对于当时左联和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可以说是和鲁迅先生所起的影响差不多相等的。两人的关系也就开始于秋白同志住进谢家的这个时候。

……

而秋白同志来参加领导左联的工作，并非党所决定，只由于他

^① 茅盾《赠丁景唐》诗，写于1980年11月病中。转引自丁景唐：《记茅盾悼念秋白同志的一首遗诗》，未刊稿。

个人的热情；同时他和左联的关系成为那么密切，是和当时的白色恐怖以及他的不好的身体有关系的。

夏衍《懒寻旧梦》：“左联”成立前后的领导骨干，调走的调走，牺牲的牺牲（调走的有李一氓、冯乃超、洪灵菲、童长荣等），领导力量薄弱，工作困难，这时，潘（汉年）才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中央已经决定上海一带的文化工作由瞿秋白同志来领导，他经验丰富，和鲁迅、茅盾的关系也很好，今后‘文委’开会时，他会来参加的。”（不久后，阳翰笙也悄悄地告诉了我这个消息。）^①

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一九三一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三年里，王明等人对秋白进行了无情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下去，相反，他根据自己的特长，主动地为党在文化战线上做了许多工作。……我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他遵守纪律，四中全会上撤销他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后，我问他准备怎样，他说听从党的分配，以后几年果然行如其言。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我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不久，瞿秋白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六届四中全会后，秋白遭到王明的打击，被排挤出中央领导岗位，有半年没有工作。我曾去看望过他，他肺病复发，正在休养，但精神仍旧很好。他表示想改行搞文学。果然，现在他真的来“搞文学”了。他知道我担任行政书记，就约我去谈。在这之前，我们在交往中，如四月底他在我家中避难时，我已经把

^① 潘汉年与夏衍谈话时间是在“一九三一年夏”。据杨之华回忆，自秋白在六届四中全会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后，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初，不分配他工作，且一直处在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当时，王明控制的中央似不可能分配他负责领导“左联”及“文委”的工作。秋白与“左联”的领导关系，究竟是不是中央的决定，待查证。

我对“左联”的意见向他直说过，例如“左联”象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等等。他大致上同意我的看法。现在他找我谈，就提出须要改进“左联”的工作。他建议《前哨》要坚持办下去，作为“左联”的理论指导刊物，另外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登创作。我说，我与鲁迅、雪峰也研究过这个问题，有这样的打算。他又提出，要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一九二八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进行研究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他并且建议我作为“左联”行政书记先写一两篇文章来带个头。

30日 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署名瞿秋白。文章论述了文学革命的意义和任务，指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他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的普通话，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而正在产生出来；文学的责任，就在于把这种新的言语，加以整理调节，而组织成功适合于一般社会的新生活的文腔。

这是秋白领导“左联”和文学革命后写的第一篇文章。

夏衍《追念瞿秋白》：我和秋白同志发生工作关系，记得是在一九三一年的春夏之交，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我介绍的同志并没有说出他的真实姓名，可是几次谈话之后，彼此心领神会，就知道他是《赤都心史》的作者了。大家都能回想得起，一九三一年前后正是狂风暴雨的时代，那时候的白色恐怖是异常严重的，在这样一个时期，他给我第一个印象，是出乎意外的安详。态度很舒坦，布置工作很细致，这恰恰和同一个时期的某些同志的激昂、焦躁、乃至若干轻率的态度，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同时，大家也都能回想得起，秋白同志来参加文化工作的领导，正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正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可是，在我和他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心情。日常谈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潇

洒”，那样的幽默，可是一接触到工作，他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对敌人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具有那样强烈的敌忾和仇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最经不起打击——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打击，而在秋白同志身上，是一点也找不到牢骚、委屈之类的个人主义情绪的痕迹的。他从来不谈个人的事，不谈过去的事，在任何困难危险的情况之下，他永远是那样的爽朗、愉快，丝毫没有感情上的阴影。他的这种高度的党性，高贵的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六 月

10日 写《学阀万岁》一文。

文章认为：要实行“文艺革命”，必须首先实行“文腔革命”，“就是用现代人说话的腔调，来推翻古代鬼说话的腔调，专用白话写文章，不用文言写文章。……还必须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就是实行“文字革命”。

七 月

因河北省委遭破坏，王明控制的中央决定派瞿秋白出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因故未成行。

马辉之《怀念瞿秋白同志》：一九三一年六月，中共河北省委遭到敌人破坏。七月间我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省委被破坏的情况时，中央领导同志通知我，决定瞿秋白同志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并要我约秋白同志一道北上。按照约定的时间，我和秋白同志在杨树浦英租界的一个公园里接了头。一年多不见，他更加消瘦了。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他想的仍

然是革命的命运和前途。当我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后，他当即表示：“党中央决定我去河北，我坚决服从。只要革命需要，去哪里，干什么，我都诚恳接受。”他非常关心组织和同志的安全，略沉思了一会，又说：“可不可以你先走，我随后就到。因为我在平津的熟人很多，一道走对组织的安全不利。”事后，我考虑到秋白同志和组织的安全，向组织上请求另派他人，组织上接受我的建议后，我就离开了上海。

24日 作《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的中国文?》一文，署名瞿秋白。文章认为：“拼音制度的新中国文应当完全脱离汉字的束缚，用罗马字母拼音，——拼音的方法尽可能的简单而有系统。”

同月 写《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研究》一文，署名瞿秋白。

八 月

10日 写文学评论《画狗吧》一文，发表在9月出版的《北斗》创刊号上，署名董龙。文章对刚出版的张天翼的《鬼土日记》作了评论。指出：“画鬼容易画狗难”。如果是画狗，随便什么人一看就知道像不像。现在画的是鬼，那就只有鬼知道了。

15日 写《哑巴文学》一文，发表在《北斗》创刊号上。署名董龙。文章提出：新文学界必须发起一种朗诵运动。朗诵之中能够听得懂的，方才是通顺的中国现代文写的作品！……中国虽然没有所谓“文学的咖啡馆”，可是，有的是茶馆，……然而茶馆里朗诵的作品，才是民众的文艺，这种“茶馆文学”总比哑巴文学好些——因为哑巴文学尽让《三笑姻缘》之类占着茶馆。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九三一年，我独自住在环龙路的一家三楼上，我无牵无挂，成天伏案书写。……这不是我的理想，我不能长此离群索居，我想并且要求到苏区去。但后来，还是决定我留在上海，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我第一次听从组织的分配，兴致勃勃的四出组稿，准备出版。这时冯雪峰同志常常给我带来鲁迅和秋白的稿件，我对秋白的的生活才又略有所知。……他那时开始为《北斗》写“乱弹”，用司马今的笔名，从第一期起，在《北斗》上连载。“乱弹”内容涉及很广，对当时的政治腐败，社会的黑暗等，都加以讽刺，给予打击，后来又翻译了很多稿件，包括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特别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写的评论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等的论文，词意严正，文笔锋利。秋白还大力提倡大众文学，非常重视那些街头书摊上的连环图画、说唱本本等。他带头用上海方言写了大众诗《东洋人出兵》，这在中国文学运动史上是创举。在他的影响下，左联的很多同志也大胆尝试，……

秋白还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他论述的范围很广，世界的，苏联的，中国的。他的脑子如同一个行进着的车轴，日复一日的在文学问题上不停地旋转，而常常发出新论、创见。为了普及革命文化，秋白还用了很长时间研究我国文字拉丁化问题。

以前，我读过《海上述林》，最近我又翻阅了《瞿秋白文集》。他是一个多么勤奋的作家呵！他早在苏联的时候，一直是那么不倦的写呀，译呀。而三十年代初，他寄住在谢澹如家，躲在北四川路的小室里，虽肺病缠身，但仍是日以继夜的埋头于纸笔之中，他既不忘情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又要应付当时党内外发生的许多严重复杂的问题，他写的比一个专业作家还多得多呵！

18日 写杂文《猫样的温文》，发表在10月19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32号上。署名V·T。后编入“乱弹”时，改题为《猫样的

诗人》。

20日 写杂文《屠夫文学》，发表在8月20日出版的《文学导报》第三期上。署名史铁儿。后编入“乱弹”时，改题为《狗样的英雄》。

文章对民族主义作家黄震遐的《陇海线上》（刊于1931年2月《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和万国安所写“首先出现剿杀‘苏联红匪’”的小说《国门之战》（刊于1931年3月《前锋》第一卷第六期），进行了抨击。

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

现在，帝国主义的列强和中国各地方、各派各系的绅商需要战争，需要势力范围，也就是抢夺民众膏血的剧烈斗争。现在，中国的红白战争一天天的剧烈，所谓剿匪更是中国天字第一号的要紧事情。而剿杀世界的匪头——尤其是中国绅商的太上皇的意旨。这就更需要杀人放火，更需要战争。“凡是必需的，都是合理的”，这是哲学家的话头。文学家就要说：“凡是必需的，都是神圣的。”这样的神圣战争就要有狗样的英雄。

因此，中国绅商就定做一批鼓吹战争的小说，定做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叫做民族主义的文学。

九 月

3日 写杂文《一种云》，发表在10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一卷第二期上，署名笑峰。

6日 写文艺杂评《青年的九月》，发表在9月13日出版的《文学导报》上，署名史铁儿。

文章又一次批判了那些反共反苏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文学。

7日 写杂文“乱弹”（代序），发表在《北斗》第一卷第二期上，

署名笑峰。

文章认为一些艺术形式，原来很富生命力，来源于民间，一旦成为绅士阶级的消遣品便失去了活力。他写道：

昆曲原本是平民等级的歌曲里发展出来的。最早的元曲几乎都是“下流的俗话”。可是，到了乾嘉之世，昆曲里面早给贵族绅士的文人，填塞了一大堆一大堆牛屎似的“短钉”进去！……这已经绝对不是草台班的戏台！昆曲已经被贵族绅士霸占了去，成了绅士等级的艺术。

……不知怎么一来，在同光之世，我们就渐渐，渐渐的听着那昆曲的笙笛声离得远了，远了，一直到差不多听不见。而“不登大雅之堂的”乱弹——皮簧，居然登了大雅之堂。这本来是草台班上的东西。……

然而统治阶级不但利用这种原始的艺术，来施行奴隶教育；他们还要采取这些平民艺术的自由的形式，去挽救自己艺术的没落。于是乎请乱弹登大雅之堂。……

这样，皮簧乱弹又被绅商阶级霸占了去，成了绅商阶级的艺术。

文章进而指出：

这世界上的一切，其实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绅商阶级虽然已经是现代化的阶级，却仍旧带着等级的气味。他们连自己大吹大擂鼓吹着的所谓白话，都会变成一种新文言，写出许多新式的诗古文词——所谓欧化的新文艺。……所以乱弹已经不乱，白话也应当不白，欧化应当等于贵族化。一切都要套上马勒口，不准乱来；一切都要分出等级：用文雅的规律表示绅士的尊严，用奴才主义的内容放进平民艺术里去，帮助束缚平民的愚民政策。

文章在最后宣称：

然而这个年头，总有一天什么都要“乱”。咱们“非绅士”的

“乱”，不但应当发展，而且要“乱”出个道理来。

于是乎，咱们不肖的下等人重新再乱弹起来，这虽然不是机关枪的乱弹，却至少是反抗束缚的乱弹。

8日 写杂文《吉河德时代》，发表在10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一卷第二期上，署名笑峰。

文章提出了着眼于大众，发动大众的问题。

9日 写杂文《非洲鬼话》，发表在《北斗》第一卷第二期上，署名笑峰。

文章针对黄震遐描写蒋、冯、阎大战的小说《在陇海线上》中，将蒋军（“中央军”）比为法国的“客军”，将中国比为“非洲”。秋白在本文中便因袭着这个比喻来反嘲“民族主义文学”。

10日 写杂文《世纪末的悲哀》，发表在《北斗》第一卷第二期上，署名笑峰。

文章针对国民党的血腥统治以及那些躲进象牙塔的文人墨客们，称前者为“武痴”；后者为“文痴”。

28日 在《文学导报》第五期上发表长歌《东洋人出兵（乱来腔）》，署名史铁儿。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军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东北军，并用重炮轰击沈阳城。东北军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下，于19日弃守沈阳。随后，日本侵略军得寸进尺，迅速占领整个东北，是为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后不久，秋白三次化装与谢澹如一起逛上海南市城隍庙。他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艺人领着一个小姑娘边唱“小热昏”，边卖梨膏糖。他被民间文艺深深打动，回到家中，便运用“小热昏”这类民间小调写下了长歌《东洋人出兵（乱来腔）》。秋白在前言中写道：

日本出兵满洲，国民党的政府军队的长官却赶紧逃命，叫做什么无抵抗，国民党原本是地主、买办、官僚资本家的党，他

们宁可把国家送给日本帝国主义,送给美国帝国主义,送给国际联盟的帝国主义,他们决不能救国的。我们千万不能够再让中国放在国民党手里,放在这个地主、买办、官僚资本家的手里。因此,在下编了一首歌,叫做《东洋人出兵》,说说这里面的道理。这首歌的调头是没有什么一定的,大家随口可以唱,所以叫做乱来腔。谁要唱曲子唱得好,请他编上谱子好了,欢迎大家翻印。欢迎大家来唱,欢迎大家来念。一人传百,百人传千。提醒几万万人的精神,齐心起来救国。底下写着上海话和北方话两种歌词,大家请便。

《东洋人出兵》曾作为宣传品印成小册子散发给群众,并且风行一时。此后,秋白还写下《可恶的日本》、《十月革命调》等一些通俗歌词。

同月 写《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一文,发表在《文学导报》第五期上,署名史铁儿。

同月 中国工人在海参威召开了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以瞿秋白于1928年在莫斯科写的《中国拉丁化字母》的小册子为基础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正式作出了中国新文字的新方案,这就使中国文字改革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开辟了中国新文字发展的道路。

同月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国民政府”发出密令,重重悬赏通缉瞿秋白、周恩来、陈绍禹、沈泽民、张闻天、罗效贤(罗登贤)、秦邦宪等七人,并拟定悬赏金额:瞿秋白、周恩来两人各两万元,其他五人各一万元^①。

^① 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第17126号公函》,原件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十月

写《陈独秀的〈康庄大道〉》，发表在10月30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二十二期上，署名史铁儿。

文章批评陈独秀提出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是“做着第二个五卅运动的梦”，是“要和资产阶级妥协，要引诱工人去投降资产阶级，屈服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豪绅地主。”

25日 写《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长文，发表在“左联”于1932年4月出版的《文学》上，署名史铁儿。在辑入“乱弹”时曾作了一些修改。

文章认为：

现在的主要工作，因此应当是创造普洛的大众文艺，——应当向那些反动的大众文艺宣战。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可以造成新的群众言语，新的群众文艺，站到群众的“程度”上去，同着群众一块儿提高艺术的水平线。……

文章指出：

普洛大众文艺应当立刻实行，应当认真的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第一，用什么话写。第二，写什么东西。第三，为着什么而写。第四，怎么样去写。第五，要干些什么。

在“用什么话写”的一章中，文章认为：

第一，当然不是用“周朝话”来写，就是绝对的不是用文言来写。

第二，也不能够用五四式的白话写。五四式的白话，表现的形式是很复杂的：有些只是梁启超式的文言，换了几个虚字眼，不用“之乎者也”，而用“的吗了呢”，这些文章，叫士大夫看起来是很通顺的。有些是所谓“直译式”的文章，这里所容纳的外国字眼和外国文法并没有消化，而是囫圇吞枣的。这两大类的所谓白话，都是不

能够使群众采用的,因为读出来一样的不能够懂。……

第三,也并不是用章回体的白话来写,这种白话,最好的象《水浒传》《红楼梦》,也只是明朝或者清朝话;而且同是省略的纪录,并不能够完全代表当时人口头的话的。……

文章又认为:

而要用现在人的普通话来写——有特别必要的时候,还要用现在人的土话来写(方言文学)。……标准是:当读给工人听的时候,他们可以懂得。

在“写什么东西”的一章中,文章认为:现在新式白话作品的体裁,大半已经很欧化的了。……但是对于民众,这种体裁是神奇古怪的,没有头没有脑的。……普洛文艺至今用全部力量去做摩登主义的体裁的东西,……而革命的普洛文的文艺因为这些体裁上形式上的障碍,反而和群众隔离起来。这也同样是不了解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任务的错误。

所以普洛大众文艺所要写的东西,应当是旧式体裁的故事小说,歌曲小调,歌剧和对话剧等,因为识字人数的极端稀少,还应当运用连环画的形式;还应当竭力使一切作品能够成为口头朗诵,宣唱,讲演的底稿。我们要写的是体裁朴素的东西——和口头文学离得很近的作品。

可是,也要预防一种投降主义,就是盲目的去模仿旧体裁。这里,我们应当做到两点:第一,是依照着旧式体裁而加以改革;第二,运用旧式体裁的各种成分,而创造出新的形式。

在“为着什么而写”的一章中,文章指出:

(一)是鼓动作品,所谓“agitha”。这当然多少不免要有标语口号的气息,当然在艺术上的价值也许很低。但是,这是斗争紧张的现在所急需的。所谓“急就章”是不能够避免的。

(二)为着组织斗争而写的作品。……这里,当然首先是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劳

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罢工、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当然是主要的题材。同时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绅士地主阶级的一切丑恶，一切残酷狡猾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一切没有出路的状态，一切崩溃腐化的现象，也应当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去揭发他们，去暴露他们。……这里，当前的斗争任务是：反对武俠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宣传苏维埃革命，宣传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三)为着理解人生而写的作品。……工人，农民，一切贫苦的民众，他们有自己的私人生活，他们受着宗法社会和封建观念的束缚，他们也有恋爱，他们也有家庭，他们要求生活，他们要求解放。……在反对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文艺里，就要一贯的贯彻反对宗法主义和市侩主义的斗争。为着这种目的而写的作品，可以是劳动民众的私人生活的故事，恋爱的故事，宗法社会的牺牲，成家立业幻想的破产……以及无产阶级的理想(社会主义)的解说。

在“怎么样去写？”的一章中，文章写道：

普洛作家要写工人，民众的一切题材，都要从无产阶级观点去反映现实的人生，社会关系，社会斗争。如果仅仅把几句抽象的理论，用说书的体裁写出来，就可以当做文艺作品，那就根本用不着普洛文学，……。文艺作品应当经过具体的形象，——个别的人物和群众，个别的事变，个别的场合，个别的一定地方的一定时间的社会关系，用“描写”“表现”的方法，而不是用“推论”“归纳”的方法，去显露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历史的必然和发展。这就须要深切的对于现实生活的了解。

文章还指出一些“用轻率态度来对大众文艺”的错误做法，如“感情主义”、“个人主义”、“团圆主义”、“脸谱主义”等。

在“要干些什么”的一章中，写道：

(一)开始俗话文学革命运动——这是要完成白话文学运动的任务，要打倒胡适之主义，象现在要打倒青天白日主义一样。胡适之的白话定义是：“说白之白，清白之白，黑白之白。”这理论已经种

下了文言本位的改良主义,虽然适之自己做的文章倒还通顺,……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彻底的俗话本位的文学革命。

(二)街头文学运动——开始做体裁朴素的接近口头文学的作品:说书式的小说,唱本,剧本等等。这需要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去学习。

(三)工农通讯运动——要开始经过大众文艺来实行广大的反对青天白日主义的斗争,就必须立刻切实的实行工农通讯运动。

(四)自我批评的运动——为着普洛现实主义的斗争,必须实行更深刻的自我批评。……具体的步骤就是要在文学报上开始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开始关于一般创作方法的讨论。只有斗争,和一切不正确倾向的斗争,才能够锻炼自己的力量,才能够发展革命的普洛的文学运动。

25日 写文艺杂著《美国的真正悲剧》(笑峰乱弹之六),发表在《北斗》第一卷第四期上,署名笑峰。

25日至28日 写杂文《民族的灵魂》,发表在1932年1月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二期上,署名司马今。编入“乱弹”时,曾作较多的删改。

26日 写《鹦哥儿》一文,发表在1932年1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一期上,署名司马今。

文章批判了中国资产阶级。

同日 写《沉默》一文,发表在《北斗》第二卷第一期上,署名司马今。

文章写道:

夏天,暴风雨之前,霹雳的雷声正要响出来可还没有响的那几秒钟,宇宙间的一切都象静止了,——好比猫要扑到老鼠身上去的时候一样,它是特别的沉默,——一根绣花针落到地板上去都可以听得见的。这种静止和沉默之后,跟着就要有真正震动世界的霹雳!

28日 写《新鲜活死人的诗》一文,发表在《北斗》第二卷第一期上,署名司马今。

同月 受鲁迅委托译《〈铁流〉序言》(苏联G·涅拉陀夫作),署名史铁儿。

《铁流》系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所作的长篇小说,由曹靖华译成中文。鲁迅为该书的出版作了很大努力,他不仅亲自校稿,而且筹备经费,决定用“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出版。16日,鲁迅接曹靖华来信,说《铁流》作者绥拉菲摩维支《全集》的编者涅拉陀夫有一篇关于《铁流》的序文,在原书卷前,题名《十月的艺术家》,原来想译,奈篇幅较长,因开学在即,再没有翻译功夫,只得放下,拟在第二版时再补入。鲁迅读信后,不无遗憾,且发稿在即,为使译作尽可能比较完美,即通过冯雪峰委托秋白赶译这篇序文。秋白愉快的接受了这一任务,在很短时间内,就把近两万字的长序翻译出来了。他在将译文交送鲁迅时,附了一封短柬:

迅、雪:

这篇序是译完了。简直是一篇很好的论普洛创作的论文。其中所引《铁流》原句只有一半光景是照曹译的,其余,不是曹译不在我手边(在下半部),就是作者自己更动了些字句,我想可以不必一致,这是“无关宏旨的”……

冯雪峰《回忆鲁迅》:这个共产党著名人物(瞿秋白),鲁迅先生早已知道的。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是一个有天才的作家,鲁迅先生也当然知道的。所以,鲁迅先生从最初在我口里知道了秋白同志从事文艺的著译并愿意与闻和领导左联活动的时候,就和我们青年人一样,很看重秋白同志的意见,并且马上把秋白同志当作一支很重要的生力军了。虽然那时他们还没有见过面。例如,最初我把秋白同志口头上谈到的关于鲁迅先生从日本转译的几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译文的意见,转达给鲁迅先生的时候,鲁迅先生并不先回答和解释,而是怕错过机会似地急忙说:“我们抓住

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鲁迅先生说话时的情态，我实在无法形容，……

鲁迅先生对于秋白同志，也首先看重他的翻译，认为在国内的文艺界是找不出第二个人可与他比较的；但也并非不看重他的杂文和论文。对于秋白同志的杂文，在谈话中我曾听到鲁迅先生有过这样的评论：尖锐，明白，“真有才华”。但他也表示过秋白同志的杂文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等等的意见。这一层，秋白同志自己也承认，也许我曾经把鲁迅先生的意见告诉过秋白同志罢，我记得在上海和后来在瑞金都曾经闲谈到这一层。可是，我又觉得鲁迅先生却也并不以为他在跟我闲谈时表示的意见，是秋白同志的杂文以及一般杂文的缺点，因为他更看重文字的明白畅晓：他就曾经几次谈到秋白同志的这一方面的优点，说道：“何苦的文章，明白畅晓，是真可佩服的！”（“何苦”，是秋白同志不知在什么时候自取的别名之一，鲁迅先生、许广平先生、茅盾先生夫妇、周建人先生夫妇、我和我的妻子以及一二个知道他并知道这个别名的左联同志，都爱用这个别名称他；在当时的环境用这别名也觉得最方便，并且又容易叫，而叫起来又有亲爱的感觉。……）

……

这个时候，两人虽然还没有见过面，也并没有什么通信，来往只是事务性的条子，大半事情都是经过我在口头上替他们相互传达和商量的；但他们中的友谊已经很深了。例如鲁迅先生一九三一年十月初写的《〈铁流〉编校后记》里，有这样几句话：“……在现状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较好的书，这书虽然仅仅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这里“译的”当然是指《铁流》译者曹靖华先生，“补的”就是指秋白同志，“校的”是指他自己；我们只看这说话的口吻就可以感觉到，鲁迅先生

是已经把秋白同志看作自己的多年的老朋友似的了。

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一九三一年秋，我在列宁格勒利用暑假，译完了《铁流》附录部分，没有功夫再将该书最主要的一篇长序译出来。鲁迅先生又急着将书出版，于是就请你（秋白）在那“岩石似的重压之下”，将那篇序文译了出来。鲁迅先生当时往列宁格勒去信说：“《铁流》长序在此已另请人译，那人你是认识的”。但始终没有料到这就是你！那真是作者之幸，译者之幸，中国广大读者之幸呵！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译笔了。鲁迅先生在《〈铁流〉编校后记》中说：

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遗憾。幸尔，史铁儿竟特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读者倘将这附在卷末的《我怎样写〈铁流〉的》都存细地研读几回，则不但对于本书的理解，就是对于创作，批评理论的理解，也都有很大的帮助的。

十一月

7日至20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最高政权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秋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0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四卷第六期上，发表论文《托洛茨基派和国民党》及《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二文，署名秋白。

20日 应鲁迅要求，重译俄国作家卢那察尔斯基的剧作《解放了的董·吉河德》，发表在12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二、三、四期上，署名易嘉。

这一剧本的第一场，由鲁迅从日文转译的。从第二场起，秋白应鲁迅的要求，直接从俄文翻译，并在《北斗》连载下去。但至1932

年7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登完第三、四场后,译文和《北斗》的停刊一同中止了。

剧本的主题是:革命只有到达了目的地,才能“脱掉染着血腥的盔甲”,“只有那样的世界里面,真正解放了董·吉河德,才可以找着和谐的光明”。

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后来又拿卢那察尔斯基的《被解放了的董·吉河德》俄文原本请他(秋白)翻译,在《北斗》杂志上连载;这剧本,本来鲁迅先生已经根据日文译本翻译了第一场,并已经用了“隋洛文”的笔名在《北斗》第三期登出;鲁迅认为最好是请秋白同志从原文从头翻译,继续在《北斗》连载,并拟再出单行本。秋白同志也欣然答应,并且立即动手,在《北斗》第四期就登了剧本第二场的他的译文(用“易嘉”这笔名),还用了编者名义附了一点声明:“找到了一本新的版本,比洛文先生原来译的那一本有些不同,和原本俄文完全吻合,所以由易嘉从头译起。”(这声明就是秋白同志自己写的,不明说而又暗示直接从俄文翻译,是带有对当时反动政府的检查官放烟幕并开点顽笑的意思。)

24日 写论文《巴黎会议和瓜分中国的阴谋》一文,发表在《红旗周报》第二十五期上,署名范亢。

2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

同月 左联执委会通过由冯雪峰起草,经秋白帮助修改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十一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执委会也研究了多次。这个决议可以说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这是对于一九三〇年八月那左倾决议的反驳,它提出的一些根本原则,指导了“左联”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活动。决议分析了形势,明确了任务,并就

文艺大众化问题、创作问题、理论斗争与批评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特别是一反过去忽视创作的倾向,强调了创作问题的重要性,就题材、方法、形式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现在看来,虽然还有某些左倾的流毒(如在形势分析中提出特别要反右倾以及组织上的关门主义),但决议提出在文学领域里的各种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我以为,这个决议在“左联”的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可以说,从“左联”成立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是“左联”的前期,也是它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逐渐摆脱出来的阶段;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时期。它已基本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统治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一九三二年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比之三〇、三一年是更猖獗了),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十二月

5日 写《论翻译——给鲁迅的信》,发表在12月11日、25日出版的《十字街头》第一、二期上。署名J·K。此信为鲁迅连同自己的覆信编入杂文《二心集》中。

秋白在信中写道：我的意见是：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为着保存原作的精神，并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顺”。相反的，容忍着“多少的不顺”（就是不用口头上的白话），反而要多少的丧失原作的精神。

秋白还在信中直率地指出了鲁迅所译《毁灭》的一些问题：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和自己商量一样。

冯雪峰《回忆鲁迅》：秋白同志稍后在给鲁迅先生讨论翻译的信里也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是确实的。

他们的亲密就建立在对于共同的战斗与工作的热情和同志的赤诚的关系上，见不见面是没有关系的。秋白同志的讨论翻译的信，就是这种热情和这种关系的一种典范的表现。这是他读了鲁迅先生送给他的刚刚出版的《毁灭》，迫于一种热情而写的信，原来不是要公开发表的。那时鲁迅先生和我合编的《十字街头》旬刊刚出版不久，鲁迅先生以为可以在这旬刊上发表，所以就发表了；接着也发表了他的回信。这个讨论在当时以及后来对于翻译界是发生了影响的。

他们两人最初的见面，根据我的记忆，大概就在《毁灭》译本出版的时候；鲁迅先生带了海婴先去看一次秋白同志夫妇。那时候，环境是那樣的坏，两人相互来往，是非常不便的。

6日 写《斯大林与文学》一文，未发表。

16日 写《南京政府的下马威》一文，发表在17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二十七期上。署名范亢。

17日 写《满洲的〈毁灭〉》一文，发表在1932年1月5日出版的《十字街头》上。署名 SmaKin。

同日 写杂文《〈铁流〉在巴黎》发表在12月25日出版的《十字街头》第二期上。署名 SmaKin。

25日 写杂文《流氓尼德》，发表在1932年1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一期上。署名司马今。

27日 写散文《暴风雨之前》，发表在1932年1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一期上。秋白在文中写道：

暴风雨快要来了。暴风雨之中的雷霆，将要辟开黑幕重重的靛青色的天，海翻了个身似的泼天的大雨，将要洗干净太阳上的白翳，没有暴风雨的发动，不经过暴风雨的冲洗，是不会重见光明的。暴风雨呵，只有你能够把光华灿烂的宇宙还给我们！只有你！

但是，暂时还只在暴风雨之前。“龙的苍蝇”始终只是些苍蝇，还不是龙的本身。龙固然已经出现了，可是，还没有扫清整个天空啦。

一九三二年 34岁

一月

9日 写论文《论弗理契》，发表在9月15日出版的《文学月报》上。署名宋阳。文章指出：弗理契是专门研究文艺科学的第一人。固然，在他之前已经有过普列哈诺夫……，然而应用互辩法的唯物论来专门研究文艺的，而且留下真正有专门科学价值的著作的，始终要算弗理契。普列哈诺夫只给了些一般的理论上的论文，而弗理契方才开始用这种理论研究了具体的文艺现象。

16日 写论文《苏联文学的新阶段》，未发表。

21日 在今日出版的《斗争》创刊号上，发表《国民党各派的一致和矛盾》一文。

28日 日军进攻上海闸北、江湾，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是为“一·二八”事变。因避战祸，随谢家由紫霞路移居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毕兴坊10号。

杨之华《回忆秋白》：“一·二八”战争爆发后，我们随同谢家搬到法租界毕勋路毕兴坊十号住了三个月。战争结束后，又随同谢家搬回原处，改住在三楼中间正屋里，一直住到一九三二年冬天发生警报才离开。

钱云锦《忆谢澹如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片断》：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我们两家就从南市迁居到法租界毕勋路（今

汾阳路)毕兴坊10号。我家住二楼,瞿秋白夫妇住三楼。那时,澹如母亲故世不久,一楼还设有灵堂。因杨之华象亲人一样帮助我料理丧事,所以来往我家的亲戚都对这位房客——林家嫂嫂颇有好感,这对秋白夫妇隐居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在毕兴坊住了五、六个月,“一·二八”战争结束,我们又搬回紫霞路68号。这次瞿秋白夫妇住在三楼正中房间里。

同月 写《财神的神通》、《狗道主义》、《红罗卜》、《忏悔》、《反财神》、《小白龙》等五篇杂文,发表在7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上,署名司马今。

二 月

26日 在《中国与世界》第十期上,发表《太平洋战争中的上海问题》一文。

三 月

1日 写《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一文,发表在3月11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31期上。署名范亢。文章指出:“工厂小报是宣传最广泛的群众的工具。……所以工厂小报实是党和工会的很重要的工作”,“党的宣传,首先是要‘脸向着群众’”。

6日 写《国民党出卖上海的无耻勾当》一文,发表在3月18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32期上,署名范亢。文章揭露说:原来国民党在上海和日本打仗,根本就罚咒不要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而只要打给英美列强看看,只要借这个苦肉计“激动世界的公平真理”,就是请英美列强来和日本共同瓜分。现在“目的已达”,可以退兵,可以让日本和列强来管理上海,设立所谓中立区等等了!而且,国民党在上海和日本打仗,根本就不是他们自己愿意打的,这是被

兵士民众的革命情绪逼出来的。他们的“打仗”还是打给群众看看的，为的要欺骗群众，维持自己对于军队的指挥权，以便指挥兵士退却；现在这个目的也一部分达到了，所以想继续这种无耻勾当，进一步的卖国了。

10日 写《谈谈〈三人行〉——评茅盾的〈三人行〉》一文，发表在5月1日出版的《现代》第一卷第1期上。署名易嘉。文章对茅盾写的中篇小说《三人行》持批评的态度。

同日 写杂文《新英雄》、《不可多得的将才》，发表在5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2期上。署名司马今。

12日 写《国民党还能谈领导权吗？》，发表在《红旗周报》第33期上。署名范亢。

13日 写杂文《拉块司令》，发表在《北斗》第二卷第2期上。署名司马今。

15日 写《小诸葛》一文，发表在《北斗》第二卷第2期上。署名司马今。

同日 重写《大众文艺问题》一文，发表在6月10日出版的《文学月报》创刊号上。署名宋阳。文章认为：现在决不是简单的笼统的文艺大众化问题，而是要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问题。这是要来一个新的，新兴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新兴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这是要新兴阶级来领导肃清封建意识的文化斗争，彻底执行这个民权主义的任务；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对这种文化革命的力量，他们反而在竭力维持封建意识，维持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借此更加加重他们的剥削，散布资产阶级的意识，因此，这个文化革命的斗争——同时要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而且准备着革命转变之中的伟大的文化改革——向着社会主义的前途而进行。

16日 写通俗唱词《江北人拆饼头》，曾收入1940年1月1日震社出版的《街头集》。手稿署名易阵风。

18日 写杂文《老虎皮》，发表在《北斗》第二卷第2期上。署名司马今。

20日 写杂文《匪徒》，发表在《北斗》第二卷第2期上。署名司马今。

26日 写《工人阶级和上海的和平会议》，发表在4月28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35期上。署名范亢。文章指出：上海的所谓停战会议或者和平会议，以及国联派来的什么检查团，就是国际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指挥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来屠杀压迫剥削中国工农兵群众的机关！这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机关。

30日 修改半由杨之华翻译的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两篇短篇小说。

同月 写《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一文，发表在4月25日出版的《文学》半月刊第一卷第1期上。署名同人。文章指出：满洲事变发生之后，直到上海战争爆发，中国的民众是站在一个新的问题的前面；革命的民族战争被中国的地主阶级压制着，出卖着。这里，问题是比较的复杂。劳动民众是不是简单的拥护十九路军？或者，反对上海战争。这显然是不对的。中国工人阶级对劳动民众说，我们大家都要赞助，参加，尤其要自动的去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但是，同时必须反对压制和出卖“革命的民族战争”的中国地主资产阶级。这才是正确的态度。这也就是中国革命普罗文学应当采取的态度。

同月 代表中宣部出席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由潘梓年主持的丁玲、田汉、叶以群、刘风斯等人的入党仪式。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后，我要求参加共产党，很快被批准了。可能是三月间，在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间雅座举行入党仪式。同时入党的有叶以群、田汉、刘风斯等。主持仪式的是文委负责人潘梓年同志。而代表中央宣传

部出席的，赫然使我惊讶的却是瞿秋白同志。我们全体围坐在圆桌周围，表面上是饮酒作乐，而实际是在举行庄严的入党仪式。我们每个人叙述个人入党的志愿。……潘梓年、瞿秋白都说了话。

四 月

1 日 在《现代》第二卷第 6 期上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

同日 在《红旗周报》第 34 期上发表《中国的假革命党和中俄复交问题》一文。署名范亢。

8 日 写《日本对苏联的不断挑衅》一文，发表在 4 月 20 日出版的《斗争》上。署名狄康。

9 日 写《国难会议和民宪协进会的丑态——地主买办军阀资产阶级进攻工农的两种策略》一文，发表在 4 月 22 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 37、38 期合刊上。署名范亢。文章指出：地主官僚军阀买办和资产阶级还有另外一种策略。这就是觉得国难会议这样简单的“御侮”招牌欺骗不了民众，认为必须提出所谓“实现宪政”的问题——也就是第三党，陶希圣派直到托陈取消派所主张的国民会议，——来欺骗群众，才更加能够和真正民众政权的工农兵会议运动对立起来，一方面诱惑群众，使他们不那么急进的革命化，别方面可以大大的加强进攻苏维埃红军的力量，“要求宪政，取消党治”的真正意义是在这里。

20 日 写《申报的武断宣传》一文，发表在 5 月 7 日出版的《红旗周报》上。署名范亢。文章揭露说：“上海的申报，算是招牌最老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报纸了。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它也“左”起来了。这所谓“左”显然是想替中国地主资产阶级“趁早收买一部分人心”，——“换一个花样来欺骗民众”，“申报时评的‘左倾’，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别有作用的宣传，它正在很细腻的很调皮的准备着‘奥

论’，混淆着革命民众的视线，企图新翻花样的挽救反革命的统治。”

22日 写《革命的浪漫蒂克——华汉长篇小说〈地泉〉序》。本篇最初印入1932年版华汉(阳翰笙)著的小说《地泉》卷首。《地泉》为《深入》、《转换》、《复兴》三部曲的合集。该《序》认为：中国的新兴文学经过了自已的“难产”时期还不很久。华汉的《地泉》显然还留着难产时期的斑点，正确些说，这正是难产时期的成绩。这里，充满着所谓“革命的浪漫蒂克。”《地泉》的路线正是浪漫主义的路线。

夏 由冯雪峰陪同，造访鲁迅。

杨之华《回忆秋白》：秋白和鲁迅的第一次会晤，是在一九三二年夏天，我们从毕兴坊搬回紫霞路以后。

那天早饭后，秋白非常高兴地同冯雪峰同志去拜访鲁迅，直到晚上才回家。这个渴望已久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初次与鲁迅见面的经过，说彼此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他已邀请鲁迅全家到我们家来玩，鲁迅高兴地答应了。……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时间一久就忘记了月日，不记得是春末还是夏初光景，……那是1932年了，通过介绍，说有一位为了革命过着地下生活的人，想乘此大好时光，出来游散一下，见见太阳。但苦于没有适当地方。问起来，才知道是“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秋白同志，就约定于某日来我家盘桓一整天。

这一天天气特别和煦，似乎天也不负好心人似的。阳光斜射到东窗上的大清早，介绍人就陪同稀有的初次到来的客人莅临了我们的住处。除了秋白同志之外还有杨之华同志。

我们虽则住在北四川路底的电车终点站附近的一个公寓里，离开不远正是虹口公园，但在三楼上，四周都是外国人住着，比较寂静的，正适宜于我们迎接这样一位过着地下生活的革命者。

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白区对党内的人都认是亲人看待)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总之,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子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的吗?那情形就仿佛相似。他们本来就喜欢新生一代的,又兼看到在旁才学会走路不久的婴儿,更加一时满室皆春,生气活泼,平添了会见时的斗趣场面。

我是依稀如见故人般,对秋白同志似曾相识的。回忆起来,时间也许太久了。那还是在女师大做学生的时候,大约那时秋白同志刚刚从苏联回来,女师大请他来讲演的。那时我初到学校不久,讲话的内容全不记得了,总之是对于新社会苏联的报道方面的吧!为什么说似曾相识呢?就是从前见到的是留长头发,长面孔,讲演起来头发掉下来了就往上一扬的神气还深深记得。那时是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宣传鼓动员的模样,而1932年见到的却是剃了头,圆面孔,沉着稳重,表示出深思熟虑,炉火纯青了的一位百炼成钢的战士,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那天谈得很畅快。鲁迅和秋白同志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经过“一二八”上海战争之后不久),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得太快了似的;又象小海婴见到杨妈妈,立即把自己的玩具献出似的,但鲁迅献出的却是他的著作、思想。两两不同,心情却是一样的。

为了庆贺这一次的会见,虽然秋白同志身体欠佳,也破例小饮些酒,下午彼此也放弃了午睡。还有许多说不完要倾心交谈哩,但是夜幕催人,没办法只得分别了。

从此他们两人除各自工作外,更是两地一线牵(共同的革命意志和情感),真是海内存知己,神交胜比邻了。在革命战线上相互支援,在文化工作中共同切磋,使他们进一步建立了革命友谊,如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和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以及对文化战线上

各种反动势力的斗争等等,特别是鲁迅,由于得到秋白同志之助,得到党给与的力量,精神益加奋发,斗志更加昂扬地勇往直前了。

周建人《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同志》:

一九三二年,大约是初秋,在鲁迅家里,我第二次见秋白,并认识了杨之华。

我几乎认不出秋白了,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只见他满脸病容,面目浮肿,气色和精神都很坏。身上穿着一件长衫,破旧不合身,好象是从旧货摊上弄来的。

在这分别的八年时间里,革命从高潮走向低潮,秋白曾经历了一场什么样的风浪,我是不知道的。直到后来才听说,王明等人扬言要把秋白“一棍子敲出党外”。

鲁迅本来不认识秋白,可是一听说秋白在上海,而且有了困难,就想见他,相见以后,又热诚相待。

五 月

4日 写文学评论《“我们”是谁?》,批评何大白(郑伯奇)的文章《大众化的核心》一文(本篇发表刊物不详)。文章指出:普洛文学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出“大众化”的口号。可是,“大众化”的口号始终只是空谈,始终没有深刻的切实的研究,始终不去实行大众化的现实问题。……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普洛文学运动还没有跳出知识分子的“研究会”的阶段,还只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不是群众的运动。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队伍,还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教师,而根本不肯“向大众去学习”。因此,他们口头上赞成“大众化”,而事实上反对“大众化”,抵制“大众化”。何大白的这篇文章就暴出这一类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这使我们发见“大众化”的深刻的障碍,——这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青年”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

众。

郑伯奇《回忆瞿秋白烈士》：

当时正是文艺大众化运动发生争论的时候，我用何大白的笔名发表了《大众化的核心》一篇短记。原文手头遗失，如今不能作全面的检查，仅就瞿秋白烈士所引用的部分来看，错误是很严重的。我把作者——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大众对立起来，而很轻率地说道：“我们的方法错误了么？不是。”对于大众化运动不能开展的原因不去虚心地作深入的考察分析，首先很笼统地来了三个“不是”，诚如瞿秋白烈士所指责的是“坚持错误”的态度。那么大众化运动没有成绩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从表面上提出了重重困难，而又错误地把主要困难推在工农大众身上。我说：“第一重困难在大众自己，就是大众对于我们的理解没有相当的准备。第二重困难在我们作者，就是作者对于大众的生活有没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感。克服这些困难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作者生活的大众化。”这里我不仅没有提到革命提到阶级斗争，而且把作者——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的阶级立场问题搁在一边，这真是本末轻重完全倒置，放弃了“核心”的问题。虽然也提到一句“作者生活的大众化”，实际是一句无力的空话。诚如瞿秋白烈士所指出的“这句话说了三四年仍旧没有实现。如今还只说这么一句空话的总话，当然等于没有答复问题。现在必须更具体的详细的解决所谓生活大众化的问题。……”但是，老实讲，在当时我就没作那样的精神准备。

我那篇含有错误思想的短文发表以后，瞿秋白烈士及时地提出了严肃的批评，题目是《我们是谁？》（见烈士遗著《乱弹及其他》第225—228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的立场态度问题。……

在这以后不久，瞿秋白同志很亲切地通过夏衍同志约我去谈话。记得是在旧名爱文义路北面一条横街（路名忘记了）口的弄堂里一所清静的院落里面我会见了瞿秋白烈士。他是比现在的画像稍显苍老的一个颇长的中年人。他穿着中国式的长衣。房子里只

有我们三人。他态度很宁静和蔼，细心地引导着我谈话。他把我的话用独特的拉丁化的文字记在他的笔记本上。他也对我发表了较长的谈话。在那样白色恐怖最厉害的环境之下，我们还谈了一个多钟头光景。

5日 写《欧化文艺》一文，未发表，1953年据手稿辑入《瞿秋白文集》（八卷本）第三卷。文章指出：新文艺——欧化文艺的最初一时期，完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运动，所以这种文艺革命运动是不彻底的，妥协的，同时又是小团体的，关门主义的。这种运动里面产生了一种新式的欧化的“文艺上的贵族主义”：完全不顾群众的，完全脱离群众的，甚至于故意反对群众的欧化文艺，——在言语文字方面造成了一种半文言（五四式的假白话），在体裁方面尽在追求着怪僻的摩登主义，在题材大半只在知识分子的“心灵”里兜圈子。……现在的“绅商知识分子”，自己发明的欧化的小说、诗歌、戏剧，弄些什么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等类的“魔道”玩耍玩耍；而另外还有武侠主义的连环图画，阶级妥协主义的时事小调……去迷惑群众，镇静群众，糟蹋群众。总之，统治阶级的文艺本来是脱离群众的，统治阶级的文艺政策总是用些恶劣的腐化的文艺在意识上来剥削群众的。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够完成民权革命在文化上的任务，它也绝对不愿意完成这种任务，而且正在反对民众自己的文化革命。而对于无产阶级，所有这些欧化文艺的流弊却是民众自己的文化革命的巨大障碍。

文章在论述文艺革命路线时指出：民众自己的文艺革命的路线是革命文艺的大众化：一方面要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别方面要使革命的欧化文艺大众化。……而中国的民众，尤其是中国工人的先锋队，同时也需要利用世界无产阶级的经验，接受世界的文化成绩。对于革命文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方才说得上所谓“欧化”。革命文艺的“大众化”，不但不和“欧化”发生冲突，而且只有大众化的过程之中方才能够有真正的欧化，——真正运用国际的经验。真正

的“欧化”是什么?这是要创造广大群众的新的文学和言语,创造广大群众的新的文艺形式,——足以表现现代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的,足以使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国际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理解国际的一般社会生活的。

8日 写书报评论《中国大革命史应当是这样写的么?——对于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的批评》,发表在7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五卷第1期(终刊号)上。署名范亢。

14日 在《红旗周报》第40期上,发表《日本对于苏联的不断挑衅》一文。署名范亢。

15日 译竣《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第三场。

16日 译高尔基论文《冷淡》。

18日 写《“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复胡秋原和〈文化评论〉》一文,发表在5月23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56号上。未署名。

文艺战线上,在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遭到左翼文艺队伍的沉重打击后,一些资产阶级文学家又打出“自由文艺”“第三种人”的招牌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普洛文艺。1932年,“文艺自由论者”胡秋原和自命为“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先后在《文化评论》和《现代》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叫嚷文艺和政治不并存,“文学和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认为文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表现“伟大的情思”,攻击无产阶级“将文艺堕落到一种政治留声机”,是艺术的叛徒,诬蔑左翼作家提倡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亵渎,说什么“革命勿侵略文艺”。秋白和鲁迅并肩作战,在5月到7月,展开了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等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进行了严正的批判。秋白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了胡秋原企图以“自由人”的“知识阶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运动领导权的野心。指出:问题的中心在什么地方?——《文化评论》和胡秋原先生认为自己是所谓“自由人”,认

为现在要“自由人”的“知识阶级”，“负起文化运动的特殊使命”，来“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而《文艺新闻》认为“当前的文化运动是大众的——是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认为脱离大众而自由的“自由人”已经没有什么“五四未竟之遗业”；他们的道路只有两条——或者来为着大众服务，或者去为着大众的仇敌服务；前一条是“脱下五四的衣衫”，后一条是把“五四”变成自己的连肉带骨的皮。《文化评论》和胡秋原先生自己愿意走第二条路，这是他们“自由人”的自由。谁也不去勉强剥他们的皮。

文章还尖锐地批判了胡秋原的所谓“文艺自由论”的观点，指出一切文艺都不是超阶级的：“而事实上，中国的，以及东洋西洋的统治阶级，地主阶级或者资产阶级，都在用文艺做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你的叫喊，事实上，说客气些，客观上是帮助统治阶级——用‘大家不准侵略文艺’的假面具，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

杨之华《回忆秋白》：

秋白和鲁迅特别致力于当时文化战线上政治的思想理论的斗争，对反苏反共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对标榜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自由论”，进行了密切的协同作战。他们尖锐地揭露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反革命真面目。……

同时，在同胡秋原、苏汶的斗争中，秋白通过冯雪峰，同鲁迅交换了意见，分头写了批判文章。秋白写了《非政治主义》、《美国的“同路人”》、《“向光明”》、《“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文。鲁迅看后很高兴，同雪峰闲谈时，微笑着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鲁迅也写了《论“第三种人”》等文。他们写的这些文章，深刻地批判了胡秋原、苏汶宣扬的资产阶级虚伪的客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谬论，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点，使广大文艺

工作者受到了教育。

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

从仪表，从谈吐，乃至从他日常生活来看，秋白同志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常常穿一件灰色的哔吱袍子，平顶头，举止斯文得很，善于欣赏各种美好的东西，读到一篇好的文章他会反复背诵，逢人介绍，可是，当接触到工作，接触到理论斗争，他一变而为一个淬砺无前的勇猛的斗士。他的文章辛辣锐利，又是娓娓动人而富于说服力和逻辑性。他有几篇短文，用化名在杂志上发表，许多读者都认为是鲁迅的东西。

秋白同志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旺盛的斗争性和高度的责任感。在反对所谓“第三种人”的斗争中，对胡秋原、苏汶这一类的“理论”，秋白同志采取了完全“不在话下”的蔑视鄙视的态度，对他们作无情的、极其尖锐的揭露与批评，可是同时，对于这种在当时也披上了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反动理论在群众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却作了足够的估计。他的文章理路清楚，例证确切，通俗易懂，就是为了让大多数理论水平不高的读者也能够看得懂。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来解释、宣传和鼓动，我以为这就是秋白同志的文风的特点。

30日 写《孙倬章先生的土地问题》一文。

31日 写《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一文。

同月 译列宁《马克思》；写《列宁青年时代》一文。

夏 支持夏衍、阿英等打入电影界，夺取电影阵地。

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

“一·二八”战争之后，一家电影公司约我、阿英和郑伯奇三人当编剧，我把这个问题提到会议上讨论。有几位同志不赞成，他（秋白）也迟疑了好久。他问：“就是你们三个？”我说，他们还打算请几个青年的话剧演员。他忽然想到另一个问题，说：“我们自己应该有电影，可是现在还有困难。将来一定要有。”

最后做了结论：“好吧，不妨试一试。认识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不要急于求成，困难是很多的。”停顿了一下之后，他讲了一句意义深长使我永远不忘的话：“但是，你们要当心”。

这就是说，要我们提高警惕。

……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当心谨慎地开始了夺取电影阵地的的工作。第二年，一九三三年，组成了党在电影界的第一个小组。

阿英《回忆左联》：

一九三二年，大约是四、五月，洪深来找我，说明星公司老板周剑云希望我，再找几位有点名气的作家去做他公司的剧本顾问。……不久，秋白（他当时已受中央委托主管文化工作）找夏衍和我去谈话，决定派夏衍、郑伯奇和我去。关于这次谈话，夏衍写过文章。为了这件事，我还找过一次秋白。秋白当时已知道我开始有兴趣收集和现代和晚清文学资料了，他对我说了大意如下的话：电影公司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不容易打进去，这方面我们的力量最弱，而电影社会影响很大，既然请上门来，我们为什么不去，要利用一切条件开展工作，打基础。秋白说我同周剑云熟悉，洪深又在，这是个好条件，要利用它。夏衍和我都是左联常委，党决定我们去，可见党对电影工作的重视。我们三人戏剧界也较熟，电影界人员最早是从戏剧界分出来的，这也是有利条件。秋白还说，我们可以不全过去，左联的重要事还要过问。不久，我们三人去了明星公司，又建立了党的电影小组，小组由夏衍主要负责，他从左联很快全转过去了，而我在左联还兼一段时间。

六 月

1日 在《中学生》第25期上，发表《两个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三篇文章，向广大青年学生介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家世及青年时代的生活及革命事迹。在同期《中学生》上，还发表

了《托洛茨基》一文，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英雄史观。

10日 写《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给鲁迅的信》^①。秋白在信中，亲切地称呼鲁迅为“同志”，并对鲁迅送他一本杨筠如著《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一书，表示感谢。秋白在信中，提出了对中国社会的看法：“中国的特点就在于：封建制度的崩坏和复活，复活和崩坏的“循环”的过程，曾经经过三四次（最古代的战国时期还不算在内）。这样的转变过程往往使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而一般“屠沽市侩”，“舆台隶卒”利用农民暴动的没有真正的领导，反而爬到了社会的上层，变成了新贵族。”秋白还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等级制度既然有这样长期的历史和转变，有这样复杂的变动过程，它在文学史上是不会没有反映的。……”

28日 写《再论翻译——答鲁迅》，发表在7月10日出版的《文学月报》第一卷第2期上。署名J·K。信中写道：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创造新的表现方法，就必须顾到口头上“能够说得出来”的条件。这意思是说，虽然一些新的字眼和句法，本来是中国话里所没有的，群众最初是听不惯的，可是，这些字眼和句法既然在口头上说得出来，那就有可能使群众的言语渐渐容纳它们。假使存心可以“不顺”些，那就是预先剥夺了这种可能，以致于新的表现方法不能够从书面的变成口头的，因此，也就间接的维持汉字制度，间接的保存文言的势力，反而杀死了那新的表现方法。

秋白在信中还指出：新的言语应当是群众的言语——群众有可能了解和运用的言语。中国言语不精密，所以要使它更加精密；中国言语不清楚，所以要使它更加清楚；中国言语不丰富，所以要使它更加丰富。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输入新的表现法，目的就在于要使中国现代文更加精密，清楚和丰富。我们可以运用文言的来

^① 此信当时未发表。原稿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在1950年整理鲁迅存稿时所发现。后收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题目为《文集》编者所写。

源：文言的字根，成语，虚字眼等等，但是，必须要使这些字根，成语，虚字眼等等变成白话，口头上能够说得出来，而且的确能够增加白话文的精密，清楚，丰富的程度。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根本就无所谓新的表现法。同样，我们应当用这样的态度去采取外国文的字眼和句法。

同日 写《德国革命形势》一文，未发表，留有残稿。

七 月

写《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一文，发表在9月15日出版的《文学月报》第一卷第3期上。署名宋阳。

秋白在写了《大众文艺的问题》后，止敬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一文来反驳。秋白就再写此文作答。在文中着重“说明文艺的技术和文字问题。”

同月 写《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发表在10月出版的《现代》第一卷第6期上，署名易嘉。

文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胡秋原的“自由人”、苏汶的“第三种人”的反动嘴脸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揭露。

八 月

8日 写《中国文和中国话的现状》一文，未发表。

文章认为要明了汉字和汉语的现状，“就必须把中国文和中国话分开看来说。”文章指出了当时存在于报刊上的四种语言不一致的中国文是：纯粹的古代文言；用文言适应现代生活的时文文言；夹杂文言的明清式的旧式白话；夹杂文言的新白话。文章认为四种中国文中，“最接近口头上的言语”的新式白话文“是应当代表现代的中国普通话”。文章指出：“用汉字的文言和北方话做本位的普通

话”，“是现在普通话的基础”。由此而形成的政治、学术、文艺、“民众都应当享受的权利”。文章还提出：“从小孩的时期起，到他独立地参加社会生活为止，必须学习普通话”。

同月 译苏联别德纳依的讽刺托洛茨基的长诗《没功夫唾骂》，发表在10月15日出版的《文学月报》第一卷第3期上。署名向茹。

同月 写批评叶青论点文章，约七、八万字，未发表，原稿已遗失。

九 月

1日 鲁迅一家到紫霞路回访。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

雨。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秋白)夫妇，在其寓午餐。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在同年九月一日那天的早晨，我们带着孩子去拜访了他们(秋白夫妇)，地点是紫霞路原六十八号三楼一个房间。这是第二次见面了，秋白同志坐在他的书桌旁边，看到我们来时，就无限喜悦地站起来表示欢迎。他的书桌是一张特制的西式木桌，里面有书架可以放文件，下面抽斗也一样，只要把书桌上面的软木板拖下来，就可以象盒子一样，连抽斗也给锁起。据他说，这样一走开，写不完的文件只要拉下木板就不会被别人乱翻了。做革命工作的人，这种桌子是比较方便的，后来他去苏区时，就把这张桌子搬到我们的住处大陆新村来，至今还保存在那里。当时，他就从桌子里拿出他研究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原稿，提出里面有关语言文字改革和文字发音问题来同客人讨论，并因我是广东人，他又找出12个字来特意令我发音以资对证。他就是这样随时随地关心人民事业，寻找活的

资料,丰富自己的知识,订正自己的看法,不倦地、谦虚地进行工作,从任何一个人身上,也不放过机会。就这样,这天上午谈话主题就放在他所写的文字方案的改革上了。后来,又几经改动,誊抄完整,到离开上海时,就成为他比较完妥的著作了。这些著作,他临行前交给鲁迅一份,鲁迅妥慎保存于离寓所不远的旧狄思成路专藏存书的颇为秘密的一个书箱内。……

杨之华《回忆秋白》:

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上午,鲁迅和许广平同志带着海婴,冒雨来到我们家里。我们平时在谢家吃包饭,这天为了款待他们,特地到饭馆去叫了几个菜。当坐下来吃中饭时,我才发觉送来的菜是凉的,味道也不好,心里感到抱歉和不安。但鲁迅却毫不在意,和蔼可亲,仍然和秋白谈笑风生,非常亲热高兴。

秋白和我都很敬重鲁迅先生,知道他在兄弟中居长,就亲切而尊敬地称呼他为“大先生”。

14日 偕杨之华到川北公寓访问鲁迅。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四日):

晴。上午……文尹^①夫妇来,留之饭。

18日 杨之华给鲁迅信,并赠海婴玩品若干。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

晴。……得文尹信,并赠海婴金铃子一合,叫呱呱一合,包子一筐。

25日 鼓励杨之华将她创作的小说稿《豆腐阿姐》请鲁迅帮助审改。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① 文尹:杨之华曾用的笔名。

星期。县。……阅文尹小说稿，下午毕。

杨之华《回忆秋白》：

不久，有一件事使我更敬重鲁迅先生了。那时，在秋白的鼓励下，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豆腐阿姐》。秋白很高兴地说：“拿去给大先生看看吧。”我不好意思地说：“这样的东西能拿给大先生看吗？而且他又很忙。”秋白说：“不要紧，大先生是很乐于帮助人的，特别是对初学写作的青年。”于是，秋白把我的习作拿给鲁迅看了。鲁迅毫不耽搁地给改了错字，在错字旁边，还端正地分别写出楷体和草书字样。鲁迅把稿子送还时，亲自用纸包得方方正正的，用绳子札得整整齐齐的。这虽然是件小事，却使我深深地体会到鲁迅的认真负责精神和对学习写作的青年的亲切关怀。

十月

24日 鲁迅赠《现代散文家批评》、《文始》等书。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晴。下午买《现代散文家批评》二本赠何君，并《文始》一本。

十一月

4日 鲁迅将出版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中刊载的由杨之华翻译绥拉菲摩维支《一天的工作》、《岔道夫》的稿费六十元送给杨之华。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四日）：

晴。以《一天的工作》归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税泉二百四十，分与文尹六十。

8日 写《美国的“同路人”》，编入《骷髅杂记》，未署名，未发表。

10日 写《爱光明》短文，编入《骷髅杂记》，未发表。

文中引用了戴望舒的一首题为《灯》的短诗后，写道：

“热心希望社会的进步，爱光明而诚意于革命之成功者”（胡秋原）其实是爱着灯光式的光明，而最好的还是“交头接耳的黑暗”。

11日 写打油诗《向光明》两章，编入《骷髅杂记》，未发表。

这两章新打油诗是秋白读了戴望舒的《灯》和苏汶《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之后写的。他在诗后的附言中写道：

这诗的题目，可以叫做《羊子歌》，因此这些自命为羊子的人，其实是要干涉“文艺上的干涉政策”，干涉“什么指导大纲之类”。

下旬 由于党的地下机关被破坏，与杨之华第一次到鲁迅家避难。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秋白同志在鲁迅寓内度过三次避难生活，两次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寓里，末次是我们住在大陆新村的时候。第一次是1932年11月，日期记不清了，只记得鲁迅这时正因母亲生病回到北京去，是由我接待他们的。我还记得，他和杨大姐晚间到来的时候，我因鲁迅不在家，就把我们睡的双人床让出，请他们在鲁迅写作兼卧室的一间朝北大房间里住下。查《鲁迅日记》，他是1932年11月11日动身往北京，同月30日回到上海的。那时，秋白同志来了几天才见到鲁迅回归，则大约是在11月下旬了。在这期间，他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简单的家庭平添了一股振奋人心的革命鼓舞力量，是非常之幸运的。加以秋白同志的博学、广游，谈助之资实在不少。这时，看到他们两人谈不完的话语，就象电影胶卷似地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之极。更加以鲁迅对党的关怀，对马列主义的从理论到实际的体会，平时从书本上看到的，现时可以尽量倾泻于秋白

同志之前而无须保留了。这是极其难得的机会。一旦给予鲁迅以满足的心情,其感动快慰可知!对文化界复杂斗争形势,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对帝国主义的横暴和“九一八”东北沦亡的哀愁,这时也都在朝夕相见中相互交谈,精心策划。两个同是从旧社会士大夫阶级中背叛过来的“逆子贰臣”,在尖锐的对敌斗争中,完全成了为党尽其忠诚,同甘苦共患难的知己了。杨大姐也以革命干部共有的风格,和我们平易相亲,和女工、小孩打成一片,使我也学到了许多说不尽的道理。

秋白同志是担任领导工作的,一刻也不能耽误,一到环境许可,他就离开我们而去了。

杨之华《回忆秋白》: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底,我们得到组织送来的警报,知道有一个叛徒在盯我们的梢。秋白于是立即住到鲁迅家里去。因为叛徒认识我,为了免得把他引到鲁迅家,我没有同秋白一起去,只好在马路上转了三天三夜。秋白和鲁迅很担心我的安全,请一位同志到处找我,终于在马路上碰见了。这时正是白天,我不放心,就请他先走。我又在街上转了很久,直到天黑以后,确信后面没有“尾巴”了,才到了鲁迅家。

同月 写《“Apoliticism”——非政治主义》一文,编入《骷髅杂记》,未发表。

文章对新月派标榜的所谓“非政治主义派”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进一步阐明了文学的阶级性,强调无产阶级创造的新文艺,就是要公开的号召斗争,要揭穿一切假面具,要提出自己的理想和要求。

文章明确指出:“每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艺术——不论是那一个时代,不论是那一个阶级,不论是那一个派别——都是意识形态得力的武器,它反映着现实,同时影响着现实。客观上,某一个阶级的艺术必定是在组织着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意志,而表现

一定的宇宙观和社会观；这个阶级，经过艺术去影响它所领导的阶级（或者，它所要想领导的阶级），而且去捣乱它所反对的阶级。问题只在于艺术和政治之间的联系的方式，有些阶级利于把这种联系隐蔽起来，有些阶级却是相反的。”

“有些作家的作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没有丝毫的政治臭味。这种作家其实也是政治家。有时候他们自己也明明知道的。他们认为必须叫“读者社会”有点儿特殊消遣，使得他们心思避开严重的政治问题，避开对于社会问题的答复。——这可以用“为艺术而艺术”的假招牌，也可以是虚伪的旁观主义。这难道不是政治？诱惑群众，使他们不问政治——这常常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有些艺术家是有意的去做这种手段的工具，有些却是无意的。”

文章还指出：“十八世纪时代的西欧资产阶级，总之，还在反对封建的旧统治的资产阶级，在当时，往往喜欢自命为劳动群众的先锋，所以它们的艺术还是公开的主张战斗的。那时候，艺术家的理想是要号召“维新”，“改革”，“启蒙”，他们认为自己的作品能够充满着这些号召是光荣的。后来，情形自然不同了。资产阶级开始想尽各种方法，来束缚群众，阻碍群众的前进，维持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奴隶制度。反革命以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同着地主买办和帝国主义，正在进行这种文化上束缚政策。”

文章在最后，指出了进步的艺术对确立革命的宇宙观和社会观的极端重要性。

同月 将《“Apoliticism”——非政治主义》、《美国的“同路人”》、《爱光明》、《向光明》等四篇诗文辑集成册，题名《骷髅杂记》，并作了序，署名 Wenin（维宁）。

序文如下：

肉已经烂光了，血早就干枯了，但是，骷髅还是不肯沉默。自然，他只会说些鬼话，只会记载些无聊的记录。谁知道呢？——也许活人在深夜梦醒的时候，偶然高兴的听着这些鬼话。或是不愿意

听,就说这是鬼叫,把耳朵塞住,钻到被窝底里去,做他们的春梦。那就让骷髅留着他的杂记给鬼看罢。人的将来总是鬼。这世界始终要变成鬼世界。不过对于鬼,这些杂记也许又都是不新鲜的了。

这本集子秋白生前未出版。1953年10月,据手稿编入《瞿秋白文集》(八卷本)第二卷。

十二月

7日 书旧作七绝条幅,赠鲁迅: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此诗为秋白于1917年至1918年间所作。他在诗后写跋语: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犹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

9日 以高价托人向某大公司买了一盒玩具,送给海婴。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

晴。……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盒。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在同年12月9日,曾以高价托人向某大公司买了一盒玩具,送给我们的孩子。

……

当时,他们并不宽裕,鲁迅收下深致不安。但体会到他们爱护儿童,给儿童培植科学建筑知识的好意,就又在这不安中接受了这件礼物。秋白在盒盖上写明某个另件有几件,共几种等等,都很详尽。又料到自己随时会有不测,说:“留个纪念,让小孩大起来也知

道有个何先生(何先生是他来我家时的称呼——作者)!”可惜几经变乱,搬动,这盒盖已经遗失。零件还有若干存上海鲁迅纪念馆,作为秋白同志预感到革命胜利后必有大规模的建设,因而对下一代必须从小给以技术知识教育的深意的纪念物品来珍贵保存,以使我们的青年一代,从革命先驱者的这一殷切期望中获得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力量。

11日 译就《高尔基论文集》。秋白在《写在前面》为题的文章中写道:高尔基的论文,也和鲁迅的杂感一样,是他自己创作的注解。为着劳动民众奋斗的伟大艺术家,永久是在社会的阶级的战线上的。战斗紧张和剧烈的时候,他们来不及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见解溶化到艺术的形象里去,用小说戏剧的体裁表现出来,他们直接向社会说出自己的“心事”,吐露自己的愤怒,憎恶或赞美。……高尔基的论文,都可以当做这种解释去读。

同日 应鲁迅邀宴。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晷。下午寄母亲信。治饌六种邀乐扬(冯雪峰)、维宁及其夫人夜饭,三弟(周建人)亦至。

12日 由鲁迅转送致曹靖华信。

鲁迅致曹靖华信:

Л·БО·Д НЫИ 的《НЕКОГДА ПЛЮНУ ТЫ》(别德纳衣的《没功夫唾骂》),已由它兄(秋白)译出登《文学月报》上,原想另出单行本,加上插图,而原书被光华书局失掉(我疑心是故意没收的),所以我想兄再觅一本,有插图的,即行寄下,以便应用。……附它兄信一张。

23日 陈云来接,离开鲁迅家^①。

史平^②《一个深晚》:

一九三二年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大约是深晚十一时许了,我坐着一辆黄包车,把载在头上的铜盆帽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吴淞路买来的一件旧的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停下了黄包车,付了车钱,望四边一看,没有人“盯梢”,我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三层楼住宅房子的大门。这是一座分间出租的住宅,走进大门就是楼梯。大约是三层楼的右首的那间房间的门口,门上有着一个同志预先告诉我的记号。我轻轻的扣了两下,里面就出来了一位女主人。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气的请我进去。

秋白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同志的包袱里,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衣服。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我奇怪的问他。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他问我:“远不远?”“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我说着,正想下楼去叫车子,旁边那位五十以外庄重而很关心我们的主人就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去。这时候,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问我:“你们会过吗?”我和那位主人同时说:“没有。”秋白同志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

① 陈云回忆中,去鲁迅家接秋白是在“一个雨夜”。查《鲁迅日记》,12月11日以后,25日以前,“夜雨”只有23日:“23日,晨,……夜雨”,许广平和杨之华回忆,都说秋白离去的时间是在“12月下旬”,因此,可以判断陈云接秋白的时间应是12月23日。

② “史平”,即陈云。

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的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我是第一次与鲁迅会面，原来不知他哪里人，听他的说话，还多少带着绍兴口音。后来把秋白、之华送到了他们的房子里，问起秋白同志，才知道鲁迅确是绍兴人。

一会儿女主人回头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我说：“走吧，”就帮助之华提了一个包袱，走到门口，秋白同志向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带给我。”又指着我向鲁迅说：“或者再请×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我就顺便插口：“隔几天我来拿。”正想开门下楼去，之华还在后间与女主人话别。我们稍微等了一下，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的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秋白同志也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你们进去吧。”他们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当我们走下到了二层楼梯口，才听到三层楼上拍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秋白同志自从一九三二年××同志被捕以后，侦探到处在追逐他。病得又很重，住在鲁迅家里已经很久了。虽然鲁迅当时也为暗探四面跟踪着，但是鲁迅终于把秋白同志安全保护了几个月。后来因为外面已经有些“风声”，所以我们就把秋白同志搬到另一个地方。……（1936年10月26日）。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这次避难，到年末之前他们就离去了。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没有

留他们度岁的记忆。这期间,曾经有过几次有人来向秋白同志接洽,但总是让他们自己见面,在一个房间里。我们从不打听来过的是什么人。只记得曾来过一个牧师身分的人,并托鲁迅代买字典,以作自修外语之用,鲁迅当即照办了。解放后,我见到一些负责同志,他们都说曾到过我们家里,是为找秋白同志去的。但那时为了革命利益,我们自觉地遵守纪律,从不问来人姓名住址,知道问是不妥的。因此,至今对有些人到过我家总是记不那么清楚了。

25日 致鲁迅信,并送火腿爪一枚,鲁迅回赠文旦饴二合。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雨。……下午得维宁信并赠火腿爪一枚,答以文旦饴二合。

28日 致鲁迅信,并附所书七绝一首。

“近读《申报·自由谈》,见有人说真正快乐的情死都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此外,尚有“冷摊负于对残书”之类的情调,实在“可敬”。欧化白话文艺占领《自由谈》,正象国民军进北京城。欲知后事如何,只要看前回分解可也。因此打油诗一首。

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

同月 完成《新中国文字草案订正稿》。

同月 译毕《高尔基创作选集》。

本年,秋白还编译《“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未出版。1936年3月由鲁迅辑入《海上述林》上卷《辩林》时,副题改为《科学的文艺论文集》;1953年辑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四卷时恢复原副题。

下列三书未署年月日,暂列于此:

《汉字和中国的言语》 这是一部研究音韵、声调的著作。

《中国文和中国话的关系》 文章从文字发展规律来说明汉字

发展方向和道路。

《新中国的文字革命》 文章分为文字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文字革命的对象；文字革命的方法三个部分，较为详尽地提出了对文字改革的主张。文后附有：《新中国文草案》、《新中国文音韵学》、《声调标记法》、《等韵字母韵摄表》、《英文声母韵母表》、《新中文声韵表》等。

一九三三年 35岁

一月

2日 鲁迅来信。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一月二日):

晴。……下午寄维宁信。

15日 寄鲁迅信。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

星期。晴。……晚得维宁信。

24日 寄鲁迅信并稿。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县。……夜得维宁信并稿,即复。

二月

4日 寄鲁迅信。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

县。……得维宁信。

上旬 上海中央局得到情报,说国民党特务要在当晚破坏中共在紫霞路的一处机关。经过分析,认为秋白夫妇住处,可能发生危险。当即由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即黄玠然)急忙赶来,通知迅速转移。傍晚,由黄文容护送,再次来到北四川路底鲁迅家避难。

杨之华《回忆秋白》:

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警报接踵而来,我们再次到鲁迅家中避难。这一次住的时间较久,秋白和鲁迅朝夕相处,促膝谈心,十分融洽,详细研究当时的斗争和“左联”的工作。……秋白还就谈话所得,或者和鲁迅商量以后,写了《苦闷的答复》、《出卖灵魂的秘诀》等十篇杂文。这些杂文,为了不让敌人发觉它们的真正作者,秋白有意模仿了鲁迅的笔调,鲁迅请别人抄一份,署上自己的笔名,送给《申报》副刊《自由谈》等处发表。鲁迅为了使这些文章广为流传,还把它们收入了自己的杂文集。

10日 给曹靖华信。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

县。上午复靖华信,附文、它笺^①。

22日 与鲁迅合编《萧伯纳在上海》一书,并写引言《写在前面——他并非洋唐伯虎》。

2月17日,英国著名戏剧家、幽默作家萧伯纳途经上海,当天下午会见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等。萧伯纳在上海只停留半天,于当晚去北京,却轰动了上海的整个舆论界。一夜之间,上海各报刊出现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捧与骂、热与冷,样样都有。鲁迅和秋白决定把这些评论合辑成书出版。同时,也可帮助解决秋白夫妇生活上的燃眉之急。由许广平外出搜罗当天出版的

^① “文”即文尹,杨之华的笔名。它,即史维它,秋白的笔名。

各种报刊,鲁迅和秋白边看边圈定篇目;许广平和杨之华剪贴,然后由鲁迅和秋白连夜编辑,鲁迅作序言,秋白写引言。编成后,于同月交野草书屋出版。书中,为秋白所写的引言、补白和杂文共十八篇。

秋白在《写在前面——他并非洋唐伯虎》一文中,说明了编辑此书的目的,写道:我们收集萧伯纳在上海的文件,并不要代表什么全中国来对他“致敬”——“代表”全国和全上海的,自有那些九四老人,白俄公主,洋文的和汉文的当局机关报,我们只不过要把萧的真话,和欢迎真正的萧或者欢迎西洋唐伯虎的萧,以及借重或者歪曲这个“萧伯虎”的种种文件,收罗一些在这里,当做一面平面的镜子,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2月17日,亦从《鲁迅日记》中看到:“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伊(?)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傍晚归。”

归来已晚,但刚好秋白夫妇住在这里,难免不把当时情况复述一番。从谈话中鲁迅和秋白同志就觉得:萧到中国来,别的人一概谢绝,见到的人不多,仅这几个人。他们痛感中国报刊报道太慢,萧又离去太快,可能转瞬即把这伟大讽刺作家来华情况从报刊上消失。为此,最好有人收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把各方态度的文章剪下来,出成一书,以见同是一人,因立场不同则好坏随之而异地写照一番,对出版事业也可刺激一下。说到这里,兴趣也起来了,当时就说:我们何不亲手来搞一下?于是我跑到北四川路一带,各大小报摊都细细搜罗一番当天的报纸,果然,各式各样的论调不一而足。于是由鲁迅和秋白同志交换了意见,把需要的材料圈定;由杨大姐和我共同剪贴下来,再由他们安排妥贴,连夜编辑,鲁迅

写序,用乐雯署名,就在2月里交野草书屋出版,即市里所见《萧伯纳在上海》是也。这书从编、排、校对,以至成书,都可以说一个“快”字,也代表了革命先驱者们的战斗精神,更开辟了由众人合作来编辑一种书籍的优良先例。秋白同志和鲁迅那种说干就干,亲自动手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周建人《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秋白生活困难,又不肯接受鲁迅的馈赠,鲁迅总是想办法让秋白出版一些书,以便获得一些稿费版税维持生活。例如一九三三年萧伯纳到上海,在上海的中外各家报纸对萧伯纳的记载和评论很多,鲁迅收集了这些材料,让秋白编成书,自己作序出版了。对自己的劳动所得,秋白是不可能反对的。鲁迅也安心了。

下旬 摘译上海2月21日出版的《字林西报》上刊载的发自北平的《特约通信》(2月15日)。摘译稿题为《〈字林西报〉之北京通信——伪造监狱通信——并未证实的事件——严刑拷打说毫无根据》,揭露胡适为国民党反动法制辩护的谎言。未发表。

在发现该原稿中,还夹有秋白画的《阿Q手执钢鞭图》。

唐天然《战友深情——有关瞿秋白和鲁迅的三件新史料》: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同盟宣言》阐明宗旨说:要“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还说要“调查监狱状况”。一九三三年一月中旬和下旬,上海、北平分盟相继成立。鲁迅当选为上海分盟执行委员。胡适当选为北平分盟执委主席。一月三十日,北平分盟成立时,同盟总干事杨铨到北平主持组盟;次日上午,与胡适等一起参观了国民党陆军监狱。回沪后,杨揭露了监狱的黑暗状况。在这之前,一月十日,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政治犯,曾集体致函中国民权同盟,控诉在监狱中备受酷刑的非人生活(函刊《中国论坛》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卷一期)。同盟负责人宋庆龄向全世界揭发,当时,

身为北平分盟执委会主席的胡适，却竭力充当国民党反动法制的辩护士，为国民党政府张目。他凭借分盟主席身分，四处发表文章和讲话，配合国民党在同盟内部进行破坏。胡适在对《字林西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中完全否认监狱有施用酷刑的罪恶事实，指责狱中来信为伪造，还说“同盟不应……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不予依法治罪的要求。”

……当时，瞿秋白和鲁迅对胡适的言行都密切注意。鲁迅曾及时驰函北平，委托台静农代寻胡适的反动言论。而不久，瞿秋白就在《字林西报》上，看到了这一篇“通信”，于是立即摘译出来。在洞察了胡适的反动言论之后，瞿秋白和鲁迅就共同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新发现的瞿秋白手稿，还有一幅《阿 Q 手执钢鞭图》。这是一幅绝妙的阿 Q 画像。但它却是由十个 Q 的字母组成的。原图画于一页稿纸之上，大小仅有四公分见方，并配有阿 Q 经常得意地唱起的那句唱词：“我手执钢鞭将你打！”看来，这不过是瞿秋白的遣兴游戏之笔，但却是一个天才的创造。这次发现时，此图附于《字林西报》两页译稿之后，而且所用稿纸，亦和译稿的一页相同，印有“OS 原稿用纸”字样。（这是鲁迅用过的稿纸）据此可以考定，它的成画时间，大约与《字林西报》译稿同时，亦即一九三三年二月，瞿秋白同志第二次在鲁迅家避难期间。

三 月

1 日 鲁迅托内山夫人为秋白夫妇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东照里（又称日照里）12 号，租了日本人住家一个亭子间。是日，鲁迅前往看屋。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

晴。……同内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

3日 鲁迅又往东照里“看屋”。秋白迁居东照里12号。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

晴。上午内山夫人来并赠堇花一盆。……午后往东照里看屋。

5日 写杂文《王道诗话》，发表在3月6日出版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署名干。文章批评胡适是“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的“帮忙文人”：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祖传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

6日 鲁迅造访新居，并送堇花一盆，以表贺意。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

曇。……下午访维宁，以堇花一盆赠其夫人。

7日 写杂文《苦闷的答复》，发表在3月9日出版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时，由鲁迅改题为《申冤》。署名干。

同日 给曹靖华信。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

曇：午后寄靖华信，附尚佩吾及维宁笺。

9日 写杂文《曲的解放》，发表在3月20日出版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署名何家干。

10日 写《〈子夜〉与国货年》一文，发表在4月2、3日出版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署名乐雯。文章对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作了评价，指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现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文章最后，写道：这里所要指出的，只是中国文艺界的大

事件——《子夜》的出现——很滑稽的和所谓“国货年”碰在一起。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纪录《子夜》的出版；国货年呢，恐怕除出做《子夜》的滑稽陪衬以外，丝毫也没有别的用处！——本来，这是“子夜”，暄红的朝日没有照遍全中国的时候，那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国货年。而到了那时候，这国又不是“大王”们的王国了，也不是他们的后台老板的国了。

14日 写杂文《迎头经》，发表在3月19日出版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署名何家干。

同日 写《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一文，未发表。

22日 写杂文《出卖灵魂的秘诀》，发表在3月26日出版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署名何家干。文章针对胡适所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严厉批评胡适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30日 写杂文《最艺术的国家》，发表在4月2日出版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署名何家干。

同月 写《一笔糊涂账》、《孙文和孙文主义》，未发表。

四 月

1日 在《红旗周报》第34期上发表《中国的假革命党和中俄复交问题》一文。署名范亢。

同日 在《现代》第二卷第6期上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署名靖华。

2日 写《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组织到赤色工会中来》，发表在江苏省委编的《列宁生活》第26期上。

8日 编就《鲁迅杂感选集》一书，并作长序《〈鲁迅杂感选集

《序言》,署名何凝。篇末署地名为北平,以减少国民党政府的注意。

秋白在鲁迅家中避难时,系统地阅读了鲁迅从1907年以来各个时期所写的杂文和论文,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他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益。于是他征得鲁迅的同意,决定编一本《鲁迅杂感选集》,他边研究、边选择、边与鲁迅交谈,对鲁迅的思想及其作品的社会意义有了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在这个基础上,秋白从4月初开始写序言,对鲁迅及其杂文作了高度的评价。序言写道:“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大家都不免要想做青年新的导师;而诚实的愿意做一个“革命的马前卒”的,却是鲁迅。他自“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没有为自己造一座宝塔,把自己高高供在里面,他却砌了一座“坟”,埋葬他的过去。他这种为着将来和大众而牺牲的精神,贯穿着他的各个时期,一直到现在,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如此。”

秋白对鲁迅走过的思想历程作了深刻的概括:“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 and 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

杨之华《回忆秋白》:

我们在东照里住下不久,秋白就要完成一个任务:编一本鲁迅杂感选集,并且要写一篇序文,论述鲁迅和他的杂文。秋白认为有必要为鲁迅辩明是非,给鲁迅一个正确的评价,以促进革命文艺队伍的团结战斗,并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这是由于敌人不择手段地

攻击和诬蔑鲁迅和他的杂文；而革命文艺阵营内部，也有一些同志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对鲁迅的认识和态度不够端正。秋白和鲁迅亲密的接触中，经过对鲁迅的思想和作品的分析和研究，对于鲁迅的伟大的革命精神、思想发展过程以及他的杂文的战斗作用，都有了深刻的了解。秋白对我说：“我和鲁迅谈了不少，反复研究了他的作品，可以算是了解鲁迅了。我有必要选编他的杂感，不但因为这是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而且也为了着现时的战斗。要知道，形势虽然会大不相同，而那种吸血的苍蝇蚊子，却总是那么多！”他要和鲁迅一起反击敌人对鲁迅的攻击，同时也要引导同志和朋友正确地认识和对待鲁迅及其杂文。秋白认为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有最坚定的革命立场，是一贯为人民群众利益而坚韧战斗的好榜样，值得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学习。

秋白想动手完成这个任务，但当时的环境很不好，妨碍他的工作。东照里十二号的房东，是个好事泼辣的中年寡妇，广东人，住在上海多年了。他的房客有中年商人，也有日本的商人和浪人。女房东和日本浪人似乎都“关心”我们，时常来串门，问长问短，谈东道西，纠缠不完，既妨碍秋白的工作，又影响我们的安全。于是我们想了个谢客的办法：白天，秋白装病半卧在床上，关起门来看书；我就在房门口的炉子上熬汤药，药味充满了整所房子，这些药我都偷偷地倒掉了。这出“戏”演得很成功，房东和房客果然不再来打扰我们了。秋白在白天专心研究鲁迅的著作，夜深人静时，就伏在一张小方桌上写作，花了四夜功夫，写成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

秋白完成这项任务后不久，一天下午，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向我们的房间奔来，接着呼呼地敲我们的门。秋白和我大吃一惊，急急忙忙把桌上的书籍收藏起来，然后去开门。呀！原来是鲁迅。

鲁迅站在房门口，虽然脸上布满了皱纹，并且长着一簇大胡子，但却那么高兴天真，笑呵呵地对我说：“你不是说听惯了我的脚步声吗？这次你听出来了没有？”

站在他身后的一个日本女房客，看到这位老人高兴的样子，也有趣地笑了。鲁迅亲切而喜露童心的逗趣使我们的亭子间里充满了活泼愉快的气氛。

鲁迅走进房间，在椅子上坐下来，抽着香烟。秋白把那篇《序言》拿给他看。鲁迅认真地一边看一边沉思着，看了很久，显露出感动和满意的神情，香烟快烧着他的手指头了，他没有感觉到。

当鲁迅和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的时候，有些同志不了解鲁迅，有的甚至以错误的态度对待鲁迅，这使鲁迅感到难过。但是秋白了解鲁迅，敬爱鲁迅，把党的正确政策和战友的挚情融合为一，热情地支持鲁迅。鲁迅把这篇《序言》不光是看作秋白个人同自己的战斗挚情的体现，而且相信是代表了党的精神，给他以支持和帮助的。他感动而谦虚地说：“只觉得说得太好了，应该对坏的地方也多提起些。”鲁迅的这种心情，他对许广平、冯雪峰同志也表露过。许广平同志在《秋白同志和鲁迅相处的时候》中说：“党了解鲁迅，秋白同志了解鲁迅。作为旧知识分子不断分析解剖自己严于对别人的鲁迅，是党所需要的。秋白代表了党的精神，对鲁迅分析，批评，鼓励写成《〈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精辟论断，以告世人。秋白同志曾不断向鲁迅探讨研究，分析鲁迅代表时代的前后变化，广泛披览他的作品，当面询问经过。秋白同志是怎样严肃地对待这个论断！写出之后，鲁迅读了，心折不已。‘只是说得太好了，应该坏的地方多提些。’”冯雪峰同志在《回忆鲁迅》中也说：鲁迅对这篇《序言》是很看重和赞赏的，表示“分析是对的。以前就没有这样批评过”。雪峰同志说：“鲁迅说话时候的态度是愉快的严肃的，而且我觉得还流露着深刻的感激的情意。”

那天他们谈了很久很久。他们谈到杂文的战斗性和对革命斗

争所起的作用。鲁迅恨透了对他们造谣诬蔑的文化特务，厌恶甘当帮闲的苍蝇蚊子，他说：“要骂就骂吧，我就是硬骨头，骂不倒我！我就是要用杂文同他们战斗！”

那时鲁迅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暗杀名单中列上了鲁迅的名字。但鲁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蔑视敌人，仍然经常坐在内山书店。秋白曾多次要他注意安全，并且劝他到苏联去疗养和编中国文学史。那天，秋白又提起了。鲁迅是很重视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的，但他认为当时战斗紧张，无空做这项工作。至于出走，他满不在乎地说：“要杀就杀吧，我就是不走！而况真要走，那么多的书也无法搬走。”他反而热诚地劝秋白去苏联养病和写作，他感慨地说：“你写作的环境比我坏得多。”鲁迅曾在他家里向曹靖华同志谈到过秋白的困难处境：“他不断受猎犬搜索、追逐。他象老鼠似地到处逃。有时一天迁三四个地方。有时被追逐得不得已时，跳上野鸡汽车，兜几个圈子，到半路再下来走。到最危险的时候，就逃到这里。”

那天，他们一直谈到夜深了，鲁迅才告辞回家。就在这期间，鲁迅亲笔写了一副对联赠给秋白：

疑欠道兄属

人生得一知己作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洛文录何瓦琴句

疑欠（欠是冰的本身字）是秋白的笔名。洛文是鲁迅的笔名。鲁迅录的这两句话，是从清朝浙江四明人徐时栋书写的《烟屿楼笔记》中选用清朝浙江钱塘人何瓦琴（即何溱）的集褙帖联句，借以表达他同秋白之间的知己深情和决意以同志相待的至诚。秋白非常珍视这副对联，当时就高兴地把它挂到墙上，并经常欣赏着，沉思着。

11日 写杂文《内外》，发表在4月17日出版的《申报》“自由

谈”上。署名何家干。

同日 写杂文《关于女人》，发表在6月15日出版的《申报月刊》第二卷第6号上。署名洛文。

同日 写杂文《真假古董》，发表在《申报月刊》第二卷第6号上，署名洛文。

同日 写杂文《透底》，发表在4月19日出版的《申报》“自由谈”上。署名何家干。

同日 鲁迅迁居至东照里对弄的大陆新村九号（今鲁迅故居）。这样，秋白和鲁迅过往更频繁。秋白每隔一夜或两夜就要去鲁迅家，而鲁迅几乎每天要到日照里秋白家。彼此交谈，从政治、时事、到文艺等等，无所不谈。常常乐而忘返。在这期间，秋白与鲁迅合作选编了第一本介绍苏联版画《引玉集》。秋白还节译了楷戈达耶夫的《五十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作为《引玉集》的《代序》，署名陈节。

杨之华《回忆秋白》：

四月十一日，鲁迅全家也搬到了大陆新村九号。大陆新村在东照里的斜对面，同一条马路上，一在路南，一在路北，离得很近。所以，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鲁迅几乎每天到东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我们见到他，象在海阔天空中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温暖的阳光一样。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即改变了不爱说话的心情。两人边谈边笑，有时哈哈大笑，驱走了象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闷人气氛。我们舍不得鲁迅走。但他走了以后，他的笑声、愉快和温暖还保留在我们的亭子间里。他还经常留下一些书刊。这些都使秋白深感欣慰。在这段时间内，秋白继续写了一些杂文，用鲁迅的笔名，由鲁迅投给《申报》发表。他们还合作选编了第一本介绍苏联版画的《引玉集》。秋白节译了楷戈达耶夫的《十五年来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一文作

为《引玉集》的《代序》。鲁迅对此表示很高兴,他在该书的后记里说:“我毫不知道俄国版画的历史;幸而得到陈节(秋白笔名之一)摘译的文章,这才明白一点十五年来梗概……。”他们出版这本书,是为了使中国的美术家从中得到教益,努力创造出中国的革命的艺术作品,促使中国的艺术在苦难的土地上开出鲜艳的花朵。鲁迅在后记中说:“历史的车轮,是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为此,他们寓“抛砖引玉”之意,给这本书取名为《引玉集》。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到4月11日,我们的家搬到大陆新村之后,就过往更其频繁,有时晚间,秋白同志也来倾谈一番。老实说:我们感觉少不了这样的朋友。这样具有正义感、具有真理的光芒照射着人们的人,我们时刻也不愿离开!有时晚间附近面包店烤好热烘烘的面包时,我们往往趁热送去,借此亲炙一番,看到他们平安无事了,这一天也就睡得更香甜安稳了。

从3月5日写《王道诗话》起,秋白同志因有一时的比较安定的生活,所以在短短时期以内,就写作了许多精美的杂文,计有:

3月7日《申冤》

3月9日《曲的解放》

3月14日《迎头经》

3月22日《出卖灵魂的秘诀》

3月30日《最艺术的国家》

4月11日《关于女人》

4月11日《真假董·吉河德》

4月11日《内外》

4月11日《透底》

4月24日《大观园的人才》

以上是用鲁迅名义发表的秋白同志所写的文章,从日期看(文末的日期,都是在写完后秋白同志自己签出的),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知识,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高度的理论水平,哪能在短短的时期以内,有如是丰富而精美的文字见诸于世?特别是《关于女人》等几篇文章,能在同一天里写作出来,真使人感到秋白同志的革命才华,足令我们人民感到骄傲,令敌人之为之丧胆。他为革命文学的威力增加了不少分量。

这些文章,大抵是秋白同志这样创作的: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哈哈地带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绝伦。而他所写的这些文章,又是那么义正辞严地揭露了敌人的卑鄙无耻行径,足使敌人之为之胆寒。这只要一看他在1933年骂那些卖国贼、汉奸、帝国主义的奴才蒋介石、汪精卫、胡适等辈的文章,是多么一针见血,击中敌人的要害,就知道秋白同志对这一小撮国家民族败类,是洞察得多么仔细,揭露得多么深刻,掙击得多么沉重!

13日 《鲁迅杂感选集》编就后,由鲁迅交北新书局主持人李小峰以声光书局名义出版。是日,鲁迅致函李小峰,谈预支稿费送秋白事。信中写道:

《杂感选集》已寄来,约有十四五万字,序文一万三四千字,以每页十二行,每行三十六字版印之,已是很厚的一本,此书一出,单行本必当受若干影响也。

编者似颇用心,故我拟送他三百元。其办法可仿《两地书》,每发行一千,由兄给我百元,由我转寄。此一千本,北新专在收账确实处发售,于经济当不生影响,如此办法,以三次为

度。但此三千本，我只收版税百分之二十。

序文因尚须在刊物上发表一次，正在托人另抄，本文我也须略看一回，并标明格式，星期六不及交出了，妥后即函告。

21日 鲁迅送来《鲁迅杂感选集》稿费壹百元。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县。……下午得小峰来信并本月版税泉二百。付何凝《杂感集》编辑费百。

24日 写杂文《人才易得》，发表在26日出版的《申报》“自由谈”上。署名干。发表时，由鲁迅改题为《大观园的人才》。

六 月

月初 奉中央局指示，从东照里搬出，与冯雪峰同住，以协助冯照顾通讯工作，并为党报写文章。

冯雪峰《回忆鲁迅》：

大约是六月初，秋白同志夫妇从日照里搬出，去跟我同住。我本来在上海中央局宣传部负责一个通讯社工作，这时候调到江苏省委去做宣传部长；秋白同志去和我同住是当时中央局的意见，一则由他暂时照顾一下那个通讯社的工作（主要是审查和修改通信稿件），二则他好久以来就在替党报写文章，所以和我同住，联系比较方便。

杨之华《回忆秋白》：

为了安全，一九三三年六月初，我们搬出了东照里，住到冯雪峰同志住的江苏省委机关里，这在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楼上。雪峰同志热诚负责地保护秋白，确保红色秘密，只让一个党内交通知道。

30日 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油印)第45、46期合刊上,发表《国民党最近大借款的目的》一文。署名狄康。

七 月

5日 致鲁迅信及文稿一本。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

晴。……得疑欠及文尹信并文稿一本。

10日 鲁迅付秋白夫妇稿费二百卅元。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

晴,热。午后大雷雨一阵。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疑冰。

16日 写《读子夜》一文,发表在8月13、14日出版的《中华日报》副刊“小贡献”上。署名施蒂尔。

文章概括了《子夜》所涉及的问题后,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有许多人说《子夜》在社会史上的价值是超越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的,这原因是《子夜》大规模的描写中国都市生活,我们看见社会辩证法的发展,同时却回答了唯心论者的论调。

二、在意识上,使读到《子夜》的人都在对吴荪甫表同情,而对那些帝国主义,军阀混战,共党,罢工等破坏吴荪甫企业者,却都会引起憎恨,观作者尽量描写工人痛苦和罢工的勇敢等等,也许作者的意识不是那样,但在读者印象里却不同了。我想这也许是书中的主人公即吴荪甫的关系,不容易引人生反作用。

三、在全书中的人物牵引到数十个,发生事件也有数十件,篇长近五十万字,但在整个组织上却有许多处可分个短篇,这在读到《子夜》的人都会感觉到的。

四、人家把作者来比美国的辛克莱，这在大规模表现社会方面是相同的；然其作风，拿《子夜》以及《虹》、《蚀》来比《石炭王》、《煤油》、《波士顿》，特别是《屠场》，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截然不同点来，一个是用排山倒海的宣传家的方法；一个却是用娓娓动人叙述者的态度。

五、在《子夜》的收笔，我老是感觉到太突然，我想假使作者从吴荪甫宣布“停工”上，再写一段工人的罢工和示威，这不但可挽回在意识上的歪曲，同时更可增加《子夜》的影响与力量。

20日 在《斗争》第48期上，发表《临死的呼号》、《从公债到外债》、《“自动的”卖国》、《瓜分混战之下的中国西部》（此文又在8月31日出版的《红旗周报》上发表。署名狄康。

21日 写《母亲——诗的故事》，未发表。

下半月 因机关被敌人发觉，第三次到鲁迅家避难。

冯雪峰《回忆鲁迅》：

不到两个月，省委机关被敌人发觉了，牵连到我们的住处，我们必须在半点钟以内搬出。我和我的老婆是随时走出，到无论那一个熟人那里去停一天，再找房子也可以的；但秋白同志怎么办呢？

“周先生家里去罢！”秋白同志夫妇和我，都不约而同地这样说了。当时又刚好下大雨，所以他们两人各带一点行李坐上黄包车，扯上车篷，在路上倒很安全的。

当天晚上，我已经安排好了我自己以后，到鲁迅先生家去看看的时候，他们两人正在谈得起劲呢。

这时候，即大约七月下半月，秋白同志又在鲁迅先生家里住了一个短期间。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第三次秋白夫妇来我家避难，是在搬出东照里之后的1933年7月下半月。那次因为机关被敌人发觉，约在深夜二时左右，我们

连鲁迅在内都睡下了。忽然听到前面大门(向来出入走后门)不平常的声音敲打得很急而且响,必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鲁迅要去开门,我拦住了他以后自己去开,以为如果是敌人来逮捕的话,我可以抵挡一阵。后来从门内听出声音是秋白同志,这才开门,见他挟着一个衣包仓促走来。他刚刚来了不久,敲后门的声音又迅速而急迫地送到我们耳里,我们想:这次糟了,莫非是敌人跟踪而来?还是由我先下楼去探听动静,这回却是杨大姐不期而遇地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别的同志的小姑娘一同进来,原来是场虚惊。但东邻住着的日本人和西邻住着的白俄巡捕都开窗探望这不寻常的事件,我们代秋白夫妇担心也不是偶然的了。

30日 在《斗争》第49期上发表《又是一笔卖国帐》、《庐山会议的大阴谋》、《国民党的理性斗争》、《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新鲜把戏》、《四川军阀混战和上海废战同盟》等短文。署名狄康。

八月

7日 在《斗争》第50期上发表《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署名狄康。

文章指出了《红色中华》报的缺点:

第一,报上所反映的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之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党的建设”——各级党部的情形,各级党部在苏维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优点和错误等等,必须反映在这个报纸上。照现在的几期看来,都只有“苏维埃建设”,而没有“党的建设”。同样,工会的作用更看不见。

第二,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再则“铁锤”栏暴露一切坏现象和缺点的时候,往往不提起党的纠正政策。

第三,消息的编辑方面也有很大的缺点。这报虽然还只是三日刊,而照性质说,应当担任日报的任务。……而现在的《红色中华》

报,却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

第四,社论和一般论文的指导作用,还应当加强,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

第五,我们以为工农兵通信运动对于这中央机关报以及一切军营、城市、作坊的小报,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可以使苏维埃的新闻事业发展到更高的一个阶段。

第六,除《红色中华》外,还应当由中央局出版一种《工农报》(象联共中央的《工人农》和《贫农报》),就是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

10日 鲁迅致函杜衡,商讨秋白所译的《高尔基文选》的出版事宜。信中说:

《高尔基文选》已托人送上,谅已达览。译者曾希望卷头有作者像一张,不知书局有可移用者否?倘没有,当奉借照印。

13日 鲁迅向董永舒推荐秋白所译的《高尔基小说选集》和《高尔基论文选集》。信中说:

高尔基的传记,我以为写得还好,并且不枯燥,所以寄上一本。至于他的作品,中国译出的已不少,但我觉得没有一本可靠的,不必购买。今年年底,当有他的《小说选集》和《论文选集》各一本可以出版,是从原文直接翻译出来的好译本,那时我当寄上。

14日 在《斗争》第51期上发表《这回“不自动”了》、《宁可送热河,不可送南昌》、《狗抢骨头吃》、《国民党的“仁爱”》等短文。署名狄康。

同日 鲁迅致函杜衡,谈秋白所译《高尔基论文选集》和《高尔基小说选集》出版事宜。

20日 鲁迅致函杜衡,继续商谈秋白所译《高尔基论文选集》和《高尔基小说选集》出版事。

27日 在《斗争》第52期上发表《最大的奸商——国民政

府》、《国民党的所谓统治经济》、《国际反帝大会——反对国民党的外债政策》等短文，署名狄康。

同日 鲁迅致杜衡函，告知生活书店同意译者条件，不肯付还书稿。交秋白所译的《伯纳·萧的戏剧》，后发表在现代月刊第三卷第6期上。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雨。上午寄杜衡信并稿一篇，书两本，又萧参^①译稿一篇。

31日 在《红旗周报》上发表《瓜分混战之下的中国西部》一文。署名狄康。

同月 居住在鲁迅家中不久，即迁至上海中央局的一个机关里住。

杨之华《回忆秋白》：

不久，组织上给我分配了工作，我和秋白就搬到机关去住。同住机关里的是文华同志一家。过了一个多月，在一个深夜里，忽然传来了警报，我们和高文华同志一家立即分别离开了这个机关。这时已是凌晨两点钟了，秋白和我先后坐着黄包车到鲁迅家里去，恰巧差不多同时到达，只是一个在前门，一个在后门，于是我和秋白分别敲响了前后门，惊动了鲁迅全家，秋白和我深感不安。但鲁迅夫妇仍一如以往，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鲁迅体贴地让许广平同志为我们准备了夜餐。

几天后，得悉高文华同志已找妥了住处，我们才离开鲁迅家，住在机关里。

冯雪峰《回忆鲁迅》：

这时候，即大约七月下半月，秋白同志又在鲁迅家里住了一个短期。

^① 萧参，秋白笔名。

后来秋白同志夫妇就搬到上海中央局的一个机关里去住了。

九 月

3日 给鲁迅信。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

星期。大风而雨,午晴。……得宁华信,即复。

10日 鲁迅致杜衡信,为秋白催稿费。信中说:《高尔基论文选集》的译者要钱用,而且九月中旬之期亦已届,请先生去一催,将说定之版税赶紧交下,使我可以交代。

12日 鲁迅送来《高尔基小说选集》版税百元。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二日):

雨,午晴。夜三弟来,得杜衡信并书两本,《现代》九月号稿费五元,萧参预支《高氏小说集》版税二十二日期支票百元。

22日 王明路线控制的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决定》。

这一年,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前夕。针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秋白用狄康笔名,在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连续发表了《国民党最大借款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等十八篇时评短论。这些文章简短有力,笔锋锐利,尖锐、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野蛮的武装侵略;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等“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卖国嘴脸;揭露了蒋介石对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等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反动政策。然而,就是这一批战斗论文,却遭到了王明宗派主义集团的无端打击。是日,王明控制的上海中央局作出了所谓《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决定》,又一次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秋白的公开批判;同时在《红旗周

报》和《斗争》上也相继发表署名文章指名批判秋白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把他作为当时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标,对秋白进行新的错误打击。临时中央的这个所谓《决定》,不顾事实,用“莫须有”和无限上纲的手法,指责秋白在《斗争》上发表的许多论文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庐山会议的大阴谋》一文,是“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员群众的武装”,“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因而秋白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决定》还号召全党“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并检查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坚决的打击一切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倾向,以保证彻底执行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

28日 写《儿时》一文,发表在12月15日出版的《申报》“自由谈”上。署名子明。文中写道: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里面,假使他天天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么,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

十月

9日 给鲁迅信。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十月九日):

晴 上午得疑冰信。

10日 赴郑振铎婚礼,并刻图章三枚作为“贺仪”,一时传为佳话。

茅盾《我所走过的道路》(上):

我还可以讲瞿秋白一个轶事,以见其为人之幽默。当郑振铎和高君箴结婚仪式之前一日,郑振铎这才发现他的母亲没有现成的

图章(照当时文明结婚仪式上必须盖有主婚人,即双方家长,介绍人及新郎新娘的图章),他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不料秋白的回信却是一张临时写起来的“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郑振铎一看,知道秋白事忙,不能刻,他知道我也能刻图章,就转求于我。此时已为举行结婚仪式之前夕,我便连夜刻了起来。第二天上午,我把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差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正在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我把那纸包打开一看,却是三个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二个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郑、高两章合为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因为郑、高二人都都是福建长乐县人),每章各占一字,这是用意双关的。我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两元,恰好是五十元。这个玩笑,出人意外,郑振铎和我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自然,我刻的那个图章,就收起来了,瞿秋白的篆刻比我高明十倍。郑、高二人本来打算在证书上签字,不用图章,现在也用了秋白刻的图章。下午举行结婚仪式,瞿秋白来贺喜了,请他讲话,他使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谐的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满堂宾客,有瞠目结舌者,有的鼓掌欢呼。

15日 在《斗争》第56期上发表《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署名康。检讨书完全按照《决定》下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

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道: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罢。

21日 鲁迅校印秋白译的《被解放的唐·吉河德》。

鲁迅致曹靖华信：

我现在校印《被解放的唐·吉诃德》，它兄译的。

24日 给鲁迅信。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县。……得疑冰信。

25日 写《中国文与中国人》一文，发表在12月28日出版的《申报》“自由谈”上，署名余铭。

30日 《红旗周报》第61期上发表社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社论强调批判瞿秋白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作为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前提。尽管秋白已公开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但对秋白的批判，仍在无休止地进行。《社论》还引用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叫嚷要对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提高一切同志的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来检查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动摇，彻底粉碎这种最有害的机会主义观点。”

在同期《红旗周报》上，还发表了署名“浪”的长文《粉碎五次“围剿”与反倾向斗争》。文章批判秋白对自己“错误”的“掩饰”行为及其“错误”根源。

同月 译V·吉尔珀汀著《高尔基——伟大的普洛艺术家》。

十一月

3日 写《两个五年计划之前》、《能量》、《认识》三篇文章，都未发表。

10日 给鲁迅信，并稿二篇。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

晴。……得宜宾信并稿二篇。

12日 写《房龙的“地理”和自己》一文，发表在1934年1月1日出版的《文学季刊》第一卷第1期上。发表时改题为《读房龙的〈地理〉》。署名商霆。

同日 鲁迅致杜衡函，查询秋白所译《现实主义文学论》、《高尔基论文集》二书的出版事：“那一本《现实主义文学论》和《高尔基论文集》，不知何时可以出版？高的小说集却已经出了半个多月了。”

15日 鲁迅致函姚克，告知秋白所译《解放了的董·吉河德》一书，不管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何等厉害，下月出书。

25日 鲁迅致信曹靖华，告知秋白“都好”。

同月 写《关于高尔基的书——读邹韬奋编译：〈革命文豪高尔基之一〉》和《“非政治化的”高尔基——邹韬奋编译〈革命文豪高尔基之二〉》，同时发表于1934年7月出版的《新语林》半月刊第2期上。署名商廷发。

同月 在江西瑞金出版的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上，全文刊载了第61期《红旗周报》上的批判瞿秋白的文章，标志着对瞿秋白的批判，已由白区扩向苏区，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

十二月

2日 译高尔基诗《市侩颂》，发表在1934年9月16日出版的《译文》创刊号上。

20日 鲁迅致函徐懋庸，推荐秋白所译《现实——马克思主义论文集》。

同月 译高尔基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发表在1934年3月1日出版的《文学》第三卷第3期上。

同月 译高尔基小说《马尔华》，发表在1935年9月20日出

版的《世界文库》第五册上。

冬 译普希金长诗《茨冈》，未及译完，于1934年1月离沪去江西瑞金。

译稿最初刊于1937年武汉时调社版《五月》，并于1940年由上海文艺新潮社印行单行本。其未竟部分由李何于1953年补译后于同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在次年辑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八卷。

年末 编就《乱弹》^①文集。

临时中央来电，要秋白去中央苏区。因健康原因，要求杨之华同行，但遭到拒绝。

冯雪峰回忆：

一九三三年末，我担任中央苏区党校教务主任，党校校长张闻天同志。有一次他和几位中央领导闲谈，谈到一些干部人选，当时我也在场。他们谈到有人反映苏区教育部门的工作有点事务主义，张闻天想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问我他能不能来。我说他是党员，让他来一定会来的。后来由我起草了电报拍到了上海，秋白就服从党的决定到苏区来了^②。

陈铁健《瞿秋白传》：

1933年底，临时中央来电，要瞿秋白去中央苏区。瞿秋白一直

① 这部杂文集，其原本有两份。一为作者在1932年末或1933年初交谢旦如保存，后由谢旦如重加编选，1938年5月以霞社名义出版的《乱弹及其他》中的《乱弹》部分；一为1933年末作者离上海赴瑞金时交鲁迅保存的。与前者相比，作者在文字上作了不少删改，编排稍有变动，篇目亦有所增加。

② 陈琼芝：《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三辑，转引自《新华文摘》，1981年第二辑。

向往和关心苏区,听到传达中央通知后,马上说:“想去很久了!”据杨之华回忆说:瞿秋白这时是兴奋的,可是又克制了自己的感情。“他平静地点燃了烟斗,安详地吸着,缕缕青烟缓缓升腾,好象带着他的心飞向远方”。他提出问题:“之华可以去吗?”通知人回答说可以向组织反映。瞿秋白身患重病,苏区生活和医疗条件都很差,他要求让一直照料他生活的妻子杨之华同行,绝非非份之想。第二天,上级领导人的答复是:暂时不能去,因为她的工作要有人来接替……

事情决定后,瞿秋白日夜工作,整理他近三年来的著作和译作。杨之华也忙于为他准备行装,一只整理好的衣箱已经放在屋角。他对杨之华叹息着说:“可惜《茨冈》没有译完,来不及完成了。”他拿起译稿又放下,自语说:“随身带去又不可能。”一会儿,他又说起驳斥叛徒叶青的七、八万字的书稿被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遗失,实在可惜。他感到今后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再从事著述;过去所写的东西,即使不能公开出版,也应该妥善保存,留待革命胜利以后与读者见面。一旦遗失,就难以弥补了。

同年 写《马克思文艺论的断篇后记》。未发表。文章指出:文艺应当是改造社会的整个事业之中的一种辅助的武器。社会的斗争是多方面的,社会现象的本身是变动的,是人自己的行动所组成的。如果文艺也还是人的行为底一种,那么,谁也不能够禁止它影响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在认识现实的过程之中去辅助现实的改造。

同年 译文具体时间不详的稿件尚有: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象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列宁:《L·M·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V·亚陀拉茨基等作:《关于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的注解》。

帕甫信柯:《第十三篇关于列夫孟托夫的小说》。后发表在

1935年9月出版的《译文》第二卷第7期上。

高尔基长篇小说《萨慕京的生活》第一部第一章的开头部分。

马尔赫维察《爱森的袭击》^①

著述具体时间不详的有：

《择吉》，署名陈逵。

《“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署名陈逵。

《鬼脸的辩护》，署名陶吉。

《慈善家的妈妈》，署名狄康。

^① 秋白根据《国际革命文学》1931年第4期所载俄文译文转译。当时拟出单行本，未成。后收入1952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

一九三四年 36岁

一月

4日 临行前,向战友鲁迅、茅盾告别。

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

县。……晚宜宾来。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1934年1月初,秋白同志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临行前曾到鲁迅寓所辞别。这一次,鲁迅特别表示惜别之情,自动向我提出要让床铺给秋白同志安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走后常常挂念秋白同志是否已经到达苏区,常常挂念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胜利。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秋白是三四年一月初只身去江西的,之华没有同去。临走之前,秋白来辞行,谈到泽民去世,也很怆然。秋白与泽民的友谊,比对我的友谊要深。他说,泽民前年去鄂豫皖时,曾与他长谈,并相约革命胜利后,在上海相会,谁料到那一夕谈竟成永诀,秋白当时把一只苏联制的钢怀表送给泽民,对泽民说:这块表是苏联同志送给我的,你到苏区天天要打仗,这只表对你有用,你就留作纪念罢。后来这块表,泽民送给了徐海东,抗日战争时,徐海东又将它送给了

彭德怀,全国解放后,彭老总又把这怀表还给了杨之华。现在这块表保存在北京革命博物馆。

杨之华《回忆秋白》: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秋白要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的前几天,他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深情和渴望,对我说:“我无论如何要去和鲁迅、茅盾告别,跟他们好好谈一谈。”他深切地关怀着“左联”的工作和最亲密的战友。他的这种感情,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所以虽然当时外出是很危险的,但还是同意他去。为了安全,让他等到晚上才去鲁迅家,在那里住上一天,第二天晚上再回来,并再三叮嘱他路上要千万小心。他听了我的话高兴极了。一月四日晚上,他就去鲁迅家,我很不安地等了他一天一夜,第二天晚上他总算平安地回来了。他走路总是轻轻的,使人不容易听到他的脚步声;但他一进大门,我就听出他回来了,压在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他仿佛年轻了许多,笑容满面地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茅盾身体都好,海婴也没有病。”停了一下,他带着抱歉的口气说:“昨天夜里,大先生一定要把他的床铺让给我睡,他们夫妇睡了一夜地板。”

6日 为鲁迅写给苏联木刻家希仁斯基等人的信译成俄文。

7日 夜11时,在风雪交加中,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①。

杨之华《忆秋白》:

在静悄悄的夜晚,他弯着腰低着头伏在书桌上辛勤地工作,已成了他多少年来的习惯。但这一夜却与往常不一样,我在睡梦中不断醒过来,也不断见到他绕着我的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沉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离开上海的晚上是“白雪纷飞”。但没有说出具体日期。据《鲁迅日记》记载:“七日星期。县。……夜雨雪”。其余几天是“五日县”、“六日晴”、“八日县”。据此,可知秋白离沪日期应是1月7日。

思抽烟,安静的夜并不能安静他的心。快要天亮的时候,他看见我醒了,悄悄地走过来,低下头,指着书桌上的一迭书说:“这是你要读的书。”又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两半:“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能通讯,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罢,到重见的时候,交换看看吧!”

他一夜没有休息,但精神还很好。我们谈着当前的工作,也谈着离别以后的生活。我发现他一直为分别后的生活耽心,为我的安全耽心,我就象小孩子似地轻松地对他说:“不要紧的,过去离别了几次不是都重见了么?这次当然也一样!”他说:“我们还能在一起工作就好了!”我说:“组织已经答复我们,等找到代替我工作的人,我就可以走了,我们会很快见面的。”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说:“之华,我们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我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

他愈说愈兴奋了,在他的脸上充满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他很坚决的对我说:“我一旦被捕,受到审判的时候,就这样回答他们:‘你们不配审判我,我要审判你们!’”他的坚强的意志,热烈的感情,无形中给予我一种不可摧毁的内在力量。

这一天的晚饭比较丰富,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各出一元钱,叫了个菊花锅,买了几个苹果,大家很愉快地给他送行。夜十一点他离开了寓所,我送他出门,他尚未走到里弄口,又在白雪纷飞的路灯底下回到我的眼前:

“之华,我走了!……”

“再见,我们一定能重见!”我很自信地回答。

我又送了他一段路,一直看他的影子消失在黑魆魆的大街尽头,……

9日 鲁迅接到秋白的告别信。

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一月九日):

微雪。……夜得宜宾信。

下旬 杨之华接到秋白在赴瑞金途中，托人带来的即将进入苏区的便笺。

杨之华《回忆秋白》：

过了半个月，接到他托人带给我的一张小条子，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

28日 鲁迅接到秋白赴瑞金途中的来信。

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晴。……得宜宾信。

二 月

1日 中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大会选举博古、陈绍禹、何克全、刘少奇、毛泽东、项英、吴亮平、瞿秋白等一百七十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

3日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洵、朱地元、邓发、方志敏、罗迈、周月林等十七人组成中央政府主席团。并选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一致通过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十一个人民委员部，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

5日 到达江西瑞金，住沙洲坝。立即到人民委员会视事，出任教育人民委员。

秋白是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再乘船到汕头，改乘火车到潮州。然后换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大埔、多宝坑，再从这里步行，经永定铁坑、桃坑、下金、中金、古木督、严坑、丰稔、庄太拔、茶地、白沙、

旧县、南阳、涂坊、元亨、河田、长汀、古城，于是日抵达瑞金。

秋白一到苏区，就与毛泽东、徐特立等商讨教育工作。与徐特立细谈几年来苏区教育工作经验。

石联星《秋白同志永生》：

一九三四年，在红色首都瑞金，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聚集了几位同志，在我的记忆里有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胡底，还有两位留苏同志，他们在那里交谈着什么。忽然门口出现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边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癯，风度潇洒而安祥，约三十余岁。他象春天的风，带来温暖与欢乐。刹时间，整个屋子飞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欢呼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当时我也跟着激动，不知是谁在耳边低声地说：“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

我和他（秋白）没有同居过，不过最初时期隔居较近。当时他任中央教育部长，我任副部长，我不住政府而在农业学校负责，有一短时期我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他任校长，往来较密。

秋白同志到苏区时敌人封锁最严重，粮食按人分配，米自十四两到一斤四两，用席草做的袋子装着，袋子上掉一牌子，牌子上写着姓名。一起放在锅里煮及甑里蒸。为着解决苏区全部粮食问题，每一个党员和群众都自动的节省，我是一日十四两，秋白同志吃多少我不知道，只知道节省委员会批评教育部节省过火。有一天我到教育部去了，他留我吃饭，他说有某同志送给他几两盐，留我吃一吃有盐的菜，最后一时期我们一日一人只吃一钱盐，职无高低，人

无老幼^①。

刘英《秋白同志在苏区》：

秋白同志住在一间狭小的平房里，房里除了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桌子和几条长板凳外，就是他的一个所谓书架；一块长木板上放了许多书和文件。在这间屋子的外面另有一间屋子，里面有一张旧长条桌和几条长板凳，这是大家开会的场所。每次开会，秋白同志总是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给大家倒水。尽管大家喝的是白开水，可是都很高兴，会场气氛活跃，谈笑风生。秋白同志喜欢用毛笔，在他的破旧桌上放着一墨盒和几枝毛笔，还有苏区造的粗黑纸张，可他用这些简陋的文具不知写了多少文件，花费了多少心血啊！

庄晓东《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

中教部系统的同志们的工作热情是高的，干劲是大的，但问题也不少，有时一大堆，几乎处处要秋白同志亲临指导，一处不到一处不了。在他的小小卧室兼办公室，经常挤满了一批批来请示的人，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等他答复解决，有时忙的连饭都顾不上吃。

秋白同志一向是终日伏案，埋首写作，需要安静的，这时他的习惯和作风却变了。有人来找就见，有事要解决就谈。不但约人来谈，而且还亲自下去调查了解。为了行动迅速，节省时间，他学着骑马，他自己是一个病人，还骑马跑得很远去看望患病的同志。一次骑着马飞跑着去看正在养病的王稼祥和其他几个同志，他们感动的说：“你带病来看病人，我们病好后一定去看望你。”

秋白同志经常工作到深夜，但一早起来骑马出去了。晚饭后经常和同志们一起去散步，有时还同大家打打球，在厅里就放着一张

^① 此文是徐特立五十年代写给杨之华的信。载《忆秋白》第322页。

乒乓球球台, 同志们都异口同声的说:“秋白同志变了, 变年轻了。”其实呢, 他三日两头发高烧, 傅连璋医生天天都走来给他看病, 开药、打针。有时他实在支持不住了, 不得不卧床, 但躺在床上还是要看文件, 处理日常事务。他这种带病工作的忘我精神, 实在令人钦佩!

老战友们深知秋白同志长期带病工作, 一再要我注意照料, 但在敌人层层包围的情况下, 为了加强秋白同志的营养, 要跑到几里外的圩场上去才能买到一条鱼和几个鸡蛋。当煮好送到他的跟前时, 他总是问东西是那里来的, 旁人有没有的吃, 推来让去, 给他弄点东西吃的任务, 也不容易完成。有时邓大姐从几里路外, 亲自跑来, 送点面粉和白糖给他, 并亲手煎几张糖饼给他吃。在当时敌人的封锁下, 这已是得来不易, 最好的营养品了。大家都在关心着秋白同志的健康, 为他担心, 可是他却经常忘了自己。为了使他脑子能空闲一些, 很希望有个谈得来的同志来同他聊天。冯雪峰同志是最诙谐和健谈, 而且和他谈得来的人, 一听到他俩的谈笑声, 我们已感到轻松。

……秋白同志是毛主席最接近的战友, 在党的政策方面、路线问题上, 两人的观点经常是一致的, 可是这时都遭到排挤, 他们的内心该是多么沉重啊! 可是每次见到他们两人, 总是面对笑容, 还常在一起谈笑咏诗呢。俗语所说“宰相肚子里能开船”。他们确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①。

7日 鲁迅将秋白避难时居住过的卧室保留原状, 以表达对战友的深切怀念。

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

^① 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三期。庄晓东是秋白在中央苏区时的秘书。

一九三四年二月七日的午后，我到了上海，到了当时不公开的鲁迅的寓所。晚饭后，鲁迅先生把我引到三楼楼梯眼前的一个房间里。那房间虽不很大，但却极整洁。后墙有一个窗子，靠窗有一张条桌，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桌上放着削好了的铅笔、毛笔、墨盒、信封、拍纸簿等等。桌前放着一张靠椅。靠后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鲁迅先生站定之后，从容而低沉地说：“这是秋白逃难住的房间，一切布置照旧，你就住在这里吧……”说毕，我们就又回到二楼鲁迅先生的书房兼作卧室的房间里。我坐在桌头的藤躺椅上，鲁迅先生坐在桌前的转椅上。鲁迅先生一面回忆着，一面用同样低沉的声调继续说：“……那是秋白逃难住的房间。他不断受猎犬追逐、缉捕，到处迁居。有时甚至一日数迁。有时被追逐到走投无路时，就跳上野鸡汽车兜几个圈子，把猎犬甩掉，再下来步行。有时到最危险的关头，就逃到这里，住到你住的那个房间里，……他等你等了好久，没有等着，你来了，他走了，到那边去了，……”他习惯成自然地随口说出了平时习用的暗语“那边”两个字之后，才悟到这是在家里说的，于是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到苏区去了。”停顿了一下，又重复着说：“你来了，他走了……”我只感到心头压了一块大石头，嘴里却吐不出半个字来。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凝视着鲁迅先生的沉思的面孔，心里想着：“先生，你用自己的生命，在最危险的情况下，来庇护一个党的领导同志！……”

1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第八、九号命令：《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小学教员优待条例》。

同月 兼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兼主编。《红色中华》报于1931年12月21日创刊，它最初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后来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联合机关报。它是我党在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中央级的铅印大报。创刊伊始，毛泽东委任周以栗为主笔。不久，周因病，先后由项英、王观澜、李一氓、沙可夫相继任主编。1934年年初，沙

可夫因病去苏联疗养,秋白便接替他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兼主编(或称编委会主任)。这样,秋白工作更忙了,他白天在教育部工作,晚上要为报纸写稿、审稿,所以常常要工作到深夜。从1934年2月至1935年2月11日,秋白在苏区的新闻战线上整整战斗了一年。

秋白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和主编的时候,正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路线达到顶点的时期,他在党内被排挤,在政府内部也处于没有发言权的地位,据《红色中华》报编委韩进回忆,连当时的中央党报委员会的成员陆定一都有意避免与他见面,以免引起嫌疑,受到迫害。他与同样遭到排挤的毛泽东虽政见相同,也无法交谈,只能咏诗咏词,互相赠答,曲折地表达对王明路线的不满。人们常看到这两位诗人,坐在树荫下、草地上,背靠着背,互相酬唱。富有幽默感的毛泽东,有时还和秋白开玩笑,问他是不是想念杨之华?

早在进入中央苏区之前,秋白在上海系统地研究了《红色中华》报的政治宣传和新闻业务的情况,写出了《关于红色中华的意见》一文,提出了六点改进意见。但在当时情况下,当然难以完全付诸实践。这时,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成为中央苏区一切工作的重心,《红色中华》报的宣传中心,就是动员一切人力财力,支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所以,报纸大力地宣传了扩大红军运动,大量地报道了革命根据地人民踊跃参军模范事迹,介绍各地在扩大红军中的先进经验,批评了一些地方在扩大红军中的缺点和错误,推动了参加红军的热潮。报纸以“红军等着粮食吃”“一切为了战争”等鲜明口号,号召人民为保卫革命根据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红色中华》报还报道了根据地内部的肃反斗争,批评了官僚主义。当然,在当时“左倾路线的统治下,《红色中华》报也不可避免的要宣传“左”倾路线的一些错误主张和政策。如过左的土地政策、过左的工商业政策、过左的肃反政策等等。这就必然给党的革命事业造

成了损失。

在秋白的主持下,这个时期的《红色中华》报在依靠群众办报方面也有所发展。报社成立了通讯部,拟订了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的计划,规定了帮助和培养通讯员的一套办法。报社向通讯员发了聘书,定期给通讯员发报道提示,并出版油印的《工农通讯员》,二十天或一个月出一期,每期三、四张蜡纸,给通讯员讲如何写通讯,要求写什么稿,以及写作方法及注意事项等。通讯员来稿采用时,都把他们的名字标在后面,以资鼓励,又表示责任要通讯员承担。这样,通讯员的队伍不断扩大,由创刊初的二百多人,迅速增加到近千人,形成了一个包括各地方、各系统的庞大通讯网。秋白还注意帮助各机关、各学校办好墙报,动员领导同志带头投稿,组织大家画画、写歌。不少单位的墙报办得很活跃,不仅在政治上起了宣传作用,对扫盲、提高文化水平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 月

1日 《文学》第二卷第3号发表译作高尔基《二十六个和一个》。

12日至14日 出席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各县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并在会上作关于新的教育政策的报告。

大会在听取秋白和省教育部长关于江西省教育工作方针的报告之后,通过了一项详细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了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方针任务,经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批准实施。决议案贯彻了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服务的方针,强调了教育文化工作与当前中心工作应当切实的互相联系起来。

刘英《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

秋白同志对教育工作十分重视,把它看作夺取革命胜利必不

可少的一项任务。……

秋白同志为人谦逊和蔼,对同志热情亲切,他的神态总是那样文质彬彬,工作总是那样认真负责。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以后,我调到少共中央局任宣传部长,同时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经常有机会参加秋白同志召开的会议。我还记得第一次去参加秋白同志召集的一次讨论会。一见面,就好像见到了老朋友。他是那样平易近人,使人丝毫不感到拘束。这次会议研究的是“苏区文化教育工作计划”,计划草案是秋白同志亲自执笔起草的。起草前,他曾找了许多早就在苏区工作的同志征求意见,然后综合大家的意见作总结发言。以后,计划又经过他的认真修改,才作为文件印发下去。……

秋白同志善于团结知识分子,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当时战争的环境下,中央苏区的主要力量都集中于直接为作战服务的工作中,办学校,编教材,总觉得人手不够。秋白同志说:不要紧,我们自己没有的,可以到白区去找么,可以设法去请白区有经验的教师来帮忙。只要他们愿意来,我们可以优厚相待。根据秋白同志的意见,教育部门设法从白区聘请了几位有教育经验的老教师,并且在工作中尊重他们,发挥他们的特长。果然,这几位教师积极工作,对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积极作用。

当时,在秋白身边工作的人不多,许多文件都是他亲自执笔起草的。他文笔流畅,写作能力惊人。他身边有一个秘书,常常只帮助他做些抄写工作。我记得每次到他那里去,总看到他在埋头写东西。想到他的身体那样不好,我也常劝他注意休息,但他总是微微一笑,仍继续伏案写作,把全部精力倾注到工作上去了。

……

秋白同志常常感慨地说:苏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太低了,一定要积极想法扫除文盲。他提倡根据苏区的特点开展扫盲运动。他说,除了办学校外,要发动群众搞扫盲运动,互教互学,这样才能使更

多的人较快地提高文化水平。经过他和徐老的苦心筹划,在苏区因陋就简地创设了地方识字班,提倡丈夫教妻子,儿子教父亲,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秋白同志还亲自编写通俗课本,供学生使用。这样实施不久,收到了不少的成效。

21日 出席中央苏维埃政府为工作人员中开展检举运动召开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并发了言。

29日 在《红色中华》报第68期上发表短论《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

中央苏区为粉碎敌五次“围剿”和经济封锁,开展了节省粮食运动。秋白在文章中论述了节粮运动的重要意义,号召工农群众“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央苏维埃政府提出的每一任务,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红军,来争取战争的胜利,从胜利中来争取自己阶级的彻底解放。”

四 月

1日 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

国立苏维埃大学是中央苏区的一所干部学校,是以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类高级干部为任务的。秋白以教育人民委员兼任校长,徐特立为副校长。是日,秋白在开学典礼上作报告。强调苏维埃大学的战斗任务,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才。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的了解自己的伟大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

苏维埃大学只存在四个月,至7月间,就并入中央党校。

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

秋白同志在江西时间短,我没有在刊物上看见他的政治

论文,因为他不是做党的工作而是任政府的教育部长,我只见他对教育工作十分负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讨论的题目他都加以原则指示。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的生活环境,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他都忘却了,精神上表现着十分愉快。

3日 在《红色中华》报第170期上发表社论《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

3月至4月初 领导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和颁布《苏维埃教育法规》及文艺组织规章。其中包括已在当年2月颁布的《小学校制度条例》、《小学教员优待条例》。

秋白的教育思想在这些规章中得到体现。他强调教育必须贯彻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土地革命服务的方针。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在他亲自制订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总纲中指出:“小学教育,是要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要消灭离开生产劳动的寄生阶级的教育,同时要用教育来提高生产劳动的知识和技术,使教育与劳动统一起来。”秋白对苏区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后来在被捕后,回答记者的采访时说:

因为国军军事压迫甚紧,一时尚不易顾及教育工作,但我甚极力为之,苏区各地列宁小学甚多,教科书亦已编就,此外有识字班之设立,后又改为流动识字班。师范学生极感缺乏,故设立列宁师范,造出小学教员甚多。另有郝西史小学,学科均极粗浅,学生大半为工人。去年计划设立职业中学多处,尚未实现。

文艺组织规章有:《工农剧社简章》、《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俱乐部纲要》、《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等各类文艺组织的规章。

苏区的文艺工作,分成两个系统:一是以红军大学为中心的红军系统;一是地方系统,由教育人民委员部隶属的艺术局统一指

导。秋白在苏区期间,十分重视文艺工作。在秋白领导下,苏区群众文艺运动和专业文艺工作,对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延安时代的文艺运动提供了许多经验。

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

一九三四年他(秋白)由白色区域来到红色区域的中心瑞金。他患很重的肺病,但是工作繁重,不仅管一般的文化教育工作,还兼管教育部所隶属的艺术局,所以常常带病工作。

苏区当时群众性的文艺工作中心在红军大学。红军大学先后由叶剑英和刘伯承任校长。他们都很重视文艺工作对教育工作所起的辅助作用。由外来的少数文艺工作的爱好者与红军中高级干部发动组织的工农剧社,很短期间就推广到各县,以至于区都组织起工农剧社的分社。工作的范围扩大,文艺工作干部的需要也随着增加,中央苏区就创办了第一所戏剧学校。当时瞿秋白同志提议学校名称应以高尔基来命名。他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他推荐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和戏剧《下层》,说:“那真正是表现劳动人民的小说和戏剧”。

没有教员,没有教材,没有书的学校创办是很难的,难以想象的。我们在瑞金附近找着一所破庙,略加修理,建设了一个室内剧场。他用鲁迅的话来鼓励我们:“路是人走出来的。”他又说:“革命的戏剧学校在苏区还是初生的婴孩,慢慢抚育吧!不要性急。”

.....

当高尔基戏剧学校讨论教育方针的时候,我们记得他强调了两点:第一,学校要附设戏团,组织到火线上去巡回表演鼓励士气,进行作战鼓动。平时按集期到集上流动表演,保持同群众密切的联系,搜集创作材料。他说:闭门造车是绝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的。

他主张学校除普通班外,应添设红军班和地方班。红军里面的文化娱乐工作与各军团剧社的活动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他认为戏剧学校如果不为红军部队培养艺术干部,就失掉创办的重要意义。同时他建议把瑞金云集区工农剧社的社长,长汀县工农剧社社长,中央印刷厂工农剧社社长,各区的社长调来训练,开设地方班半年毕业。他说:“没有戏剧骨干,就谈不到什么工农戏剧运动。”

……

秋白同志鼓励大家搜集民歌来填词。庆祝二苏大会上,云集区的俱乐部唱了几个歌子,很好听,后来打听出来都是江西老百姓中最流行的《竹片歌》、《砍柴歌》、《十骂反革命》。他笑着对我们说:“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

为了防空,学校搬到梅村,离教育部只三二里路。秋白同志常来,为戏剧学校的教职员讲政治课,解答时事问题。由于他精通马克思主义,能够深入浅出地讲解时事,听众总是精神饱满,常常发出笑声。他一走出校门,总有一大群学生围住他,不让他走掉。他每次都说:“隔两天我再来听‘哎哟来’(刘秀章的别名,她是兴国县最好的青年农妇歌手)的兴国山歌。”

一阵如雷的掌声把他送走,两个最小的演员秋兰、郭滴海每次都把他送到教育部才回来^①。

12日 在《红色中华》报第174期上发表《纪念“五一”与声援华北工人斗争》一文。

五 月

1日 组织艺术团体上前线慰问。

^① 载《人民日报》,1950年6月18日。

20日 写《阶级战争中的教育——论教育系统的检举运动》一文，发表在6月2日出版的《斗争》第62期上。署名瞿秋白。

文章提出了教育必须与实际斗争相结合，“苏维埃的教育是阶级教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教育。”指出“战争时代的教育，特别要注意学生的集体的社会工作——就是一切参加战争的工作，要在学生的社会活动中去进行教育；要在一切日常功课中去教育他们的阶级的战斗的精神。”同时又提出“在教育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并且应当利用旧知识分子，即使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也可以利用。”只要他们能“忠实于苏维埃，服从苏维埃法令，旧知识分子我们仍旧把他们当做苏维埃职员看待，我们还是督促他们，勉励他们积极工作。”他强调“教育方面需要利用一些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地主富农或是他们的子弟，这个政策并用不着改变。问题在于苏维埃政府和党的监督必须加强阶级警觉性。”

同月 主持创办的《苏维埃文化》月刊第一期出版，发表《文化战线的红五月》一文。

六月—七月

23日至7月7日 在《红色中华》报第206期、209期、211期上连续发表《中国能否抗日？》长文。

文章运用大量材料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军事、经济和人民组织程度等条件，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散布的“中国无力抗日”论。指出，“国民党拥有百余万使用现代武器的军队”，并且“还在继续训练法西斯军队”，“但是没有派遣一兵一弹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反而“把华北的数十万军队”调到南方去进攻主张抗日的“苏维埃红军”，这是“国民党无耻的卖国辱国勾当”。

文章分析了日本的武装力量，依据唯物论的观点指出了在战争中人和武器的关系，断言：“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有着精良的

器械,但是战争的胜败不完全决定于器械,而决定于使用器械的人。”文章强调指出:“无论从那一方面考察,我们有着抗日的力量”,“我们有力抗日”,“中国所有的工农士兵群众,所有的武器,如果都用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那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

八 月

4日 代表工农民主政府出席瑞金县召开的红军家属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致词。

十 月

10日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身患重病的秋白被迫留在江西。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

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①。

伍修权《往事沧桑》:

这次战略大转移,只是中央领导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在进行这样大的战略转移之前,不仅没有作群众性的思想动员,连

^① 这是张闻天同志在延安整风笔记的摘录。转引自《遵义会议文献》第78页。

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相反作了严格保密。项英、陈毅等同志，当时就不知道这一重大战略意图。有些“左”倾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根据地打游击，如瞿秋白同志，他的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环境，结果不幸被俘牺牲；何叔衡、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时牺牲的。

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关于遵义会议之前的片断回忆》：

……这时我听说，中央局决定不让瞿秋白同志（当时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跟红军走。听到这事以后，我心里很难受。一方面向毛泽东同志说：“这怎么成？秋白同志这样一个有名的老同志难道能够不管，要他听任命摆布？”请求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局说说。毛泽东同志说，他很同情秋白同志，他曾说过，但他的话不顶事。另一方面，我向张闻天同志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闻天同志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秋白同志自己听到了这决定，精神上甚为不安。我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这次秋白同志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这是我同秋白同志的最后会面，不料竟成永诀^①。

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

长征出发时，我离秋白同志住的地方三十里，这里正是出发地点，我仓促赶到出发地点，我们两人没有多谈，他和我换一马夫以强壮的马夫给我，当时我们都以为红军出击不久必仍回苏区，从此永别是我们不及料的。

^① 载《学习与研究》，1981年创刊号。

莫文骅、苏进《冯雪峰在长征中》：

一九四〇年，苏进到延安杨家岭去看望毛主席，提到这件事，毛主席说：“长征出发的时候，象瞿秋白、刘伯坚，还有我的爱弟毛泽覃等人都应该带来的。教条主义搞宗派，把他们留在苏区，给敌人杀掉了。”雪峰同志对“左”倾机会主义搞宗派，把许多反对他们的应该随队长征的好同志当作不可靠的人留在苏区，葬送在敌人的屠刀下，客观上做了借刀杀人的事。这一点，从开始就非常敏感地感觉到了，并且态度非常鲜明的。

陈早春《夕阳，仍在放光发热——追忆冯雪峰同志》：

（雪峰）也说到了毛主席与瞿秋白同志在瑞金时的友谊。他说：“那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彼此谈了一个通宵，话很投机，两个都是王明路线的排挤对象，有许多共同语言。后来瞿秋白死了，毛主席认为这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毛主席曾气愤地说：‘将来要跟他们算账，为什么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大队伍中去！’”

杨之华《回忆秋白》：

为了和一些战友们话别，秋白邀请了李富春、蔡畅、刘少文、傅连璋等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秋白举起一只酒杯，风趣地向大家说：“这酒杯是之华在上海给我的纪念品，让我们一起为革命胜利干杯！……”

因为负伤留在医院治疗的陈毅同志，第二天偶然见到秋白。陈毅同志还不知道中央让秋白留下的决定，就问秋白为什么还没走。他为了照顾秋白病弱的身体，要把他的马送给秋白，又劝秋白赶紧追上队伍。秋白很感谢陈毅同志的关心，告诉了他中央的决定。

朱德回忆：

我们留下许多最能干的军事、政治和群众领导人。……司法委员何叔衡和前任党书记、当时任教育委员的瞿秋白都留下未走。何叔衡已经六十多岁，而瞿秋白身患肺病，健康极差。瞿秋白曾经是

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而且做过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的中央委员。^①

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记事》：

十月十六日晚上，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进行一次谈话。……

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和前途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顾及到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②

13日 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到医院看望负伤正在治疗的陈毅，共商坚持苏区斗争大计。陈毅主张迅速转变斗争方式，将部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秋白等有病，应穿便衣去打埋伏。项英认为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所定方针，坚持“三角地区”^③斗争，等待主力回师反攻，未采纳陈毅的正确意见。

陈毅《三年游击战争回忆》：

我说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等有病，又都是高级干部，最好让他们穿便衣去打埋伏，反正有的是钱。还有些不能走的妇女和一些“知名之士”，最好让他们到白区，打游击他们跑不动。他(项英)说：“你想走吗？”我说我现在不做这个打算，我希望伤口好起来。反正中央苏区垮也得两三个月，不是一天能搞垮的。我希望伤口一个月

①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351至35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

②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117页，现代史料社1980年版内刊。

③ “三角地区”：中央长征前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最后坚守地区。

到一个半月能好,我能走就没有问题了。他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还是那一句老话,我还是要看一步。”我说:“你没有理由让瞿秋白这些同志冒险,万一损失了不得的。陈正人、周以栗有病也不能拖累。我不走,中央有任务把我留在这里,总能起些号召作用。”^①

14日 出席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瑞金梅坑的马道口召开原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各部门留下在苏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会上宣布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在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撤离后,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由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

秋白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报。为了保密,不露红军走了的任何痕迹,《红色中华》报仍标明是中共中央和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一切都尽可能保持原来的情形:报社仍在原来的地址,印刷厂仍是原来的印刷厂,报纸仍是铅印的四开四版形式。宣传内容仍以反映战讯为主,刊载军事台收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提红军的行动情况。此时,教育部已撤销,秋白不再担任教育人民委员了,他索性搬到《红色中华》报社住宿,与韩进、袁血卒两名编辑一起承担了报纸的编辑任务,继续坚持每周出版二至三期报纸,一直坚持到1935年2月,中央分局正式决定突围时为止。

14日 兴国县城被敌所占。

21日 晚至22日晨,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第一、二纵队八万七千余人,胜利突破粤军设在信丰、安远间及王母渡的封锁线,离开中央苏区,突围西征。

26日 宁都县城被敌所占。

下旬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从瑞金梅坑迁至于都宽田

^① 系陈毅1957年讲话录音稿。载《军史资料》,1985年第四期。

的龙泉村和石含村。

秋白在撤离瑞金时，将搜集到的孤本《瑞金县志》，保存在沙洲坝图书馆，以免散失。

月底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决定以宽田为中心，设立瑞西县，直属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代表中央分局出席了瑞西县苏维埃大会。

十一月

1日 长汀县城被敌所占。

10日 瑞金县城被敌所占。

17日 于都县城被敌所占。

23日 会昌失守。

十二月

中旬 中央苏区被敌分割成几小块，面临越来越严峻形势。

本月 为粉碎敌对苏区即将进行的分区“清剿”，中央分局召开会议。陈毅在会上再次提出，应迅速转变战略思想，分散部队，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项英面对严重形势，接受了陈毅等人的正确意见。

月底 随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委机关，从宽田地区转移到黄龙的井塘村。

一九三五年 37岁

一月

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肺病越来越严重。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

记得1935年在中央分局驻地,我看到了瞿秋白同志。他身患疾病,脸色很不好,还有些浮肿,他还自己动手煮稀饭,煮鸡蛋。柴草很湿,满屋是烟,他不断地咳呛着。

上旬 参加苏区中央分局会议,讨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问题。

袁血卒《红军长征以后》:

大约在1935年1月间,中央分局又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是陈潭秋同志主持的,陈毅同志作中心发言,主要内容是开展群众游击战争问题。会议结束时,陈潭秋同志征询瞿秋白同志的意见,瞿秋白同志说没有意见了。

6日 鲁迅致曹靖华信,关心秋白行踪。信中说:

它嫂平安,惟它兄仆仆道途,不知身体如何耳。

二 月

上旬 包围中央苏区的各路敌军,开始对瑞金、瑞西和于都、登贤各县苏区进行“清剿”。敌人加紧构筑于都至会昌珠兰铺的碉堡线,企图将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封锁在西江、宽田、黄龙之间的狭小地区。中央分局在井塘村召开会议,就当时形势,讨论突围问题。

4日 项英向中央发电,要求尽快指示行动方针。

5日 项英再次电请中央立即指示行动方针和突围方向。

同日 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万分火急”电报,指示:

(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它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是不适合的。

……

中央分局接到中央电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突围,决定将中央分局、办事处人员,都疏散到各地去打游击。并决定送秋白去上海治病,同去的还有何叔衡、周月林(梁柏台妻)和张亮(项英妻)。

7日 中央分局紧急会议后,秋白主持中央工农剧社“星火”、“战号”、“红旗”三个剧团,在中央分局驻地井塘村举行文艺会演,中央分局委员均观看了演出。次日,向参加会演的优胜者颁发奖品。

石联星《秋白同志永生》:

一九三五年元宵节前，秋白同志来信要我们三个剧团回到总部，也就是中央驻地进行会演。我们立即整好行装与当地群众告别。经过几天的行军到达于都县小密附近的一个山村，在农舍里见到秋白同志。他看到我们回来了，而且带了许多新的创作，非常高兴。……

这次会演没有座位，大家都是站着看戏。中央局的领导都来了，站在人群中间。秋白、陈毅、毛泽潭、陈潭秋、何叔衡、刘伯坚、项英等同志都来了。秋白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以及群众、战士，一直在雨中看到节目完，时已过午夜，接近拂晓。

这次演出后的第二天，秋白同志还亲自给我们评了奖，并给整个演出谈了意见。他认为我们在群众中生活，学了几个月，能创作出这样许多而且较感人的多样的节目，无疑地能鼓舞群众与战士。说我们基本上做得不错，学习得不错，而且发动了剧团的所有同志写了几百首歌词，他很高兴。他还说把这些节目整理一下，可以出专集。还有那么多的山歌、民歌，想办法带到上海去出版。虽然他认为我们所写的这些东西是粗糙的，比较简单，艺术性不是很强，但是健康的。本来还想再谈，但战争情况更加紧张了，他亲自给我们发了奖，第三天他就收拾行装要离开我们了。

在出发之前，他将上面提到的要出版的戏剧集，名为《号炮集》，油印了三百份发到全区，在我印象里，秋白同志写了序言。

秋白同志是在会演完的第三天晚上走的。那天晚上，我和品三，还有剧团的两位同志去看他。……在告辞时，我们没有任何的伤感之情，总认为秋白能平安地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将来会见面的。没想到这次与他永别了。

11日 中央分局从井塘村转移至于都南部禾丰地区。转移前，项英、陈毅等先安排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和张亮等由一个警卫排护送，离开井塘村，经瑞金武阳往福建长汀转移。

周月林《我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突围、被俘的前前后后》：

1935年2月，敌已对我形成坚固的包围圈、封锁线，将我压在狭小区域里，形势已十分恶劣。中央分局决定将分局与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机关人员分派到各地各部队去，进行分路突围，并决定让病得厉害的瞿秋白、年老体弱的何叔衡、怀孕在身的张亮（项英爱人）和我4个撤离中央苏区，经福建、广东去香港或上海做地下工作及就医。同时决定邓子恢到福建永定、龙岩一带领导游击战争，与我们同时出发。这些都是项英通知我的。项英对我说：“中央分局决定瞿秋白、何叔衡、张亮和你转移到白区去搞地下工作。从福建、广东到香港，如在香港能接上党的关系，就留在香港；如在香港接不上关系，就去上海。你从小在上海长大，又在上海搞过地下工作，对上海情况比较熟悉，他们都喜欢你一起去。”

中央分局作出了我们4个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后，又命我先行出发，护送一担中央政府办事处的铅皮公文箱到瑞金武阳山区埋藏。……

我把公文箱护送到武阳山上埋好之后，就在苏区等瞿秋白他们^①。

17日 秋白在武阳山与周月林会合，并谈了转移计划，还说去上海后，一定要找鲁迅的打算。当晚，离武阳山向福建长汀转移。

周月林《我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突围、被俘的前前后后》：
很快他们来了。这时山下已被敌人占领了，他（秋白）告诉我是摸了敌人的岗哨进来的。……

瞿秋白一见到我，就向我转述了梁柏台的问候。接着他对我谈了这次突围转移的计划和打算。他说：“我们不管是到了香港，还是到了上海，都要尽快设法找到党组织。”我对瞿秋白说：“你是病人，

^① 载《浙江党史通讯》，1988年第七期。

得抓紧时间治病。”瞿秋白又关照我说：“我当真住了院，你不要把我的住址告诉张亮，连你的住址也不要叫她知道。她口快容易露嘴。”我说：“张亮讲过，她要跟着我的。”瞿秋白说：“我们在找到党组织之后，把她交给党组织，请组织来安排她。”

瞿秋白还同我说，这次要是到了上海，他一定要去找鲁迅，他和鲁迅关系非常好，心里老是想着鲁迅，要是能见到就好了。

瞿秋白的身子十分单薄，脸色不好，还有些浮肿。他的肺病十分严重。连日来不停地奔跑，过度劳累，使他病情加剧了，时常咳嗽不止，还经常吐血。他为自己的身体担忧，希望能闯过眼前的险境，早日到达香港、上海，尽快找到党组织。我也为他的身体担忧，心想到了上海要是能马上找到杨之华同志就好了，就问：“之华在什么地方？”瞿秋白摇摇头对我说：“我从上海到瑞金以后，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她可能还在老地方（指上海），也可能去苏联了。能找到她当然好。”

我对瞿秋白说：“要是不能很快找到党组织，你就先住旅馆里吧。”瞿秋白听了我的话，不由笑了起来，对我说：“我还能住旅馆？国民党里面有我的学生，也有交过锋的对手，还有认识我的叛徒。旅馆里人又多又杂，万一被人认出怎么办？”经他这么一说，我才想到瞿秋白是敌人十分注目的人物，到了白区后，先在什么地方住下好呢？这倒是一个不能马虎的问题。看来，瞿秋白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有一次，他突然问我家里的人认识梁柏台否？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便告诉他只有我弟弟认识，别的人没有见过。瞿秋白听了我的回答，便说：“那好，我们到了上海，你先同弟弟商量好，我就假称是梁柏台，先在你家住下，反正别人也不晓得我是什么人。”瞿秋白能住到我家里，我是欢迎的，可是我家条件很差，怕他不习惯，便对他说：“我家里很穷，住在工人区，一间小小的楼阁，条件很差，生活不好呀！”他却说：“工人区更好，更安全！”

邱世桂^①《我所知道的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

二月十七日晚(农历正月十三日)^②我带着四、五个人来到武阳河边,察看徒涉地点。在这里,恰巧遇上了邓子恢、何叔衡、瞿秋白、张亮、周月林一行。他们五人由一个警卫排护送,往长汀地区转移,这天晚上也来到武阳河边。我认识邓子恢同志,见面后,我问:“邓部长你来了?”他说:“是呀。你们有什么困难吗?”我汇报了敌情和我们的活动情况。他听后,说了一些鼓励的话,然后他抓了几支铅笔给我。他们一共有四副担架,当晚就在武阳附近的下州坝过绵江河。过河时,四副担架一起浸湿了。过河以后,就在黄田的袁屋祠堂烧了一堆火,烤衣服,做饭吃。吃完饭已经天亮了。我们几人和他们一行继续往白竹寨走。到了老虎嶺,碰上了武阳游击队。这时,刚巧敌人也到了老虎嶺。武阳游击队立即与敌人接火,我们听到枪声,加快步伐前进。张亮听到枪声,吓得腿发抖,走不动,就用担架抬着走。在武阳游击队的掩护下,我们安全到达白竹寨。邓子恢同志他们一行继续往长汀方向前进,我们同他们分手了。

19日 到达福建长汀县四都区小金村。在这里作短时间休息后,由福建省政治保卫局特务队护送。

21日 到达福建省委所在地琉璃乡汤坑之汤屋,与省委书记万永诚商讨突围计划,因形势险恶,略事停留后,由万安排伪装成“俘虏”,由一个警卫连“押送”,启程上路。

周月林《我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突围、被俘的前前后后》：

从武阳出发走了一两天,我们就到了福建省委驻地长汀四都山上,见到了省委负责人万永诚。他告诉我们说,省委已接到中央分局的通知,已准备派人护送我们出境。又说:现在敌人很猖狂,封

① 邱世桂当年曾任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② 原文有误,应是正月十四日。

锁很紧,为了能安全突围,准备将你们和外地买伐木的香菇商人混在一起送出去。先把那些商人抓来,你们也装成商人的样子,和他们关押在一起,吃住在一起。你们设法和这些商人搞好关系。由战士“押送”到交界线时,你们和商人一起逃跑,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护送战士朝天开枪,掩护你们。

瞿秋白考虑一下,觉得这个方案不甚妥当。在我们5个人中,除邓子恢和我身体较好外,其他3人都有困难:瞿秋白的肺病很重,何叔衡年老体弱,张亮怀孕。如果战士一放枪,敌人必然出动,有的跟战士交火,有的追商人,危险性很大。而且同商人混在一起也难保不暴露身份。第一个方案没有通过。

过了几天,万永诚拿来了几只假面罩,又提出了第二个方案:你们几个人乔装成被红军抓来的“俘虏”,每个人都戴上各种颜色的面罩,由战士押送”。这样,即使遇上密探,也认不出是谁。

经过再三考虑,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们便同意这个方案突围。福建省委派出了一连战士,组成护送队,护送我们出境。

26日 经坪埔、山田、陈屋、梅迳到达濯田水口近处的露潭。晌午,在渡汀江时,被驻水口敌保安团钟绍葵部发现,派兵追来,在牛庄岭山上被敌包围。突围时,邓子恢脱险,何叔衡牺牲,秋白与周月林、张亮等三人藏在塘边草丛中,为搜索敌军发现,被俘。

周月林《我和瞿秋白、何叔衡一起突围、被俘的前前后后》:

约在3月20日左右,我们从四都山上出发,向永定方向行进。一路上,部队装出押送犯人的样子,一部分战士在前面开路,一部分战士押后,我们五人在中间,每人戴着假面罩,身边还有两个战士“押”着。经过村子时,因为我们戴了假面罩,人们觉得新奇,围观的很多。看来这个方案并不好,这样反而更加惹人注意。

为了避开敌人,我们走的尽是山路。出发之前,省委找了个年轻妇女做向导,她长年在山上砍柴,知道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山路,

地形十分复杂，路径难以辨认。向导走在前头，遇上岔路她就折下两根树枝，将一根横在岔路上，另一根直放着暗示前进的方向。

带病的瞿秋白和年迈的何叔衡，和我们一起在这曲折盘旋的山间小路上一个挨一个地走着，谁也不敢落后一步。路窄得只能一个人通过。何叔衡幽默地对瞿秋白说：“这是蛇走的路，也是你们文人作诗写文的好材料。”……但是瞿秋白的心情好象要比我们沉重一些，他比我们考虑得更多、更远。他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对何老说：“过去这一带是我们的地方，来往都很安全。现在都是敌人的了！路上的危险性是不小的。”何老根据多年经验，认为瞿秋白的分析是对的，绝对不能大意。……

大约第三天晚上，我们到了敌人占领的水口村附近。我们必须从这里东渡汀江，但只有村里的一座桥可过，而桥头驻有保安十四团一个营，无法通过。我们便决定在半夜时从桥的下游偷渡。护送队临时扎了副担架，好抬瞿秋白、何老过河。

半夜过后，我们甩掉了假面罩，准备过河。当我和张亮到达河边时，有几个战士已在河里，邓子恢也下河了。我看水不太深，就对张亮说，我们快过河吧！张亮不肯，她要等担架。……我想，她怀孕在身，而2月的河水还很冷，便没有相勉强。

我跳下河，两个战士赶快来搀扶我前进。到了河对岸，见邓子恢已在岸上。……

过了一会儿，担架抬着瞿秋白过来了。接着又扛回担架，把何叔衡抬了过来。最后，担架又扛回去，把张亮抬过来。这样来回三趟，就耽误了一些时间。

人都过河后，我又继续向前走。当到达一个小村时，天已拂晓，我准备吃了早饭再走。刚刚休息一会，饭还没有吃，突然传来枪声——这是村口哨兵发现敌人来了的讯号。……掩护队一面掩护，一面催促我们赶紧转移到村南的大山上。随后，战士也撤上了山。但是，敌人尾追不放，向山上紧追。护送战士掩护我们从后山突围。可

是后山坡很陡，无路可走。战士便叫我们滚下去。

我滚下山后，不顾疼痛站起来一看，只见邓子恢在前面走，还有几个人跟着。我想邓子恢是在福建打游击出身的，路熟悉，就紧紧跟上去。好多人也跟着往这条路上来了。

我往前走了一段路，为已脱离了危险而暗暗庆幸。突然发现瞿秋白、何叔衡没有跟来。心想这下糟了，他俩会不会掉队？瞿秋白有病又是近视眼，何叔衡年迈体弱，他们掉了队，在到处是敌人的山上是寸步难行的，我不应该撇下不管。……我找着找着，突然发现瞿秋白正一个人艰难地走着。见到他我好象一块石头落下了地；他一见到我，也高兴得不得了，对我说：“阿梅啊！（他前叫我月林，从这时起叫我阿梅。因我在苏联时曾化名王月梅）你来了，我心里正急得不得了。”敌人正在搜山，我们处在十分危险中，我就催他快走。

走了一段路，又发现了张亮。她也掉了队，正坐在那里干着急。

……

我们三人一起走着。后来来到了一间没有顶的破屋前面，瞿秋白由于不停地奔跑，身体已疲惫不堪，对我说，阿梅，我实在走不动了，要到这个破屋子里休息一下。张亮也说要进去休息。……

于是，我把他两陪进屋里，又叮嘱他们，在里面不要说话，周围可能有埋伏的敌人。出来找我也不要叫，轻轻地拍两下，我就知道了。我从破屋出来，就到草丛中隐蔽起来。……

过了一会儿，张亮来了。后来瞿秋白也来了。他说，我也到你这里来。说后就跳了下来，不料却跌倒了，我赶紧把他扶起。他靠近一棵小树坐了下来，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身子碰着了树身，树枝摇动了，被山上敌人发觉。只见敌人向我们这儿搜索过来，还相互说：没有风，别的树都没有动，为什么那棵会动，可能有人。敌人来到草丛前，一时不敢进来，对着草丛喊叫：里面有人没有？我们没有响，敌人又一连喊了三次，然后向草丛中搜来，就这样我们三个被

俘了。……

邓子恢回忆：

我又去叫瞿秋白赶快突围。这时瞿秋白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瞿秋白说：“我病到这个样子，实在走不动了，你快点走吧！”我三翻五次叫他走，他就是不走。我拉他走，他还是不走。他说：“你快点走吧，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这个地方是很茂密的树丛）。无奈，我冲出重围到山下河边；见到有几位战士也冲了出来，其中持机枪的战士也冲了出来，我就把几个剩下的战士集中起来，用机枪阻击追敌，边打边走，离开了长汀，向闽西走去^①。

另据敌福建省保安司令部保安 14 团团团长钟绍葵向龙岩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的报告称：“2 月 24 日，职率五个中队搜剿汀江两岸散匪，25 日宿营水口，26 日午，据当地民众报告，水口以下五里许之露潭有匪百余渡河，职令第二大队长李玉率特务三中队前往围剿，迨我军追到，该匪已渡过露潭以东约五里之高山，据险顽抗，我军分三面攻击约半小时，匪不支，即满山逃窜，我军即从事搜山，计俘匪十余名，瞿秋白、周月林、张亮等要匪于是役俘获”。

27 日 由钟绍葵、李玉率部押送，乘船离开水口，沿汀江下行，中午到达上杭县城，关押在上杭县城。

周月林《我和瞿秋白、何叔衡一起突围、被俘的前前后后》：

我们被押到水口镇营部时，只见 20 多个护送我们的战士已关押在那里了。敌人把瞿秋白、张亮和我三人关在里角，战士们关在外边。

敌人当天来不及审讯。但审讯是预料之中的事，该怎样对付呢？在这次突围行动中，我们是装扮成红军押送的“俘虏”的，但是，

^① 转引自陈铁健《最后的斗争——瞿秋白就义前后》，载《近代史研究》，1980 年第三期。

各人的假身份事先没有统一过。到了深夜，我们三人便悄悄商量对付审讯的办法。一致同意继续利用红军“俘虏”的假身份，各自编一套假口供。瞿秋白要我先编。我说，我就化名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

接着，由张亮编。张亮说：“我就姓你的周，叫周莲玉，是香菇商的老板娘，被红军抓住的。”……

最后，瞿秋白编。他说：“我就姓你的那个林，叫林琪祥。原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后毕业于同济大学。职业医生，被红军俘获。”……

我们商量好之后，就躺在地上休息。突然，闯进两个敌兵，架起我就往外拉。我一看苗头不对，不象是传讯，这些野兽一定不怀好意，就拼命挣扎，用脚踢，用嘴咬，还大声叫骂。躺在脚后的瞿秋白猛地坐了起来，用眼睛瞪着敌人，怒目而视，站起来要和敌人拼了。敌兵见状将我放下，用力把瞿秋白推倒，出去了。……

最后，瞿秋白还深有感触地对我说：“阿梅啊，今天我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们妇女比我们男子还要多一层痛苦。”

第二天，敌人开始审讯了，我们按已编好的口供回答。敌人没有问出什么，就将我们三人和被俘的战士一起押送到上杭县城敌团部。将瞿秋白和战士关押在一起，我和张亮关在一道。自此，我再也没有见到瞿秋白的面了。

三 月

9日 为了欺骗敌人，以求脱身，化名林琪祥，编造了一份假“笔状”；并分别致信鲁迅、周建人等，请求设法取保营救。

秋白在“笔供”中，编造自己是“北京大学医学系毕业，民国二十四年赴漳访友，后不幸被匪掳去”。如能开脱释放，“文书胜任，足敢自负，担任医学上士，绝不至于尸位”。

李玉看了“笔供”后，对秋白说，如果所述属实，可以取保释放，要秋白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索取证明或在当地觅铺保，以证实自己确与共产党向无关系。

于是，秋白以林琪祥化名，分别给鲁迅、周建人等写信。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

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不是共产党，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杨之华《忆秋白》：

由于党组织被破坏，无法依靠党组织去营救秋白，再三考虑，就找一起工作过的杜延庆同志商量后，想到用剩下的一架印刷机办一个印刷所，作为铺保去保释秋白。但没钱就去找鲁迅，鲁迅立即答应了。有了钱还是找不到人办印刷所。最后通过一个同志的关系，找到了以牧师身份掩护工作的秦化人同志，他给我找了一个旅馆老板，写好了铺保证明。我马上把它和鲁迅给的五十元钱寄出去了。

周建人《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同志》：

我仍在商务印书馆上班，有一天，茶房（当时服务员的称呼）送到我手里一封信。这是一个白色的洋信封，上面的笔迹是瞿秋白的，翻过信封一看，有一个大印：“福建长汀监狱署”。

我心中一惊，拆开信封：

信里的一字一句我记不全了，但我清清楚楚记得的是，他讲自己是个生意人，到福建来做生意；另外，他讲天气冷了，他在狱中衣

被单薄,很冷,需要一些衣物或钱;最后他讲到,只要上海有殷实的铺保,这里就可以释放。

信里最后署名是“林琪祥”。……

我收到这封信以后,想很快让杨之华知道。那时,杨之华已经进工厂做工,不常来了,但她留下一个地址,我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杨之华,……。

四 月

10日 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妻子被国民党汤恩伯部第八师在福建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处的归龙山俘获,供出秋白等人在濯田被俘的事实。敌掌握到秋白已被俘的线索后,加紧在被俘红军中,严密清查秋白下落。

宋希濂《瞿秋白烈士被捕和就义经过》:

依据当时的情况推断,红军大约主要是分成三部分分头突围。……另有一部三百余人早先向上杭方面去了,在这三百人中,有瞿秋白先生在内。钟彬旅长立即将此情况电报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师参谋长向贤矩根据这个情报急电报告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当时在上杭并无正规部队,只驻有福建省政府所属的保安团(团长姓名,我记不起来了),蒋鼎文立电该团严密清查瞿秋白的下落。在此之前,向上杭方面走的红军三百多人,已被该保安团所截俘,内中有二十余人,经该团查明是红军干部,寄押于上杭县政府的监狱里,瞿秋白先生当时化名林琪祥,说是在红军部队中做文书工作的,即在其中。保安团接到蒋鼎文的电令后,一则感到他们的责任重大;一则觉得如能将瞿秋白清查出来,可以邀功邀赏,所以十分卖力气来进行这一工作。他们先将所俘红军士兵三百余人再逐一查问,证实这些人中没有疑问后,便肯定瞿秋白先生是在那二十多

人中,于是进行个别审问,一次、两次,……仍然没有人供认,遂用严刑拷打和“谁说出来就释放谁”的双管齐下的办法,结果其中有一个人经不起革命的考验而变节了,供认了林琪祥就是瞿秋白。蒋鼎文接保安第十四团查出了瞿秋白的电报后,即命该团将瞿秋白解送到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听说该团派了一个连押送,三十六师还派了队伍到中途去接^①。

国民党第八师师长陶峙岳向福建省绥靖主任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发电:“据万匪永诚妻供称瞿秋白、何叔衡及项英之妻在濯田已被我军俘获。”

敌保安十四团5月4日向宋希濂发电:“职部在水口俘获男匪林琪祥一名,经派传达二名由船解汀,到否乞电示,近查该匪有云似系瞿秋白,乞严讯,女犯周莲玉已供系项英之妻,陈秀英据俘匪称是梁柏台之妻,刻仍在审查中。该二犯拟于鱼日^②连同俘获枪械派员解送龙岩区司令部讯办”。

敌保安团十四团钟绍葵给李默庵的呈文:查职团长汀水口之役,俘获男匪一名,女匪周莲玉、陈秀英二名,一再审查,林琪祥似系瞿秋白化名,奉宋师长电令,既陷日^③解送长汀讯办,周莲玉经俘虏指认系项英之妻,该匪亦已供认不讳,陈秀英言语狡黠,据俘虏兵云,似是梁柏台之妻,兹仅将该女匪周莲玉、陈秀英二名连同口供解送钧部”。

15日 利用敌人尚未确认之际,经保安十四团又写了一个“呈文”,说:“身体孱弱,积年肺病”,“狱中因顿,又多侵蚀其体力”,“现觉日就衰惫,手足乏力,头晕眼眩,时发潮热,秽气蒸熏,似饥似

^① 转引自《革命史资料》2,第201页至203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

^② 鱼日:旧中国电报以韵目代日,“鱼日”即六日

^③ 陷口:即卅日。

饱，似此久羁不决，势将瘐毙”。要求准予开释出狱，或资遣回江苏原籍，或在上杭任教员、文书等职，决不私自遁走，如有嫌疑，可随传随到。

30日 被解离上杭，去长汀。

五 月

9日 被押解至长汀卅六师师部。

宋希濂《瞿秋白烈士被捕和就义经过》

我经过很长时间的回忆，对于秋白先生被捕日期和到长汀日期，始终难以明确，送到长汀的日期，可能为5月上旬或中旬。

10日 第一次受卅六师军法处审讯，在叛徒郑大鹏指认下，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高春林《我所知道的瞿秋白烈士就义前后》：

瞿秋白被捕，身份暴露后，被押解到36师军法处，伪师部决定组织特种军事法庭审理。并指定：军法处吴淞涛任审判长，参谋处第二课长张翼扬、副官处少校副官陈定二人任审判官，我任书记官组织之。

……当秋白被押解入庭时，挺身站在庭中，态度极为从容，当吴淞涛询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时，秋白答：林琪祥，年36岁，职业医生，继问有无其他姓名？秋白不承认有其他姓名，更不承认就是瞿秋白。吴淞涛当即呼提一人出庭（即叛徒，其姓名忘记，听说是长汀口音^①），其脸圆，身材矮胖，时年约40岁，系工农民主政府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勤杂人员。吴淞涛照例询问叛徒姓名、年龄、

^① 1980年9月15日，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关于瞿秋白问题的复查报告》中，认定是叛徒郑大鹏出面指认，才使秋白被迫承认自己的身份。

籍贯以后,就问秋白:你认识他吗?秋白答复“不认识”。吴淞涛再问叛徒:“你认识他吗?”叛徒答:“他就是瞿秋白。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文化委员会委员。”吴淞涛进一步问:“没有认错人吧?”叛徒答:“没有认错。”于是吴淞涛转而问秋白:“你听到没有?还有什么说的吗?”秋白剀切地说:“事已至此。没有什么可说的!”此时,张翼扬插问:“你们闯入水口镇干什么?”秋白告之因有肺病,想经水口镇突围赶漳州转上海就医。不料经过封锁线,寡众不敌被俘。

当时审讯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林琪祥是否即瞿秋白,事经叛徒指证,并经瞿秋白认可以后,事已大白。^①

陈子刚回忆:

1935年5月,瞿先生押解到36师师部时,身份已被叛徒出卖暴露。穿灰色夹长袍、额角两边带方,棱角线很清。囚室在汀州中学的一个院中,院子一端宋希濂住,另一端卫兵住,再一端瞿先生住。在七、八个平方的小房间中,放一张木板床,窗下有桌子和椅子。因他是要人,又有肺结核,邱定邦就派我去给他看病。^②

11日 国民党《中央日报》以三行大字标题刊载秋白被捕消息。

匪首瞿秋白就逮

化名林琪祥与项英妻同时被逮

经指认确实已由长汀解往龙岩

13日 在狱中写了长约四千余字的“供词”。“供词”热情地歌颂了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建设成就,驳斥了敌人的各种诬蔑与诽谤,并严正表明自己的立场。“供词”指出:

^① 转引自《革命史资料》2,第209页至21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

^② 转引自纪白《瞿秋白狱中侧记——访卫校陈子刚先生》。载《瞿秋白研究》(一)。

苏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个阶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苏区在经济建设方面”“也有可惊的成绩。例如去年的春耕运动教会了几万妇女犁田。苏区去年没有灾象是事实,虽然红军扩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的壮丁少了好些,而米粮能够吃到今年秋季。”“至于民众同苏维埃政府的关系方面,只看一九三四年五月扩大红军,九月又扩大,计划都完成了;六月和八月的收集粮食……也完成了。”

“苏区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还是相当安定和充足的,不过盐贵些,布缺乏些,这是国民党封锁的关系。我看见一般农民当时的饭菜,问他们比革命以前怎样,他们都说好些,因为分了田。到后来,国民党的军队很多很多的围紧起来,占领了一切城市和圩场,乡村中的生活就一天天的苦起来,……。”“苏区的生活一般的说是苦的,并没有在苏维埃革命之后立刻创造地上的天堂。这区域原来就是很贫瘠的,何况要应付这样严重的战争和封锁,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残酷的战争啊!”

“供词”对敌人利用苏区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进行反共反苏区的宣传,驳斥道:

“自然,革命和战争难免杀人,这种肃反的工作做得‘过火’或是错误,就会引起一种民众的恐慌和反感。可是,在我到苏区的这一年中,早已没有这种现象。……正是共产党中央迅速纠正了他们,……在中央的决定之中,决没有以残杀为原则,‘越杀越革命’,‘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几岁的小孩子都要杀’的事情。据我所知道的,就是‘消灭地主阶级’的口号,也不是绝对杀尽地主的意思。……我在苏区没有亲眼见着‘杀得满地是尸首’的现象,也许我的‘见闻不太广’。”

秋白是身受王明宗派集团迫害最严重的中央领导人,他对王

明路线的实质危害了解最深。但是,为了在敌人面前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党中央领导的权威,他却为之辩护道:“到了苏区,使我更加感觉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全党,同以前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如李立三)领导的时候比较起来,大不同了,工人干部多了,工作方法也是新的了,政治分析的能力也强多了。”“总之,在政策方面,我虽然不在中央政治局,不担负着政治上的最高领导职务,可是,以我在苏区一年的感觉而论,党中央的政策路线没有错误”。

秋白曾在“供词”中谈及留守中央苏区红军突围计划时说:“在二月初有过一次会议,决定了三条路线:第一是闽北和清流、宁化一带;第二是由江口渡江向西行动;第三是于都、兴国方面。项英、陈毅、梁柏台、何自立等就是在决定的几条路线去活动了。至于何人担任任何路线我都不明白了。”

但据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中回忆:当时按中央二月来电指示,留守部队(红二十四师和几个独立团)是兵分九路活动。项英、陈毅早在1935年3月到达赣粤边界的油山地区与李乐天会合。可见“兵分三路”是为了掩护我军安全转移,迷惑敌人而虚构的假情况,根本不存在“出卖机密”的问题。

秋白在“供词”的最后写道:

“最后我只要说:我所写的都是我心上真实的感觉。我所见、所闻、所作、所想的。我不会随声附合写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自欺欺人呢?!”

秋白虽然在“供词”中也流露某些颓唐消沉的情绪,但,确是击中了国民党的痛处,所以国民党始终不敢公开发表这篇“供词”。当时,反动记者赵庸夫曾评论这篇“供词”说:文长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的鼓吹,因而不便发表。

14日 鲁迅致曹靖华信。信中说:

闻它兄(瞿秋白)大病,且甚确,恐怕很难医好的了,闻它嫂却

尚健。

夏征农回忆(1979年7月26日):

鲁迅在得悉秋白同志被捕以后,还是多方设法营救。他曾经打算与陈望道等发起公开营救运动,未能实现^①。

周建人回忆(1979年7月26日):

[鲁迅]还通过蔡元培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力量保留秋白同志的生命,也未成功。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当时蔡元培的秘书,他后来告诉鲁迅:在蒋介石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蔡元培认为瞿秋白是一位有才气的文学家,留下来对中国有好处。但是蔡元培的意见遭到蒋介石等人的否定。^②

17日至22日 在狱中写《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是秋白在狱中写的自述,全文约二万余字,分七个部分:《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多余的话》是秋白临牺牲前所作的自我解剖。他在文中老老实实在地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历史,坦率地剖析了自己,暴露了内心世界的阴暗面。他说:“我愿意乘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在《历史的误会》中,秋白回顾了自己所走的曲折道路,对党深自内疚地写道:

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中,“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士大夫的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的意

^① ^② 转引自陈铁健《最后的斗争——瞿秋白就义前后》。

识”，“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而“无产阶级意识在我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因此，他自认是“脆弱的二元人物”。但他又明确地写道：“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推论以外，它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秋白在《左倾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一节中，对自己所犯的“左”的错误，深感痛心，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表示：“当然我应当负主要责任。”并说：“历史的事实是抹杀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秋白在最后一节“告别”中，总结说：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

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

秋白怀着对同志对组织对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惜别的心情写道：“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跟随你们了。”“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宏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了。”“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1935年8月，国民党中央主办的《社会新闻》，首次选登《多余的话》时，在“编者按语”中，无可奈何地哀叹道：“瞿之狡猾恶毒，真可谓至死不变，进既无悔祸之决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所以瞿之处死，实属无疑义。”

1980年9月1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中所作结论说：

《多余的话》一向传说是瞿秋白同志在狱中写的自述，最

先刊登在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上。一九五四年以来,经反复查找,迄今国内外从未发现《多余的话》手稿,它是否为瞿秋白同志所写和是否经过敌人篡改,历来有人怀疑。目前流传的这个《多余的话》,即使是真的,文中一没有出卖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多余的话》里,虽然也有些消沉的语言,但是,客观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决不能认为是叛变投降的自首书。

宋希濂《瞿秋白烈士被捕和就义经过》:

在大约是一百张(或六十张)十行纸订成的一个本子,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瞿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用毛笔写了一长篇《多余的话》和一些诗词。这个本子,他托向贤矩代为寄交某人,秋白先生就义后,向贤矩曾交给我看,我只是粗枝大叶地看了一遍就交还他,没有认真研究,所以对于内容记不起来了。

李克长《瞿秋白访问记》:

问:此外尚有何作品否?

答:我花了一星期的功夫,写了一本小册,题名《多余的话》(言时,从桌上检出该书与记者。系黑布面英文练习本,用钢笔蓝墨水书写者,封面贴有白纸浮签),这不过是记载我个人的零星感想,关于我之身世,亦间有叙述,后面有——“记忆中的日期表”,某年作某事,——注明,但恐记不清,难免有错误之处,然大体无讹谬。请细加阅览,当知我身世详情,及近来感想也。

问:此书亦拟出版否?

答:甚想有机会能使之出版,但不知可否得邀准许。……

问:此书篇幅甚长,可否借出外一阅?

答:可以,可以,如有机会,并请先生帮忙,使之能付印出版。

……

17日 鲁迅致胡风信,告知秋白确已被俘。信中说:

那消息^①是万分的确的,真是可惜得很。从此引伸开来,也许还有事,也许竟没有。

22日 鲁迅致曹靖华信,信中说:

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许君已南来,详情或当托其面谈。

同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派陈建中^②来长汀作劝降工作。

25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又加派王杰夫^③偕同陈建中前来长汀作劝降工作。

28日 致郭沫若信^④。信中写道: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了,这在国内阶级战争中当然是意料之中可能的事。从此,我的武装完全被解除,我自身被拉出了队伍,我停止了一切种种斗争,在这里等着“生命的结束”。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使我惭愧的倒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远在被俘以前——离现在足有四年半了——当我退出中央政治局之后,虽然是因为“积劳成疾”病得动不得,然而我自己的心境就已有有了很大的变动。我在那时,就感觉到精力的衰退甚至于渐灭,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尽力。偶然写些关于文艺问题的小文章,

① 指秋白被俘事。

② 陈建中,叛徒。中统局行动科干事。全国解放后逃往台湾。

③ 王杰夫,又名王书生,王傲夫,吉林人。历任中统局设计委员、训练委员会主任、总督官、纪律审查委员会主席,解放前夕任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主任委员。

④ 秋白此信,原由36师军医陈炎冰保存。1935年,陈去澳门探亲时,将此信及秋白赠给他的题词半身照片和诗词手稿交同事王廷俊代为保管。同年10月,王在南京时,将信与照片及诗词手迹一并寄给在美国留学的柳无垢。柳无垢接到后,又转寄给他父亲柳亚子,最后由柳亚子交给郭沫若。该信手稿影印件已辑入《瞿秋白文集》。

也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话。我早就“猜到了”我毕竟不是一个“战士”，无论在那一战线上。

这期间看见了你的甲骨文字研究的一些著〔作〕，《创造十年》的上半部。我想下半部一定更加有趣：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而后来就象触了电流似的分解了，时代的电流使创造社起了化学的定性分析，它因此解体、分化。这段历史写来一定是极有意思的。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也终于禁不起了。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尽情的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功夫。

只有读着你和许多朋友翻译欧美名著，心上觉着有说不出的遗憾。我自己知道虽然一知半解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只有俄国文学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社会科学的论著现在已经不用我操心了）。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了。

还记得在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当年的豪兴，现在想来不免哑然失笑，留得做温暖的回忆罢。愿你勇猛精进！

瞿秋白一九三五、五、廿八，汀州狱中。

月末或6月初 在狱中给杨之华及其兄写诀别书。

杨之华《忆秋白》：

大约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底或六月初，有一个人来到我母亲家里，他冒充是秋白同狱的所谓同情者，说秋白让他捎来给我和我哥

哥的两封信,说给我的信一定要亲自交给我。我妹妹就偷偷来找我,说了些情况。我对妹妹说:“那是敌人派来钓鱼的坏蛋。你不能领他到我这里来。”我要她想办法把那两封信要到手。但她只拿到了秋白给我哥哥的信,信的大意是:想来你们已经在报上看到了我的事。我要和你们永别了。之华是我生平的知己,我要留最后的一封信与他永别。可能她已经被捕,你们不知道她的下落。那么,就请你们把信投寄给叶圣陶先生作为写小说的材料吧。

秋白给我的诀别信,那个坏蛋始终不肯交出来,他只把信在我的家属面前晃了晃。那是一封很厚的信。他再三说:“瞿秋白要我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杨之华本人。”我妹妹对他说:“已经几年没来往,到哪里去找呢?你愿把信留下是可以的,不留下也没有什么,反正我们不知道她的下落。这个特务无法实现这个“钓鱼”的毒计,以后就没有再去找我的家属了。……”

同月 被关押在长汀狱中后,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出于对秋白品德和学问的仰慕;更重要的是为了软化秋白的革命意志,以收劝降之效,曾下令给秋白以生活上的特殊照料;并亲自劝降,遭到秋白的严词驳斥。

宋希濂《瞿秋白烈士被捕和就义经过》:

三十六师司令部住在长汀靠西头路南的一栋中等地主所谓缙绅之家。进大门有一个小天井,靠左手边有一间厢房,长约一丈一尺左右,宽约七、八尺,门向南,窗子向西,室内有一张中国式的床,安置在东边靠着墙,一张书桌安置在西边靠着窗户,一个洗脸架安置在北头,还有一把木椅和一条板凳,秋白先生自到长汀那天起到就义止,就是住在这间屋子里。在瞿先生正对面的一间厢房,住着一个副官和几名警卫,他们负着双重任务——监视和照料生活。……

秋白先生原来穿什么衣服,我不清楚,我见到他时,他是穿着一件灰色夹布长袍,一双浅口的布鞋和蓝色线袜。

秋白先生每天除了刻图章或者有时和人谈话以外,大部分时间便是写写感想和作诗,有时也读读古文和唐诗(当时在长汀,也找不到其他的书)。……

据秋白先生说,他因健康情况不大好,所以没有随红军主力部队北上,有打算转到上海去疗养,不料在上杭被捕了。他在长汀一个多月,没有生过大病,但常有些咳嗽及头晕的情形。他身体颇为单薄,脸部显得清瘦。……

我和秋白先生只谈过一次话,由于自己当时的反动立场,对真理和是非没有正确的认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彼此间意见是完全对立的。记得我回到长汀后的第三天,我到秋白先生室内去看他,先谈了一些生活情形和他的身体情况后,转而谈到政治问题。

我说:“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的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是在农村里生长的,当了多年军人,走过许多地方,有五百亩以上的地主,在每一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没收这样几个地主的土地,能解决什么问题?至于为数较多,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都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起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成为小地主,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资本家比较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向这样的一些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

秋白先生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这是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但中山先生所标榜的三民主义,把中外的学说都吸收一些,实际上是一个杂货摊,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都市里,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尤其是农村情况,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过。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

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或是小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呢？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秋白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说了许多的话，我记不完全，只能概述当时所说的大意。

接着秋白先生又说：“宋先生，你一路上看到有些地方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的情形，当然是事实。但是不是因为 we 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弄得劳动力减少了，有土地没有人耕种呢？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为了保卫苏区，有许多壮年人参加红军或地方武装，使农村劳动力受到一些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你们对我们施行严密的封锁，苏区的经济完全靠发展生产来自给，在你们未向我们进攻以前，这些地方的田地并无荒废的情形，你们来了，老百姓逃跑了，土地无人耕种，所以显得荒凉，我想主要的是这个原因。至于一些房舍被毁坏，恐怕大部分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

我和他进行了争论，争论的详细情形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最后我曾说过这样的话：“根据江西省政府最近的调查报告，说自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在南昌暴动起，随后在农村搞分田运动，一直到共军退出江西根据地，仅七年的时间，江西省人口减少了八百万，我过去读历史，说黄巢杀人八百万，感到寒栗，今天你们搞阶级斗争，更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秋白先生对江西省政府的调查报告，表示怀疑，认为是有意夸大数字，借此来污蔑共产党。同时秋白先生又说，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过程中，人员的死亡和人口的减少，是免不了的。造成这种情形，主要是要由国民党负责，因为国民党先后调集了百万以上的军队来围攻我们。

以上是我和秋白先生谈话的大概情形。

同月 在狱中,与卅六师少校军医陈炎冰^①建立了良好的友谊。曾将在狱中拍摄的半身照片赠给陈,并在照片上题词: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躯壳!

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

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

秋白

一九三五年五月

摄于汀州狱中

又,书赠词三首:

浣溪沙

廿载浮沉万事空,
年华似水水流东,
枉抛心力作英雄。

湖海栖迟芳草梦,
江城辜负落花风,
黄昏已近夕阳红。

卜算子

寂寞此人间,
且喜身无主。
眼底云烟过尽时,
正我逍遥处。

^① 陈炎冰,字子刚,系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后脱党。任国民党卅六师少校军医,后曾在国防医学院深造。1950年以后回故乡盐城医院任内科主任,后任卫校教务主任。1984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

花落知春残，
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

梦 回

山城细雨作春寒，
料峭孤衾旧梦残。
何事万缘俱寂后，
偏留绮思绕云山。

一九三五年初夏草于汀州狱中。

录呈炎冰先生雅正 瞿秋白

(这三首词写在一尺七寸长宣纸上)

此外，秋白在狱中，还写了下列二首诗：

忆 内 集唐人句

夜思千重恋旧游，
他生未卜此生休；
行人莫问当年事，
海燕飞时独倚楼^①。

无 题

斩断尘缘尽六根，
自家自了自家身。

① 第一句：集李瑞《宿淮浦忆司空文明》(七律)；第二句：集李商隐《马嵬》(七律)；第三句：集许浑《咸阳城东楼》(七律)；第四句：集戴叔伦《寄司空曙》(七律)。

欲知治国平天下，
原有英雄大圣人。

夏 写《未成稿目录》：

《读者言》：1、王凤姐。2、张飞与李逵。3、安公子。4、野叟曝言主义。5、“阿Q”。6、“阿Q”以后。7、酒瓶问题。8、“不成话”。9、古汉文。10、翻译。《痕迹》：1、环溪。2、大红名片。3、父亲的画。4、娘娘。5、宁姐(以上《家乡》)。6、黄先生。7、出卖真理(以上《北平》)。8、“饿乡”。9、郭质生(以上《第一次赴俄》)。10、丁玲和他。11、“生命的伴侣”。12、独伊。13、误会(以上《上海》)。14、蓝布袍子。15、庐山(以上《武汉》)。16、忆太雷(以上《一九二七年年底》)。18、“老爷”。19、忆景白。20、面包问题。21、夜工(以上《第二次赴俄》)。22、油干火尽时。23、“做戏”(以上《退养时期》)。24、那松林的“河岸”。25、真君潭(雪峰)。26、只管唱，不管认。27、淡淡的象(以上《苏区》)。28、逃！29、饿的研究。30、不懂的(以上《上杭》)。31、得其放心矣(《汀州》)。(按：原件无17)。

此稿是秋白准备写的文学札记和自传性作品的目录。这几十个题目，几乎涉及他一生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动笔，秋白就牺牲了，这真是巨大的损失。

此外，在狱中，由于秋白的书法、刻章俱佳，故三十六师的一些军官来求书刻章的亦不少，秋白都能满足要求，在狱中刻章就有十几颗。

六 月

2日 军统诱降失败，蒋介石密令杀害瞿秋白。

秋白的身份被识破后，军统即奉蒋介石之命，电令闽西属下张超“协助”三十六师军法处进行审讯；同时又从南京派出“要员”，取

道江西赶到长汀。但是经过二十余天的时间，一切威胁、利诱均告失败，军统遂以瞿秋白“思想顽固，意志坚决，无法挽回”为由，报请南京军事委员会处置。六月二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即密令闽西绥署主任蒋鼎文杀害瞿秋白^①：

龙溪绥署 蒋主任：寒已法电悉。成密。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正冬行息字印。

同日 上午8时，接受《闽西日报》记者李克长的采访，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后来，李克长将这次访问写成《未正法前之瞿匪秋白访问记》，登载在1935年7月3日至7日的《闽西日报》上。后又刊载在1935年7月8日出版的《国闻》周报第十二卷二十六期上。《国闻》周报在发表时，加了编者按语：“访问记所谈多关个人身世，并无政治关系，故予刊载，以将此一代风云人物之最后自述，公诸国人。”

李克长是以对秋白抱着同情的态度写了这篇访问记。它不失为一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秋白在狱中思想状况的实录。为此，秋白不仅给他刻了一方印章，书写了三首诗词，还托他带出了《多余的话》。《访问记》刊出后，立刻受到国内外新闻界的重视，竞相引用为秋白传记的蓝本。

上旬 中统陈立夫获悉军统对秋白“诱降”失败后，为与军统争高下，呈经蒋介石批准，派中统王杰夫、陈建中等一行于6月上旬抵达长汀，再次对秋白进行“诱降”活动。王杰夫等离南京前，陈立夫找他们谈话：“如能说降瞿秋白，那么国际上的号召和影响都是很大的。”并要他们通过秋白查明我党在上海、香港地下组织的潜伏计划。王杰夫以“中央组织部特派福建党务视察委员”身份与叛徒陈建中从南京启程，途经福州、厦门、龙岩时，在第二绥靖区司

^① 许映湖、王仰清：《国民党中统诱降瞿秋白同志始末记》，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四辑。

令李默庵的安排和配合下，加派福建省党部秘书、调查室主任钱永健和厦门市党部书记、中统特务朱培横同去长汀。

许映湖、王仰清《国民党中央统诱降瞿秋白同志始末》：

（军统“诱降”瞿秋白失败）事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所悉，他为了要同军统争高下，就火急约集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处长王思成、专门委员张冲、专员王杰夫等紧急磋商。拟由中统出面，并请蒋介石准许暂缓执行枪决，由中统派“干员”赴长汀劝降。旋即将磋商意见写成呈文，由陈立夫星夜晋见蒋介石，向蒋出谋献策，说瞿秋白为中共中委，有真才实学，最熟悉苏俄，如能为蒋用，则对中共影响颇大。但瞿秋白曾任中共领袖，要他立即转过来反对共产党，恐怕在面子上一时难以过得去，如能准许他暂不公开反共，而让他在南京主持编译室，负责翻译托洛茨基的书刊，他是有可能接受的。陈还吹嘘说，中统有一批善于做“说服”工作的“干员”，过去已卓有成效，若能派去工作，成功希望颇大。蒋阅罢呈文，即予照准。中统立即选派专员王杰夫、总干事陈建中和福建省调查室主任钱永建（在福州）等三人就劝降事宜进行详细研究。

正当中统加紧准备之际，军统则从中作梗。军统先是密电第36师师长宋希濂，要宋以“闽西原为共党老根据地，瞿久押恐生意外”为由，电请“迅速处决”。然蒋介石不准。不日，军统又急电福建属下张超，令其赶往长汀，抢在中统之前再次进行诱降，许以瞿秋白可以不公开反共，暂时迁到南京近郊疗养，俟身体恢复健康后再去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但仍为瞿秋白坚决拒绝。于是，宋希濂再电国民党军委会，历陈再次劝降经过和瞿秋白的“顽固态度”，并强调长期关押于长汀的危险，再次要求，“从速执行，以杜后患”。但蒋介石仍坚持“照原拟办理”。

中统为此慎重其事地聚会研究，设想了种种“说服方案”，并根据瞿秋白的身份、地位、学识、个性、爱好等诸方面的具体情形，反

复商讨了诱降时应采用的题材、语言、谈话的方式方法,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的对策,也预先一一作了决定。在为王杰夫、陈建中举行的饯行宴会上,他们一再叮咛“此行成功与否,关系我局前途至大,在委座前信用至大,切不可掉以轻心”,“到闽后要将这次重大任务详告各位同志。凡事要共同研究,竭尽智慧,作最大努力”,“工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9日“劝降”开始,遭到秋白严辞驳斥,以失败告终。

晨8时许,秋白身穿淡蓝色的中式便服,面容消瘦,精神尚佳”由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带领下,走进“谈话室”内。王等四人已在场,由向介绍说:“这是不远千里由京来汀挽救你的中央要员,望你好自为之。”王与秋白寒暄后,即请秋白在写字台旁坐下,并打开皮包取出两封信交给秋白,说是“从上海带来的亲友的亲笔信”。秋白接过信,随口说“谢谢”,只是朝信封看了一眼,便把信放在写字台右侧。经王一再催促,秋白才一一折阅了信件。谈话从相互询问籍贯等家常话开头,渐渐转入正题:

王:蒋委员长、陈部长对瞿先生的真才实学至为爱惜,只要瞿先生为国效劳,过去的事可以不加追究。我奉命由南京赶到长汀,就是来挽救瞿先生的。

瞿:谢谢你替我带来亲友的信,远道来“挽救”我,但我听不进,有负盛意,奈何!

王:瞿先生是当代名人,在共产党内威信很高,声望很大。不过现在中共已临末路,瞿先生若能识时务转变方针,为国尽力,前途未可限量啊!

瞿:当前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是抗日。日寇亡我东北,现又入侵华北、胶东,你们不去抵抗,却在这里空喊为国出力,前途何以之有?

陈:党国方针“攘外必先安内”,亦即先平定叛乱,统一国内,然后一致对外。现共军西窜,已临覆灭,国内统一局面已成,因而特派

我们前来争取你共同抗日。

瞿：内未安，内不安，这是事实。但是，国内安不了就不要攘外了吗？不要抗日了，让华北继东北而沦亡吗？不！历史事实证明：凡是对外越屈辱，就会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不满，这也就是你们认为的“内忧”，越来越大的“内忧”。因此你们所谓的“安内”实际上是对爱国力量的摧残、镇压，敌人的侵略就会越加猖狂，这难道不是常理吗？王先生，你是东北人，你对故乡沦亡的感受，总该比我深刻一些吧？

王：我对东北沦亡体会至深，有时夜深人静，常挥泪自勉，立志报仇。多年来，中枢当局对内力求统一，对外忍辱负重，用心良苦，现统一局势渐已形成，对外抵抗定将步步加强。

瞿：多年来，你们所谓的对内力求统一，对外忍辱负重，实际上就是要把抗日的武装消灭掉，把抗日的组织解散掉，把人民抗日的热情压下去，让日寇肆无忌惮地蹂躏中华！对于你们的这种亡国灭族的做法，广大不愿做奴隶的人民是绝不会答应的。

钱：瞿先生关心国事，令人钦佩！不过，今天我们初次见面，还是叙叙家常吧！

王：时间晌午了，瞿先生请休息休息，我们下午再谈。

王等回寓后，即对刚才的“谈话”进行研究，深感不是秋白的对手。认为以后的“谈话”宜从“建立感情”入手，“随时注意方式方法，尽量减少刺激口吻”。要求师部重新布置“谈话室”，多备些茶点，以添融洽气氛。

下午2时半，开始第二次“劝降”活动。

此时“谈话室”重新作了安排，在写字台上摆了四碟瓜子、花生、莲心、果糖和一罐香烟。

王：闽西平定，共军西窜，浙赣铁路畅通无阻，东南诸省一片升平景象，社会各行各业欣欣向荣，京沪市场繁荣活跃，……

瞿：东北四省早已沦亡，淞沪卖国协定墨迹未干，华北、山东又

危在旦夕，外患方盈，亏你们还说得出什么“升平”，什么“繁荣”！

王：少谈国事，少谈国事。你想家吗？瞿先生！

瞿：你想家吗？王先生，你是东北人，东北沦陷，家破人亡何止万千，你的家料想也难保全。日寇在淞沪侵略战争中，又使多少人家破人亡，我就有不少同志，亲友遭到不幸。古语云“国破家何在？”谈家常焉能不涉国事！

王：何必如此严声正色……京沪朋友都很关心瞿先生的身体和安全。这次我从上海带交的两封信，每封信都代表了许多关心瞿先生安全的心意。

陈：自从瞿先生被捕的消息传到京沪，许多亲友，甚至许多青年为瞿先生的安全担心，有的还向：“中央呈意见书，要求予以考虑的机会”。

王：瞿先生是明事理，通世故的智者，只要从长计议，自己也有极其光明的前途。

瞿：够了！我绝不作这样的考虑，更不愿听你们这样、那样的“教言”！

王：瞿先生怀念亲友，感情上难免不好过，请好好休息，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当晚，据师部副官电告，秋白回到囚室后“晚饭没有吃，只喝了几口汤。”王等均以为“谈话”非常成功，颇为得意，立即草拟电稿，报告中统局，夸耀“诱降”工作已“击中”瞿秋白“要害”，瞿“思想”已开始“转变”，“正在考虑”等等。王等四人一致同意继续采用下午这套方式方法。王兴奋地总结说：“不要急于将谈话生硬地搬到主题，要多研究如何去刺激这位布党的感情！要使他认为死不得，死得不值，产生生存下去的想法，一到这种机会，我们的忠言他听了就会顺耳！”）

10日 上午9时左右，王等四人抵达师部，又听取了师部副官的报告，说秋白“彻夜咳嗽，很少入睡，早餐只喝了半碗薄粥汤。”

按计划陈、朱两人回寓所整理第一、二两次谈话详细记录，王、钱继续同秋白“交谈”。王等原企图乘秋白身体不佳之机，一鼓作气“说服”成功，岂料秋白态度比昨“顽强”，不是装作未曾听见，就是故意避而不答。但一听到“红军西窜”时，就忘了囚犯身份，多次主动地、委婉曲折地探听情况，并几次请王、钱喝茶，吃茶点，“好比主人自居”。王无奈地说道：“今天上午是他在探索我们，向我们做工作呢！”

（根据三次谈话情形，王等四人决定下午休整。决定从明天起，采用以“激发感情为主，导入主题为副”的方案，使用“引导”和“规劝”的方法。还决定在“谈话室”里，备置老酒，以利工作。王、钱相约：“未经研究不准谈有刺激的题材，如果看到不利于说服的苗头一露，另一个人应立即把话锋转过来”等等。部署既定，由陈将这一方案电告南京。）

11日 上午8时许，王等四人方坐定，秋白身着长衣慢步前来。王趋前询问：

“瞿先生贵体可好一些？”

瞿：没什么，我的身体一向如此！

钱：听说瞿先生很喜欢汀州家酿，让我们来喝喝酒，聊聊天。

王：宋师长替我们布置了这样窗明几净的房间，又特备了浓茶美点，醇厚家酿，来一碗吧！“酒逢知己千杯少！”

瞿：“话不投机半句多！”

钱：我们不是谈得很投机吗？

瞿：国民党与共产党怎能相互投机？

王：瞿先生，喝一碗吧，我们祝你做当代的俊杰！

瞿：好吧，干一碗吧！你们要谈，那就谈下去吧。王先生，我要请教你，什么是“时务”，什么是“俊杰”？

王：善于观察和分析当前世界的事物，特别是善于处理自己的前途，象瞿先生这样真才实学的人，就是会识“时务”。

瞿：照王先生的逻辑，我做了你们的俘虏，投降你们，求免一死，替你们办不可告人的事，就是识“时务”，就是“俊杰”喽！

王：瞿先生，我们是看重你，并不把你当俘虏。瞿先生要识“时务”，认清当前大势，珍惜自己生命，爱惜自己前途，争取当个“俊杰”。

瞿：好，你们要谈“时务”，那就谈吧！本世纪初，苏联十月革命成功，震撼了世界，动摇了资本主义，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作出了榜样。从此，世界共产主义蓬勃发展，中国自从一九二一年建立共产党以来，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革命的果实虽然被你们国民党所篡夺，但我们共产党仍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为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幸福作斗争。自东北沦亡，日寇魔爪伸入华北，全国垂危！有志之士正揭竿而起，奔走呼号，如尚有人性天良的当权者，应该准许并积极发动和组织人民，捍卫国土抵御外侮。这就是当代世界大势，当前中国的时务。

王：瞿先生说的道理很对，不过作为你自己来说，为要替国家民族作一番事业，必须珍惜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存作打算，只有有了生命，然后才可徐图向当局条陈意见，实现你的宏图宿愿。

瞿：凡是认清了当前时务，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而斗争的人，无论是成功或失败，都不愧为当代的俊杰！终使失去了生命，虽死犹生，千千万万的人，将继承他的遗志，前仆后继，斗争至功成，死又何足惜耶？

钱见王无言以对，忙借酒扯开话题，说：瞿先生说得太累了，让我们再干一碗吧！

陈：这样的叙谈，虽然是有益的，但我总觉得离题太远，无济于事。

瞿：当然，除了喝酒之外，我同你们谈话是无济于事的，是不会达到你们的目的的！

王：今天我们各自畅抒己见，有助于相互了解。瞿先生累了吧？

下次再谈吧。

(王等回寓后,决定改变“谈话”方式方法,采取审讯的形式,对秋白施加压力,意图挽回败局。)

同日 鲁迅致曹靖华信。信中说:

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

12日 上午8时半,在同一“谈话室”内,对秋白进行“审讯”,由王、钱任审讯,陈、朱记录。

王:几天的“谈话”,没有结果,今天正式审问你(说完照例问明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职业、住所等)本人奉中央之命,专程来到长汀,规劝你放弃共产党,归顺中央,这是对你宽大为怀,你考虑了没有?

瞿:没有考虑。

王:你对政府的优待、挽救无动于衷吗?对你亲友的规劝、希望也都不顾吗?

瞿:没有什么好说的。

王:你只有三十几岁,就这样顽固,不愿活下去吗?

瞿:如果一个人只有躯壳,没有灵魂,那么活着不如死去!

王:老实告诉你,这次共军西窜途中,中共大部委员均已被捕,他们的地位不比你重要,但已认清大势,一一投降了,你何必这么顽固呢?

瞿:古语云:“朝闻道,夕死可也”。我不仅闻了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之道,而且还看到这个道正越来越多地为人民所拥护,千千万万人正在为它洒热血、抛头颅,不管遭受多大的牺牲,多少次的失败,总有一天会在中国,在全世界成功的。我瞿秋白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

王:你这样顽冥不灵,不是硬把自己的前途和生命葬送了吗?

瞿:葬在土里,会变成肥料,促进树木开花结果!

王:你这样不识抬举,就不要怪法律无情!

瞿：我从不考虑在你们法律上求得宽恕，更不懂得什么抬举不抬举！

钱：你这样顽固不化，有孚众望，但我们贯彻中央挽救的初衷，仍然给你再次考虑的机会。

王：下午再来问你，你好好考虑吧！（随即宣布审讯结束）

（王等四人回寓后，研究以后“诱降”如何进行。钱认为今天上午的审讯，对瞿秋白没有什么压力，一点效果也没有，况且拉破了面皮，今后更难谈了。陈认为改改方式，试试苗头，何尝不可。特别是让瞿秋白知道，如果一味顽抗不识抬举，是没有好结果的。王则说，“既然审讯过，就往好里想吧。”对下午的“诱降”工作，一致认为还是采取“谈话”方式为上策。）

下午2时半，开始第五次“诱降”活动。王等企图利用秋白对亲属的感情来动摇他的思想。

王：朋友亲戚关心你，中央挽救你也是爱惜你的才学，才派我们远道而来。那料到同你谈了好几天，你无动于衷乎？

瞿：王先生、钱先生，谢谢你们的好意。我问你们，这种关心和陷害有什么区别？我知道，你也知道，事实上没有附有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友家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长期给她带来耻辱和痛苦。杨之华不仅不要我叛党而生，她将为我的死而益增斗志。

王：我有一个假设，假设瞿先生不幸牺牲了，你瞿先生是希望中共中央为你举行盛大的追悼会吧？

瞿：我死则死耳，你何必谈什么追悼会？

（当晚，王等四人借宋希濂设宴招待之机，把连日“诱降”活动，作了扼要叙述，并要求多延几天时日，以便进行更细致的“规劝”工作。王等回寓后，又研究第六次“诱降”方案。除摆设茶点、烟酒外，还加备了围棋和象棋，“边饮、边奕、边谈，既显得轻松，又易于露出

真情。)

同日 再三要求阅报,卫士押他至新生活俱乐部翻阅报纸。

13日 上午,第六次“诱降”活动开始。

王:我们一向关怀瞿先生的身体,许多中央委员,凡是认识瞿先生的,无一不希望瞿先生能认清大势,从速抉择,改弦更辙,这样可以马上到京郊休息疗养。果夫、立夫都关心你,中央一再为挽救你,特派我们专程前来劝你,希望你能放弃那为国民所不容的非法活动,争取为党国效劳。

瞿:难道国民党的一切活动都是合法的吗?拱手送东北四省给日本,让日本入侵华北,签订卖国的淞沪协定,不准人民抗日,消灭抗日武装,难道一切都是合法的吗?

钱:近几年红军所实行的杀人放火政策,料想瞿先生是不会赞同的,这样的破坏总不能说是合法的吧?

瞿:杀人放火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是你们的委员长,是你们在“四·一二”背信弃义,实行了大屠杀,是你们在江西的所谓“围剿”中实行了烧光、抢光、杀光的政策。你们的白色恐怖,绝不能压服人民,你们欠下的血债,总有一天是要偿还的!

王:瞿先生,你这一席话,虽然我完全不能同意,可是你有许多话是出于误解,也有许多话是出于爱国热情,这些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当今中共在江西浩大的苏区尚无法立足,西窜到那赤贫的山区,还谈得到什么作为呢?

陈:红军西窜,路过那不毛之地,已全军覆没了!

瞿放声大笑:你们讲这些话的目的,无非是要我相信北上抗日的红军早已被消灭,从而使我对中国革命失去信心,投降你们,为你们效劳。但是你们的伎俩是骗不了人的,我从你们言谈的矛盾里,已经知道了红军西征北上的成功!

(王等觉狼狈不堪,遂摆开棋盘,与秋白对奕,未终局,王一推棋盘,说:“我输了,下次再来。”)

在返寓途中，王等四人相互责难，王把怨气泄在陈的身上，陈则分辩王没配合好，王又怪钱、朱到关键时刻为什么不来个转弯。）

下午，进行第七次“诱降”活动。为改变气氛，仍由王同秋白边奕边谈。但只要王一开口，便被秋白顶了回去。王作了最后努力：

瞿先生，生命是宝贵的，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你是不是愿意活着？

王：生命是宝贵的，一个人是只有一次生命，我愿意活着，但是

王：但是什么？往下说吧，我们会照你的意见考虑着办的。

瞿：但是你们要我活着，是要我当你们的傀儡，供你们驱策，与其这样的活着，还不如死掉的好！

王：我们不要你当傀儡。瞿先生，我们从南京到长汀来，因为你是一个非凡的人才，你的中文特别是俄文程度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你生存下去，可以作翻译工作，翻些托洛茨基最近批判联共的著作，这对你说来是轻而易举……

瞿：我对俄文固然懂得一些，译一点高尔基等文学作品，自己觉得还可以胜任。我与托匪毫无共同语言，他的谬论，我看也看不下去，那里说得上翻译呢？

王：给你再一次考虑吧，如果你愿意生存？

瞿：我被捕失去了自由，又要剥夺我的灵魂，利用我的躯壳，这没什么考虑的！

（第七次“诱降”失败，王等四人深知“说服”工作败局已定，无法挽回。王更焦躁不安，当晚竟大喝老酒消愁。）

14日 下午，在三十六师师部花厅中，对秋白进行正式审讯，由王审，钱记。形式与内容同上次雷同，主要内容有：

陈：瞿先生，你是去香港转向上海，你打算在香港住什么地方？有什么关系？到上海又打算住什么地方？有什么关系？

瞿视而不答。

王：请你说明中共中央过去发动过几次暴动？如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这个责任你瞿先生要不要负责任？

瞿：这些暴动都是中央发动的，发动这些革命运动的责任，在中央方面，我当然负责任。

王：中共中央和红军都西上了，江西等地的善后潜伏计划，你当然知道一些的，请谈一谈。

瞿怒形于色，拒绝回答。

在审讯最后，

王：瞿先生，我们决定明天就离开长汀回到南京。你是不是在我们走以前，最后表示你的真正态度。我们同你的亲友一样诚心地挽救你，爱惜你的才学。

瞿：劳了你们远道而来，几天以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昨天都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

钱：你要识大体，最近中共残部流窜而去，只余下几个小股，很快就要肃清，中国已经空前统一，中共穷途末路，大势已去，“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这样顽固迷信？我看瞿先生还是从速考虑罢！

王：你如果决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作公开的反共工作。你可以担任大学教授，也可以化名作编译工作，保证你不作公开反共。瞿先生你学识渊博，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所以我们为国家爱惜你的生命。瞿先生，你不着顾顺章转变后，南京对他优待。他杀人如麻，南京都不追究嘛！

瞿：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们这样做很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的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最后，秋白在审讯记录上盖了指印，并给亲友回了信，信中写道：“感激关怀，身体尚好，今后勿以我为念”等字句，别的什么也没有写。

当晚,三十六师为王等四人饯行。王杰夫哀叹:“我们不能作到瞿秋白为我们所用,这就说明我们工作的失败。”宋希濂拍着王的肩膀说,瞿秋白思想虽然“相当顽固”,但确实是一位“真才实学之士”,“他几个月来的言行,始终如一”。又说:瞿秋白虽是“敌党”,“但他确实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们党国就需要这样意志坚强的人。”“王专员等此次长途跋涉,备极辛劳,虽说服未成,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是尽人事而已,望勿难过。让我们举杯祝你一路平安!”

王等任务结束后,一行四人于翌日上午离开长汀,返京复命^①。

17日 宋希濂接蒋介石“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电令,决定于18日将秋白执行枪决。

宋希濂《瞿秋白被捕和就义经过》: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我先后接到蒋介石和蒋鼎文均是“限即刻到”的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当天晚上,我和向贤矩及政训处长蒋先启、特务连长余冰研究了执行这个命令的具体措施。商定六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在中山公园枪决……。

同日 夜,向贤矩奉命至秋白囚室,向他暗示蒋介石处决密令,希冀秋白有回心转意的表示。但秋白“面色没有一点变化,若无其事”。

18日 上午10时,在长汀罗汉岭前英勇就义,终年三十六岁。下午,遗骸葬于罗汉岭盘龙岗。

晨8时许,秋白披阅唐诗,有感,伏案写绝笔诗《偶成》一首: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

① 参见许映湖、王仰清:《国民党中统诱降瞿秋白同志始末记》、陈铁健:《最后的斗争——瞿秋白就义前后》、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等有关资料。

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①

正书写时，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来到囚室，向秋白出示枪决令。秋白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随即提笔写道：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讖，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书毕，秋白在来人押送下，步入作为临时法庭的师部正屋时，宋希濂和师部军官百余人分站两旁，由庭长吴淞涛开庭宣判。

9时20分，秋白在蒋先启陪同下，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大门。他身着中式黑色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昂首直立在中山公园亭前拍照。随即步至亭中，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

餐毕，约10点钟，秋白走出中山公园，缓步走向刑场。中山公园至刑场约两华里，秋白手持香烟，神色不变，仪态从容，缓缓而行。沿途用俄语高唱《国际歌》、《红军歌》，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走至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

① 第一句集韦应物《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

第二句集郎士元《题精舍寺》第六句，原诗“木”字，改作“叶”字；

第三句集杜甫《宿府》第七句；

第四句集郎士元《题精舍寺》第四句。秋白引用该诗时易一字，改“流”作“山”。

官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中间，盘足而坐，点头微笑地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宋希濂《瞿秋白烈士被捕和就义经过》：

六月十八日早晨八点多钟，在警戒方面部署妥当后，向贤矩走入秋白先生室内，将蒋介石的电报交秋白先生看，据向贤矩告诉我，瞿先生看了后，面色没有一点变化，若无其事。九时许，我和司令部的大部分干部，共约一百多人，都先后自发地走到堂屋里来了，九时二十分左右，秋白先生在蒋先启的陪伴下走出他住了一个多月的小房间，仰面向我们这些人看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走出大门。时间只是一刹那，但秋白先生这种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使我们这些人既震惊，又感动，默默离开了那间堂屋。

由司令部走到中山公园，只有六、七百步，这个公园占地不大，环绕一圈，不过两里多，周围有些树木，中间有一小运动场，靠东边有一个用土砖砌成的讲台……

秋白先生在蒋先启的陪同下，来到公园，在那座讲台的前面停下来，当时除周围担任警戒的士兵外，在场的仅有特务连官兵三十余人。

执行后，蒋先启回到司令部向我和向贤矩报告执行情况，说秋白先生到了公园后，向在场的人作了十多分钟的讲演，主要是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是要实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使人人都能过美好幸福的生活。他相信这个理想迟早一定会实现，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最后一定会失败等语（大意如此）。秋白先生讲完后，举起右手高呼：

打倒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据蒋先启说，当秋白先生喊完口号后，他便命令士兵开枪，结束了秋白先生的生命，时间约在十时左右。

将秋白先生处决后，我叫人买了一口棺材装殓，即埋葬在中山公园的旁侧。

在六月十八日下午，我将处决瞿秋白的情形，分电向蒋介石、蒋鼎文报告。

附：

宋希濂向李默庵电告：

青密。瞿匪秋白已于本日上午十时遵令执行枪决。除将该匪照片及处理经过各情形另外呈报外，谨先电闻。职宋希濂叩。巧午印。

《大公报》“长汀通讯”(1935年7月5日)：

瞿秋白系共党首要。本年三月中旬，于长汀水口地方被保安十四团钟绍葵将其俘获，当时瞿犹变名为林琪祥。拘禁月余，莫能辨认。后呈解长汀，经三十六师军法处反覆质证，彼乃坦然承诺，于是优于待遇，另辟闭室。时过两月有余，毫无信息。今晨忽闻瞿之末日已临，登时可信可疑，记者为好奇心所驱使，趋前叩询，至其卧室，见瞿正大挥毫笔，书写绝句。

书毕，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继而高唱国际歌，打破沉寂之空间。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回首一顾，似有所感也。既至刑场，彼自请仰卧受刑。枪声一发，瞿遂长逝人世矣！

高春林《我所知道的瞿秋白烈士就义前后》：

伪师部于同年6月18日上午开庭宣判，由审判长吴淞涛和我两人出席。当吴淞涛当庭向瞿秋白宣读判决瞿的死刑布告后，询问

秋白：“如对家庭有遗嘱，可以当庭书写”。秋白泰然作答：“没有”。于是吴淞涛命我宣读“宣判笔录”后，即宣布将“被告”瞿秋白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陈子刚回忆：

（瞿秋白）就义前几天，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最近情绪不太好，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在森林中漫步，阴森的，这是不好的预兆。其次，看上去是文弱书生，实际上是一个硬汉，平时看不出来，关键时刻才能认识一个人真正的伟大。1935年6月18日，宋希濂动用了150多人的特务连，将瞿先生带赴刑场。从囚室到就义的罗汉岭有两华里多山路，瞿先生镇定自若，视死如归。当时，我都不忍去现场。事后，管药材的少校主任曹文桂告诉我，就义前，瞿先生对执行者提出了两点要求：我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点就是不能打我的头。最后，他盘膝而坐，子弹穿过心脏而英勇就义^①。

许荫秋回忆：

1935年6月18日清晨，国民党三十六师令赖绍九和我到原汀州中山公园待命拍摄。一大清早，我们来到没有人影的公园里等候着。突然，从三十六师师部一个通向公园的边门走出一个中年人（后来才知道是瞿秋白），他身着黑衣白裤，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信步来到凉亭。当时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已向他出示枪决令，但瞿秋白毫无惧色，轻蔑地笑了笑，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随后，他悠然自在地站在凉亭拍了就义前之照。……

瞿秋白拍照后又回到囚室。这时凉亭石桌上摆了一些菜和酒，周围出现了武装士兵。不到半小时，瞿秋白又信步来到凉亭，他绕

^① 纪白《瞿秋白在狱中侧记——访盐城卫校陈子刚先生。

着石桌漫步而行，一边喝酒一边高唱《国际歌》，高呼“共产主义万岁！”接着，他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昂首阔步走向刑场……

瞿秋白来到西门外罗汉岭前，他环视四周：山上青松挺秀，山前绿草如茵，便点头微笑说：“此地很好！就在这里。”^①

^① 许荫秋是原长汀园艺照相馆摄影师。

附录一：

多 余 的 话

瞿 秋 白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①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話。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

^① 这是诗经《黍离》篇中的两句。相传周平王东迁后，其旧臣行役到故都遗址丰镐，见往日的宗庙宫室都平为田地，尽为禾黍。这种悲凉景象，引起他无限感慨，忧伤彷徨，因而作了此诗——《黍离》。

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①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瞿 秋 白

一九二五·五·十七于汀州狱中

^① 小布尔乔亚,即小资产阶级,法语 un petit-bourgeois 的音译。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甚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做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①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

^① 《新社会》系旬刊，瞿秋白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等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创办于北京，次年五月，被反动当局封闭。

罗斯研究会”罢?)^①,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②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〇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我就多读了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③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些〔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〇年八月)^④。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⑤,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

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在李大钊的组织和指导下,由当时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等人发起,一九二〇年三月创立于北京。不久,瞿秋白加入该会。

② 此为《妇女与社会主义(Femme et Socialisme)》一名之误。其作者倍倍尔(1840—1913)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者和领导者之一。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了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明确指出私有制的产生是社会上“轻视甚至蔑视妇女”的开始。瞿秋白不仅读过倍倍尔这本名著,而且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三日翻译过倍倍尔的著作《社会之社会化》一文(刊载于《改造》,第3卷,第4—7期)。

③ 《晨报》是进步党前身研究系的机关报,初名《晨钟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停刊。

④ 据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一书中记述,他是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六日从北京动身去莫斯科的。这里的“八月”,可能是瞿秋白接受北京晨报馆聘请的日期。

⑤ 陈独秀这次到苏联是参加共产国际在彼得堡(后移于莫斯科)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参加会议者还有瞿秋白、刘仁静等人。

回来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三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的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①。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于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此处，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得好象是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

^① “四大”之后，瞿秋白同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五人主席团（即中央常委会）。

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只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二〇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召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所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形势〕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方面也是十几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脆弱之二元人物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辘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

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经〔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满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算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无〔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病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〇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智〕昏聩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经〔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炼呵！

或者，这不仅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廉韶，还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的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继续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

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米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够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没有公开的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一(以)至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的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待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份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个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

过份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至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干吗？！我想，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的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①——直到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来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

^① 《大乘起信论》是佛教论著。其内容为阐释大乘教理，提出了“真如缘起”之说，与法相宗的“阿赖耶缘起”说相对立，引起许多争论。

——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级〔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么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有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过一遍，作为预备。其他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那是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上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已经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的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

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是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的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幼稚的论著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〇年，我虽然在国际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智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智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就完全暴露了。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么简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考”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

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的走去，不知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有气力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stop^①。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做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更进一步的关口，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确的。武汉分共之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秋收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无〔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一般的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的；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

^① stop 是终止、结束的意思。

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的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念，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严重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行〔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重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之间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〇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抑制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之后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的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错误路线，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念——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的

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保持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觉得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的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致〔至〕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的委员。我呢，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钧万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象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气力也已经疲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惜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愈，耗费了三年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的——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可是，既然苏维埃中央政府担负了一部分的工作，虽然不必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加一切政策的最初讨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却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为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罢。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革命奋斗，为

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一些，说“奋斗”是实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都决不应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一九三五·五·二十

“文人”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得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智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使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但是也会纠正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的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些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就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

新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智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消闲的工具。究竟在那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智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得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连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还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的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末，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

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去。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一——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为什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会总有的。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它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板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象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则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候，对于政治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智识和累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蜿蜒、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实际生活，总象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智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候，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者清理一本账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那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

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来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候，只是创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智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的孤独，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言语”，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的，我学着比较精细的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的用力。书是乱七八糟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的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趣味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个“读者”。

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智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了。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文方面每字每句的斟酌着，也许不

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在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告 别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是始终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账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

士，实在太那么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因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〇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的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科学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得或许是很可笑的，A？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闭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①，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一九三五·五·二二

记忆中的日期

——附录

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九〇二

一九〇五

一九〇八冬

一九〇九春

一九一五夏

一九一六 二月

二月

八月

十二月

一九一七 四月

九月

一九一九 一月

生于常州

入私塾

入常州冠英小学

初等小学毕业

入常州中学

因贫辍学

母亲死

赴无锡南郊某小学任校长

是年父亲赴济南，弟妹分散

辞无锡教职返常州

抵汉口考武昌外国语专修学校

在北京应普通文官考试未取

入俄文专修馆

与耿济之、瞿世英等组织《新社会》杂

^① 近年来多译作《罗亭》。

	五月	志
一九二〇	八月	任俄专学生会代表
一九二一	一月	应北京晨报聘起程赴俄任通信员
	五月	方抵莫斯科
	九月	张太雷抵莫介绍入共产党
一九二三	一月底	任东大翻译始正式入党
	七月	返国抵北平
	九月	参加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
		返沪任上海大学教职
		是年加入国民党
一九二四	一月	与王剑虹结婚
	一月	赴粤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七月	剑虹死,赴粤
	十一月七日	与杨之华结婚于沪
一九二五	一月	参加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被举为中委
一九二七	二月	写批评彭述之的小册子
	三月	赴武汉
	四月	参加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仍任中委
	七月(宣言退出国民党)	赴庐山
	八月七日	参加“八七”紧急会议会后实际主持政治局
一九二八	四月三十日	离沪出国
	六月	参加共产党六次大会仍任中委留莫为中国共产党代表
一九三〇	六月	撤销驻莫代表职
	七月	起程返国仍在政治局工作
	九月	参加共产党三中全会
一九三一	一月七日	参加共产党四中全会被开除政治局委员之职请病假
一九三二	秋	病危几死
一九三四	二月五日	抵瑞金任教育人民委员

一九三五 二月十一日
二月二十三日
二十六日
五月九日

离瑞金
抵福建汀州之水口被钟绍葵团俘
入上杭县监
解到汀州三十六师师部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一、文件、文献

- 《六大以前》 中共中央书记处 人民出版社 1980年
《六大以来》 同上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党校 1982年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编》 同上 同上 1983年
《中共中央党史报告选编》 同上 同上 1982年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
《八七会议》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年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人民出版社 1987年
《文献与研究》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
《毛泽东选集》
《周恩来选集》(上卷) 人民出版社 1980年

二、著作

- 《瞿秋白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年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人民出版社 1987年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
《瞿秋白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85年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中华书局 1979年

- 《中国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
- 《中国语文的新生》时代出版社 1949年
- 《王明言论集选辑》人民出版社 1982年
- 《瞿秋白诗歌浅释》周洪兴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
- 《瞿秋白思想研究》丁守和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
- 《瞿秋白论稿》王铁仙著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5年
- 《瞿秋白研究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年
- 《瞿秋白研究》“纪念瞿秋白烈士就义50周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编
- 《瞿秋白研究》“纪念瞿秋白诞辰九十周年”常州瞿秋白纪念馆、瞿秋白研究会
1989年
- 《瞿秋白研究》(3) 学林出版社 1991年
- 《瞿秋白研究资料》江苏省社科联等编印
- 《瞿秋白研究资料》常州教师进修学院编印
-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编印
-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黄修荣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
-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德〕郭恒钰著 李逸六译 三联书店 1985年
-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向青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年
- 《莫斯科大学与王明》曾仲彬、戴茂林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
- 《从容共到清党》李云汉著 台北出版社 1966年
- 《米夫关于中国言论》人民出版社 1986年

三、传记、回忆录

- 《瞿秋白传》陈铁健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
-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王观泉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年
- 《瞿秋白传》王上菁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
- 《新闻界人物·瞿秋白》许焕隆著 新华出版社 1983年
- 《瞿秋白年谱》周永祥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年
- 《回忆秋白》扬之华著 人民出版社 1984年
- 《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
- 《瞿秋白文学活动纪略》曹子西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年
- 《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著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年
-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7年

- 《周恩来年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90年出版
- 《国父年谱》 罗加伦主编 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
- 《包惠僧回忆录》 人民出版社 1983年
- 《我所走过的道路》 茅盾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
- 《懒寻旧梦录》 夏衍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年
- 《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
- 《李大钊年谱》 (河北文史资料第三辑) 1981年
- 《陈独秀年谱》 唐宝林、林茂生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
- 《陈独秀传》(上) 任建树著 同上 1989年
- 《邵力子传》 朱顺佐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88年
- 《鲁迅回忆录》 许广平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1年
- 《回忆鲁迅》 冯雪峰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
- 《回忆亚东图书馆》 汪原放著 学林出版社 1983年
- 《榕园载记》 罗章龙著 三联书店 1984年
- 《往事沧桑》 伍修权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年
-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时代》 [美]艾·史沫特莱著
王华译 三联书店 1979年
- 《中国纪事》 [德]奥托·波劳恩著 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 《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 [苏]A·B·巴库林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
-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
- 《我的回忆》 张国焘著 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 《往事回忆》 黄季平著 人民出版社 1981年
- 《王明评传》 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9年
- 《王明年谱》 周国全、郭德宏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年
- 《我所知道的墨秋白》 郑超麟著 未刊稿
- 《胡汉民年谱》 蒋永敬编 台湾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出版 1978年
-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年

四、资 料

《新社会》

《晨报》
《时事新报》
《向导》
《布尔什维克》
《新青年刊季》
《东方杂志》
《解放与改造》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前锋》
《热血日报》
《红旗》三日刊
《红旗周刊》
《红旗日报》
《斗争》
《红色中华》

（以上均系人民出版社影印本）

《党史资料》第四辑 中央宣传部编印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党史通讯》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出版
《中共党史教育参考资料》第六、十五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印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中国职工运动史料》 1982年第四期
上海《党史资料丛刊》 1979年第一、二辑,1980年第三辑,1981年第二、四辑,1982年第四辑,1983年第三辑
《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编 知识出版社 1988年
《上海大学史料》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年
《新文学史料》 1980年第一、三期,1982年第三、四期,1983年第一期,1985年第二、四期
《人物》 1982年第四期,1991年第六期
《南昌起义》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年
《南昌起义资料选辑》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年
《秋收起义》 同上 1982年

- 《广州起义》 同上
- 《江西党史资料》(二) “中共中央分局资料专辑”
江西省委党史教研室 1987年
- 《江西党史通讯》第九、十五期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
- 《于都人民革命斗争史纪略》 江西省于都革命历史纪念馆 1980年
- 《回忆中央苏区》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
- 《苏区教育资料选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
- 《江苏革命史料选辑》 1983年第六辑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江苏省档案馆编
- 《江苏党史资料》 1985年第二辑 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
- 《革命史资料》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 《长汀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
福建省长汀县委员会编印
- 《浩气贯长虹》 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1985年
- 《浙江党史通讯》 1987年第四、九期,中共浙江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
- 《近代史研究》 1981年第二期、1988年第三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
- 《革命回忆录增刊》(一) 人民出版社 1983年出版
- 《革命史资料》(2)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年
- 《新华文摘》 1981年第二期
- 《军史资料》 1985年第四期
- 《新昌县党史通讯资料》 1985年第四十八期
中共新昌县党史征集委员会编印
- 《山花》 1981年第七期
- 《春秋》 1985年第五期
- 《文物天地》 1981年第三辑、第六辑
- 《革命文物》 1980年第三、五、六期
- 《国闻周报》 1935年1月第十二卷第26期
- 《申报》 1935年7月5日
- 《救国时报》 1936年10月30日、1937年6月17日
- 《逸经》 1937年第25、28、34期
- 《罗易赴华使命》 [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年
-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同上 1982年
元锡《工人生活》 1957年第六期
《学习与研究》 1981年第一期
《复旦学报》 1983年第四期
《党史研究》 1980年第六期
《历史研究》 1979年第三期
上海《社会科学》 1979年第三期
《文汇报》 1962年6月19日、1980年6月17日
《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 陈玉堂编 红旗出版社 1985年

后 记

八十年代初,我们开始瞿秋白的研究;1985年6月,在常州参加纪念瞿秋白就义5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进一步确定编写《瞿秋白年谱长编》。

经过多年的努力,收集到资料数百万字。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既注意到便利于专家学者的研究,又考虑到篇幅不宜过长,采取了详略结合的原则。本书除1932年至1933年约请陈依群撰写外,其余部分均由我们集体收集资料,分工撰写。《前言》由姚守中、耿易执笔,集体定稿。耿易和姚守中还负责全书体例的统一,史料的考订、增补和注释,最后由耿易审阅定稿。

本书得能奉献在读者面前,首先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出版上给予大力的支持。杨杰和马洪才同志为本书的编辑加工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收集资料、编写和出版的过程中,还得到常州瞿秋白纪念馆和赵庚林同志的协助,还得到郑超麟先生和高介子同志的热情帮助。我们吸收和运用了其他同志已出版的瞿秋白研究的成果,除了在附录注明外,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编著者

1992年6月